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新 孙思白 主编

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新 孙思白主编

中华书局

1978年·北京

689486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新 孙思白主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13 印张 265 千字

1978 年 8 月第 1 版 197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8·751 定价：1.00 元

前 言

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们接受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当即召开座谈会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根据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初步设想:

一、编写《中华民国史》,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绝不能因袭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修史方法。

二、写一部书,定名为《中华民国史》,拟分三编:

第一编 中华民国的创立(1905—1912年)

第二编 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1912—1927年)

第三编 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1927—1949年)

三、编三种资料:

第一种 《中华民国大事记》

第二种 《中华民国人物志》

第三种 《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

关于人物志,需要写传记的约一千人;列入人名辞典的约四千人;另外还拟编制若干人物表。

如何写传记,我们毫无经验,只预先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一个人写传记，必须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了总的概念、对他的主要言行有了具体的判断、并且自信这个概念和这些判断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然后才可以下笔。

二、要求用记叙文，不要写成评传。要通过具体的事实把正确的观点表现出来。不要离开事实材料，作过多的评论。对事实的取舍、详略以至措辞用字，都必须仔细斟酌，务求妥贴。

三、要求真实可信。传记中所写的事实，要经过反复核对，有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务求做到确实无误。凡是有疑问而又查不清的，宁可写或不写，不要以讹传讹。

四、要求在反映一个人的全貌的同时又要有重点与特点。一个人的传记，要把他的家庭情况、上学情况、主要的经历和言行，总而言之，要把他的生平事迹如实地反映出来。但又不要写成流水帐或年谱。要把最能反映本质的事情，选其中最重要的一两件写得详细、生动些，其余的不妨简略。

五、要求用白话文写，文字要力求简练。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引文，引文要注明出处。每篇以二、三千字为准，不要写得太长。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非全国大协作不能成功。即以写人物传记而论，那个行业的人由那个行业的人来写最好，那个地方的人由那个地方的人来写最好。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我们希望这批初稿，能引起各方面和全国各地方的兴趣，大家都来写，尤其是

熟悉情况的人动手写，那么《中华民国史》就不难完成了。我们还希望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志，不但自己动手写，而且要把有关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承担起来。

目 录

孙中山	尚明轩 (5)
黄 兴	周天度 (35)
宋教仁	周天度 (43)
陈天华	周天度 (48)
秋 瑾	闻少华 (52)
徐锡麟	闻少华 (58)
朱执信	尚明轩 (62)
熊成基	黄德昭 (68)
焦达峰	周天度 (72)
张培爵	沈庆生 (76)
禹之谟	闻少华 (81)
喻培伦	尚明轩 (85)
林述庆	王学庄 (89)
蔡 锷	张振鹤 (93)
伍廷芳	郑则民 (101)
陈其美	黄德昭 (105)
邓演达	傅洪奎 周天度 (111)
杨虎城	黄德昭 (119)

唐绍仪	郑则民 (126)
胡汉民	周天度 (131)
黄 郭	郑则民 (140)
袁世凯	李宗一 (145)
徐世昌	李宗一 (156)
段祺瑞	李宗一 (162)
曹 锟	张振鹤 (172)
张作霖	黎 光 孙继武 (179)
陆荣廷	李宗一 (190)
李 纯	张振鹤 (198)
徐树铮	李宗一 (204)
孙传芳	张振鹤 (208)
张 勋	李宗一 (215)
梁士诒	郑则民 (221)
陆征祥	郑则民 (227)
曹汝霖	郑则民 (231)
张宗昌	黄德昭 (236)
韩复榘	沈庆生 (243)
石友三	沈庆生 (248)
秦德纯	沈庆生 (253)
张 睿	朱信泉 (259)
徐 润	江绍贞 (266)

穆藕初	朱信泉 (270)
吴蕴初	朱信泉 (274)
荣宗敬、荣德生	江绍贞 (278)
郭 乐	江绍贞 (285)
夏瑞芳	熊尚厚 (291)
宋则久	熊尚厚 (295)
简照南、简玉阶	熊尚厚 (298)
严裕棠	熊尚厚 (304)
杨燊三	熊尚厚 (309)
杜月笙	江绍贞 (314)
康有为	耿云志 (320)
▲蔡元培	宗志文 (328)
邵飘萍	耿云志 (335)
陶行知	宗志文 (342)
朱自清	娄献阁 (349)
史量才	耿云志 (356)
马相伯	娄献阁 (360)
王国维	耿云志 (366)
丁文江	耿云志 (370)
邹 鲁	闻少华 (377)
刘师培	朱信泉 (382)
罗振玉	耿云志 (387)
江亢虎	曾业英 (391)
田耕莘	雷镇阁 (399)

余日章.....雷镇闾 (402)

附录:《中华民国人物志》中的《民国人物传》
选录草案(405)

孙 中 山

尙明轩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因此以后又号中山。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出生在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翠亨村。其时中国正处于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他的父亲孙达成，年轻时在澳门当鞋匠，后归家务农。哥哥孙眉，1871年到檀香山作雇工，后经营畜牧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华侨资本家。

孙中山六岁起在家参加农业劳动，十岁进塾读书。他的童年时代，正值太平天国失败不久，听到人们讲述洪、杨革命故事，非常向往。1878年，他随母亲到檀香山，住在哥哥家里，先后进英、美教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及奥阿厚书院读书，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1883年返回家乡，目睹清吏腐败，深感不满，常加批评。因毁村庙偶像，为豪绅地主所不容，于同年冬往香港。1884年到1885年间，先入拔萃书室、后转域多利书院读书。

1885年，中法战争以清政府向法国侵略者屈服而告终。孙中山怵于民族灾难的深重，产生了从事改造国家的念头。他打算“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①便于1886年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校学医。在这里，他结识了

同学中的会党人物郑士良，以后在革命过程中运动会党起事，得郑助力甚多。第二年秋，他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到1892年毕业。在校五年，他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与先后结识的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尤列等人，志趣相同，经常聚谈，倡言革命。其中和陈、杨、尤三人同住香港，交游尤密。当时革命尚未兴起，人们听到他们的革命性言论，都认为是大逆不道，把他们四人称为“四大寇”。

孙中山结束学生生活后，从1892年起，先后在澳门、广州开设西医房，借行医为掩护，积极结识一些对清朝统治不满的爱国青年和会党分子，互相议论时政，寻找救国道路，开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

当时，改良主义思潮正在国内盛行，孙中山及其同志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对统治阶级上层某些人物存有若干幻想。早在1889年，他就曾致书已退职的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提出过效法西方国家以进行改良的具体意见，建议先在香山倡行，然后推广全国各地。^②1894年6月，他又约同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③的变法自强的主张。李鸿章对他的投书没有理睬。

通过事实的教育，孙中山觉悟到上书言事的“和平之法，无可复施”^④，只有用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救中国。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起，清政府在战争中接连遭到失败，孙中山更感到国家民族的危机严重，便决定赴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11月，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经孙中山倡议，在檀岛成立。《兴中会章程》中

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进而说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③入会者必须宣誓。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④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联合同志，于2月21日在中环士丹顿街成立兴中会总部，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不久，大家商议袭取广州的计划。其时，清政府刚与日本缔结了《马关条约》，全国人民对于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无不痛心疾首。于是他们加紧筹备，商定由孙中山率郑士良、陆皓东等入广州主持发动，由杨衢云、黄咏商等留港接应，并决定于当年10月26日（夏历九月初九日）举行起义。经过半年的筹备，广东省各地的会党、绿林和防军，均已联络成功，不料在起义前两日，正当运械赴广州时，事泄失败。陆皓东等被捕遇害。孙中山逃亡日本。这是孙中山武装起义的第一次失败。

孙中山在日本联络华侨，11月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他断发辮，改服装，以示革命决心。之后，再往檀岛。时当新败，不易开展工作，于是在1896年6月又赴美国联络华侨。但当时美洲华侨，风气闭塞，愿赞助革命的不多；与洪门会会员有所接洽，也收效不大，遂决定渡海往英国。10月1日他到达伦敦，首先访问了他学医时的老师英人康德黎（J. Cantlie），并在康寓附近住下来。10月11日，孙中山在外出途中被清

政府驻英公使诱骗绑架，羈囚在使馆里。使馆人员准备把他偷运回国杀害；幸得康德黎等多方设法，积极营救，才于十二天后脱险。此后一年，他留住伦敦，每天到图书馆中努力钻研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等理论书籍，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寻求救国真理。这时期，孙中山由于接触到些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说，加以目睹伦敦的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遭政府军队残酷镇压的情景，感触颇深，从而产生了用民生主义来把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解决的初步设想。

孙中山不愿久留欧洲，远离中国，旷废革命时日，遂于1897年秋，重到日本；并结识了日本朝野的许多人物，其中不少人都对他的革命事业表示同情或赞助。1898年9、10月间，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亡命日本。由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居间联络，劝说孙中山等和他们谈判合作。于是，陈少白代表革命党人要他们“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⑦由于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的顽固立场，谈判不得结果。^⑧1899年夏秋间，孙中山又与梁启超等在横滨继续就合作问题进行多次会谈，因康有为强烈反对，梁启超口是心非，联合的计划终未实现。此后，孙中山逐渐识破了康有为保皇派的反动面目，并认为他是个“坏透了的孔学家是一文不值的”。^⑨

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津一带，清政府于6月对外“宣战”。当时英国政府为镇压中国人民，与沙俄对抗，并“保护”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侵略利益，拉拢张之洞、刘坤一等策动“东南互保”；又策动粤督李鸿章据两广“自主”。香港议员英籍华人何启，在港督卜力(Henry A. Blake)授意下，与

陈少白秘商，拟请孙中山帮助李鸿章组织“独立”政府。李鸿章幕中要人刘学询函邀孙中山来粤“协同进行”。孙中山得讯后，开始有些犹豫，随后决定：一面仍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一面偕杨衢云、宫崎寅藏等赴广州同李鸿章商谈“合作”。他抵香港后，得知李鸿章尚在观望形势，看风转舵；且有企图诱捕自己的阴谋；便拒绝前往广州，乘原船赴越南再转香港。7月，孙中山仍拟借英国力量推翻清朝，在南方成立“独立”政府^⑩，来实现他救国的目的。这些活动，表明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中“洋务派”的幻想还没有完全破灭。

孙中山在日本于准备再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对菲律宾人民的解放事业也给予热情的支持。他早在1898年和菲律宾人民起义军派到日本的代表彭西（Maroano Ponce）有过接触，并应其所请，积极帮助。1899年，他们为他们购买和运送了一批军械，并准备亲率杨衢云等赴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1900年1月，他再次设法为他们购置了一批枪械。这种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行动，在旅日的亚洲各国革命人士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同年10月，孙中山又组织了惠州起义。这次起义是郑士良等奉孙中山之命进行的。惠州起义军一度发展到二万多人，血战逾半月，但最后终于失败。

1901年至1904年，孙中山远涉重洋为革命四处奔走：1901年他在日本，1902年冬到越南，1903年秋又从日本往檀香山，1904年春再去美洲，至年底又由美洲到了欧洲。这次所到之处，与从前大不相同，华侨与留学生中同情或赞助革命的人空前地多起来了。因为自《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民

族危机更加严重,清政府威信扫地,人民的不满迅速增长。同时,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所增强。不少地方蓬勃地开展抵制美货及收回铁路矿权的运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地掀起抗捐抗税的运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日益倾向革命。国内外各地继兴中会之后,又陆续涌现了一些革命团体。如1902年留日学生组织的青年会,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1903年留日学生成立的拒俄义勇队(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湖南组成的华兴会、武昌组成的科学补习所、上海组成的光复会,1905年上半年湖北创立的日知会等等。与此同时,宣传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各种报刊书籍也纷纷出现,促进着人们的觉醒,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时,中国已处于革命风暴的前夜。

但是,从1898年秋流亡在海外的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念念不忘他们的“圣主”,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又于1899年7月以后,在加拿大等地组织保皇会,反对和破坏革命。同年12月,狡猾的梁启超忽然伪装愿与孙中山合作,骗取了孙中山给孙眉等兴中会员的介绍信,持赴檀岛,用“名为保皇,实则革命”^①的谎言,混淆视听,诱骗华侨加入保皇会。兴中会发源地的檀岛,会员被夺去大半。海外其他各埠兴中会员,也受他们的迷惑,不少转入保皇会,为康、梁所利用。1902年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停刊后,又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他惯于在字里行间玩弄些“革命”的词藻,用来蛊惑群众。这一套骗人伎俩,逐渐地为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所识破。早在1900年,孙中山对梁启超上年在檀岛招摇撞骗的无耻行径已给以严厉的

谴责；随后，在孙中山指导下，横滨的革命派半月刊《开智录》、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对保皇派一些报刊（如《清议报》、香港《商报》、广州《岭海报》以及后创的《新民丛报》等）上的反动谬论，都进行批驳。两派之间初步进行了理论上的交锋。

1903年10月，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看到檀岛各埠华侨误入保皇会的很多，自己亲手组织成立的兴中会，因梁启超等人的破坏而面目全非，不少老会员都变为保皇会的骨干，痛感保皇会的危害性。认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②，决心与保皇派的主张“划清界限，不使混淆”。他一面在檀埠和希炉(Hilo)等地，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公开演讲，驳斥保皇派的各种谬论。一面改组华侨程蔚南所办商业报纸《檀山新报》为革命喉舌，亲自撰文和保皇会机关报《新中国报》展开笔战。他针对保皇党徒对革命的攻击及《新中国报》主笔陈某发表的《敬告保皇会同志书》一文的谬论，于1903年底和1904年初，先后发表《敬告同乡书》及《驳保皇报》两文。在两文中，孙中山猛烈抨击保皇派的宣传，揭破他们所讲的“爱国”，是爱的虐民媚外的“大清国”，而不是“中华国”，所讲的“革命”是假革命。他们所谓“借（保皇）名以行革命”，全是骗人的。他尖锐地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此外，孙中山还驳斥了他们所谓革命可召瓜分说的可笑，指责他们先行“立宪君主”才能行“立宪民主”说法的荒谬。断言他们没有政治学常识和不懂逻辑，他们是“感世诬民，遗害非浅”的。这些讲演与文章，有力地揭穿了保皇派的反革命真面目，帮助许多侨胞逐步了解到革命与

保皇的区别，使许多误入保皇会的人重新回到革命派立场上来，在檀岛各埠发生很大的影响。

1904年夏，孙中山离开檀岛到了旧金山。那里是保皇派势力集中之地，华侨中的上层人物多受“保皇”宣传之骗。孙中山为了使宣传易于生效，先在小商人及工人中进行活动，发表公开演讲，力驳“保皇”谬说，博得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同情。同时，指派干部改组《大同日报》成为革命派在美洲华侨中的重要喉舌，使该报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偕同美洲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到美国几十个城市访问，在华侨中间广泛进行革命宣传，肃清保皇派的流毒。

孙中山与保皇派经过激烈的论战，初步打击了各地保皇派的嚣张气焰，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为同盟会的建立进行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05年初，孙中山在比、德、法等国，向中国留学生宣传革命，建立革命组织。7月，他由欧洲再到日本，在东京会晤了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针对过去革命团体的分散状态，商议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8月13日，他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作了长篇讲演，再一次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和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③并批驳他们污蔑中国人“愚蠢”的谰言，指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他高度赞扬中国人民的智慧，认为只要敢于革命，就一定能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坚决主张从革命着手，在封建皇朝的废墟上建立民主共和国。接着，他和黄、

宋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并联合光复会等反清团体，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在《章程》中提出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翌年制订的《军政府宣言》中还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作号召，对同盟会的四条政纲分别作了阐释。）11月26日，《民报》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里，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共和国，并且设想通过某些社会经济改良政策，以求避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带来的“祸害”。这是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以来政治思想的巨大发展，也是他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特点，它的提出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件大事。

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继续深入开展和改良派的斗争，他自撰或口授大意由别人执笔成稿而发表的一些文章，进一步抨击改良派的谬论。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旗手，他领导革命派更加广泛地全面开展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以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同时有广州、上海、天津、香港以及新加坡、暹罗、旧金山、加拿大等国外各地。双方的二十多种报刊参加了论战。从一九〇五年起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论战的内容，主要环绕着是拥满还是反满？是维护清政府，行君主立宪，还是推倒它，新创民主共和国？是革命会引起瓜分和内乱，还是用革命去消除内乱与瓜分？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是针锋相对的。革命派

认为只有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政治,才能把中国从危亡中挽救出来。两派还就是不是可以实行以民生主义为内容的“社会革命”进行辩驳。改良派认为实行这种革命就会引起“下等社会”的骚动,就会亡国;革命派认为应趁中国大生产事业还没有发达以前,用“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政策来防止贫富过分悬殊的发生。尽管革命派由于阶级的局限,还有自己理论上的弱点,但他们坚决反对媚外卖国、腐朽透顶的清政府统治,反对君主立宪,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与要求的。

这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论战,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的政治大搏斗,是革命和反革命、前进和倒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通过这场激烈的论战,暴露了改良派的反动本质,揭穿了他们对革命的歪曲宣传,使许多人摆脱了改良派的影响,转向革命,为辛亥革命作了进一步的思想、舆论准备。

在和改良派论战的同时,孙中山在国内群众反清斗争的推动下,更积极地筹划武装革命。1907至1911年的四年中,他连续组织和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1907年3月,他离日本往越南,在河内设立机关,就近策划粤、桂、滇等省的起义。5月有潮州、黄冈起义,6月有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12月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在镇南关起义中孙中山亲自据守炮台,与清军交战。此役失败后,他被迫离越南,行前又派黄兴、黄明堂分别入广西、云南,因而又有1908年3月的钦州马笃山之役和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孙中山又派人策动了广州新军起义,虽仍归失败,但孙中山毫不气馁,随即召集党人会商于南洋庇能(即檳榔嶼),决心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经过近半年的准备,遂

有1911年4月27日(即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影响最大的黄花岗之役。这些武装起义,由于革命党人主要是在部分新军、会党或防营中进行工作,而没有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因而均归失败。但是这些起义在政治上、精神上给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动员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为辛亥武昌起义准备了条件。

在1907到1911年的这一时期内,各地劳动群众由于不堪清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自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单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抢米”风潮,就有八、九十次之多。革命党人虽然没有自觉地去领导这些群众反抗斗争,但这种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客观上相互配合,形成了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清朝皇帝的宝座推向火山口上。1911年5月以后,不断扩大的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保路风潮,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当时湖北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曾在清朝的新军中秘密地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湖北约有三分之一的新军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在声势浩大的群众保路风潮兴起后,同盟会和文学社、共进会中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的时机已趋成熟,便准备利用这种形势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冲出营房,经过一夜激战占领了武昌城,两三天内先后占领汉阳、汉口,革命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接着,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立即在各省领导和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到11月下旬,全国二

十四个省区中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正在进行反清斗争。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当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活动。他得知武昌起义胜利消息后，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办理外交交涉，断绝清朝政府的后援。因此，便由美赴英，再到法国奔走活动；于11月下旬才动身归国，12月25日，到达上海。29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府，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改用公历，以这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孙中山领导人民多年奋斗的结果。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随同清朝政府的垮台，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最后结束。孙中山在以后的短短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并在3月11日公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后来任何帝制复辟都只能是短命的丑剧。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对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④。

但是，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处于极不巩固的地位。一方面投机革命的立宪党人、官僚、政客钻进了这个政权的内部进行破坏；另一方面清政府起用了大野心家袁世凯来绞杀革命。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党人不能广泛地发动人民，打退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结果就被内外反动势力所包围，通过所谓

“南北和议”，革命党人被迫向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妥协了。根据协议，1912年2月13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也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荐袁以自代，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所篡窃了。虽然孙中山在正式解除职务（4月1日）之前，还尽力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须到南京就职和必须遵守《临时约法》等三条防范袁世凯背叛共和国的办法，但也无济于事。最后连中央临时政府设置地点，也迁就袁世凯，从南京搬到北京去了。

孙中山辞职后，起初还总是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于8月24日应邀到达北京与袁会商内政纲领时，为表示真诚合作，声明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请袁于十年内练精兵百万，自己则以在野的身分，专力从事社会实业活动；9月，接受袁政府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满怀着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愿望，回到上海。1913年2月，他去日本考察铁路状况并积极进行借款活动。同年7月初，在上海与英国宝林公司签订广州至重庆铁路借款合同。这些情况表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性逐渐丧失了警惕。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桩震动国内外的政治事件。原来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成了个议会迷，醉心于责任内阁制，到处奔走宣传。为争取国会中的优势，他于1912年8月，拉拢由官僚政客组成的四个小政党，与同盟会合组为国民党。国民党仍拥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宋教仁已成为党的核心人物，同时党也丧失了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变成一个庞杂的政治团体。宋教仁想以内阁来

削弱总统权力的主张和活动，以及国民党在国会中取得多数的事实，引起袁世凯的嫉恨，他便指使凶徒把宋杀害。宋案发生后不久，4月，袁世凯又违法和英、法、德、意、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作为用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军费。这是袁世凯的真面目的大暴露。它使孙中山从“欲治民国，袁总统适足当之”的幻想中警觉过来，认为“非去袁不可”，断然主张立即兴师讨伐。1913年7月中旬，他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这时涣散无力的国民党，已经不能发挥多大的战斗作用了。“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孙中山被迫再一次逃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另行组成中华革命党，以期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再举革命”。孙中山被举为总理。他接受失败教训，希望严密组织纪律，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许多革命党人因反对这个规定而拒绝加入，党员最多时只有五百来人。中华革命党的总章中，规定党的宗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并以反袁作为革命的目标。孙中山于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便任命了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分派干部到江苏、浙江、广东、山东、陕西等地去组织暴动或暗杀活动。1914年至1916年，中华革命党虽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是比较坚决的力量，也积极组织了一些小规模武装斗争，但是由于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斗争相继失败。在反袁的“护国”运动中，中华革命党也因而只充当了配角，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916年5月，在全国反袁护国胜利的形势下，孙中山由日本回上海。时袁世凯见势不妙，已“自动”撤销了帝制；孙中

山当即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提出此次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要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说明了他对国内政局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袁世凯在全国军民反对下倒台并于同年6月毙命之后，继起掌权的段祺瑞，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承袭了袁的全部反动政策，毁弃《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仍是一个“谋危民国者”。孙中山对此坚决反对，主张打倒“伪共和”。1917年7月，他偕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由上海去广州，联合“暂行自主”的西南桂、滇系军阀，于8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了一个反对北方军阀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并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揭起“护法”的旗号，以图“树立真正之共和”。

孙中山把《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民国”的重要象征。他在1916年以后一段时期内的言论和著作中，多次强调“护法”的主张。他认为，《临时约法》乃是革命的产物，又是民国的保证，“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⑮。“拥护约法，即所以拥护民国”^⑯。“……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⑰。“故解决今日时局，以恢复国会为唯一之根本”^⑱。此后多年，卫护临时约法一直是孙中山政治斗争的旗帜。其实，《临时约法》在北洋军阀几年来的任意蹂躏下，已不被人们所重视；所谓“国会”，已成为政客们卖身分赃的活动场所。因此，“护法”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起不到动员革命人民的作用。当时西南局势，又非常复杂和混乱。在美、英帝国主义操纵下，桂系首领陆荣廷与北方的直系军阀素有勾结，谋取私利。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不容许他掌握武装力量。孙中山局处于广州一隅，“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门”。1918年4月，桂

系军阀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一长制为七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除孙中山。孙中山愤恨桂系军阀的跋扈，本身又无力反击，被迫于同年5月向国会非常会议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并从此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①9}。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回忆护法政府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讎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②0}这时，他一筹莫展，意态消沉，对于“外方纷纭，殊不欲过问”^{②1}，完全陷入苦闷和绝望的困境；继而想到用心著书，以此启发人民，“唤醒社会”。1918年，他着手继续撰述过去未完成的《建国方略》，到1919年完成了全书。

当中国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有了新的觉醒、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时候，孙中山沉痛地回顾着辛亥革命以来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摸索着继续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二

1917年，孙中山听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而且取得伟大胜利的消息时，十分兴奋。他真诚欢迎十月革命，把它看作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1918年5月，他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贺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孙中山指导下于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不断刊载俄国革命消息，表示了对十月革命的向往，虽然当时他对十月革命本质的理解，还是有限的。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它

标志着我国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对孙中山是一种推动。他在同年10月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⑳不久，又说：“五四运动以来，……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撻其锋。”^㉑表明他对人民群众的威力有所感受，隐约地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不能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当年10月他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这虽然谈不上彻底的改造，但孙中山是准备用这个国民党新党来继续领导革命。与此同时，他指派廖仲恺和朱执信等，在上海出版了《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民国日报》附刊）两种刊物，以“激揭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㉒孙中山还是继续前进了。

当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后重新奋起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已经开始。在此基础上，1921年7月1日，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的工农革命运动发展起来。这些崭新的事物也给予孙中山以震动和影响，不过，开头他还没有想到要依靠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

孙中山1918年离粤回沪时，“护法”军政府在桂系把持下，虽已无护法之实，但广东这块地方却被他们盘据着。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就须首先打倒桂系，夺取广东和统一南方。1920年8月，他命令自己培植起来的陈炯明部（时驻闽南）回粤讨伐桂系，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同年

11月孙中山在粤省军民欢迎声中重返广州。1921年4月，国会开非常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一次揭起护法旗帜。同年7月，他派军队平定了广西，于是两广统一，便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由桂入湘，进行北伐。这时北方政权已落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手里。孙中山积极筹划与准备讨伐直系，“以成戡乱之功，完护法之愿”。但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受英、美帝国主义与直系军阀的策动，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暗中牵制。孙中山被迫于1922年4月回师广东，改设大本营于韶关，准备改道北伐。时北方直奉战起，孙中山照事先与奉系约定夹攻直系的计划，便于5月中旬派兵进入江西。不料6月间，当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时，陈炯明于16日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于枪林弹雨中仓促脱险，午夜避登到白鹅潭的楚豫舰上，翌日转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号），率各舰反击叛军，相持五十余日，至8月9日，迫不得已始离开广州转赴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完全想不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相从十余年的部属竟要置他于死地。他心情沉重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⑤

两次护法的失败，使他很痛苦，甚至绝望，但也使他觉悟到依靠军阀打倒军阀的老办法，应当彻底改变，必须走新的道路了。

就在这时候，孙中山遇到了共产党人的帮助，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伟大转变。

如前所述，孙中山向往十月革命，希望学习俄国的经验。他曾与列宁在函电中讨论东方革命问题；又拟派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去苏俄学习。还在1921年8月间，他在答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信中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②⑥}同年年底，他在桂林军次约见了经李大钊介绍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密谈了五天。共产国际代表向他陈说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并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点建议：（1）要有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2）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十分赞同这些建议，打电报给廖仲恺说，这次会见使他“心中非常高兴”。

1922年8月间，孙中山再次回到上海，适逢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主张》。这个文件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它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但是“他们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②⑦}文件中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以及对国民党的批评和建议，对正在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是一种有力的帮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自己的党员给孙中山以积极影响，如李大钊就在这由北京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对这种真诚的帮助感到非常兴奋，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②⑧}《向

导周报》上,也在这时发表文章,对孙中山进行帮助,如蔡和森的文章就指出:如果一味依靠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进行纵横捭阖,以此来抵抗暴力,将会失掉革命的生命。要使革命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地反抗……两种恶势力(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⑧ 正在这时,苏俄政府派出的代表越飞到了上海,和孙中山会见了,他们先后晤谈多次,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与建立军队,以及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之后,为避开反动派注意,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和苏俄代表越飞到日本去进行详细会谈。这一会谈更加强了孙中山前进的决心。

这时工农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尤其是工人运动已经形成全国性的高潮。孙中山从展现在面前的工农群众运动中,受到了教育和启发,逐步觉察到工农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并从而发现他所建立的政党缺乏坚实的基础。由于孙中山欢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代表的帮助,并肯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终于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他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了研究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开始了改组的准备工作,初步成立了改组工作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与了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和草拟宣言及党纲、党章。孙中山并邀请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国民党的进步力量。

1923年1月,孙中山发表了一个《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中明确提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

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③⑩} 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的思想正由于接受共产党人对他的影响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与廖仲恺会谈的苏联代表回到上海，孙中山再一次会见了他们，双方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中声明：“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中国当得俄国公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靠也。”^{③⑪} 恰在这时，滇、桂军中接受孙中山策动的各部向粤境发动了对叛军陈炯明的进攻，陈炯明被逐出广州，退往惠州；2月，孙中山又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在此期间，他除继续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外，又于8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回访苏联，并邀请了苏联的政治及军事顾问到广州，帮助中国的革命工作。孙中山这些勇敢的步伐，使他晚期的政治生命放出了可喜的异彩。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并确定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帮助国民党改组，特为发出了十三号通告，具体部署各地保证改组工作的顺利进行。8月，苏联代表鲍罗庭到达广州，被聘为国民党的特别顾问。10月，孙中山指派廖仲恺等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11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2月，孙中山连续对国民党员作了三次演说，表示他改组国民党和学习苏联的决心。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③⑫} 年底，李大钊由北京到达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了改组国

民党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但是,孙中山虽有改组国民党的决心,而真正可依靠的国民党员却不多。国民党中的元老派如冯自由、邹鲁、张继、胡汉民等,实力派如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军人)等都明里暗里阻挠、破坏孙中山的改组政策。当时能积极拥护和执行改组政策的干部只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少数左派人士。在此情况下,孙中山的改组工作,便不能不依靠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一百六十五人。在由各省推派及由孙中山指派的代表中,有些是共产党人。李大钊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几个审查委员会中,也都有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工作。依靠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才保证了这次大会的成功。通过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辩论和斗争,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后,各省市的国民党部也大部分都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1月23日,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的通过,使国共两党有了合作的共同纲领,因为这里所阐述的三民主义已经不是旧三民主义,而是与三大政策相结合的新三民主义了。在《宣言》中,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对内反对民族压迫。民

关主权的示威运动,给他以有力的支持。最后,北京外交使团不得不作出将一部分“关余”拨交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定。“关余事件”的胜利,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成果,也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国民党改组之后,英国又利用香港这个据点对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破坏,它一面积极援助盘踞惠州的陈炯明反攻广州;一面又利用广州汇丰银行大买办陈廉伯组织商团武装,从内部颠覆广东政府。1924年8月上旬,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为进行阴谋叛乱而秘运广州的一批军火。商团便借此出动一千多人包围孙中山的大本营,喊叫发还枪械。在陈廉伯等人煽惑下,广州商人掀起罢市风潮,陆续蔓延到全省一百多城镇。8月28日,英舰九艘集中白鹅潭,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进行恫吓,同时英国总领事向孙中山提出最后通牒,宣称“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④为此,孙中山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指出:“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⑤同时对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当时,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及反动军阀范石生等和商团暗中勾搭,乘机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煽动,谋求妥协。他们的步步退让,使得商团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面对着这种日益猖獗的反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人主张采取严厉措施,坚决镇压,以消除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和北伐的后顾之忧。

其时,孙中山一直想实现他拟定的北伐计划。还在1923年10月,北方直系军阀曹锟利用国会贿选为“总统”时,孙中山即普通电全国声讨曹锟和通缉受贿议员,下令出师北伐,以

员书》，说明联俄、联共的必要性。书中指出散布谰言者，“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⑧为了排除右派顽固势力的干扰，代表大会前，孙中山把阻挠改组、无理取闹的张继加以囚禁，会后又把破坏联共政策的代表人物冯自由等开除出党。

国民党改组后不久，中国革命就出现了高涨的形势。工农群众运动在各地共产党人的组织、推动下，从一度处于低潮又开始高涨。过去遭破坏了的工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会也陆续成立。广州的工人成立了工团军，广州郊区农民组织了自卫军。孙中山这时坚定地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1924年“五一”劳动节，他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鼓励工人“作国民的先锋”。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开幕时，孙中山看到许多赤脚破衫的农民到广州来开会，非常感动，他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⑨8月，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时，指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来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⑩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帝国主义这个近代中国一切社会进步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最凶恶的敌人，也就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早在1923年12月，当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税余款，要求收回海关主权时，美、英、法、日、意、葡等国为劫夺广东“关余”，截断革命政府的经济来源，就调集兵舰二十艘，集中黄埔，进行威胁。孙中山没有为帝国主义的威胁所吓倒，他指出截留“关余”完全是“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⑪，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那时广州各界人民，以广东工会联合会为主导，也一再举行收回海

直系将领冯玉祥部发动了北京政变，使直系迅速溃败而结束。之后，北方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联合而又相互猜忌和争夺的局面。冯玉祥等受革命潮流影响，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也想“拿革命主义去宣传”^④，以求实现和平统一，遂接受了邀请，于11月13日带病离粤北上。这时，孙中山有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革命坚定性进一步加强。在当前局势问题上，他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主张，也都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而为孙中山所接受的。他在北上前，对《粤报》记者谈话说：“帝国主义……不仅为我国实现独立自主的主要障碍，而且是反革命势力最大的因素。”离开广州前三日，又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他由上海取道日本到天津，沿途多次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谋求全国真正统一的重要言论，表现了坚强的原则性。他反复申述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来解决全国一切大事”。^⑤

中国共产党于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发动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各地区、各阶层都建立了促成会组织，积极展开斗争，为孙中山北上作后盾。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京已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执政府。冯玉祥一派渐被排斥，无能为力。旧的反动统治去了，新的反动统治又建立起来。因此当孙中山年底到达北京时，面临的对手，仍旧是以前的那个“谋危民国者”段祺瑞了。段祺瑞政府于12月6日发表了要“外崇国信”的致使困书，表示要尊重不平等条约；24

谋国家统一。他的北伐计划,由于内部牵掣等原因一再受阻,可是他毫不懈怠地部署军事,有时还亲临前线,鼓励士气。为了打击主要敌人,他曾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一致行动,进攻直系。国民党改组之后,1924年9月初,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序幕的江浙战争爆发了。孙中山认为应乘这一时机向广东以外打开出路,遂再次决定北伐,并亲率北伐军到韶关。他到韶关之日,也正是陈廉伯勾结帝国主义加紧煽动叛乱之时,在陈廉伯煽动下,各地买办商人、豪绅地主趁孙中山离开了广州,纷纷集会,肆意攻击广东革命政府,并向国际联盟指控孙中山是“破坏国际善意的叛徒”。10月9日,商团发出第二次罢市的通牒。10月10日,当广州人民为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举行游行时,商团竟开枪屠杀游行群众,并构筑炮台,封锁市区,遍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四出捕人,发动武装暴乱。在这局势十分严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力劝孙中山当机立断,镇压叛乱。广州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学生都纷纷表示支持孙中山,愿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决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采取断然的措施,他立即成立了镇压叛乱的革命委员会,下令解散商团军,并命参加北伐的部队星夜由韶关回师广州戡乱,在工农群众积极支持下,仅仅经过几小时的战斗,就平定了叛乱,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

商团事件的解决,向帝国主义显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心和力量,使广东革命政府得以巩固下来,也增长了孙中山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

商团叛乱平定后一周,正在鏖战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

第 133 页。

- ① 《犬养毅传》卷二，第 726—727 页，转引自〔美〕詹逊(M. B. Jansen):《日本人和孙逸仙》(*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美国哈佛大学 1954 年英文版，第 80 页。
- ② 7 月 10 日，孙中山与香港三个英人谈话，力述拟在南方成立“独立”政府的决心。见英外交部专案档案 F.O.N. 类第 1718 号:《英国领土内之中国革命党》(*Chinese Revolutionists in British Dominions*)，同月 24 日，写了《致香港总督书》。
- ③ 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革命文献》第三辑，1958 年版，第 55 页。
- ④ 《致黄宗仰乌木山僧函》(1904 年 1 月)。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成都近芬书屋 1944 年版，第 22 页。
- ⑤ 《民报》第一号(1905 年 11 月)。
- ⑥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53 页。
- ⑦ 孙中山:《约法国会乃共和国之命脉》(1916 年 5 月在东京与某君谈话)。
- ⑧ 《中国革命史》。黄编《总理全集》，下册，“论著”，第 44 页。
- ⑨ 《护法宣言》。同上书，中册，“宣言”，第 26 页。
- ⑩ 孙中山:《复日本头山满等述护法目的书》(1918 年 3 月 28 日)。
- ⑪ 孙中山:《辞大元帅职通电》(1918 年 5 月 4 日)。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第 1085 页。
- ⑫ 孙中山:《复港商陈廉如函》(1919 年)。黄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第 176 页。
- ⑬ 孙中山:《复陈炯明函》(1919 年 2 月 24 日)。
- ⑭ 《孙中山先生在寰球学生会演说辞》，铅印原件；参见《救国之急务》，《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427 页。
- ⑮ 《致海内外国民党同志函(十)》。黄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第 160 页。
- ⑯ 同上。
- ⑰ 《致国民党员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448 页。
- ⑱ 《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新华月报》第三卷，第四期(1951 年 2 月)；又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436 页。
- ⑲ 《先驱》第九号(1922 年 6 月 20 日)。
- ⑳ 参见《李大钊狱中自述》。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 ㉑ 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一期(1922 年 9 月)。
- ㉒ 上海《民国日报》1923 年 1 月 1 日。
- ㉓ 《外交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日又正式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将要召集军阀分赃的“善后会议”。这些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愤慨。他怒斥段祺瑞的谬误。随后，他忧愤疾发，一病不起，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病重期间，孙中山仍坚持斗争，拒绝与段祺瑞妥协，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极力反对“善后会议”。他在弥留之际，犹念念不忘革命，留下“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并在《致苏联遗书》中，表明了他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决信念。

孙中山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始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⑧

注：

- ① 《建国方略》，民智书局1922年再版；参见《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68页。
- ② 参见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广东中山县濠头中上学生会编《濠头月刊》，第十四、十五期合刊，藏广东石岐中山图书馆。
- ③ 《上李傅相书》，《万国公报》1894年九、十月号。
- ④ 甘永龙编译：《伦敦被难记——广东孙文口述》，1912年商务印书馆版；参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
- ⑤ 《兴中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9页。按：当时尚无“宣言”一词，原称“章程”，参阅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6页的说明。
- ⑥ 郑东梦主编：《檀山华侨》，“檀山华侨”部分，檀香山1929年版，第30页。
- ⑦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49页。
- ⑧ 参见《孙文革命运动清方档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

黄 兴

周天度

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当时人们把他和孙中山并称，号为“孙黄”。他原名轸，字廑午，1874年10月25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生。父亲黄筱村，是湘中名诸生。黄兴九岁入私塾，十五岁考入长沙岳麓书院。二十岁参加县试，被录为县学生。1898年以成绩优异被保送至武昌两湖书院深造。

黄兴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特别是明末王船山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曾说：“丈夫处蛮夷猾夏之秋，当有事于大者远者。”^①进两湖书院后，正值戊戌变法之年，新学流行，他接触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日益关心。戊戌变法和1900年唐才常在武汉发动的自立军起事相继失败，他看到改良主义道路行不通，开始倾向反清革命。

1901年夏，黄兴毕业于两湖书院。次年春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去日本考察学务。到达日本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他幼年曾学习拳术，后来喜好军事，在弘文学院课余常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并参观兵操。每日晨起必练习骑马射击。为他以后从事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他到日本后不久，和杨笃生等创刊《湖南游学译编》，组织“湖南编辑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1903年，留日

- ⑳ 《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基础》，《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1924年版；参见《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81页。
- ㉑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铅印原件，藏北京图书馆；参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6页。
- ㉒ 同上；参见同上书，第527页。
- ㉓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86页。
- ㉔ 《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1925年4月12日；参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82页。
- ㉕ 恽代英：《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1925年3月14日），《孙中山先生与中国》，民智印刷所1925年5月版，第27页。
- ㉖ 孙中山：《致全体党员书》。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3月16日。
- ㉗ 《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页。
- ㉘ 《向农民宣传应该为他们谋幸福》，黄编《总理全集》中册，“演讲”（关于农工商各界及一般国民者），第43页。
- ㉙ 《关于海关问题之宣言》（1923年12月）。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37页。
- ㉚ 《广州英领事致傅交涉员函》（8月29日）。香港《华字日报》编：《广东扣械潮》1924年印刷，卷二（文件），第91页。
- ㉛ 《孙中山先生遗言》，上海书店1925年四版；参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71页。
- ㉜ 《北上的意义和希望》（1924年11月12日）。黄编《总理全集》中册，“演讲”（关于一般内政与外交者），第53页。
- ㉝ 《与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3日），《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又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97页。
- ㉞ 《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2页。

领袖。

同盟会成立后，黄兴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上。他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人会工作，发展了一批革命分子入会，并从中选择一些坚定分子组成一个严密的“丈夫团”，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他都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勒令出境，到安南（今越南）河内设立机关，策动两广的革命工作。黄兴于同年夏由日本到河内，和孙中山共谋在南方起义。9月他们在广西发动了钦州、防城起义，12月发动了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两次起义先后失败。1908年3月下旬，黄兴率领二百余人由安南再次进入广西，转战钦州、廉州、上思一带，为时月余，历经数十战，大破清兵，因而声名大著。后以弹尽援绝，不得不退回河内。

此时，同盟会由黄明堂带领的一支队伍于4月末攻占了云南河口，孙中山委任黄兴以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名义前往指挥，他于5月上旬赴河口督战。因河口部队人少弹缺，且不听约束，黄兴只好返回河内，拟调集人力再举。这时法国殖民政府将他扣留，强迫出境。黄兴离河内去新加坡，随后转去日本。河口起义不久亦归失败。

1909年秋，他受孙中山委托到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孙中山、黄兴和赵声等于11月13日在南洋槟榔屿集会，他们鉴于过去几次分散性的起义都遭失败，决定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组织一支以数百人为“选锋”（敢死队）的大规模

学界反对沙俄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掀起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后转变为“排满革命”的军国民教育会），他是积极参加者，曾慨然说：“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②随后他被推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从此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

1903年夏，黄兴离日本回到长沙，在明德、修业等学堂任教，暗中进行革命活动。11月4日（阴历九月十六日），他三十岁生日，邀集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谭人凤等二十余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次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黄兴被推为会长。^③

华兴会根据黄兴提议，确定了由湖南首先发难，然后谋各省之响应，以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的革命方略，并决定从联络会党入手。因此在华兴会外，另立一同仇会专门联络会党，随后与会党首领马福益取得了密切联系。他们共同议定，于1904年11月16日（阴历十月初十日）西太后七十岁生日在长沙起义，常德、衡州等五路同日举事。另派遣同志分赴上海、武昌等地与革命者联络，策应起义。黄兴为起义筹集经费，出卖了在长沙东乡凉塘的祖遗田产三百石。这次起义由于事机泄漏，未经发动，即遭失败。黄兴于10月下旬潜离长沙，经上海亡命日本。

1905年7月，孙中山到日本，经日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兴和孙中山见了面。孙中山主张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黄兴深表赞成。8月20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黄兴被推为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同盟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

遭受重大牺牲，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反动官吏，以报死难烈士，为谭人凤等人所劝阻。同年7月31日，谭人凤和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极力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黄兴写信予以支持，并表示要和他们在一起共同战斗。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起用袁世凯，调集重兵猛攻汉口。黄兴于10月28日由上海到汉口。次日即赴前线督师，在汉口与清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11月2日，清军将领冯国璋攻入汉口，民军退守汉阳。3日，湖北军政府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他率领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二十余日。由于清军占优势，27日汉阳失陷，革命军退守武昌。黄兴认为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不如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等占领了南京后，再训练一支精锐军队来收复武昌。他的主张遭到武昌革命地区党人的坚决反对。黄兴便于同日辞职，离武昌去上海。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时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了窃取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迫使革命党人向他让步。黄兴以为随着清朝政府的被推翻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多年追求的政治理想已经实现，革命已成过去，“吾辈十余年，兢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目的已达，掉臂林泉，所得多矣。”^⑥因此，在南北和议中，他主张和袁妥协，认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助共和，即可举袁为总统。

3月10日，袁世凯窃取了大权，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的武装起义。计划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出湖南，进攻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向南京推进，会师长江，继续北伐。

1911年1月中旬，黄兴从槟榔屿到香港，与赵声等在香港成立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他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4月23日，他由香港乘轮潜入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5号。由于几经周折，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参加起义的人数大减，放弃了原定的十路进兵计划，改为集中全力攻打总督衙门。

4月27日晨，黄兴向党人写了绝命书：“本日当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④表示他视死如归的革命决心。

当日午后5时半，螺角一声，广州起义发动。黄兴带领林时埭、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敢死队百余人，臂缠白巾，脚穿黑面胶鞋，手执枪械炸弹，由小东营指挥部出发，急攻总督衙门，攻入后堂，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跑。及至返出衙门，和水师提督李准调来的卫队遭遇，展开激战，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亦受伤，右手断了两指。他仍指挥队伍奋勇杀敌，且战且走。最后只剩下他一人，他用肩撞破一家小货店门板，进入门内，持双枪左右射击，击毙敌兵七、八人。后敌军退却，他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后来他俩结成了夫妇。广州起义延续到第二天失败。后收殮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由于革命事败，同志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黄兴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府留守，主持南方各军之整编。其时南方各军兵多饷少，士兵生活困难，而袁世凯又不予接济，部分军队发生哗变。同时黄兴认为南北既已统一，没有必要再保留大批军队，因此大量裁减了南方革命军队，南京留守府亦于6月间自行撤销。

袁世凯为了进一步笼络和麻痹革命党人，加强其统治地位，1912年8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当时孙、黄等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都认识不清。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9月11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他受了袁世凯的欺骗，对袁深表信任，向人宣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⑥这时宋教仁在北京组织了国民党，积极推行其政党政治的主张，黄兴也抱着要把北京政府改变为国民党政府的幻想，逢人便劝其加入国民党。据说他劝过北京政府所有的国务员，甚至劝过袁世凯，要他也来当国民党领袖。袁虽未加入，但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其他大多数国务员都填写了国民党入党誓愿书。10月，他出京到上海，随后回到湖南故乡。途中怀着功成身退的心情，写过下面的诗句：“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林园想落暉。”^⑦12月初，他接受了袁世凯委任的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不久又辞职。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其反革命面目完全暴露。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认为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各省内部不统一，革命军队力量薄弱，不堪作战，对武力讨袁缺乏信心，主张采取法律解决办法。但袁已积极准备

发动对南方的战争，国民党人不得不起而应战。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首先反袁，14日黄兴由上海到南京，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反袁战事开始后，黄兴派往徐州的讨袁军失败，22日徐州失守，袁军将领冯国璋、张勋率大队南下。25日江西湖口又为袁军所攻占，李烈钧败走。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黄兴在南京饷械不支，声援复绝，面临三面受敌的危险。他认为败局已定，于7月29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不久，南昌、南京相继失陷，其他各地讨袁军也被战败，南方各省国民党势力为袁世凯所摧毁，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迅速失败，黄兴和孙中山再一次逃亡日本。

孙中山到日本后，总结革命失败经验，把原因归结为党内精神涣散，党员不听话，对黄兴拖延了举兵的时间，丧失了有利时机，有所责难。因此提出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时要立具严格誓约，并须在誓约上按印指模，以表示服从他的命令。黄兴不赞成重新组党，更反对写誓约打手印的做法，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由此他和孙中山一度不合，各行其是。1914年夏，他离日本去美国。

黄兴旅居美国期间，在美洲华侨中作了一些反袁宣传。1915年袁世凯称帝，云南起义讨袁，他曾为护国军筹措军饷。1916年6月他由美国抵日本。袁死后回国，居住上海，和孙中山恢复了往日的关系。10月31日，黄兴因病在上海逝世。

注:

- ① 何伯言:《黄克强》第2页。
- ② 天忬生、冬山合编《黄克强蔡松坡轶事》第7页。
- ③ 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 ④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第828页。
- ⑤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资料》第196页。
- ⑥ 《民立报》1912年9月4日。
- ⑦ 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宋教仁

周天度

宋教仁字遯初(一作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县人,1882年4月5日(清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生。地主家庭出身,父亲宋起龙,占有土地百余亩。宋教仁童年入私塾。1899年入漳江书院读书,喜爱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1903年春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校常与同学田桐等议论时政,关心国事,渐萌革命思想。是年留日学生反对沙皇俄国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组织拒俄义勇队,派黄兴、陈天华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与宋教仁取得联系。1904年春,宋教仁和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同年夏,他又参加了在武昌成立的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任文书。

华兴会成立后,决定于当年11月16日(阴历十月初十日)西太后七十岁生日在长沙举行武装起义,常德、衡州等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这次起义未经发动即因消息走漏而失败,宋教仁被迫潜离长沙。11月10日,船过湖北螺山,他感慨革命事败,口占长歌一首:“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①

12月13日宋教仁从上海到达日本东京。起初上东京法政大学,后入早稻田大学。他到日本后不久,即和田桐等创办

《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于1905年6月创刊。他在第一期上提出用黄帝纪元代替帝王纪元，以示与清廷决裂。第二期因登载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出版后，日本政府以“妨害公安”罪名予以干涉，全部被没收。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当同盟会成立时，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为《民报》，宋教仁担任《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员。

1907年春夏间，孙中山与黄兴先后离日本去河内组织领导机关，准备在中国南部发动起义。与此同时，宋教仁受同盟会委派，和白逾桓、日人末永节到东北安东联络“马贼”，谋占奉天，以与南方起义相呼应。是年4月1日，宋教仁等到达安东，致书“马贼”头目李逢春说：“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②李表示赞同，愿一致行动。宋教仁于是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策划进行。后因招兵失败，白逾桓被捕，宋教仁复返日本。

他回日本后，仍参加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并从事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在日期间，曾著《间岛问题》一书，以确凿证据，证明延吉为我国领土，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略我国领土的阴谋，作了有力的揭露。

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和谭人凤、赵声等主张将注意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在中部地区发动革命。在一次会议上，他提出革命的三策：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为

上策，然运动不易；中策为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边地起义为下策。随后，由谭人凤出面，在东京召集十一省区同盟分会会长会议，宋教仁建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④。这年冬，宋教仁回到上海，在于右任所创办的《民立报》任主编。他在《民立报》上写过不少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抨击清朝反动统治的政论文章。

1911年广州起义的再次失败，使革命党人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意念愈加坚定。宋教仁与谭人凤等按照前在东京拟订的计划，积极活动，于该年7月31日在上海湖州公学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读了谭人凤与宋教仁草拟的宣言和章程。预定宣统五年(1913)在长江各省举行大起义，注意点尤在武汉。总会设五总务干事，由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分别担任。之后，谭、宋二人秘密往来于沪汉间，联络党人，进行起义准备工作，并与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取得联系，得到黄兴的赞同和支持。

当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猝然爆发，10月下旬，宋教仁与黄兴由上海到达武汉，协助湖北都督府办理外交；并与居正等拟定了《鄂州临时约法》。随后，他到了南京，参与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在当时南北议和中，他主张和袁世凯妥协。同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命唐绍仪组阁，宋教仁在内阁中任农林总长。后唐绍仪辞职，他一同退出了内阁。

宋教仁认为大总统非袁世凯莫属，但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他醉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是责任内阁制的积极宣传者。他以为只要有了一个健全的内

阁，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为了在国会中争取选票，达到建立政党内阁的目的，他不顾一些党人的反对，在“朝野合作”、“新旧合作”的口号下，于1912年8月下旬以同盟会为基础，与几个小党派合并改组而为国民党，将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部分抹掉，并吸收了许多封建官僚和投机政客入党。至此，同盟会原有革命精神全失，而所谓国民党，其纲领之含混与分子之复杂，同当时其他政党几无多大差异，连他的好友谭人凤也把它看成是狐群狗党，而拒绝参加。^④ 国民党虽然仍拥戴孙中山为领袖，实际主持人则是宋教仁。1912年底至1913年初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于是，宋教仁便以政党内阁组织者自居。他没料到由他一手造成的国民党声势，却深为袁世凯所忌恨，袁已蓄意要除掉他，而他却沉浸在“胜利”的幻想中。这时，他从家乡省亲后，经历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到达上海，沿途发表演说，批评时政，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一心企望实现他自己的抱负。

1913年3月20日午后10时，宋教仁从上海搭车北上，在车站突然遭到凶手的狙击，22日逝世。事后判明，杀宋教仁的主使者，正是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但他临死前在遗嘱中还期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⑤ 宋教仁的事败身死，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注：

④ 《宋渔父日记》，1904年11月10日。《建国月刊》第9卷，第4期。

- ② 同上, 1907年4月9日。《建国月刊》第11卷, 第4期。
- ③ 《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09页。
- ④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 第3期。
- ⑤ 《民立报》1913年3月22日。

陈 天 华

周天度

陈天华，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下乐村人。1875年(光绪元年)生。母亲很早去世，父亲陈善，是个落第秀才。陈天华幼年替人放牛，或卖些零碎东西，藉资糊口，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15岁才入蒙塾。他喜爱当时民间流行的弹词小说，这是他稍后成为通俗宣传家的重要原因之一。1896年到1897年间，他随父到新化县城居住谋生，仍以做小贩维持生活。后经人帮助，得入资江书院就学，不久考入提倡新学的新化求实学堂。当时正值维新运动在湖南迅速开展，新学广泛流传，陈天华“拾阅新学中书报残纸，慨然欲任天下事”^①。1903年初由所在学堂出资送他去日本留学。

到日本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当年4月，沙俄帝国主义违约不撤走它在1900年侵入中国东北的军队，企图永远强占我国东北三省，陈天华十分悲恸，曾啮指写血书表示抗议。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组织了拒俄义勇队，随后转变为“排满革命”的军国民教育会，他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黄兴一道被举为归国革命运动员。当年冬，陈天华回国。

1904年2月，他随同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参与谋划在湖南举行反清武装起义，曾往江西游说防营统领响应起义，并与刘揆一等从事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的活动。起义事泄失败后，复逃往日本。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被推为会章起草员，并参与了《革命方略》的拟定工作。《民报》创刊，他任撰述员。同盟会成立和《民报》发刊后，革命影响日益扩大，清朝反动政府便要求日本帝国主义政府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运动。是年11月，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留日学界群起反对，陈天华愤而于12月8日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想以他的死来激励人们的觉悟。临死前，他写了一篇“绝命辞”，勉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②，并留有给留日学生总会的一封信，要求他们坚持斗争。

陈天华是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青少年时代即以光复祖国为志，“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③有着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清廷的反动统治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给他以很大刺激。在留日期间，他看到祖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④于是作书报以警世，积极从事爱国革命的宣传活动，以唤起国民共同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在《猛回头》结尾的一首诗中沉痛地写道：“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表达了他对时局的忧虑和对同胞的期望。他的著述除散见于《民报》等报刊上的一些短文外，出版行世的尚有《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国民必读》、《最近政见之评决》、《最近之方针》、《中国革命史论》等书。其中《猛回头》、《警世钟》两书，写于1903年，通俗易懂，流行广泛，在革命宣传中发生的作用最大。在这两本小册子中，他陈述了帝国主义

瓜分和灭亡中国的灾祸，指出清朝的腐朽黑暗统治及其所奉行的“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投降卖国方针，是造成这种危险局势的根源。他历数清朝专制政府的罪恶，并一再申述，清朝的统治早已名存实亡，现在的朝廷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它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守土官长”，完全是按帝国主义旨意办事的，只有把它推翻，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他说：“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遂立刻奉行。”^⑤“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谈我们与洋人作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作对，要把我们当做谋反的叛逆杀了。”^⑥因此，“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⑦爱国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两者不可分，他把这个思想说得最为透彻明白。

陈天华不仅论证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性，无情地鞭挞了“拱手降洋”、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清朝统治者，而且还指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是能够打败的。他说：“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⑧他号召全国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⑨

陈天华当时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当然还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他着重从政治上去揭露清朝政府的反动卖国，指明革命的必要性，但未能摆脱种族主义的偏见。此外，他把“中等社会”作为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对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力量认识不足，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由于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深为群众所喜爱，清朝官府曾严厉查禁，不准阅读，但他的小册子仍然在长江流域广泛流行，传诵一时。

1906年，陈天华的灵柩运回湖南，长沙学生及其他各界万余人，手执白旗，高唱哀歌，送葬于岳麓山。

注：

- ① 徐佛苏：《对于陈烈士蹈海之感叹》，《新民丛报》1906年第2号。
- ② 《陈天华绝命辞》，《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页。
- ③ 宋教仁：《烈士陈星台小传》，《民报》第2期插图背页。
- ④ 同②，第154页。
- ⑤ 《警世钟》，《陈天华集》第70页。
- ⑥ 《猛回头》，《陈天华集》第38页。
- ⑦ 同⑤。
- ⑧ 同⑤，第65—67页。
- ⑨ 同⑤，第66页。

秋 瑾

闻少华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秋瑾：《对酒》

秋瑾，激进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也是近代著名的女诗人。她字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原籍浙江山阴县（今绍兴），1875年11月8日（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生于福建厦门。秋瑾的祖父秋嘉禾做过厦门知府。父亲秋寿南是个举人，当过厦门知县和湖南常德县厘金局总办。

少年时代的秋瑾，已经读了不少经史书，能诗词，又学会骑马击剑。

1890年，秋瑾的父亲到湖南做官，她随父入湘。1896年，依父母之命嫁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王是个纨绔子弟（王父与曾国藩是表兄弟），和秋的性格不合，家庭生活甚不融洽。1902年王花钱捐了一个户部主事的京官，秋瑾勉强随他去北京。

秋瑾住在北京时，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目睹民族危机深重，清政府腐败无能，曾作《宝刀歌》以述怀：“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

梦。”^① 还曾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② 她在京期间，结识好友吴芝瑛，两人意气相投，共同搜求新书报，讨论“新学”，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有了一些理解。后来，她在《致王时泽书》中表明她在当时已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③

辛丑条约后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秋瑾想探求更多的新知识。1904年夏，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筹旅费只身到日本留学，“钗环典质浮沧海，骨肉分离出玉门。”^④ 是她当时心情的写照。到东京后，秋先入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随后入青山实践女学。在此期间，她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继而又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两会都是以反抗清政府为宗旨。同年秋，她在东京创办《白话报》，鼓吹推翻清政府，提倡男女平权。不久，秋瑾参加了冯自由等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她还结识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和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等人。年底，秋瑾回国筹措学费，因陶之介绍：在上海爱国女学校认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由上海返绍兴，在热诚小学校又见到徐锡麟，经徐介绍加入光复会。

1905年春，秋瑾复去日本，当船过黄海时，她感时忧国，思绪万千：“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⑤ 充满激情的诗句表达了她挽救祖国的心声。她到东京后，经黄兴介绍见到孙中山，随即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省主盟人。同年冬，清政府为了破坏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由驻日清公使串通日

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驱逐留日的革命党人。留日学生异常愤慨，纷纷集会，讨论对策。当时留日学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忍辱求学，一部分则主张罢课回国，以示抗议。秋瑾是极力主张回国革命的。在浙江同乡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她为表示回国闹革命的决心，同时也针对有些人对她们回国动机的怀疑，从靴筒里抽出她自买的一把倭刀，猛然往讲台上一插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⑥

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经是一个很有声誉的革命活动家和宣传家。“每际大会，……则振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魂”。^⑦她结纳革命志士，交游甚广。当时留日学生很多，革命和反革命壁垒分明。凡是反对清政府的青年，她都引为同志，无话不谈；而对那些专讲吃喝玩乐的学生，则深恶痛绝，不相往来。有个浙江留学生胡道南，一心想升官发财，顽固透顶，曾和秋瑾争论反清革命与男女平权问题，秋瑾当面骂他是“死人”。^⑧后来秋瑾在大通学校被捕惨遭杀害，就是由于胡道南的告密。

1906年初，秋瑾回国，回国前她留信给在日友人说：“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荇、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⑨回国后，与易本羲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3月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学教书。暑假辞职离校，转赴上海。与陈伯平等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敖嘉熊、吕祥熊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又与蒋乐山、张恭等运动浙江会党，作起义准备。同年9月，秋瑾与陈伯平等

在虹口祥庆里寓所试制炸药，不慎爆炸，炸伤手臂，差一点被警察逮捕。

同年冬，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她在该报发刊辞中大声疾呼：“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⑩伴随着她的革命实践，她的妇女解放的思想，也更加明确，更加炽烈：“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⑪

与办《中国女报》的同时，秋瑾把她的注意力投向军事方面。1906年12月，革命党人刘道一等联合会党，在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光复会会员集议于上海，计划起兵响应，由秋瑾负责联络浙江会党。不久她回到绍兴，进入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校。当时的大通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学校，事实上是革命的联络机关。秋瑾以大通为据点，联络金华、诸暨、义乌各地会党首领。不料尚未联络成熟，而萍、浏、醴起义已失败。秋瑾听说后，悲愤万分，她不愿失信于会党，就决定依靠会党的力量，准备在浙江举事。

1907年春，秋瑾被举为大通学校的督办。她以大通学校为中心，往返于杭州、上海之间，运动浙江军队官佐和军校师生参加光复会。同时又两次到金华、处州所属各县，把所属会党成员按军队编制起来，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顺序，编为八军，称为“光复军”。^⑫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自居协领。王金发、竺绍康等为分统。光复军编制既定，积极准备起义。这年5、6月间，孙中山先后发动了潮州、黄冈和惠州七女湖的起义，各处会党纷纷响应。在这种形势下，秋瑾认为时机

成熟，她与徐锡麟约定浙、皖两地同时举事。与浙江会党吕熊祥、王金发、竺绍康等计议，预定浙江方面先由金华会党起义，处州响应，诱使清军调离杭州，出击金、处等地，然后以绍兴义军渡江直攻省城杭州，军学界为内应。如攻不下杭州，则把部队带回绍兴，从金华、处州进入江西，直趋安庆，和徐锡麟相呼应。她与会党首领决定的起义日期是7月19日，但不久，金华、武义等地会党起义相继失败，绍兴会党也过早地暴露了目标，清政府大肆搜捕党人。徐锡麟于7月6日在安庆仓促起事，失败遇害。当时绍兴知府贵福已得到胡道南的告密，于7月7日赴杭州报告浙江巡抚张曾敳，即作好了镇压准备。秋瑾于7月9日得知徐锡麟被害失败的消息，悲痛异常，但浙江方面，仍按原计划行动。7月12日，在杭州武备学校的学生侦知杭州派出清兵的消息，遣人密告秋瑾，秋瑾作了些疏散的布置。7月13日上午，会党首领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认为事态已急，劝告秋瑾暂避。秋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吩咐王金发快走，自己则留下。王走后的当天下午，知府贵福和山阴、会稽两县知县跟在张曾敳派遣的一队清兵之后，进入绍兴。这时，学生们又劝秋瑾走避，她没有理会，只叫学生们离开。清兵很快包围大通学校，荷枪实弹，入内捕人。秋瑾和少数学生持枪械同清兵搏斗，击毙清兵数人，学生死二人，终因众寡悬殊，抵抗失败，秋瑾及程毅等六人不幸被捕。

秋瑾被捕后，贵福等清吏深夜提审，这位杰出的女革命家，不为严刑所屈，斩钉截铁地回答敌人说：“革命党的事就不必多问。”^⑬ 贵福等怕久押生变，请准浙江巡抚张曾敳，决将秋瑾就地杀害。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

轩亭口下。烈士忠骸，经其友人收殓，营葬于杭州西湖西冷桥畔。

注：

- ① 《宝刀歌》，《秋瑾集》第 80 页。
- ② 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秋瑾集》第 184 页。
- ③ 《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 45 页。
- ④ 《有怀》，《秋瑾集》第 85 页。
- ⑤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秋瑾集》第 77 页。
- ⑥ 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4 集第 210 页。
- ⑦ 同注②。
- ⑧ 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4 集，第 226—227 页。
- ⑨ 同注①。
- ⑩ 《中国女报发刊辞》，《秋瑾集》第 13 页。
- ⑪ 《弹词》，《秋瑾集》第 126 页。
- ⑫ 《拟光复军军制手稿》，《秋瑾史迹》。
- ⑬ 《秋瑾口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辛亥革命》（三）第 195 页。

徐 锡 麟

闻少华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绍兴东浦村人。生于1873年12月17日（清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其家营商业，富有资产。^①父徐凤鸣字梅生，顽固保守。徐锡麟幼年受父管束，常遭痛斥。十二岁时曾负气跑到钱塘当和尚，经家人找回。二十一岁为诸生。

1901年，徐锡麟被绍兴府学堂聘为教师，后提升为副监督。1903年，在其父的严命下应乡试，名列副榜。当时国内不少知识青年受民族危机的刺激，多倾向革命，喜谈“新学”，鄙视科举，徐也受到感染。就在这一年，他有机会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到东京游览。适逢东京浙江学生正在开会讨论营救因宣传反满革命入狱的章炳麟，他积极参加，出钱相助，因而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等人。那时留日学生界因帝俄侵占我东三省的问题，组织拒俄义勇队。徐受这一运动的影响，愤清廷无能，发生了反满革命的思想。

回国后，他创建热诚蒙学于东浦，提倡军训；又在绍兴创设书局，传播新译书报，宣传反清革命。他每听到有关沙俄在东北的暴行，即为之恸哭，常画沙俄侵略者的像为靶子，以短銃射击。他的行动吓坏了他那个保守的父亲，因此被赶出来，与父分居。

1904年，徐到上海爱国女校访蔡元培，这时陶成章也恰

在上海，经陶介绍遂加入了光复会。他得知陶过去和浙江会党联络的情况，非常高兴。明年2月，徐和他的几个学生，游历了诸暨、嵊县、东阳和义乌等地，交结了些他称为“奇才力士”的会党成员。回来后他对人讲：“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②

1905年徐在绍兴创立体育会，招各校青年数百人，学习射击术。有光复会会员自上海来，建议用“劫钱庄”的办法来筹措军费，徐得到富商许仲卿的帮助，筹款到上海购买后膛九响枪五十杆，子弹二万粒，声言是供体育会学生体操实习用，公开运到绍兴。然后与平阳党首领竺绍康商议，约集党中强有力者二十人到绍兴，准备执行上述筹集起义军费的计划。后因不易进行，乃与陶成章、龚宝铨密议，设立一所学校，以容纳招来的会党成员并贮藏购到的枪支、子弹。学校既立，定名为大通学校。徐又想借开学典礼之机，杀掉邀集来校参加典礼的大小清吏，即行起义。他要陶成章通知各府会党同时响应，陶认为时机不成熟，此议作罢。大通学校于1905年9月23日正式开学，改称大通师范学校，设体育专修科。陶成章、龚宝铨招金、处、绍三府所属各县会党头目来校受兵操训练。大通学校规定，凡入校学生都是光复会会员，毕业后也仍受学校领导人统辖和节制。大通师范学校是一所准备革命的特殊的学校，也是革命的联络机关。同年春，徐介绍秋瑾加入光复会。

与创立大通学校同时，陶成章提议党人捐官学习陆军，学成后打进清朝军事系统，掌握军权，以谋“中央革命”。徐极表赞成。经过他表叔原湖南巡抚俞廉三的推荐，花银三千，被批准送日本学习陆军。这一年冬天，他偕妻子王振汉、友人陈伯

平、马宗汉等去日本，先后欲进陆军联队、振武学校，均因眼患近视不合格被拒。又欲入陆军经理学校或警政学校，也未如愿。1906年春自日回国，北游京师及辽、吉，察看形势。当年冬，捐了一个道员，分发到安庆，经俞廉三推荐，加上做事精明干练，得到安徽巡抚恩铭的重用，先任武备学校副总办，继任警察处会办。第二年又任巡警学堂堂长，接着又任陆军小学（原武备学校改名）监督。徐利用其身分，广事交游，和兵备处提调胡维栋、马营排长常桓芳、督练公所学员龚振鹏等过从尤密，准备起义时引为奥援。他白天亲自督课，晚上和将士们饮宴，在学员中声望日高，与学员关系日益密切。

先是，徐赴安徽候补时，大通学校事交给秋瑾主持，并有浙、皖同时起事之约。此后，党人陈伯平往来于安徽、浙江和江西之间，贯通声气，并运动会党。

徐在安庆起义前，上海侦探捕获党人叶仰高，押送南京。经两江总督端方酷刑严讯，叶仰高叛变，将所知同党供出，幸所供是党人别名或暗号。端方将名单电告恩铭，嘱其拿办。恩铭接电，召徐锡麟计议，不知名单中也包括徐锡麟。徐就心事已泄露，与陈伯平、马宗汉计议，决计速杀恩铭。徐原定7月8日乘巡警学堂毕业生举行典礼的机会，将省府官员一网打尽，并已通知外地会党前来支援。但恩铭因这天有他事，命将典礼提前两天举行，因此外地会党未能赶来。

7月6日一早，徐锡麟同陈伯平、马宗汉到巡警学堂，召集学生演说，徐激励学生“不忘救国”。^③语意虽甚激昂，可是学生们并不了解他的用意所在。上午八时，恩铭及文武官吏陆续到警校礼堂。徐抢上前向恩铭行举手礼，大声说：“回大

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方惊愕，陈伯平即上前向恩铭投一炸弹，未爆发。徐随即从靴统内拔出两支手枪，射向恩铭，因近视，恐不中，只得连续发射。恩铭身中七枪，由部下狼狈背走。一时文武官吏，纷纷逃出。惟奸吏顾松被马宗汉捉住，徐立杀之廊下。徐回到礼堂，命令学生到军械所开库取枪支子弹，均不适用。从警校逃走之藩司冯煦，臬司毓朗等清廷官员，立即组织清军进攻军械所，并悬赏缉拿徐锡麟等。经过近四小时的激烈战斗，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不幸被俘。

接着，冯煦、毓朗等组织审讯，要徐锡麟写口供，他挥笔直书说：“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还说：“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不可拖累无辜。”“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④

恩铭被刺后当天死去。端方致电冯煦立即处死徐锡麟，安庆司道等清吏并决定将徐斩首后剖腹剜心祭恩铭。徐锡麟于1907年7月6日晚在安庆抚院门前慷慨就义。

注：

- ① 徐父梅生在绍兴“开生绸庄、泰生油烛棧两铺……约计徐家产业，共值十五万元。”见毕志社编：《中国革命党大首领徐锡麟》第90—91页。
- ② 章炳麟：《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8页。
-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页。
- ④ 同③第80—81页，又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第728—729页。

朱 执 信

尙明轩

⑤

朱执信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著名的活动家和理论家。他原名大符，字执信，笔名蛰仲、县解、去非、前进等，广东番禺县人。1885年10月12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出生在广州，父亲朱启连，当过张之洞的幕僚。

朱执信童年进私塾读书，稍长，跟从舅父汪仲器学习数学。1902年，入广州“教忠学堂”读书。他勤奋好学；和学友共同集资购阅新学书报，并组织“群智社”，探求新知识。1904年，应广东省留日考试，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法政科。在东京他结识了孙中山及许多革命留学青年。目睹清政腐败，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他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1905年7月，参加中国同盟会^①，后被选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

从1905年到1908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改良派的反革命谬论。在《论满洲欲立宪而不能》、《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和《心理的国家主义》等文中，他从当时存在的国内民族矛盾现状出发，抨击了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说明这个政府乃是内忧外患的祸根；揭露了清政府假立宪的骗局，驳斥了康、梁之流所散布的种种胡说。他指出清朝统治者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的改革，力主以革命求共和，反对改良主义的调和论，号召人们摒弃对清政府的幻想，举起反清的旗

帜，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斗争。

朱执信在1906年1月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片断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某些内容。尽管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对科学社会主义无力进行正确、全面的介绍，甚至有很多错误，但他肯定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称赞“马克思素欲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②这种提法虽仍不恰当，但比之当时一般的民主主义者，显然具有更为远大的眼光。

1906年，朱执信自日本归国后，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政法学堂及方言学堂等校任教。他以教员的职务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征集同志，与新军中的赵声、倪映典等人经常秘密策划反清斗争。同时，积极从事联络和发动民军，进行武装起义。“自丁未(1907年)以至辛亥(1911年)，凡广东革命诸役，无一不与”^③，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之役，他负责发动顺德一带民军起来支援。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他是进攻督署的“选锋”(突击队)之一，随同黄兴攻入督署，在激战中负伤。这次起义失败后，他流亡到香港。

武昌起义爆发后，朱执信在广东发动民军起义，对于促成广东“兵不费刃”而光复，起了重大作用。之后，他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着手编练军队，准备北伐。南北和议达成后，他又被委为广(州)阳(江)军务处(后改称绥靖处)督办和广东审计院院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离开广州到上海，后又赴日本，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1914年，他奉命返粤，与邓铿策划发动反袁武装斗争；接着，又主持驱逐龙济光的军事活动，由于所联络的各路民军举义时间不一致以

致失败。在这期间，朱执信先后两次到达新加坡、马来亚的怡保等地为讨袁筹款而奔走。1915至1916年，为讨伐袁世凯，他在广州及东莞、阳江、雷州等处，陆续策划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

与此同时，朱执信仍然坚持理论宣传活动，为《民国》杂志撰写了许多捍卫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的政论。在《无内乱之牺牲》、《暴民政治者何？》及《革命与心理》等文中，他揭发了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罪行，驳斥了当时反动分子把革命者及其主张诋毁为“暴民”和“暴民政治”的谬论。他反复指出“民心恶袁”，袁记政权的稳定只是暂时的，坚信民主革命必然胜利。

在“护法”运动期间，朱执信一直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1917年7月，他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及掌管机要文书的职务。1918年5月，他又随同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协助孙中山办理海外侨胞捐款事宜，并担任与福军及陈炯明军的联络，准备驱逐窃踞广州的桂系军阀。1919年秋至1920年夏间，他曾多次到福建漳州与驻扎该地的粤军进行策划，并和在粤的魏邦平、李福林军相联络，积极从事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活动。除此之外，他还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等著作，并奉命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担任编辑撰述工作。

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业已走到终点，孙中山的政治活动陷于绝望的困难日子里，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接着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新时代的曙光给朱执信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他著文予以赞颂，并学习俄文，准备钻研苏俄的革命理论。在他此后的很多著述中，显示出他的思想发

生了重大变化。

1919年春南北和议时，针对有人把国内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向南北军阀实力派的乞求上，朱执信指出：象今天南北军阀“拥兵据地”的这种“实力”，是“旦夕倒坏”的实力，是“千人所指，无疾而死的实力”，不是真正的实力。他断然说，“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人民所归向者，始谓之实力”。^④

朱执信比当时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看得更远一些，他不但一向坚持比较急进的“平均地权”的纲领，而且由于时代革命思潮的影响，逐渐认识到来自下层革命群众的力量。“今后革命，顾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也”。^⑤在《野心家和劳动阶级》、《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等文中，他说：“我以为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又说：“离开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他把日益增长的“工人的力量”，视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因素。他支持工农劳动人民的斗争，并且发出“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的呼声，鼓励青年学生到农村发动农民参加爱国运动。

朱执信赞扬“五四”时期革命知识分子参加“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在《青年学生应该警戒的两件事》一文中，他指出：“现在的学生，已经把从前儒家那些谬说，通打破了。”

朱执信热情地赞颂布尔什维克的刻苦牺牲精神，他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精神，只是在他们那为社会牺牲的精神上。他们共产党员工作时间比非共产党员多，而所受的俸给特别比非共产党员少。要有这样的牺牲精神，然后才可以作成一個革命事业。”^⑥他从俄国的革命经验中，注意到赤卫军的功

绩和列宁培育赤卫军的方法,指出:“现在俄国的赤卫军,就是国内劳农阶级的乳母。有了赤卫军的保护,他国里头的种种组织,才可以保持发达。”^⑦俄国的军队“一面做防卫主义的武力,一面又是共同经济建设的先锋”。^⑧他想以当时苏俄的劳动军为榜样,来建立一支新的部队。为此,他翻译了列宁颁布的苏俄《劳动军法规》。从上可以看出朱执信也象孙中山一样,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怀着向往的心情,从而使他对中国革命增加了信心,在晚期的政论中闪现出新的光辉。

当然,他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对列宁的理论之了解,还受到各种局限(例如,他重视工农劳动人民,还仅仅是认为革命离不了“农工的帮助”;他认为“实行共产主义,……不必以各取所需随之”。等等);他用以观察和论述社会问题的基本观点,仍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

朱执信始终积极地参加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工作。他极端反对逃避革命斗争的行为,深恶痛绝吃饭不干事的人们,曾说:“现在这些自命高尚而作隐遁生活的人,都是过分的贪婪。既然吃众人做成的饭,穿众人做成的衣,住众人做成的房子,就应该为众人做事。”^⑨1920年夏,戴季陶和胡汉民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不满,逃到湖州去过所谓“隐遁生活”,朱执信曾写信给予严厉斥责。

1920年夏,孙中山决心驱逐桂系军阀,“统一南方”。为此,朱执信于6月下旬再次被派赴漳州,敦促驻扎在那里的粤军西进讨桂。稍后,他又不避艰险地赴广东,联络国民党旧部和民军响应讨桂军事行动。在他的策动和民军纷起的压力下,

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宣布独立。9月21日，朱执信到虎门调停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时，被桂系军阀杀害，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出了生命。

注：

- ①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邀约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七十余人，在东京赤坂区霞关内田良乎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会议临时结束时，孙中山领导大家举行宣誓加盟仪式。朱执信于此日加入同盟会。
- ② 《民报》第2号。
- ③ 《朱执信先生墓表》，广州执信女子中学编：《朱执信先生殉国十周年纪念册》。
- ④ 《所谓实力派之和平》，《朱执信集》上海建设社1921年版，下册，第541页。
- ⑤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
- ⑥ 《革命党应该如何？》，《朱执信文存》1925年版，第437—438页。
- ⑦ 《匈俄苏域政府的兵》，《朱执信集》上海建设社1921年版，下册，第661页。
- ⑧ 《兵的改造与其心理》，同上书，第392页。
- ⑨ 《朱执信先生纪念专刊》1929年版，附录类，第23—24页。

熊成基

黄德昭

熊成基，一名承基，字味根，江苏江都县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祖、父两代都做过清朝的小官吏。^①熊幼年进塾读书，稍长，学过医。感于中国民族危机深重，使他仰慕历史上的岳飞、史可法等人物的业绩，决心改学军事。1904年夏，他到安庆，考进安徽武备学堂练军班当学兵。这时，民主革命浪潮已波及到这所武备学堂。在这里暗中传布着的《革命军》、《扬州十日记》等反清革命宣传品，深深影响着他。^②他结识了同学中的柏文蔚、倪映典和在籍军人（陆军常备营排长）范传甲等革命党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反清秘密革命团体——“岳王会”^③，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1905年夏，练军训练期满，熊被派去南京入新军某营为副目。后经管带介绍考入江南炮兵速成学堂学习。在校与同入炮校的倪映典等相约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06年从炮兵速成学堂毕业后，充当陆军第九镇炮兵排长，得到军中同志帮助，熊常向士兵秘密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听者多为感动。

1907年夏，安徽举行征兵。熊由南京应调回安庆。先任马营队官，继任炮营队官。当时，新军中的下级官佐和士兵，在革命党人的运动和影响下，多已倾向革命。7月间，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熊成基与范传甲等计议，决心相机在安庆再次起义。是年冬，革命党人倪映典由南京回安庆，任马营管

带，倪与熊策划于是年除夕起义。不料事机为清吏所觉察，倪被撤职，起义计划没有实现。倪去后，熊被推主持“岳王会”，继续在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

1908年秋，清政府令江苏、湖北和安徽各镇新军于11月间在安徽太湖举行会操，安徽革命党人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在太湖秋操时联合江苏革命党人发动太湖起义。但安徽巡抚朱家宝对本省派赴秋操的士兵官佐严加挑选，军中的革命党人因被怀疑多不能前去，眼看太湖起义的计划将无法实现。于是，熊成基与范传甲等又改变计划，决定于太湖秋操时，先在安庆发动起义，待得手后，开赴太湖策动参加会操的新军响应，转攻邻省，乘势扩大。恰好，光绪帝和西太后于11月14日、15日相继死去，熊等认为机不可失，遂于11月19日（旧历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召集党人举行会议，制定起义计划。会上决定以熊所掌握的炮营（驻城东门）和马营（驻城西门）为主力，先在城外起事，革命党人薛哲所部之步营（驻城内北城根）和范传甲的辎重队在城内接应。熊被推为起义军总司令。熊当即发布了作战密令十三条，决定是晚发动起义。

当晚9时，炮营和马营分别在城东、西举火为号，把拒绝投降的两个营管带一个打死一个打伤，迅速会师占领了子弹库，并进攻北门。不料皖抚朱家宝在检阅太湖秋操时得到光绪帝和西太后死讯，先已于19日午间机密地回到安庆，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防范，而党人不知。当熊率起义军攻城时，朱督率协统余大鸿命城内各营紧闭各城门，准备顽抗。在城内的薛哲，见势畏缩，动作迟缓，未能按时打开城门接应起义；范传甲在辎重队，被严密监视，不能自由行动。因此，起义军不

得入城。熊率起义军，在城外迭次进攻，奋战一昼夜，未能攻破。江上的清军兵轮，本已表示归顺，此时又为反革命所劫持，炮轰起义军阵地。起义军内外受敌，伤亡很重，难以支持。熊迫不得已，改变战略，于20日下午率众北向集贤关退却，欲取庐州为根据地，然后联络凤阳、颍州等地会党，进取中原。于是取道桐城，直趋合肥。时清提督姜桂题在河南闻讯，派兵来追，熊虽然打败了追兵，但到庐州时，所部仅剩士兵八九十人，而且在退却中，人心不固，时有叛逃出现。熊见如此，劝余众散去，自己则到一士兵家中暂避，安庆起义至此失败。皖抚对革命党人、士兵和学生，进行逮捕、屠杀，全省先后受害者达三百人之多。

1909年初，熊成基从河南至山东烟台，经大连转赴日本，改姓名为龙潜，号望云。在东京，由革命党人肖翼鲲介绍加入同盟会；在勤学社结识了黄兴。黄和他谋划再举。适有党人获得日本之秘密图籍数十种，拟向某国求售，以充革命经费。熊急于回国革命，即担负起售书筹款任务，于9月间冒险走东三省。他化名张建勋先到长春，寄住其友人友友臧克明父臧冠三家。后因在臧家居住不便，就到哈尔滨活动。臧冠三是个好利之徒，对熊久居其家有所要求，熊临行时被迫对臧父说，此往售书如有所得，当以重金馈赠。臧父大喜，望其成功。熊居哈数月，事情并不顺利，臧父屡函催问，开初熊尚作答复，后即不予理睬，臧父于是怀恨在心。1910年1月，清廷考察海军大臣载洵和萨镇冰由俄回国，路过哈尔滨，传闻熊要谋刺载洵，清吏悬重赏搜查。臧冠三即向吉抚陈昭常告密，以致熊于30日在哈遭捕。次日，解赴长春。清廷据陈昭常电奏于2

月7日电令陈及皖抚朱家宝会勘，“就地正法”^④。熊在狱中笔写供词数千言，直言革命宗旨是“以推翻政府改革政治为主要，不尽是满汉种族之见”^⑤，“俾我同胞永享共和之幸福，以洗涤我祖国历史上莫大之耻辱”。^⑥1910年2月27日，熊慷慨就义。

注：

- ① 熊祖父瑞生曾任安徽繁昌知县，父存仁系候补通判。见《熊烈士供词》（宣统元年十二月）。
- ②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记》有云：熊谈《革命军》和《扬州十日记》时，“乃至流泪不止”。
- ③ “岳王会”是1904年由柏文蔚等发起组织，意思是崇拜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总会设在芜湖，安庆为分部。（见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
- ④ 《安庆马炮营起义清方档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255页。
- ⑤ 《熊烈士供词》（宣统元年十二月）。
- ⑥ 《熊烈士供词》（宣统二年正月）。

主要参考资料：

- 陈春生：《戊申熊成基安庆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
- 陈春生：《熊成基谋杀载洵始末记》，同上。
- 佚名：《熊案始末记》，同上。
-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记》1932年作。
- 顾忠琛：《熊成基戊申起义始末》，上海《中华日报》1944年12月11日。
- 杨士道：《熊成基安庆起义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12月版。

焦 达 峰

周天度

焦达峰原名大鹏，字鞠菽，湖南浏阳县人，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生。家有土地五百余亩，父亲担任过地方上的团总。^①焦达峰五岁入私塾，十五岁上浏阳高等小学，十八岁加入哥老会，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随后转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肄业，与禹之谟交好，受禹及当时革命形势的影响，倾向革命。

1906年焦达峰参加了萍、浏、醴起义，曾任起义将领李金奇的参谋。起义失败后逃往日本，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不久加入同盟会。1907年任同盟会调查部长，专门从事联络各省秘密会党的工作。

这时，同盟会的活动正集中于华南地区，对长江流域各省注意不够。焦达峰认为同盟会的行动舒缓，革命应从“腹地”发动。于是联合四川张百祥、江西邓文翠、湖北刘公等共同组织秘密团体共进会，准备联络长江流域秘密会党，聚集力量，在中部省区发动起义。共进会1907年8月正式成立于东京，仍拥戴孙中山为领袖，宗旨与同盟会也基本相同，但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以便易为会党所接受。

1909年初，焦达峰由共进会推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到汉口后，和孙武等研究了在两湖开展革命办法。4月，他们在汉口法租界设立了共进会总机关，并在武昌设了分机关。

同年8月，焦达峰化名左耀国，回到湖南，在长沙设立了共进会机关部，并密赴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一带活动，联络会党。此后，他一面与杨任等在湖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农民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时往来于湘鄂之间，加强两湖革命党人的联系。半年后，组织起来的会众达一千数百人。

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焦达峰到武汉。这时，谭人凤也从香港来到武汉，经与谭人凤以及当时在湖北的居正、孙武等商议决定，继续加紧两湖革命发动准备，“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②10月，武昌首先起义胜利，给湖南革命党人以很大鼓舞。在湖北革命的推动下，焦达峰负责联络会党，陈作新运动新军，积极准备起义。1911年10月22日晨，焦达峰和陈作新率领驻在长沙城外的新军革命士兵分两路攻入城内，与城里巡防营革命士兵会合，占领了谘议局、军装局和巡抚衙门。湖南巡抚余诚格闻变潜逃，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和几个清吏顽抗被杀，湖南起义迅速获得胜利。当晚，参与起义的各界代表在谘议局举行会议，在革命党人特别是新军代表的支持下，会议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建立了由革命党人为主体的湖南军政府。军政府成立后，焦达峰把支援武汉战争作为首要任务。三日内，招募新兵六万人，并派遣了由王隆中率领的新编独立第一协出师援鄂。

湖南起义成功，军政府一成立，立宪派马上就发起了对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革命党人的进攻。还在起义前，以湖南谘议局长谭延闿为首的一些立宪派人物，看到革命不可避免，

分别表示“倾向”或“赞成”革命，混入革命营垒。他们提出“文明革命”，要求“勿扰乱秩序”。谭延闿宣称：“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③立宪党人力图篡夺革命的领导权，以便维护旧的统治秩序。10月22日起义胜利的当晚，在谘议局举行的会议上，立宪党人即想推举谭延闿为都督，没有得逞。焦达峰、陈作新被选为正副都督后，23日，他们以“模仿英国立宪之精神”为名，迫使焦达峰接受了成立一个参议院的要求，以谭延闿为院长，参议院议员大多数为原谘议局议员。它的职权规定，凡都督发布重要命令都要经参议院同意才能执行，参议院则可自行议决事项交都督执行。但立宪党人并不以此为满足，25日，他们又要求按照湖北接受立宪党人参加政府的先例，于都督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由谭延闿任民政部长，黄鸾鸣任军政部长，实行“军民分治”，以削弱都督职权。焦达峰等对立宪派的篡权野心认识不清，一味妥协，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这样，正副都督形同虚设，立宪派实际上已控制了湖南政权。

这时谭人凤回到湖南，看到都督大权旁落，焦达峰成了立宪派的“笼中之鸟”，主张取消参议院及两部，由都督掌握一切，采取果断措施，给立宪派以有力制裁，但不为焦达峰所采纳。焦达峰说：“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④陈作新也持同样看法，认为大家都是汉族，“如家人聚首”，不必戒备。焦达峰、陈作新等对立宪派的进攻，完全失去了警惕性。他们思想上的弱点，加上当时新军革命队伍被调往湖北支援战争，失去了防御力量，就给立宪派以可乘之机。事先，立宪党人已暗中攻击焦达峰是

“会匪”首领，制造谣言，挑拨新军与焦、陈的关系，鼓动旧军人为黄忠浩复仇。随后他们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由原新军五十标二营管带梅馨，策动一部分军队来发动谋杀焦、陈的流血政变。

1911年10月31日，立宪派先煽动一部分人到长沙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闹事，制造了和丰公司纸币挤兑风潮。与此同时，梅馨则分兵两队：一队埋伏于和丰公司附近，一队作围攻都督府的准备。和丰挤兑风潮发生后，立宪派诡请都督亲往弹压，焦达峰派副都督陈作新前往调处，遭到伏兵袭击，被乱刀砍死。随后，梅馨又指挥所部，声称为黄忠浩报仇，冲进都督府，将焦达峰杀害。焦、陈被害后，立宪派的首领谭延闿随即被拥戴当上了都督。接着湖南常德、湘潭、宝庆等地也相继发生了类似的反革命政变，许多革命党人被诱杀。革命派掌握的政权很快便落到了立宪派手里。

注：

-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80页。
- ②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5页。
- ③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
- ④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册，第924页。

张培爵

沈庆生

张培爵字列五，四川隆昌县人，生于1876年12月（清光绪二年十月）。父张照清是医生。培爵幼入私塾，二十三岁中秀才，后两次到成都参加乡试，不中。1904年春，入成都高等理科优级师范。同年冬，与同校叙属同乡创办旅省叙属中学。次年，被举为旅省叙属同乡会会长。1906年，经谢持介绍加入同盟会，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同盟会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反清武装斗争不断兴起，四川是斗争激烈的地区之一。1907年11月，张培爵与熊克武、谢持、黄复生、杨维、黄方、余切等联络新军和会党，密谋在成都起义。事泄，杨维、黄方、张治祥、黎靖瀛等六人被捕，是为“丁未成都六君子之役”。成都起义失败后，党人多出走，张培爵仍潜留成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秋，张培爵从成都高等理科优级师范毕业，翌年任成都叙属中学校学监。他利用学监身分为掩护，发展同盟会会员，并与熊克武、谢奉琦、廖树勋等秘密联系，从事革命活动。这时，在川北、川西、川南各地革命党人，都靠培爵为他们互通声气。

1909年，重庆同盟会支部负责人杨庶堪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邀张培爵赴重庆协助工作。1910年，张到重庆，任重庆府中学堂学监。同盟会重庆支部也就设在这里。张培爵与杨庶堪等，以重庆府中学堂为基地，发展会员，联络会党及巡防

军，准备继续发动武装起义。

1911年5月，清廷发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激起了四川人民的愤怒，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清廷闻讯，派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9月7日，川督赵尔丰屠杀成都请愿群众，更加激起全川人民强烈反抗。此后，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斗争，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遍及全川。这时，杨庶堪和张培爵接各方密报，深知全川民气激昂，已达高潮，于是积极作起义准备。他们在党人内部作了分工部署，派党人掌握了巡防军和商会的团练，又发动袍哥会党，组成了义勇队，还联络好了川东道清军的炮队营。对清吏方面也作了分析，掌握了他们的动态。当时端方所率鄂军尚在入川途中，其军中也有革命党人，杨、张派人和他们取得了联系。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接着，九江、长沙、安庆、昆明、贵阳等地也宣布独立。消息传来，使重庆党人大受鼓舞，但也使重庆知府钮传善严加戒备。11月5日，突然传来夏之时在简阳起义的消息。夏之时原是新军的下级军官，他在简阳杀死清兵军官宣布起义。杨庶堪、张培爵闻讯后派党人朱之洪前往和他接洽，许他入城后担任将来蜀军政府的副都督。定议后，夏即率起义军东下重庆，11月22日抵重庆浮图关。钮传善急令守兵闭城门，企图抵抗，但城内党人所掌握的团队、巡防营立即出动，打开城门，遂使夏军整队入城。川东道朱有基闻讯先逃，钮传善则被揪住，剪去发辫，俯首投降。于是张培爵同杨庶堪等于当日通电宣布重庆独立，成立了蜀军政府。23日，蜀军政府酝酿选举各级职员，关于都督一职，杨庶堪坚决谦让，张培爵遂被举为蜀军政府正都督，夏之时担任

了副都督。同日，蜀军政府发布对内对外宣言，在对内宣言中明确指出：蜀军政府以同盟会四大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①到此，清朝在重庆的封建专制统治终被推翻了。

与蜀军政府成立的同时或稍后，川东道及下川南道所属五十七个州县纷纷宣布接受重庆蜀军政府的领导与管辖。

同年11月27日，成都方面成立了以立宪派首领蒲殿俊为首的四川大汉军政府，宣布四川“独立”。这个“独立政府”是清廷四川总督赵尔丰与立宪派绅士相勾结玩弄的骗局，重庆蜀军政府不承认大汉军政府，并派夏之时率兵西上，讨伐赵尔丰。夏军出发后，尚在途中，12月8日，成都蒲殿俊已在兵变中被驱逐，由另一野心家尹昌衡继任大汉军政府都督。尹迫于周围情势，将赵尔丰捕杀。重庆西征军遂中途返回。这时，南北议和已经开始，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妥协。重庆蜀军政府适应南京临时政府的妥协政策，决定与四川大汉军政府合并。1912年1月27日，成渝双方代表在重庆议定合并合同十一条，2月2日双方正式成立统一的四川军政府，设在成都。2月12日，张培爵离重庆西上成都，至隆昌时，与同盟会党人分析形势，觉得成都方面尹昌衡党羽甚众，遂主动由张电请尹昌衡任“中华民国四川军政府”正都督，自任副都督。3月9日，张抵成都，12日就副都督职。张培爵及同盟会党人的这一决定暴露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性。这种妥协的结果，使四川军权仍落入封建军人、投机分子与立宪派绅士手中。

1912年春，西藏农奴主叛国分子在英帝国主义操纵下，

派兵攻占川边一些地区。6月14日，北洋政府委尹昌衡为西征总司令(后改为川边经略使)率部西征。尹于出发前，不以副都督代理其职务，而转举胡景伊为护理四川都督，改张培爵为民政长。这是明显地对张歧视，而张竟接受了这个名义。胡景伊原为清朝广西陆军协统，对革命党人极端仇恨。他护理川督后，竭力排斥张培爵，使张名为专司民政，实则毫无实权。胡后又派人到北京，以重金贿袁世凯亲信陈宦，借陈的力量，达其排挤张培爵的目的。11月，张被袁世凯政府以谘询边防民事为名调往北京，并被解除四川民政长职务。

1913年初，张培爵抵北京，被袁世凯任为总统府顾问官。3月，袁世凯暗杀了主张成立政党内阁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4月，又非法地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大借款协定，引起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这时南北斗争的形势十分尖锐，张培爵已身在北京，无行动自由，“惟看书着棋，凡政治上一切竞争，均淡漠视之”^②。但熊克武、杨庶堪在四川发动的反袁斗争，却引起袁世凯对他的疑虑。时黄兴谋取金陵，培爵曾潜至上海输资助其事，更为袁世凯所不容。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在京、津一带密布侦缉队，侦捕革命党人。张培爵为避祸，离京住入天津租界，借经营机织袜作坊以“自晦”。但袁世凯对他仍然很不放心。1915年1月7日，袁世凯的军政执法队在天津将张培爵和他的友人邹杰、陈乔村同时逮捕，解往北京。3月4日，袁政府借“血光团”罪名将张及其两友同时杀害。

注:

- ① 《四川与辛亥革命》第 261 页。
- ② 《张列五先生手札》第 27 页。

主要参考资料:

- 张培爵:《张列五先生手札》,成都球新印刷厂,1939年9月版。
- 向楚:《巴县志》卷二十、二十二。
- 向楚等:《蜀军政府成立前后》。
- 王子骞等:《蜀军始末纪实》。
- 《宣统政纪》卷五二、五三、五八。
-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四号。

禹之谟

闻少华

禹之谟，字稽亭，湖南湘乡县青树坪（今属双峰县）人。1867年（清同治六年）生。^①其父禹春轩是个略识文墨的商人。他六岁入塾读书，虽然读到十七岁，但对于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全无兴趣，却爱研读王船山遗著及流览各种小说。

禹在二十岁时，经同乡介绍，投奔南京某军营作文书，不久担任运输粮秣事务，往来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等地，有机会与各地的帮会首脑发生联系。

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中，禹因襄办由山东、天津等处向辽东运输粮秣弹药的任务有功，经刘坤一保奏，以县主簿候选，他辞不受命。战后他回到上海，专心研究实业，多次在长江沿岸进行开矿活动，没有成功。

戊戌变法前，禹曾回到长沙与谭嗣同、唐才常以及哥老会首领毕永年等有所接触；变法发动后，他寄以同情。变法失败谭嗣同等被杀，他极为愤慨，曾说：“倚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与虎谋皮。”^②

1900年，禹之谟参加了唐才常在汉口的自立军活动，几乎被捕，后逃出汉口，经上海东渡日本。

禹到日本后，结识了留日学生中的爱国青年，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同时他在东京学应用化学，又到大阪千代田工厂学纺织工艺。1902年春，接父病危电回湘乡省亲。其父死后，他

到湘潭创办了一所规模不大的毛巾厂，招收艺徒不足十人，但产品质量较好，价格便宜，颇受欢迎。1903年夏，他把毛巾厂迁到长沙，规模稍加扩大；又附设了一个工艺传习所，制做竹木家具，职工共约四十人。他和生徒职工，同设计，同操作，谋求实现他的“实业救国”理想。在他的提倡下，“湘省织布机坊，一时创设不少”。^③但随着旧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大量倾销，毛巾厂不久几乎被外来廉价品挤倒。“实业救国”毕竟行不通。

1904年，黄兴、陈天华等发起成立华兴会，禹当即参加。

1905年秋，同盟会成立，他是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之一，曾介绍了许多人入会。这时全国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他通过湖南商会积极推动了这一运动。翌年，他又领导了湖南铁路废约改归商办的运动。他的这些行动，得到长沙商、学界的热烈支持和拥护。这期间，禹之谟在长沙创办了“湘乡旅省中学堂”，自己还出资创办了“唯一学堂”。不久，湖南教育会和商会开会都公举他担任会长。

1906年夏，湖南省两个著名的留日革命青年陈天华与姚宏业（他们都因所志不遂，愤而自杀：陈是在日本投海；姚是在上海投江）的灵柩运回长沙，禹之谟主张把两人遗体葬于岳麓山，“以彰义烈”。署理湖南巡抚庞鸿书、长（沙）善（化）学务处总监督俞诒庆拒绝禹的主张，禁止举行公葬。陈、姚灵柩运到长沙的第二天，禹不顾禁令，发动各校学生，一律穿白色制服，整队送葬。这一行动震动了长沙的官绅，他们认为：“民气伸张，清政府危，而官绅之富贵不保矣。”^④俞诒庆当即指挥军警捕去十几个学生。禹向学务处和军警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连

遭拒绝。

禹素闻俞诒庆爱作狎邪之游，嘱学生密切注意俞的行动。果然就在镇压学生的第二天晚上，俞打着“学务处”灯笼，到妓院宿娼，被学生们当场抓住，送到濂溪阁开会声讨。禹之谟主持了这个会，痛斥俞的无耻行径，并要他当场答应释放被捕学生。俞只好低头应允，但因此对禹怀恨在心，决心伺机报复。

不久，禹之谟由长沙回湘乡。这里正发生学界反对盐捐浮收的风潮。禹参加了这次斗争。他和学生们一道去见知县陶福曾，严正表示：“食盐加税，已违人道，浮收巨额，民命更危；倘不能根本撤销，亦应将浮收之额，移充办学，免入私囊。”^⑤禹交涉无效，即返回长沙。陶福曾据此上报，在俞诒庆的怂恿下，巡抚庞鸿书、臬司庄赓良加给禹以“哄堂塞署”的罪名，下令逮捕。被捕前，有人劝他躲避一下，他沉痛地说：“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⑥终于8月10日被捕。当清吏追究公葬陈、姚事时，他厉声回答说：“今台湾及胶洲……等处，皆为外人占领不惜；独以中国人葬中国一抔土，反不能容乎？”^⑦

禹之谟被捕入狱的消息传出，湖南商、学界纷纷营救。营救的文电，每日数十起，迫使庞鸿书、庄赓良等对禹不敢公开审讯。他们深恐激成事变，偷偷地把禹秘密押送至常德，判处永远监禁。9月初，岑春蓂接任湖南巡抚。岑于到职之后，首先注意到禹案的处理。这时正是萍、浏、醴起义风声正紧的时候，岑春蓂与庄赓良必欲从禹之谟身上获得新罪证，借杀禹来立威。俞诒庆乘机向庄建议，用著名酷吏靖州知州金蓉镜来承办此案。遂于9月16日把禹移交到靖州。金蓉镜是个豺

狼成性残暴无比的家伙，他按照岑春煊和庄庶良的意旨，用各种酷刑向禹逼供，妄图从禹口供中找到革命党人活动的线索。但是，禹之谟虽在严刑之下，断指割舌，体无完肤，而终不屈服。他在靖州狱中致诸伯母书说：“侄十年以来，不甘为满洲之奴隶，且大声疾呼，唤世人无为奴隶……宗旨甚正，程度渐高，思想甚大，牺牲其身，无所惜也。”^③又在致同胞遗书中说：“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其毋奴隶其心而生！”^④不久，萍、浏、醴起义发动，湖南全省戒严，岑、庄急电令金将禹迅速处决。1907年1月5日，禹之谟被绞牺牲。

注：

- ① 关于禹之谟生年的直接记载，据湖南历史考古所近代史组辑《禹之谟及其遗书》说，禹生于1855年。但禹之谟在1907年靖州狱中书信则说死年41岁，又据姚渔湘：《禹之谟传》亦说禹卒年41岁。据此上推，除虚岁，则禹应生于1867年。
- ② 冯自由：《丙午靖州禹之谟之狱》，《革命逸史》第2集，第183页。
- ③ 《时报》1906年1月31日。
- ④ 曹亚伯：《禹之谟之死难》，《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204页。
- ⑤⑥⑦ 姚渔湘：《禹之谟传》，《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169页。
- ⑧ 禹之谟：《致诸伯母书》，载《湖南历史资料》1960年第1期，第112页。
- ⑨ 禹之谟：《遗书》，前引书，第119页。

喻培伦

尙明轩

喻培伦，字云纪，四川内江人，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①

喻培伦幼年进私塾，喜听塾师讲述历史故事。稍长，厌恶科场的“括帖”之学，转而喜好机械、金石雕刻等技艺。他赋性聪敏，一般技艺，稍学就会，对各类小型机件，装拆自如。又愤世嫉俗，爱作“不平”语，曾刻石，自署“世界恶少年”。

1905年，喻偕同其弟培棣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时在东京学习警监，不久转入经纬学校，后又进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他初到日本时，成天注意的还是弹琴、照相之类的玩艺，对政治并无多大兴趣。后来，在民族危机的刺激及留日革命青年的推动下，逐渐倾向革命；1908年夏，在东京经吴永珊（玉章）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从此思想一新，舍豪华而尚质朴，积极投身于推翻清朝的民主革命运动。

1908年前后，由于同盟会组织的起义迭遭失败，一部分革命青年转而醉心于个人恐怖活动，主张用暗杀手段对付清廷官吏。喻培伦也赞同这种主张。他认为“利器实用，莫便于炸烈药弹”，而且“暗杀为个人动作较易举”。便抛弃所学，转学到千叶医学校药科读书，钻研化学；并和吴永惲等专租房屋试验炸药、制造炸弹；还与黎仲实、黄复生等人成立了暗杀团的组织。在一次试验炸药中，因药瓶炸裂，他身负重伤；治愈

后废掉了一只手。但他并不气馁,越发精心研究,终于制造出一种在当时说来,威力较为强大的炸药。从此人们赞誉他为“炸弹大王”,称他的炸弹制法为“喻氏法”。喻培伦还将自己发明的炸弹制法写成小册子,向热心暗杀活动的反清革命者广为宣传。

1909年夏季,革命党人得到一条消息说清政府新任北洋大臣、原两江总督端方将绕道武汉入京。革命党人决定在他北上途中,把他杀掉。这时喻培伦早已回到国内,他被派往汉口进行布置。他到汉口北面的刘家庙车站详细勘察了地形,作好周密计划和准备。但狡猾的端方临时变更了北上的路线,没有从这里经过。同年秋,又有几个革命党人决定集中力量暗杀“摄政王”载沣,他被派往北京协同组织暗杀机关。他和黄复生等于12月到北京,在和平门外琉璃厂开设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后,1910年3月31日夜,携带一个特制的大型炸弹,潜匿在什刹海西北面载沣寓所附近的银锭桥下,进行安置。由于事前目测不准确,电线短了几尺,又为敌人所发觉,没有成功。当敌人起出炸弹找外国专家鉴定时,外国专家们认为这颗炸弹的威力很大,制造的技艺是很高的。4月中旬,黄复生、汪精卫被捕下狱。喻培伦东渡日本,不久潜赴香港。

喻培伦到香港后,在同盟会领导下,于九龙城设立暗杀机关,一面从事营救黄复生等出狱的工作,一面策划继续进行暗杀活动。1911年初,他得悉孙中山、黄兴决定将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消息后,便立即奔赴广州,积极响应。旋被派为实行部实行员,为起义制造炸弹。2月,他在香港中环摆花街(后

迁广州甘家巷)设立了专门机关。他不顾身残体弱,夜以继日地和同志们一道工作,两天中赶制出了炸弹一百多颗。当时对起义时间,几经讨论,一再改期。最后一次商讨时,少数党人因鉴于清军戒备的严密,又主张缓期,喻培伦坚决反对说:“举义诚知必死,然死国,义也,吾人不肯死,谁肯死者?国事将不可挽矣。”^③起义决定后,有人认为他一臂已废,可不必参加。他愤然答道:“诸公具四体,不如吾偏枯人也。”^③大家还从他身体和具有技术专长,劝阻他不要参加战斗,喻培伦仍坚决拒绝说:“学固不能磨灭,非我死可以亡之。”^④

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广州起义爆发,喻培伦分派到从后面攻打清总督衙门的一路队伍。他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异常,先炸破督署后墙攻进衙门,再从督署前门走出,随同七十多人又去攻袭督练公所。从黄昏到夜半,他以炸弹作武器一直战斗在前列,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末后因敌我实力悬殊,寡不敌众,身被数创,弹尽力竭,为清军所俘。当敌人审问时,为避免牵累别人,他隐匿真姓名,冒名王光明,坚贞不屈,怒斥敌人,慷慨激昂地宣称:“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⑤壮烈就义。

喻培伦牺牲后,葬在广州东北郊的黄花岗。1912年2月,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喻培伦为“大将军”。

注:

① 出生时间,据杨庶堪所撰《喻培伦烈士墓表》和胡汉民的《为辛亥革命先烈

建墓立碑之经过》一文所附《七十二烈士姓名籍贯及就义情况表》都说喻终年是二十六岁。据此推断,他生于1886年。

- ② 杨庶堪:《喻大将军事略》。
- ③ 章炳麟:《喻培伦传》,《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四)》第431页。
- ④ 同②。
- ⑤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10页。

林述庆

王学庄

林述庆字颂亭，又作松亭，福建闽县人。1881年4月8日（清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生。父亲林耀源是一个普通农民。他小时没有读过多少书，因家境困苦入营当兵，1902年被选拔进福建武备学堂，毕业后充长门练营督操官、常备军帮带。他在武备学堂读书时，就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曾加入革命团体福建学生会。

1906年春，林述庆到江宁（今南京）投入新军第九镇统制、原福建武备学堂总办徐绍桢部下，任第十七协三十三标三营管带。徐绍桢是貌似开明的官僚，他的部队，有革命党人渗入，三十三标统带就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赵声。林述庆积极参加了赵声组织的秘密革命活动。同年冬，调任第三十四标二营管带，奉命随徐绍桢开赴江西镇压萍浏醴起义；他与赵声等密谋率部响应起义，未成。1908年，参加南洋新军太湖秋操，中途被调到安庆，要他们去镇压熊成基起义。1909年，改任第十八协三十六标一营管带，驻江阴。这时，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三十六标被调到镇江与同协三十五标会合。官兵得到起义胜利的消息异常兴奋，纷纷试图响应，统领和统带都借故逃走。于是，林述庆便联络各营军官，秘密准备起义。他奔走于沪宁之间，争取配合，得到

同盟会上海机关的大力支持。同盟会派李竞成回镇江加紧活动，联络巡防营、会党和士绅。林与李取得联系，完成了起义的布置。当时，徐绍桢见革命虽已爆发，但清朝势力仍很顽固，立意观望，他派孙铭来镇江接任协统，企图控制部队，被林述庆顶了回去。11月7日，林述庆率新军在京岷山起义，次日入城，驻防旗兵被迫缴械。镇江光复，成立军政府，林述庆任都督，李竞成任军务部长，绅士杨振声任民政长。随后，林派人劝说被阻截在镇江江面的清军舰队起义，得到海军官兵响应，全体投向革命。他还派部将臧在新到淮安镇压谋害起义领袖周实的反动官绅。他又和李竞成支持反正的清朝军官、盐梟徐宝山去光复扬州，徐宝山镇压了贫民孙天生起义后，成立了扬州军政分府。

随后，徐绍桢迫于形势，也率新军起义了，谋占江宁，但被早已作好准备的清将张勋击败。江、浙、沪各革命军组织联军会攻江宁，上海都督陈其美推举徐绍桢为苏浙联军总司令。林述庆不满意徐在起义前后的表现，通电要求改推司令，后来经人调解，才勉强接受徐的指挥。镇军收容了第九镇溃兵和起义的部分海军，成了江浙地区革命军中较强的一支队伍。11月26日，林述庆自任镇军司令与许崇灏率镇军一支队出发攻江宁，柏文蔚、李竞成率二支队从江北包抄浦口，并派人策动沿江炮台起义。12月1日，林指挥镇军会同浙、沪军发起猛攻，占领钟山上的据点天堡城，从而控制了战局。张勋见大势已去，与两江总督张人骏等连夜率军北逃。次日，镇军从太平门首先入城。

林述庆初担任镇江都督时，曾特聘他过去的上司、本地人

陶骏保为他的参谋长。陶是个参加过反清活动，后来投靠两江总督端方，任江宁宪兵司令的变节分子，到任后为林出了许多坏点子，并一再怂恿林自称江苏都督。进入江宁后，林述庆进驻两江督署，占领银行、电报局，用临时江宁都督名义安民，陶署临时参谋总长。结果，浙军方面认为林独霸战果，和镇军发生武装冲突，徐绍楨也借机公开表示不与林合作。林述庆感到处置失当，立即通电请江苏都督程德全来宁莅任，并宣布取消镇江都督名义，专心北伐。随后，镇军即撤出江宁，开赴浦口、临淮关一线，林述庆就任北伐临淮总司令。但徐绍楨却不肯罢休，跑到陈其美处诬告林述庆，说江宁起义失败是因为林扣押了上海支援的子弹。陈也认为林在通电中要求取消江苏几个都督并立状态是和他为难，就借林述庆赴沪与黄兴会商北伐事宜的机会准备对林下毒手，结果捣乱的陶骏保被陈诱杀，林述庆、柏文蔚脱险乘兵舰逃回浦口军中。

林述庆激烈反对同袁世凯讲和，要求北伐，他将部队向北推进，监视清军行动。但是，因为得罪了陈其美等，得不到军费和军火，以致柏文蔚不肯开拔；他迫不得已赶到扬州向徐宝山求助，遭到冷遇；又到南京，镇江设法，也毫无结果。江北都督蒋雁行还不让镇军驻在他控制的地区里；镇江地方势力也阴谋驱逐留守的镇江军政使、老革命党人郑权。林述庆处处碰钉子，灰心丧气，只好于1912年1月8日通电下野，回乡闲居。归途中，写成了记叙起义和北伐经过的《江左用兵记》。

袁世凯上台后，看到林述庆在革命军内受过排挤，生活又很贫苦，便加意笼络，1912年9月，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当时，沙俄策动外蒙古王公叛乱，林述庆想劝袁出兵讨伐，于

10月到北京，被推为各团体联合国防会副会长。这时，袁世凯任命他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国民党也推他为名誉理事。但他看到袁处心积虑镇压革命势力，对时局很担忧，却又找不到出路。次年2月，孙毓筠等发起国事维持会，以超越党派、调解纠纷为号召，林述庆应邀参加发起，出任理事。但该会实际上是袁的工具，处处以调解为名遏制反袁活动。

不久，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沪遇刺身死，案情披露，主凶就是袁世凯。林述庆对此非常激愤，不断当众拍案为宋鸣不平，表示要回南方号召旧部反袁复仇，因而遭到袁党的仇视。4月10日，袁世凯心腹、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单独宴请林述庆，林归家后突然发病，满身浓痘，七窍流血，延至16日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林述庆：《江左用兵记》。

林述庆：《林松亭遗诗》。

郑叔：《林烈士述庆传》。

郑贞文：《国贤事略初稿》。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

蔡 锷

张振鹤

蔡锷字松坡，原名艮寅，生于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湖南邵阳人，后迁往武冈。七岁就学，十四岁中秀才，1898年春，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任教的有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蔡锷在校，深受梁启超的赏识。同年秋“戊戌政变”发生，谭、梁在北京一死一逃，时务学堂也因连累而被解散。蔡遂离长沙展转到了上海，考入南洋公学。

1899年，他应梁启超函约到日本，先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后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求学。1900年，随唐才常等人回国，准备在汉口发动武装起义，事败又去日本。

他第二次抵日后，改名锷，表示投笔从戎的决心。前后入日本陆军成城、士官两校学习军事。积极参与留学生抗俄义勇队的活动。1903年冬，于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

蔡在日本期间，同梁启超的关系更加密切。曾用孟博、奋翮生、击椎生等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

1904年，蔡从日本回国，先在江西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材官学堂总教习及监督，1905年初到湖南任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等职。同年夏，被调到广西，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随营学堂总理官、测绘学堂堂长等职。

1906年秋，奉令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同年，广西陆军小学堂创办于桂林，蔡锷任该校总办。1908年，升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自桂林移驻南宁。次年，接任龙州讲武堂监督。1910年奉令兼新军混成协协统，学兵营营长等职。蔡锷在广西数年，创练新军，颇负盛誉；然亦招人嫉忌。有人策动谗议局，对蔡提出弹劾。这就促使他决意离开广西。1911年初，经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和陆军小学堂总办罗佩金向云贵总督李经羲推荐，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他的表现又不完全象梁启超。他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潮流的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派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以同情和赞助。1907年，同盟会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起义时，黄兴和赵声二人于事前秘密去广西访问过他。他到云南后，对云南讲武堂李根源等人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蔡锷约集昆明的革命党人秘议响应计划，部署一切，被推为总指挥。^①

1911年10月30日（阴历九月初九日），蔡按预定计划在昆明发动起义，令李根源率新军七十三标在城北校场发动，他本人率新军七十四标在南校场巫家坝发动。第二天，起义军占领昆明全城。清总督李经羲自督署逃往法领事馆避难，后经蔡锷派人把他护送出境。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协统王振畿被起义军击毙。军事总参议靳云鹏化装潜逃。11月1日，云南军政府成立，公推蔡锷任都督，李根源任军政部总长，唐继尧任次长。蔡锷掌权后，在行政上进行了若干改

革,他撤换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县知事,任用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军官;财政方面则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③。

云南独立后,贵州革命派与立宪派竞相酝酿独立。四川总督赵尔丰还盘踞成都,和保路同志军对抗。蔡锷为了巩固云南,立即着手向邻省发展,从而对贵州、四川两省的政治变动进行了干预。

11月4日,贵州宣布独立,革命派获得群众支持,掌握了政权。但两派斗争极为尖锐。该省立宪派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请求蔡锷派兵援黔,武装镇压革命派。蔡锷和立宪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竟然听信他们对革命派的中伤,派唐继尧率军到贵阳^③。唐到贵阳后,围攻贵州军政府,屠杀了大批革命党人。唐当上了贵州都督,戴戡、任可澄当上了都督府左右参赞^④。

四川群众性的保路运动在云南起义后,进一步高涨起来,清政府派端方率军进入四川,向革命势力反扑,四川总督赵尔丰也还拥有相当大的反革命军事力量。11月11日,蔡锷派谢汝翼、李鸿祥两个梯团,共八个营的兵力援助四川起义军。赵尔丰的军队士气低沉,一与援川滇军接触,就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但是,援川滇军和四川起义军未能团结对敌,因争地盘、税款等问题,也不断发生冲突。因此,谢汝翼于1911年12月,在叙州和自流井对数万抗清保路同志军进行了镇压;1912年初,李鸿祥也在泸州属合江县杀死了革命党人黄方和大批保路同志军^⑤。对于这场屠杀,事后蔡锷和重庆军政府张培爵、夏之时两都督有截然相反的电报致黎元洪。蔡称“合江

匪徒啸聚”，“随我军人城后，彼乘间入城，肆行劫掠”。张、夏却说：“滇军以兵力解散同志会，施放机关炮，杀伤过多……党人滇人皆以为过当。”^⑥

民国成立以后，蔡锷的主要政治倾向仍受着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也把云南、贵州作为他们活动的地盘。但是蔡锷又被谷钟秀、张耀曾等组织的统一共和党推为总干事，从而，他也和国民党内一些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二次革命”爆发时，他暗中派兵援助四川熊克武讨袁。末后，袁世凯把他调离云南，以唐继尧继任都督兼民政长。1913年10月，蔡锷到了北京，袁加以多方笼络，任以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段祺瑞）、全国经界局督办、政治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等职衔。

但蔡锷到京不久，迅即察觉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便暗中与朋友、同道，小心翼翼地多方做应变的准备。当时全国各省除滇黔粤桂外，几乎都是北洋军队防地，而广东都督龙济光早已投入袁的怀抱，并牵制广西都督陆荣廷，使之不能对袁有任何异动。只有滇黔，一时成为立宪派活动的地盘。蔡锷的举动对该两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袁世凯对他倍加提防。袁曾向亲信曹汝霖泄露自己的心机说“松坡这个人，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⑦

1915年，袁世凯酝酿称帝，引起全国各界人民的反对。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先投靠袁世凯，后又遭到遗弃。当梁启超看出袁的帝制必然失败时，便也反对帝制活动。8月间，“筹安会”在京成立，蔡锷立即暗中到天津去和梁启超商议讨袁计划。不久，梁启超针对袁世凯的帝制阴谋，发表了题为《异哉所谓国

体问题者》一文之后，袁对蔡锷的行动就更加注意了。袁派密探对他跟踪监视。10月，袁又派人搜查了蔡锷的住宅。蔡为了麻痹袁对他的注意，伪装意志消沉，同时又借故把眷属先遣送出京，为自己脱身作准备。

11月间，蔡借看病为名去天津，戴戡事先应邀自贵州来津，同在梁启超家里会面，进一步商谈讨袁计划。据梁启超事后追述：当时曾预计“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③。11月19日，蔡锷改名化装，从天津乘日本商船经上海到日本门司。其部属石陶钧等自东京专程抵此在码头迎接他。他和石互换衣服后，独自雇一只小船到横滨，乘轮船秘密到了香港，又从香港经海防到云南，12月19日回到昆明。蔡为了转移袁的注意力，在日本写了许多假信，报告他游历和养病的情况，托人陆续寄给袁的亲信。因而，袁世凯一点也没有察觉蔡离开日本的迹象，当他接到“蔡某过香港到云南去了”的情报时，还不相信。

蔡锷回到昆明以前，军队中早已秘密开会，准备发动讨袁。革命党人也积极活动，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已先后从国外来到昆明，只因唐继尧态度暧昧，不能迅速发动。蔡锷到后，统一了各派力量，促使唐继尧下了反袁的决心。

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戴戡等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废除袁政府“将军”、“巡按使”称号，仿辛亥革命例，推唐继尧为都督，通电讨袁。26日，云南正式组成护国军，以蔡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以扼长江上游，这是主力；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相机进取湘赣；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

令,担任留守,负责前线补给。蔡、李分途出征。

袁世凯得到云南警讯后,1916年1月5日,任命曹锟为总司令,张敬尧为副司令,督师入川,进攻云南。曹的第三师,张的第七师及李长泰的第八师等,取道重庆向泸州前进;另调马继增率第六师、二十一师等由湘西入贵州;令四川将军陈宦将所部伍祥楨旅、川军刘存厚第二师向叙府、纳溪、泸州布防。同时还派龙济光率军入广西以进攻滇南。在袁世凯看来,云南一隅的护国军,不难一鼓荡平。

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向四川出发后,分兵三路,其左路第一梯团刘云峰于1916年1月21日,一战攻下叙州,然后指向南溪,敌川南镇守使伍祥楨部溃不成军。蔡锷亲自率领两个梯团,居于中路,于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后,由贵州威宁、毕节前进,指向四川泸州。敌方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2月2日于纳溪起义响应,配合护国军第二梯团,于2月6日攻占泸州。泸州的攻占,争夺激烈,是出兵以来的第一次大战斗。经此一战,护国军声威大振。另外右路军戴戡指挥的护国军第一军一部也于14日攻入四川綦江,并分兵进入湘西。但其后,北洋陆军数万之众,开到泸州前线,护国军只有三千余人,敌众我寡,加以后方军饷得不到接济,又无预备队可增援,蔡锷不得不于2月下旬,退出泸州,在纳溪与北洋军隔江对峙。3月2日,左路军退出叙府,6日,中路军又不得不放弃纳溪。同时,戴戡的右路军也退守黔边。这时,袁世凯兴高采烈,认为云南问题不久即可解决。不料15日广西宣布独立讨袁,消息传来,四川前线的护国军大为振奋。又经过十几天的整顿补充,蔡于3月17日再次发动反攻,几天之内,就连占江安、

南川、彭水，重新夺回纳溪，北洋军死伤惨重，全线崩溃，敌将张敬尧仓皇逃回泸州。

广西独立的消息使袁世凯大为恐慌。17日，袁召见梁士诒，让梁嘱四川将军陈宦，一面严防前线，一面试探与蔡锷商订停战等办法。^⑨19日，袁又接到北洋内部冯国璋为首的“五将军”将迫使其取消帝制的密报，顿时吓得目瞪口呆。接着四川前线北洋军溃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并又有所谓“五国公使的口头“警告”（帝国主义国家也看出袁的必然垮台）。到此，袁世凯才被迫于22日宣布撤销帝制，并委派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与护国军议和，徐、段等又责成四川将军陈宦先与蔡谈判。3月31日，蔡锷同意了陈宦的停战请求，双方议定停战一星期。期满又延续。从此，川、黔前线转入长期休战状态。

自四川前线停战后，全国反袁形势有了更大发展。有些地方军阀看到大势所趋，乘机由拥袁派转为反袁派，于是广东、浙江、陕西相继宣告独立。到5月22日，被袁视为可依靠的陈宦，宣布四川与袁世凯脱离关系，29日，袁视为心腹的汤芑铭，也被迫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在一片众叛亲离声中，于6月6日忧愤死去。

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民政长。

蔡锷本来长期患喉病，半年多的艰苦转战，健康情况急剧恶化，声带已哑。7月29日，他抱病到达成都，随即推荐护国军参谋长罗佩金代理督军，黔军总司令戴戡代理省长。8月22日，蔡到上海，由于病情日益加重，决定出国治疗。9月20日，抵东京，住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无效，于11月8日逝世。

死后经国会决议国葬。蔡的遗体由日本运回后，湖南各界派代表迎葬于长沙岳麓山上。

注：

- ① 李根源：《雪生年录》第21页。
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44页。
- ②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1951年，中华书局，第6页。
- ③ 蔡锷：《云南蔡都督来电》，《黎大总统政书》卷9。
- ④ 杨昌铭：《贵州光复纪实》，《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06—208页。
李文汉：《我对蔡锷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三），1962年，中华书局，第430页。
- ⑤ 《云南辛亥革命长编》，《续云南通志长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12—114页。
赖建侯：《叙州府独立和滇军侵占川南》；向楚遗稿：《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三）。
- ⑥ 《黎副总统政书》卷6。
- ⑦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4页。
- ⑧ 梁启超：《盾鼻集》第二，第461页。
- ⑨ 风冈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卷上，第321页。

伍廷芳

郑则民

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县人。父伍荣彰在南洋经商。1842年7月30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伍廷芳出生于新加坡。^①三年后，随父归国，居广州芳村。

伍廷芳幼年进塾读书。十三岁往香港入圣保罗书院，1861年毕业，任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接着在香港与友人创办《中外新报》。1874年，他自筹经费赴英国伦敦留学，入林肯法律学院，三年期满取得了大律师资格。不久，回香港担任律师，后又受香港政府聘，任法官兼立法局议员。

1882年，伍廷芳被直隶总督李鸿章招入幕府，前后十多年，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多次参与外交谈判及缔约活动。

1896年，清政府特命伍廷芳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即公使）。^②1899年，伍奉命同墨西哥签订“中墨通商条约”。^③这时，美国为了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由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提出对华外交上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保障中国领土主权独立完整”的幌子下，要求“机会均等”，享有其他列强在华的同等利益。伍廷芳竟然认为这是避免瓜分的好办法，大加鼓吹。^④

1902年伍廷芳应召回国，清政府授他以四品候补京堂衔，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曾与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订法律，拟订了民刑律

草案，报清朝政府颁布施行。

1907年伍廷芳再次任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大臣。两年后被召回。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当时伍廷芳正住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他先后致函清廷摄政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劝告清帝退位。^⑤上海光复后，他和沪军都督陈其美、立宪派头子张謇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并与旧官僚程德全、立宪派头面人物汤寿潜等相联结，准备在动荡的政局中有所主张和夺取权力。11月中旬，南方光复各省，推定伍廷芳为临时外交代表，驻上海，负责革命方面的外交任务。接着，南方光复各省在北军压力下，接受了袁世凯通过英国等驻华使节提出的“调停”建议，派伍廷芳任民军方面的议和全权代表，12月18日开始与袁世凯派出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正式举行所谓南北议和谈判。首先达成了湖北、陕西、山西、安徽、江苏和奉天的停战协定。12月20日，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北京公使，致电南北议和代表，提出：“须早日解决和局，以息现争”^⑥的“劝告”，向革命方面施加压力。伍廷芳和张謇等人乃于12月22日发表了“共和统一会意见书”，认为如果革命战争继续发展下去，就会造成列强干涉的危险。^⑦表现了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的脆弱和恐怖心理。

在谈判中，伍廷芳代表民军坚持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但又暗示对方，只要袁世凯迫清帝退位赞成共和，革命党人方面愿以大总统的职位作为报答。经过多次密谈，双方达成妥协，决定君主、民主问题由国民会议解决。

在谈判过程中，孙中山于12月25日归国；1912年元旦，

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伍任司法总长，协助孙中山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符合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法制和法令。同时他继续兼任议和全权代表留驻上海办理交涉，与唐绍仪等密议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以及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继任等问题。

当袁世凯以清廷内阁总理身分，在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之间，为攫取权位玩弄阴谋诡计时，伍廷芳曾经对袁进行了一些揭露。袁窃夺总统职务后，伍退居上海，历时五年。在此期间，伍虽先后被“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小党派推为首领，并被“共和党”列为该党理事，^③但他实际上没有就职，而在家中埋头攻读儒、佛、耶、回诸书。当袁世凯演出帝制丑剧时，伍廷芳表示反对。^④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伍廷芳应邀北上，于1916年11月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1917年，在以美、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府院之争”中，伍站在黎元洪一边，于5月代总理，协助黎元洪副署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其后，张勋入京复辟，迫使黎元洪于6月12日下令解散国会，伍坚决反对，虽受到各种胁迫，仍拒绝副署这道不合法的命令。他的这一行动，为自己在政界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任大元帅，伍廷芳也南下参加，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次年5月，军政府为桂系军阀所把持，改设七总裁，孙中山辞职离广州赴上海，伍廷芳仍留任军政府总裁兼外长和财长。不久，由于不满桂系军阀独断专行，乃脱离军政府，携印信、税款离广州去上海。从

现实政治斗争中，伍廷芳提高了对孙中山的认识，日渐采取与孙中山紧密合作的态度。

1920年冬，伍廷芳随同孙中山回到广州，恢复军政府。次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伍任外长兼财长。当孙中山前往桂林指挥北伐时，由伍代行总统职务。1922年4月，因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孙中山免陈炯明职，命伍廷芳兼任广东省长。6月16日，陈炯明从惠州以电报指挥叶举等发动所属军队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兵舰与叛军相持。在遭受叛兵围困的情况下，伍坚持与孙中山合作，于次日登上孙中山的军舰与孙会晤，接受指示，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希望他们严守中立，勿助叛军。^⑩适于此时，伍廷芳突然病发，于6月23日在广州去世。

注：

- ① 孙中山：《伍秩庸博士墓表》。
- ② 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23页。
- ③ 《中外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册，第934—938页。
- ④ 《伍秩庸博士哀思录》第2页。
- ⑤ 《伍秩庸先生公牍》上海图书局1913年版，第1册，第11—12页。
- ⑥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册，第213页。
- ⑦ 张忠绶：《中华民国外交史》1936年版，卷上，第49—51页。
- ⑧ 同注⑥第585—586页。
- ⑨ 陈此生：《伍廷芳轶事》第36—37页。
- ⑩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第1102页。

陈其美

黄德昭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生于1878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他的祖父陈绚是个乡绅。父亲陈延祐在本地经商。陈其美六岁入塾读书，十四岁至崇德县石门镇善长典当铺当学徒，历时十多年。到1903年春，他辞去当铺职务，转到上海一家同康泰丝栈当助理会计。这时，正是辛丑条约之后，民族危机十分严重，人们怨恨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陈也表示了对现状的苦闷，尤不满于自己的职业，想出国留学，另找出路。^①1906年夏，陈到了日本东京，入警监学校。在这里他认识了留日学生中的一些革命青年，也结交了后来与他有密切关系的蒋介石。同年冬加入同盟会，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第二年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

1905年后同盟会发动多次起义，革命怒潮波及全国。陈其美于1908年春奉派归国，往来浙沪及京津各地，联络党人。1909年到上海接办作为革命机关的天宝栈，策动江浙一带的革命运动。

1909年夏，同盟会员身兼浙江龙华会首領的张恭等拟发动浙江起义，邀陈共同策划，因叛徒刘师培向江督端方告密，机关遭破坏，张恭被捕，起义被迫停止。

1908年秋，陈其美曾和一些党人到汉口筹办《大陆新

闻》，招股已满，行将开办，因受清吏破坏而中止。1909年和1910年，又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和《民声丛报》，还协助于右任、宋教仁等办《民立报》，进行革命宣传。

陈其美曾在上海加入青帮，并且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上海各酒楼、茶社、戏园、澡堂等游乐场所，多有党羽。1910年4月，宋教仁、谭人凤等为了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在上海组中部同盟会，很重视陈在上海的力量，约他参加，并委托他在上海马霍路德福里设秘密机关，负责策应。1911年4月，黄兴、赵声等发动广州起义，陈应邀到香港参加。当起义失败，他以上海新闻记者的名义，独自跑到广州活动，险及于难。随后，陈经香港回到上海，继续谋在长江起事。7月31日，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他被推为庶务部长。

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接着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及云南等省相继独立。因清廷派重兵南下，武汉方面的战局出现了对民军不利的情况。当时武汉党人“亟望各处响应”。消息传到上海后，陈其美先走南京，又到杭州谋响应，而两地党人希望上海先发动。因此，他积极准备在上海起事。10月下旬，上海人民革命情绪高涨，革命时机已成熟。先是，陈联系的青帮、商团和士绅，到这时已集聚了一定力量；同时奉黄兴之命来沪的光复会员李燮和（时任上海光复会总干事），对驻沪湘籍防军也已运动成熟。11月1日，陈与党人集议，正式决定先在上海起事。2日又分别与上海立宪派分子李平书（清末任上海自治公所董事兼江南制造局提调）及李燮和商讨，决定次日发动起义。11月3日，上海民军起义爆发。上午，闸北民军先行起义，占领巡警总局。下午，陈派敢死队

进击清军兵工厂——江南制造局，局内守军赞拒各半，总办张楚宝又负隅顽抗，一时未能攻克。陈叫大家暂停攻击，自己冒然闯进制造局，企图用口舌劝说敌军放下武器，结果为敌军所拘禁。李燮和闻讯，急令民军进攻，市内群众纷纷前往支援，经过激战，第二日晨制造局被攻克，陈得救出险，上海也随之光复。11月6日，他由上海绅商及会党代表拥戴为沪军都督。

上海光复后，杭州、苏州、镇江也次第宣布独立；但南京仍为张勋盘据。时陈其美以沪军都督身分与苏、浙、镇各军首领共同组织联军，推已经与张勋在南京近郊对峙的新军将领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会攻南京。12月2日，南京克复。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抵上海，独立各省代表议定在南京设立临时政府，陈参加，拟公推孙中山主持国是。29日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遂于1912年元旦宣告成立。

民国初成，陈其美就占据了上海都督的重要职位，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时逐渐暴露出他的恶劣的倾向。早在德福里秘密工作时，他就“纵情声色”^②；到取得都督地位后，更是“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在都督府中“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③。并与意气相投的蒋介石及黄郛三人换帖拜把，结成异姓兄弟。陈在上海光复之初，就立即排挤走了光复会总干事李燮和，独占了上海的革命果实。特别是到1912年初，为了派系权力之争，竟秘密刺杀了当时在江浙一带具有较大影响的同盟会及光复会的著名领袖陶成章。为了杀陶，他暗嘱蒋介石设计，由蒋收买了光复会叛徒王竹卿，于1月13日夜间，将陶刺死于上海广慈医院^④。同时，

他把附和革命的立宪派人物当成了盟友。上海光复前夕，先就预定了立宪派分子李平书出任上海民政总长。上海光复后，又联合了立宪派头目张謇等一类人物组织了共和统一会。此外他还曾多次派兵镇压上海周围的青浦、南汇、昆山、崇明等地农民的抗租斗争，并禁止上海制造局工人反抗虐待的斗争，和严禁工人参加“制造工人同盟会”的组织活动。

1912年2月，清帝退位，陈其美认为革命已成过去，“此后共和巩固，已无冒险者可为之事”^⑤，幻想从事“实边”（指开辟边地）建设。3月，袁世凯窃任临时大总统，为了解除陈的兵权，调他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陈以结束沪军事迟未就任，后乘唐内阁倒台，于7月1日辞工商总长职。7月31日，又被解去沪军都督职务。

1913年3月，倡行责任内阁的宋教仁被袁世凯密谋杀害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党人，认识到袁世凯的阴险狠毒，主张立即起兵讨袁。陈其美与另一些党人表示反对，以为民国已经成立，主张依据法律求得解决。直到6月间，袁世凯明令将江西、安徽及广东民党三都督免职，国民党人才被迫于7月举行反袁的“二次革命”。江西、南京等地党人发难后，陈也在上海起兵；7月16日，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9日宣告上海独立。袁世凯派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到上海加强对海陆军的控制，海军正式表示助袁。上海讨袁军几次攻打制造局，都不能得手。吴淞方面的讨袁军，也相继失败。9月，各省讨袁军完全失败，党人纷纷逃亡海外。陈仍留上海租界活动，11月间，应孙中山电召前往日本。

陈其美到日本时，孙中山正在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准备

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斗争。以“四捷”（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著称的陈其美，这时表示要完全服从孙中山的领导。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者都要立誓约，打手模，绝对服从孙中山。当时许多党人，特别是辛亥首义有功者，不愿履行这种仪式而拒绝入党，但陈首先赞成，对不赞成者就攻击^④，竟至不顾大局，挑拨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⑤。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他被任为总务部长，成了党内的显要角色。

在中华革命党时期，陈其美为反袁进行过多次单纯军事冒险活动。1914年1月，他潜入大连，成立奉天革命党机关部，联络东北党人，进行东三省革命。由于袁世凯警探的阻挠和日本官厅的压迫，没有活动机会，不得已于3月返东京。同年夏，欧战起，日德在我国胶州湾开战，陈以袁世凯在江浙一带兵力少，有隙可乘，又请孙中山经营长江方面，委派夏尔屿、范光启及吴藻华分别负责浙、沪和江苏的军事发动。不久，各地都陆续失败。

1915年2月，陈其美自回上海主持长江方面的军事，经营半年，仍未得手。是年秋，“筹安会”出现，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暴露，陈又至东京，与孙中山计议在敌人比较空虚的西南起兵，并以广东作为发难目的地。10月，陈返国经过上海，党人以上海敌海陆军归附日众，留他在上海主持。经电请孙中山表示赞同，并派他为淞沪司令长官。于是，他即取消西南之行，改在上海组织总机关部。当时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为袁的得力爪牙，陈认定不除掉郑，就不能有所作为。因此，他决定以杀郑为第一要务。11月10日，陈命党人王晓峰、王明山将

郑刺死于外白渡桥。到12月5日,他和杨虎等发动肇和兵舰起义,动用了中华革命党的绝大力量;但因脱离人民,结果又遭失败。其后不久,蔡锷等在云南举起护国军义旗,西南地区成为全国反袁的重心。

护国军讨袁以后,陈其美继续策动过一些零星的反袁军事行动。1916年4月,曾计划在上海发动海陆军起事,未果。同时另派杨虎到江阴、夏尔屿到浙江举事,杨因孤立无援失败,夏以谋泄被害,江浙军事陷于停顿。而陈其美的反袁活动,颇为袁世凯所忌恨,曾悬重赏募人刺杀。陈屡起屡败后,经费困难。袁探得知,假设一鸿丰煤矿公司专事谋杀。某日,利用民党叛徒李海秋见陈,伪称鸿丰拟把一块矿地向外商典押借款,如他能从中介绍,事成愿以借款四成助作军费。陈不知是计,允为介绍。到约定的签字日——5月18日,被袁所收买的张宗昌派程国瑞按计将陈杀死于萨坡赛路寓所^⑤。

注:

- ① 《陈其美传》,见《革命先烈传记》第84页。
- ② 何仲箫:《陈其美〈年谱初稿〉“民元前二年条”》,《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一,第5页。
- ③ 龙浩池:《致陈其美书》,《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61页。
- ④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一册载:陈“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蒋“以陶案之故”“避往日本”。另可参看马叙伦:《石屋续稿》第74页;黄炎培:《八十年来》第90—91页。
- ⑤ 陈其美:《与共和建设会等团体书》,《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二。
- ⑥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2页。
- ⑦ 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
- ⑧ 蔡寅:《英公被刺案情概要》,《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一。
王翰鸣:《张宗昌兴败纪略》。

邓演达

傅洪奎 周天度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生于广东惠阳县鹿颈乡。^①先世务农，兼做船夫。父亲邓镜仁是个秀才，在惠阳县城教书。邓演达幼年随父学习，1909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是年级中最小的学生，他的勇敢引起了老师邓铿的注意。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以陆小学生参加了姚雨平的革命军。1914年进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1916年升入保定军校。在这里，他除学习军事外，并研讨社会科学。1919年军校毕业后，被派往西北边防军见习。这时，孙中山在南方组织援闽粤军，作为国民党基本武装力量，陈炯明任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1920年初，邓演达应邓铿之召，到福建漳州，统率先兵。从此，他正式踏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

同年夏，孙中山命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旧桂系。11月，粤军第一师在广州成立，邓铿任师长，邓演达任师部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随后又调任工兵营长。1922年3月，邓铿被暗杀。5月，孙中山调第一师参加北伐，他拥护北伐主张，并从中进行了策动，使部队得以迅速出动。北伐军经始兴、南雄向北推进，他指挥的工兵营勇敢作战，首先进入赣州。6月，陈炯明所部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调北伐军回师广州救难，在向信丰途中，一师上层分子发生动摇，邓演达表示

拥护孙中山到底。孙中山脱险到上海后，邓由一师革命军官推派，秘密到上海会见他，请示以后行动计划。12月，孙中山调广西的滇桂军东下，驱逐陈炯明，邓演达奉命联络各部，在西江策应，配合滇桂军重新占领了广州。1923年2月，第一师工兵营扩充为第三团，邓升任团长。他率领三团参加了讨伐沈鸿英、陈炯明的战斗，随后被派负责大本营警卫工作。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邓演达是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拥护者。国共合作后，他是奉命筹办黄埔军校的七人筹委之一。5月，黄埔军校成立，他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在军校初创阶段，他积极工作，注重爱国主义教育 and 政治训练，受到学生的拥护。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是蒋介石的心腹，对邓演达进行排挤。1925年春，他被迫辞职，前往欧洲游历，在德国研究政治经济。在那里，他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并结识了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猖獗。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刺。11月国民党右派召集了西山会议。邓演达鉴于“党内形势日非，革命前途危险”^②，于同年冬回国。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右派进行反击，他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蒋介石3月20日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邓演达敏锐地指出了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③因而一度遭到蒋的拘禁，被调离黄埔军校，任潮州军分校教育长。

1926年7月初，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随军出

发,8月初到达长沙,参与第四军军部指挥工作。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数万人后,进迫武昌城,他任攻城司令,亲临前线督战。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他兼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两湖地区农民运动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地发展起来。邓演达生长于农村,对农民的疾苦比较了解,对农民革命运动显示出来的力量也有所领悟,因此,他对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能够采取赞助与支持的态度。邓演达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问题解决了,即解决中国问题百分之八十^④。在北伐途中,他要求政治工作人员努力调查沿途的农民生活状况及土地分配情形,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支援北伐。占领武昌的第二天,他就把政治部的工作转向农民运动方面^⑤。1927年初,他写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目前的农民运动,不过是民主主义的初期表现,农民自然要进一步和工人联合,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联合,把目前的盘剥的社会秩序推翻,造成新的社会。”他还指出,“农民问题是我们的量尺”,赞成农民运动的,“便是革命的朋友;自己觉悟起来,参加这个工作者,便是中国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反对这个工作的,便是反革命”。^⑥

正当革命在迅速发展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蒋介石已经暗怀鬼胎,准备分裂,破坏革命。1926年11月初,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在那里安下他的总司令部,把南昌作为右派中心,以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相对抗。接着,就发生了迁都问题的争执。11月下旬,国民党中央政

治会议在广州开会决定迁都武汉。12月13日，邓演达和徐谦等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未迁来前代行其职权。蒋介石为了把革命政府置于他个人的独裁控制下，以达到其反革命目的，1927年初，擅自决定迁都南昌，扣留到达南昌的中央委员，不让他们前往武汉。邓演达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反动阴谋。2月9日，他和吴玉章、徐谦等五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斗争的领导机关。随即发表宣言，要求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并决定在3月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2月2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党员大会，邓演达发表演说，指责蒋介石左右完全是些“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民众的痛苦”。他提出“首先就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其次军事就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⑤他是当时武汉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3月10日，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邓演达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努力，使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有利于革命势力的发展。由于他忠实地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此外，他还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负责人。

邓演达在农民部长任内，在武昌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兼所长。当国民党右派叫嚷“农民运动过火”，肆意攻击农民运动时，他对农民运动仍然表示支持。他主张农民要有武

装自卫的力量，并主张替农民解决土地问题。^⑧

邓演达在武汉的活动，妨碍了蒋介石反革命事业的进行，因而蒋对他怀恨在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与南京反革命政府诬称邓演达为煽动暴乱的代表人物之一，下令通缉，并封闭总政治部驻沪机关，另成立以吴稚晖为首的总政治部^⑨。面对蒋的叛变，邓演达主张东征讨蒋。

1927年4月下旬，武汉政府为了击退张作霖的奉军从北面来的进攻，开始了第二次北伐。邓演达随第四军出发。5月末，在河南临颍大战中，他亲临前线，往来于炮火中，与士兵同战斗，博得军士的爱戴。临颍之战击溃了奉军主力，接着配合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6月中旬，混进武汉政府中的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反革命会议后，形势进一步恶化，邓演达在愤怒和忧虑中从河南回到武汉。这时武汉已处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加上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产生的恶果，反动派的气焰嚣张，武汉国民党内汪精卫集团也迅速转向公开反对革命，准备和南京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合流。邓演达看到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大革命已面临无可挽救的失败，6月30日，他写了一篇《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对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行径表示谴责，随后辞职离开武汉，化装成查电线杆工人，沿平汉路步行到郑州，转到陕西潼关，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回国的汽车队，于10月15日到达莫斯科。

同年11月1日，他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一项宣言，指责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虽然窃取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号，“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

敌。”^④他们提出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随后他往欧洲去游历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把中国投入黑暗与灾难的深渊；中国共产党则继续高举革命大旗，英勇地进行了土地革命斗争。在反革命势力暂时占了优势，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刻，一部分不愿意同蒋介石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和从共产党内游离出来的分子，在上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表示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与在国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1930年春，邓演达回国，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8月在上海召集十个省区的代表参加的干部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创办了《革命行动》月刊，选出了中央干事会，他被推为总干事。随后，在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组织。行动委员会既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反对共产党，企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寻找出第三条道路来。邓演达标榜要在中国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其实是幻想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来领导，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人们称行动委员会为“第三党”。

邓演达所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指出，蒋家王朝“投降帝国主义，军阀专政的官僚统治与野蛮狠毒的屠杀剥削，较之从前北洋军阀时代尤为残酷”。国民党“已变为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中心。革命的中国已变成昏暗无光的地狱”。^⑤只有推翻南京反

革命政权，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国家和人民才能得到拯救。但同时他又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只能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前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可能领导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民，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因此他武断地说“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⑫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声称只有他所领导的行动委员会才能“完成民族及平民解放的任务”。很显然，这是他的资产阶级偏见。邓演达虽然属于国民党左翼，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与共产党合作，也重视农民的力量，愿意解决农民的问题，但他的思想仍跳不出旧民主主义的思想范畴。他根本不了解，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但是，邓演达始终把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反革命统治，认定要革命就必须首先反蒋。他除了政治上进行反蒋宣传外，在军事方面也进行了策划。蒋介石是以黄埔军官学校学生为其反革命武装基干的。邓演达与黄埔学生，也有历史的渊源。1930年夏秋间，邓演达在上海秘密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系黄埔系军人，策动他们起来反蒋。同时，他与国民党内的反蒋军事集团如杨虎城、冯玉祥、阎锡山等，也有联系，企图与他们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进行军事投机。1931年“宁粤分裂”期间，他与陈铭枢、蔡元培等商定，利用蒋介石调动十九路军进攻广东的机会，准备在军队开进广东后，急入潮、梅，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邓演达、蔡元培、陈铭枢等发表声明，用武装调停宁粤分裂的办法，建立第三种势力和第三种政权。^⑬

邓演达的活动,遭到蒋介石的忌恨,特别是他的军事策划被蒋察觉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即四处搜捕他,必欲置之死地。1931年8月19日,行动委员会各地受训干部在上海愚园路20号举行结业式。邓演达出席了这一结业典礼,由于叛徒告密被逮捕,并被解送南京关押。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注:

- ① 根据李洁之提供的材料说,1923年阴历二月初五日邓升任团长的日子,恰好是他的生日。邓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五应是3月1日。
- ② 杨逸棠:《邓演达先生传略》,《邓演达先生遗著》第10页。
- ③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5册,第2页。
- ④ 同③,第14页。
- ⑤ 郭沫若:《革命春秋》第40页。
- ⑥ 以上引文均见邓演达:《现在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国闻周报》第4卷,第16期。
- ⑦ 《国闻周报》第4卷,第16期。
- ⑧ 邓演达:《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招待湖北农民代表会上的讲话》(1927年3月15日)《农民生活》第14期。
- ⑨ 《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纪略》,《国闻周报》第4卷,第16期。
- ⑩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邓演达先生遗著》第198页。
- ⑪ 《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对时局宣言》,《邓演达先生遗著》第203—207页。
- ⑫ 邓演达:《中国到哪里去?》,《邓演达先生遗稿》第10页。
- ⑬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

杨 虎 城

黄德昭

杨虎城原名彪，陕西省蒲城县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在一个农民家里。幼年时，由于家庭贫困，他只念过两年村塾，便到一家小饭铺替人烧火。1908年，他的父亲遭仇家诬陷，被官府处死。这时，他才十五岁，得村民帮助勉强营葬了父尸。之后，他走投无路，和当地一帮少年成立了一个“中秋会”，以“打富济贫”相号召，后来发展到百余人，他是领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杨率领中秋会员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兵作战。1913年退伍回乡，他仍然以中秋会员为基本群众，参加当地农民的抗捐抗暴斗争。1914年，他纠合一批人打死了县东南乡一个向农民逼债的大恶霸李桢。此人包揽词讼，强占民女，无恶不作，农民恨之入骨。李桢被打死的事件，轰动了当地，县官派差役缉捕杨虎城等人，他们被迫流亡到同州（今大荔）、郃阳（今合阳）一带去活动，杨成了当地“刀客”^①集团的首领。1915年冬，杨已有众数百人。袁世凯窃国称帝，民党井勿幕等发动反袁护国，杨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转战于朝邑、华阴一带。1916年反袁军事结束，杨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任营长。^②

1917年底，中华革命党人在三原组成靖国军，参加“护法”，反对段祺瑞政府及陕督陈树藩，不久靖国军在三原、渭南

宣布独立，杨虎城任靖国军左翼军第五游击支队司令。次年2月，杨率部参与临潼关山镇防卫战役，使陈树藩压境之敌不能前进一步。6月间中华革命党人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入陕，为各军共推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统率各军，杨虎城任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1919年1月，杨率部与陈树藩军及北洋政府八省援陕军相对抗。1920年杨攻占武功城，及于扶风、麟游等县。不久，直系曹、吴取代了皖系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派阎相文督陕。直系对靖国军采取分化政策，胡景翼一师首先接受了直系收编。其后各路靖国军多被改编，独杨不为所动。1922年春靖国军总司令部迁到武功。于右任任杨为第三路司令。杨率军一旅迎击十倍之直军于大王店，奋战半月后，以孤军难持久，退往凤翔。在此决定：于右任南下向孙中山请示，部队由杨率领再转移到陕北。千里行军，冲破沿途堵截，最后到达延安，依托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井勿幕之兄）处。杨到陕北后，一面集训旧部，一面派代表与孙中山联系。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通过杨的代表告诉他，批准他为国民党党员。

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驱逐曹、吴的北京政变，与胡景翼、孙岳共组国民军，委井岳秀为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杨虎城为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1925年7月，杨率师自陕北南下，击败直系军阀吴新田，把他赶到秦岭以南，杨升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这时，杨虎城已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耀县设立“三民军官学校”，由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任学校政治部主任，请一些共产党员教授政治课，还吸收了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在部队中任下级军官。这对杨及其部下以后

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有不少影响。

1926年1月，张作霖、吴佩孚联合对国民军开战。4月，吴佩孚派刘镇华率镇嵩军七万人进攻陕西。镇嵩军是土匪集团，陕人过去深受其害。但当时陕西督办李云龙（属国民二军）新自豫西败回，潼关门户洞开。刘镇华得以长驱直入，兵临西安城下。陕西人民要求抗刘。这时杨虎城带领部队自三原迅速开入西安，与李云龙部共守省城。两部兵力不过万人，又当国民军各军新败；当时西安城内又有一批反动绅士、政客，见刘势大，与刘勾结，形势十分险恶。但西安城内，当时也有共产党人领导的青年学生、妇女等各种进步团体。这些团体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打倒军阀，帮助守军，给守城国民军以极大鼓舞和支持。杨在群众支持下，枪毙了“和平迎刘”的劣绅头目，镇压了投降活动。守城战自4月中旬开始，至9月冯玉祥派国民一军援陕，到11月底西安解围，历时将近八个月。其间城内粮食吃光，代之以树皮、草根，可食之物，罗掘殆尽。杨与李云龙部团结一致，坚守待援，^③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这一战役有力地支援了当时已开始的北伐战争，是民国史上有名的守城战例之一。

1927年初，冯玉祥入西安，6月杨虎城归冯统率，任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旋改第十军），随后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同奉系直鲁联军在陇海线归德一带作战半年之久。后因失利而退入皖北太和休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冯玉祥接着与蒋合作反共，形势大变。当时在杨身边的中共干部劝杨起义，他不赞成。1928年春，以魏野畴为首的皖北特委发动刘集暴动失败（魏牺牲），引起南京政

府注意，杨从“朋友道义”的关系上，礼送其身边中共党员（有南汉宸等人）出境。在这样时局重大转变关头，杨从个人利害出发，表现迟疑不决。蒋介石发动的二次“北伐”，他不愿参加；与冯的关系也渐疏远并有所不满，但也不愿追随中共。他已失去了早年的勇气。末后，他决定出国“休养”，于4月底到日本。同年冬，蒋、冯之间出现裂痕，双方都电促杨回国，他于11月回到国内。当时，他的部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奉冯命开往鲁南。他到鲁南就任二十一师长新职，暂时仍隶冯部。1929年4月，蒋、冯矛盾濒于破裂，冯为备战，令其驻鲁部队西撤。杨权衡利害，不听冯命，继经蒋的拉笼，他率部投归了蒋介石，任新编第十四师师长。从此，他参加进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行列，9月奉蒋令调守河南南阳一带，阻击冯军。12月，助蒋击溃了反蒋的唐生智部。

从1930年4月起，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在中原大战。杨虎城在蒋方何成濬指挥下对阎、冯作战。7月间蒋升任他为讨逆军第十七路总指挥。杨率部自豫西转战入陕，11月占领西安。大战结束，蒋为收拾西北局面对杨极力拉拢利用，并临时授杨兼陕西省政府主席。但从杨主陕之日起，蒋与杨的矛盾就开始了。杨一入陕，蒋立派顾祝同为潼关行营主任，率兵扼制陕东咽喉。其后，数年之间，蒋曾撤销了杨部所辖一个师的番号，策动该师长叛杨(1932)；又派马鸿逵率部回宁夏作主席，以控制杨向西北发展(1932)；还派邵力子主甘肃，拉笼马家回军反杨(1932)；另外，还令胡宗南驻天水，以监视杨部。在杨虎城方面，则镇压了一批由蒋暗中扶持反杨的地方武装；一度派其十七师师长孙蔚如驱逐吴佩孚的余

孽及四川军而进入兰州(1931);并帮助回民马仲英部进兵新疆(1932),准备从西北打通国际线。同时,杨与国内各方面反蒋势力,也有所联系。1933年5月,蒋介石突然免去了杨陕西省政府主席职(保留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另委邵力子为陕省主席。1934年10月蒋又调走了杨的一旅人,开往河南。这些都显示了蒋、杨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

杨在主陕期间,南汉宸又回到陕西,任杨的省府秘书长,援引了一些进步人士在杨处工作。杨的内部有进步、中间、反动三种力量,互相消长,左右着杨的政治倾向。“九一八”事变后,在应否抗日问题上,三种力量进行着斗争。1933年,当红军一部分到达川北陕南时,进步力量推动杨与红军取得默契,迂回避战。但后来破裂,终于发生冲突。1935年,杨奉令阻击红军北上。当年1月,杨调其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一个旅,企图阻击从鄂豫皖苏区突围进入陕南山区的红二十五军,在蔡玉窑和葛牌镇两地被歼灭六个营。2月,杨又将三个警备旅全部用来对红二十五军作战,并亲到蓝田指挥。3月,警二旅两个团在佛平、华阳地区被歼灭,旅长张鸿远负伤。4月,警三旅五个营在柞水九间房地区被歼。7月,警一旅在秦岭山区袁家沟口又被全歼,旅长唐嗣桐被俘。在军事上不断受到打击的情况下,经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全国人民抗日潮流的推动,他渐觉悟到此路不通。同时,1935年夏张学良的东北军奉令入陕“剿共”,9月到11月,东北军也连续遭到红军的歼灭性打击。因而张学良发生了与杨同样的感想。当东北军入陕之初,蒋介石在张、杨两部之间施行挑拨,使其互相牵制而后加以操纵利用,因此,两部之间曾一度深有隔阂。后通过

中共地下人员及其他进步人士的工作，双方意见沟通，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下，决定共同反对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到1936年春，他们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进而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当时蒋不但拒绝其建议，反调集大量嫡系部队入陕，准备对工农红军大举“围剿”。蒋于12月4日亲至西安向杨与张施加压力，说他们如不愿“剿共”，则将他们的军队调开，让出陕西省，由“中央军”“进剿”。到此，张、杨与蒋的矛盾已无可调和，于是张、杨密商，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张、杨两部密切合作，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④同时致电陕北，请中共和红军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16日毛主席、党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为代表到西安。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士兵及西安群众，普遍要求公审蒋介石，把他明正典刑；汉奸亲日派分子则企图利用群众情绪，杀死蒋介石，挑起内战。末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张、杨的共同努力，使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由内战到抗战转变的关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竟背信弃义，于1937年4月迫杨辞职。6月，又迫杨“出洋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在欧洲想返国参加抗战，曾两电蒋介石，均遭拒绝。后电宋子文，才得到同意。11月他由法国马赛乘船经香港回国。这时

蒋介石电杨，要他至南昌相见。杨到南昌后即被戴笠囚禁。对此，杨虎城曾对其友好坦然表示：“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⑤ 1938年他被解往湖南长沙，益阳监禁。次年起又先后被囚于贵州息烽玄天洞，和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以及贵阳麒麟洞等特务机关，前后达十二年之久。1949年9月17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指使其特务用利刃将杨杀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公祠”内。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同他一起坐牢，死于狱中。杨虎城的幼子拯中和在狱中出生，年仅九岁的幼女，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年亦八、九岁的幼女，还有杨的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等七人，都与杨同时被杀害。这是蒋介石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暴行之一。同年11月重庆解放，中共党政军人员找到了杨虎城及其家属、随员的遗骸，将他们的遗骸迎葬于西安韦曲少陵原，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

注：

- ① “刀客”，陕西江湖人物的一种，崇尚侠义，劫富济贫。
- ② 见《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第192页。
- ③ 见黄成说：《西安围城记》第49页。
- ④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 ⑤ 据王根僧关于杨虎城将军回国被捕经过的日记。

唐 绍 仪

郑则民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中山（香山）县唐家湾人。生于1860年（清咸丰十年）。父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及开平矿务局总办。

唐绍仪自幼到上海学外语和洋务知识。1874年经清政府选派、由容闳带领到美国留学，经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1年被召回国，改派至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廿五岁时，开始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当时袁世凯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对唐十分赏识，调唐任西文翻译，接着兼任办理龙山商务委员。1894年7月，袁请内调，委唐代理其驻朝鲜的职务。

1895年唐随袁世凯至小站练兵，和徐世昌一起经管营务处。其后，袁任山东巡抚，唐以道员随往山东，办理外交和商务。1899年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时，曾招唐入幕府。1900年唐回山东协助袁世凯镇压义和团运动。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特荐唐绍仪为津海关道。1904年，英国加紧侵略中国西藏地方，引起我国人民反对，唐绍仪奉命以清政府议藏约全权大臣身分，先后两次与英国办理交涉，前后达二年之久，到1906年4月，与英国签署了《续订藏印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英国确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但取得了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有关商埠的特权。^①

在办理交涉期间，唐绍仪历任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侍郎等职。1907年出任奉天巡抚。在奉天，他企图依赖美国修建东北“新(民)法(库)铁路”和设立“东三省银行”，由于日本干涉，未成事实。^②次年，美国为了扩展文化侵略，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清政府。唐绍仪被派为“致谢”专使，赴美活动。回国后于1910年一度任邮传部尚书。

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唐绍仪充当袁内阁的全权代表，于1911年12月18日开始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谈判议和。首先达成了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的停战协定。

唐绍仪认为他的主要使命，在于运用妥协手段，使南方确认袁世凯的地位。在谈判中，面对南方代表坚持必须承认共和的主张，他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③的折衷方案。中经帝国主义分子穿针引线，又经过双方多次密谈，初步达成协议。正在这时，孙中山自美归国，南方十七省代表迅速于1912年元旦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闻讯，非常忌恨，策动唐绍仪于1月2日辞去全权代表职务，由袁亲自出面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立即对南方革命党人施加政治、军事的压力。但同时，袁又授意唐绍仪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办法、孙中山的辞职和以袁继任的各项问题。最后由于南方一再让步而达成协议。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后，提名唐绍仪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唐为了取得支持，迎合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实行政党内阁的心理，经孙中山同意，加入了同盟会。^④

3月25日，唐到南京组织新内阁，4月迁往北京。

唐绍仪内阁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力图推行他的“责任内阁制”，而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则要求大权独揽。当袁世凯看到唐对他不甘驯服的时候，便联合当时拥袁的共和党人，向他刁难和胁迫。6月15日，袁公然破坏《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颁布命令须经内阁副署的规定，擅自取消了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决定，未经唐副署即任命王芝祥去南京遣散军队，唐对此感到极大的难堪，便于6月16日愤而提出辞呈，弃职离京。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曾与卢信等人集资设立“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洪宪”复辟丑剧发生时，唐表示反对，曾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1916年6月30日任命唐绍仪为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由于北洋派军阀的反对，没有就职。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任大元帅，唐绍仪南下参加，被孙中山任命为财政部长。次年5月，军政府中的桂系军阀为排斥孙中山，取消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唐为总裁之一。1919年初，唐绍仪充当为桂系把持了的南方军政府的总代表，在上海与北京政府代表朱启钤举行和议。双方表面上就恢复国会等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为划分地盘、争夺权力而争吵不休，到五四运动发生后，以毫无结果而中断。

1920年6月，孙中山、伍廷芳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唐绍仪在上海也参加。接着粤军把桂系军阀驱逐出广东，他随孙中山等回广州恢复军政府。这时唐认为孙中山的政治主

张难于实现，不愿支持，没有继续任职。此后，退居其家乡。1922年夏，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扶持下复任总统，8月5日发表唐绍仪组阁的任命，因有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吴佩孚的阻挠，唐“不愿出山”。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唐采取沉默态度，闭门不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动政府之后，聘唐为高级顾问，他也没有前往就职。

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争权，唐绍仪应邀参加，担任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当年冬，唐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1月，广州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唐任常务委员。3月，唐兼任中山县县长。后因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争夺政治权力和该县的收益，陈济棠策动了中山县的“倒唐”事件。1934年10月，县兵“哗变”，以索饷为名包围唐的寓所，迫使他离开中山县，重返上海。1936年，唐绍仪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提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等两机关，帮了蒋介石的忙，后因蒋没有给以相应的报答，对蒋不满。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留住上海法租界，与汉奸温宗堯私交甚密。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上海、南京后，加紧拉拢唐绍仪等充当汉奸傀儡。唐还在犹豫观望中，1938年9月30日，在其家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死。^⑤

注：

-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册，第345—348页。
-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天津大公报社印行，第5卷，第52章。
-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册，

第82页。

④ 同上书,第118—119页。

⑤ 据有关材料揭露,暗杀唐绍仪的事件,是在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指使下,由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具体执行的。但为了掩人耳目,重庆“国民政府”于事件发生后,公布了“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参见:陈恭澍:《蓝衣社内幕》,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1943年版,第30—38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又见《国府公报》1938年10月8日,渝字第90号。

主要参考资料:

夏敬观:《唐绍仪传》,《国史馆馆刊》(南京)1948年第1卷,第2号,第79—80页。

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2集,第326—333页。

郑砺石:《唐绍仪生平二三事》。

罗翼群:《唐绍仪生平的概述》。

黎照寰:《关于唐绍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容闿的关系》。

胡 汉 民

周天度

胡汉民，原名衍鸿，字展堂。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广州）。父胡文照，做过几处州县幕僚，主管刑名。胡汉民幼年从师学习，读了不少经史书籍。后来，父母相继死去，开始借教书维持生活。二十一岁参加乡试，中了举人。

1902年，胡汉民与吴稚晖、钮永健等人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不久，吴因保送私费陆军学生事与清公使蔡钧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汉民亦愤而退学回国。先任广州《岭海报》总编辑，随后在广西梧州中学教书，兼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1904年冬，他再次赴日本留学，到东京后，入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学习。

1905年秋，同盟会成立不久，胡汉民和廖仲恺同时入盟。在入盟前夕，他因对平均地权的口号表示怀疑，认为不宜在这个时候提出，曾与孙中山辩论了一个晚上，经孙中山为他详加剖析，他才勉强同意加入。^①入盟后，初任评议部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11月，《民报》创刊，被推为编辑。他在《民报》上发表过一些政论文章，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也有很大的软弱性，特别表现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1906年4月他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在阐述同盟会的政纲时，宣称革命

“不可有妨害外国之举动”，主张革命后成立的新政府，应当承认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于各国之债权，亦断许其无损害”。^②

1907年春，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胡汉民随同孙中山到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策动两广起义。其后，孙中山和黄兴在粤、桂、滇边境地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胡往返于河内、香港之间，任筹饷运械等工作。这些起义失败后，1909年5月，孙中山赴欧洲，委托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同年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他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倪映典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1910年春，新军起义失败后，11月，孙中山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在南洋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随后，胡汉民往南洋各地筹款。1911年1月，黄兴、赵声到香港设立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他任秘书课课长。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胡汉民和赵声、宋教仁等次晨由香港赶到广州，起义已失败。他返回香港，后往南洋、西贡等地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胡汉民被推为都督。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孙中山让权于袁世凯后，胡汉民于4月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任广东支部长。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接着，又向五国银行团大借款，准备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势力。胡汉民是反袁的，但主张法律解决，小心翼翼地避免和袁世凯公

开对抗。孙中山电促广东独立，他“以时机未至拒之”。^②6月14日，袁世凯撤免他广东都督职务，调为西藏宣抚使，他复电遵令解职。随即将权力交与袁世凯任命的粤督陈炯明，悄然离广州去香港，后到上海。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和孙中山从上海乘船到台湾，转去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继续举起反袁革命斗争旗帜，胡汉民任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1916年4月，他化名陈同荣从日本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筹划反袁活动。袁世凯死后，与廖仲恺往来于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政治谈判，并进行扩充北方党务及联络原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工作。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为大元帅，任胡为交通部长。不久，孙中山为桂系、滇系军阀和政学系政客所排斥，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他随孙中山离广东到上海。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广泛开展。1919年8月，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胡汉民和廖仲恺、朱执信、戴季陶等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他写的文章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他任总参议，随同孙中山在两广进行活动。

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新的革命形势面前，国民党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派。胡汉民的右派面目很快暴露，随着革命日益深入发展而越来越反动。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

大政策，发表宣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胡汉民本来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后来见风使舵，也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闭幕后不久，他即向孙中山提议建立民族国际来对抗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同年9月初，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率领北伐军到韶关，由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10月初，广州发生商团反革命叛乱，危及广东革命政府，革命派要求坚决镇压，他主张“委曲迁就”，发还扣留商团的一部分枪械，谋取妥协解决。^④10月9日，孙中山为处理商团事变，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指出胡汉民“长于调和，不长于彻底解决”，并且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去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有济。”^⑤随后，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同意举兵镇压，但叛乱平定不久，即向商团反革命头目陈廉伯表示认错，请陈“释前怨”，^⑥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场。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官僚政客，认为他们的反共活动从此可以无所顾忌了。6、7月间，胡汉民约集孙科、邓泽如、邹鲁、林直勉、胡毅生（胡汉民堂弟）、伍朝枢、吴铁城等经常在家中聚会，商量反共反革命对策，攻击坚决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⑦他和邹鲁等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谢持、戴季陶等取得连系，认定国民党非清党（清除共产党）不可，并秘密商定清党的步骤。8月10日，他们在一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于9月15日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来解决清党问题，^⑧并分头通知右派分子齐集于广州。与此同时，胡毅生、朱卓文等结合粤军首领许崇智的部属梁鸿楷、魏邦平等人，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接

受了香港政府赠送的二百万元，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⑨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主谋者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等人的阴谋被揭露，胡汉民因与廖案有重大嫌疑，一度被拘留，后被释放，在汪精卫的支持下，9月间，以“出使苏俄”为名到苏联去了。

1926年4月末，胡汉民从苏联回到广州。这时的广州充满着革命气氛，人们把他划入右派，投以鄙视的眼光。他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企图抵制和对抗，由于遭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对，在广州呆不下去，于5月中旬，避往香港，后到上海。1927年春，当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全国工农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刻，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夙屈了一年的胡汉民，看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赶忙由上海到南京，同蒋介石勾结在一起，反共清党，绞杀革命。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与武汉革命政府公开对抗的反革命的“国民政府”，胡汉民任“国民政府”主席。他上台后制订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共产党，并开列了一百九十余人的名单，多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和著名活动家。5月5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着手清党。6月20日，他参加蒋介石和冯玉祥合作的徐州会议。他还担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要职。从“宁汉分裂”到“宁汉合作”，他是南京国民党反革命罪恶活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发表了许多反共、反苏、反对工农运动的文章和演说，打着宣传三民主义的旗号，实际是对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彻底

背叛。

1928年1月，胡汉民适应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需要，和孙科、伍朝枢到欧洲考察政治。9月回国后，他提出了旨在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使蒋的南京反革命政府合法化的《训政大纲》及《国民政府组织法》，10月经由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通过公布。《训政纲领》(通过后改名)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⑩把国民党中央作为“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实行五院制。蒋介石于同年10月间“依法”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1929年到1930年，他坐镇南京，帮助蒋介石出谋划策，先后打败了桂系、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等敌对各派军阀势力，完成了反革命的“统一”。

但是胡汉民和蒋介石的反革命结合，并不能消除他们之间的权力冲突。蒋介石为了加强他个人的独裁统治，1929年建立了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特务集团，以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同时提高黄埔系军官的地位，以控制军队，胡汉民被摆在“尊”而无权的地位，并逐渐被排挤。胡汉民则以国民党元老自居，高唱“党权高于一切”，鼓吹“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对蒋、陈侵犯他的权力发牢骚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海陆空军司令部便可以了。”^⑪蒋胡间的权势之争，由于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问题而公开化。1930年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以便集权于一身，当选为五院院长之上的总统。

胡汉民强调召开国民会议“必须完全遵依总理遗教”，^⑭ 声称“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⑮ 坚决不同意制定“约法”。其目的是反对在五院之上有一个集权的大总统，以保持党权高于政府权的形式，使自己的权位不致受到削弱。蒋胡的激烈冲突，加上当时省市代表推举中，支持胡汉民的占了多数，蒋不能容忍，便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扣留，软禁于南京汤山。

胡汉民被软禁后，由胡派核心人物古应芬、邓泽如、林森、萧佛成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委名义，于4月末，发表通电，指责蒋介石非法扣留胡汉民，对蒋提出弹劾。接着两广派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分别通电响应，汪精卫、孙科也从香港回到广州，开展了联合反蒋运动。5月27日，他们在广州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和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相对抗，形成宁粤分裂的局面。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抗日运动高涨，蒋介石处境不利。在“团结御侮”的压力下，宁粤双方被迫举行和谈。由于广州方面提出以恢复胡汉民的自由作为宁粤议和的先决条件，蒋介石不得不于10月14日将胡汉民释放。接着宁粤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此后，胡汉民回到广州，结合两广军阀势力，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形成长期对立的局面。

1933年2月，胡汉民在香港创办了《三民主义月刊》作为自己的喉舌，连续发表文章，宣传他的政见。他在失意之余，也骂蒋介石，认为北伐的结果，“只是以暴易暴，完成了军阀治权之转移。”蒋是继承了北洋军阀余绪的“新兴军阀”，^⑯ “南

京统治，只是反动的军阀统治”^①。他忘了为虎作伥，帮助蒋介石建立反动军阀统治的，正是他自己。由于当时全国人民抗日运动高涨，他也打着抗日的旗号，要求对日抗战，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表示不满。但在反共上面，他和蒋仍然是一致的，甚至认为蒋对共产党“始终剿办不力，遂使匪祸蔓延，至于此极”^②。由此可见他的反动立场是始终不变的。胡汉民鼓吹抗日剿共“并行不悖，以北方的军队抗日，以南方的军队剿共”^③。他依托两广军阀势力，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共并重”的欺骗口号之下，和蒋介石对立。胡汉民把他所标榜的抗日、反蒋、反共和三民主义连在一起，称之为三民主义的连环性。1934年4月，他居然在用宋庆龄等人名义公布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上也签了名。毛主席曾深刻地指出，胡蒋之间的矛盾是地主买办阶级内部的矛盾，是狗咬狗的斗争。^④

1935年6月，胡汉民往德意等国考察。12月，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的示意下，仍把他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接着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推他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次年1月，他回到广州。这时蒋介石为了敷衍各方面，仍希望他到南京“重新合作”。他也正准备进京打算再次和蒋共事，^⑤但未及成行，5月12日在广州因脑溢血病死。

注：

① 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7页。

② 《民报》第3期。

③ 黄远庸：《远生遗著》第3卷，第121页。

④ 蔡和森：《广州反革命之再起》，《向导》第87期；记者：《答国民党中央执行

- 委员会》，《向导》第 92 期。
- ⑤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 8 册，第 7—8 页。
- ⑥ 1925 年 5 月 4 日《申报》。
- ⑦ 林直勉：《共产党入寇国民党后借词诬陷同志之概述》，《三民主义月刊》第 2 卷，第 6 期。另见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1 集，第 51 页。
- ⑧ 佚名：《清党实录》第 1—2 页。
- ⑨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第 267 页。
- ⑩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第 354 页。
- ⑪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 2 卷，第 6 期。
- ⑫ 胡汉民：《遵依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 2 册，总 758 页。
- ⑬ 《中央日报》1931 年 2 月 25 日。
- ⑭ 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的补救》，《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第 33 页。
- ⑮ 胡汉民：《辟谣——法西斯蒂与立宪政治之检讨》，《三民主义月刊》第 2 卷，第 2 期。
- ⑯ 胡汉民：《为蒋日妥协正告友邦人士》，《三民主义月刊》第 1 卷，第 6 期。
- ⑰ 胡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 1 卷，第 3 期。
- ⑱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3 页。
- ⑲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

黄 郭

郑则民

黄郭原名绍麟，字膺白，1880年3月8日生于浙江绍兴百官镇。黄氏先代经商致富，后渐衰落。他父亲黄文治是个候补的县官。黄幼年时随父母住杭州。六岁父死，依靠母亲维持家计，进塾读书。1896年补钱塘县学生。1904年春入浙江武备学堂。不久，黄受清朝政府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1907年在振武学校与蒋介石、张群相结识。次年转学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1910年毕业后归国，投入清廷军咨府任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陈其美在上海策划响应，黄赶往参加。上海光复之初局势混乱，黄提出迅速成立沪军都督府并推陈其美为都督的主张，受到了采纳。11月4日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黄任参谋长。他们立即招募兵员，编练了一师陆军，称为沪军第二师（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由黄兼任师长。这时沪、浙、苏、宁、镇、粤各军联合谋攻南京，陈、黄对此役有所策应。蒋介石也在这时从日本回国，投机革命，陈、黄委他任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基于共同的反动政治立场，陈、黄、蒋三人互相结托，订为“盟兄弟”。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派黄郭兼任兵站总监，准备北伐。其后中山解职，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沪军都督府撤销，并入江苏，黄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这时原准备北伐的各路

民军多停留在津浦铁路沿线。黄郛被指派负责处理津浦路南段各军的善后工作。他首先主动地解散了自己的陆军第二十三师，又依次遣散了他部队，数月之内将沪宁地区各路民军全部解散。这恰好适合了袁世凯的需要。1913年4月，“宋案”发生，黄郛在北京得电，回到上海。当时革命党人分为“武力反袁”与“法律解决”两派，黄认为“国家不堪有内战”，不主张武力解决。但是，袁世凯已准备好对南方的进攻。7月，国民党人在江西湖口和南京等地被迫发动了反袁起义。这时陈其美在上海仓促起事，黄也参加了。他们向江南制造局进攻，结果失败，遂相偕逃往日本。稍后黄经南洋去美国。

1916年护国之役起，黄由美国返回上海，对浙江反袁军事，有所策划。此役结束后，黄即移家天津，直到1921年。

黄住天津期间，声称“闭户读书，潜心研究”，并标榜“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曾写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两书出版。但这期间他和一些北洋政客来往不断，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1918年10月，徐世昌上台后，英美政府曾提出南北议和的“劝告”。当时欧战即将结束，中国国内确也出现了要求和平的呼声。黄这时一度与张耀曾、张绍曾等以“促进南北统一”为名，搞“和平运动”。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徐世昌的嘱托，代徐起草了《战后中国》一书。到1921年初，他以考察战后经济为名出国游历。到美国时，恰值美国总统将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黄事先发表了有关会议问题的论文，被北洋政府聘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会后，于1922年经欧洲回到北京。1923年2月，黄郛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随后又历任高凌霨、颜惠庆内阁教育总

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黄参与了这一政变的策划。先是，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扎南苑，黄郭应冯之约常到冯的部队中讲学。从此他们之间日渐密切。到曹锟以贿选上台后，全国人民声讨贿选，黄郭乘机与冯密议推倒曹、吴的问题。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冯率部出热河，黄在北京，为冯通风报信。10月22日冯率部回师北京时，黄秘迎冯于高丽营，代冯草拟通电。冯部入京，推翻了曹、吴。10月31日起，在冯部的支持下，黄郭代理内阁总理，11月3日起又以代总理摄行总统职权。但这个摄政内阁，不为奉系所欢迎，11月24日段祺瑞再次上台，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黄郭被迫辞职，返回天津。

1925年，黄虽然家居天津，但对南方革命阵营中的起伏变化也密切注视，并和他的一些老关系保持着联系。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是由来已久的。1926年11月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率军进入南昌，随后就派张群持密信约黄郭南下。这时蒋介石决心投靠帝国主义，其反革命趋向已日益明显。1927年1月黄郭到南昌与蒋介石见面密商。他受蒋指派，潜往上海，纠集反动势力，为迎蒋入沪作准备。接着，他又北上会见冯玉祥、阎锡山，拉冯、阎附蒋反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起反革命政府，黄郭于7月初被任为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8月，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黄与蒋同进退，也宣布下野。黄下野后，利用他自己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关系，在日蒋之间牵线，替蒋出访日本作准备。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2月，推荐黄郭为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推行对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

交方针。他上台不久,就着手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英国公使蓝浦生就上年3月英美兵舰炮轰南京事件,进行屈辱的谈判,并于3月30日首先与美公使成立了解决此案的协定。这一协定,除将事件的原因与“罪责”诬加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外,还承认双方调查南京美领事馆及美侨损失,由中国赔偿、道歉和惩凶,而对中国军民两千余人的重大死伤,则一字不提。协定成立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和黄郛为首的外交部竟把这种媚外投降的行径,无耻地吹嘘成是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同年5月国民党军“北伐”途中,日本军队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时,黄郛与蒋介石都在济南。蒋下令撤军,黄陪同蒋介石逃出济南,任凭日军继续在济南屠杀,并将济南及胶济路占领。日军的暴行激起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黄为逃避舆论指责,不得不赶快引咎辞职,跑到浙江莫干山,过起“读书学佛”的生活来。

黄退居莫干山,又一次声称不问政治,实则和国民党政客们来往频繁,他和张群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把他和张群、杨永泰、熊式辉等为首的一帮政客称为“新政学系”。他山居期间(到1933年),接连发生了“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中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之下,民族危机日趋严重。1932年6月,黄到上海倡议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声称研讨“学术救国方案”,发行《复兴月刊》,鼓吹“广义的国防中心建设计划”,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打掩护。他和张群等人都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并被看作是“日本通”的人物。因此,他虽居山,蒋介石并没有忘怀了他。1933年春,日军乘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的时机,打进山海关,占领

热河，越过长城各口，4月底逼进通州，平津震动。蒋介石在火烧眉毛的时候，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5月初蒋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起用黄郛为委员长，令黄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黄郛带着殷同、袁良、殷汝耕、李择一等一批亲日分子于5月14日北上就职，车至天津近郊时，被一爱国青年向他投了一弹，几乎丧命。

5月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进行密谈，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随后，又令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继续会谈，于5月31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有随时被侵占的危险。次年，黄郛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委派代表与日本方面谈判华北与伪满间通车与通邮问题，先后于5月和12月达成了协议。这一协议又等于变相地承认了伪“满洲国”。黄郛在华北一系列的媚日投降外交，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骂，乃于1935年春托病躲入莫干山。1936年12月6日因患肝癌死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沈亦云：《黄膺白先生家传》。

冒鹤亭：《黄郛传》，载国史馆馆刊（南京）1947—1948年第1卷，第4号，第70—72页。

南仁：《黄郛先生》，载北平《正风》杂志半月刊1936年12月版，第3卷，第9期，第1089—1090页。

冯白山：《革命逸史》第5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陶尚铭：《黄郛与塘沽协定》。

袁世凯

李宗一

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头子，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生于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他的叔祖父袁甲三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父亲袁保中是地方豪绅，在家乡办团练。叔父袁保庆在袁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一直过着纨绔子弟生活。八岁时，随袁保庆到济南读书，后来又南京读书。1873年袁保庆病死，第二年他又随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刑部侍郎）到北京。他在这里一边读书，一边帮袁保恒办事，学会了清末官场上那一套虚伪、奸诈的行径。1878年袁保恒死了，他回到家乡。次年，捐了一个“中书科中书”。结识当时做塾师的徐世昌，资助徐到北京应试。袁世凯本想也通过科举猎取功名，但1876年和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都落榜。于是，他赌气烧了自己所作的诗文，决心另走一条升官发财的道路^①。

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靠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当时，吴为淮军统领，委派他为营务处会办。次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政变”，他随吴军开赴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参与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此后，又为朝鲜国王训练“新建亲军”，镇压“开化党”，支持“事大党”，因此受到清廷褒奖，尤其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1885年10月，李鸿章

保荐他做“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②。1892年8月，以海关道记名简放，次年5月补授浙江温处道，仍留朝鲜。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他受了日本驻朝鲜代理馆务书记官杉村的怂恿，一再要求清廷派兵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及至清军赴朝，日本又按预定计划派遣大军侵入朝鲜，占据汉城，中日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他一见局势严重，深恐无法收拾，乃推荐其西文翻译、办理龙山商务委员唐绍仪自代，于7月19日请调回国。^③8月1日战争爆发，他被李鸿章派往辽宁凤凰城办理清军前敌营务处兼筹转运事宜。先随清军败退至辽阳，再退至锦州。次年春至天津销差。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廷鉴于旧式湘淮军不足恃，有意改练新军。当时，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抢先上书当朝权贵，提出练新军的策划。经过多方钻营，他取得了西太后的亲信荣禄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的推荐，1895年12月，被派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定武军”是中日战争期间成立的一支使用新式枪炮的队伍，驻在天津附近的小站，有四千七百余人。袁接管后，添募二千多人，仿照德国军队的建制，编成“新建陆军”，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近代军事训练。同时，招纳封建文人，对弁兵讲“经史大义”，灌输“忠君”、“尽孝”等封建思想。^④为了控制这支军队，造成个人的武力，他网罗了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张勋、王占元等一批人，分别给以重要职务。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他的爪牙。1897年，清廷认为他练兵有功，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但仍专管练兵事宜。

中日战争后，袁世凯看到变法维新的潮流高涨起来，又想

在这方面下一笔赌注。1895年7月，他把康有为的“万言书”代递“督办军务处”，9月参加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表示自己是同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1898年9月，变法运动在光绪帝的支持下达到高潮。袁为了升官，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这时，以西太后、荣禄为首的顽固派也正密谋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光绪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于9月16日召见袁，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18日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求救和催促康离京的密诏，感到事态严重。当晚谭密访袁于法华寺，要求他率兵“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⑤他假装忠于维新派，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⑥但事后“反复筹思”，觉得维新派的实力有限，不容易成功；^⑦遂即返回天津，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结果，西太后囚禁了光绪帝，重新临朝训政，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袁世凯用出卖维新派的阴险手段，取得了西太后的信任，从此飞黄腾达，更有了捷径。

1898年12月，新建陆军改名武卫右军，为荣禄控制下的“武卫军”五军之一^⑧。袁世凯于1899年6月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仍专管练兵。12月6日，又署理山东巡抚（次年3月14日实授），率领武卫右军前往山东。当时，山东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如火如荼。袁世凯诬蔑义和团是“左道邪教”，^⑨颁发“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八条，派兵到各州县屠杀团民，焚毁坛场，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6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占大沽，清廷命令他入京防卫。他不敢公开抗拒，只派少数兵力到直鲁边界，应付一下，而实际是按兵不动。这时，他一面与南方表示“中立”的

各省督抚取一致态度，派人与帝国主义各国驻烟台领事勾结，仿照“东南互保”的办法和各国达成协议：“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并派兵保护教堂，“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⑩；另一方面，又向在逃亡中的西太后处进贡些饷银、缎匹，落得两面讨好。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荣禄的前后左中四支“武卫军”几乎全部崩溃，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而且在血洗义和团的过程中扩充了“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他的队伍已有一万九千六百余人，成为北方最大的一股反革命武装。

1901年11月，卖国贼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他到达直隶后，在内外政策上，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且把这个淮系军阀的班底也接收下来，政治军事势力迅速膨胀。这时，清廷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筹办“新政”，已成立“督办政务处”。1902年初，让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总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同时，奏派赵秉钧负责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把清朝京畿的警权抓在自己手里。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为了筹措“练兵费”和庚子赔款，他加征捐税，巧取豪夺，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起人民不断反抗。随后，他又残酷地镇压了直隶广宗景廷宾领导的农民起义。1903年12月，由他建议，清廷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为了避免皇族的疑忌，他力请由庸懦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退居为会办大臣，而

掌握练兵处实权。1905年袁世凯拼凑成北洋军六镇（每镇官兵定额为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人），实额共六万余人，除第一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五镇都是他的嫡系，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出身。至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反动集团的基本武力大体建成，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主要工具。同时，为了抵制革命运动，他极力主张搞假立宪的骗局，在天津设立宪法研究所，又办理“地方自治”。他还极力破坏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为美国在东三省的侵略活动效劳，支持英国的路权要求，不遗余力地去博取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两国）的欢心。当时，“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才能作出决定。^①

袁世凯深知自己权势的膨胀会引起一些满族亲贵的猜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每年以北洋“截旷银”（空额兵饷）上贡西太后，贿赂奕劻和总管太监李莲英。同时表面上又把一、三、五、六镇交陆军部尚书铁良指挥，自己退居幕后操纵的地位。尽管他使用了这些手段，但到1907年仍被清廷用明升暗降的办法调任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剥夺了他对北洋军的直接指挥权。1908年11月，光绪、西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光绪的弟弟）监国。载沣本想杀袁，但惧于他的内外奥援，未敢下手，载沣为了把袁世凯的权力夺回到自己手中，于次年1月2日发下上谕，硬说他有“足疾”，勒令回河南彰德“养病”。袁世凯虽被罢官，但通过他的旧部下，继续操纵分布于华北和东北的北洋军，依然是一个为中外反动派所重视的实力人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一片混乱。陆军大臣

荫昌率领北洋军赴武汉作战，但是北洋军将领不听他指挥。清廷于14日只得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使其统领北洋军镇压革命。袁世凯见清朝土崩瓦解之势已成，即一面推说“足疾”未痊，拒绝接受任命；一面暗中通过时任协理大臣的徐世昌向清廷提出条件，要求取得军政大权。这时，帝国主义分子也极力制造“非袁不能收拾大局”的空气，不断敦促清廷起用他以绞杀革命。因此，清廷被迫于27日召荫昌回京，任命袁为钦差大臣，指挥水陆各军。11月1日又任命他为内阁总理。袁世凯见清廷屈服，立即由彰德抵湖北孝感前线，督促冯国璋第一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回汉口；然后带卫队抵京，16日组成责任内阁，取得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

袁世凯感到只用武力，无法扑灭革命。他离开彰德前后，曾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条件，多次秘密地向革命党人进行“和平”试探，没有得逞。但已得到一部分革命党人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的消息。他北上组阁后，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给革命党人一个严重打击，然后下令停止攻击武昌。同时又请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出面斡旋，这样一打一拉，迫使革命党人接受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他派唐绍仪为代表到上海和革命党人谈判，目的是要取得革命党人让他做总统的确实保证。在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官绅的支持下，并利用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性，袁世凯取得了上述的保证。当时，革命党人曾坚持以清帝退位和他保证赞成共和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他即借用革命声势威吓清廷，并授意段祺瑞联合北洋军将领通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⑨如此双管齐下，迫使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

位。次日，他向南京临时政府发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保证^⑩。15日南京参议院应孙中山的咨请，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并请他到南京就职。他口头上表示“极愿早日南行”，暗中却策动第三镇兵变，并以此为借口，迫使革命党人打消了要他南下的计划。3月10日，他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职，窃夺了辛亥革命成果，组成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的北洋军阀政府。

袁世凯上台后，一心追求独裁专制的统一。开始，南方各省仍在革命党人的控制下，他表面上对革命党领导人不得不采取笼络的手段。1912年8、9月，他邀请孙中山、黄兴入京，称之为“革命元勋”，授以勋位，企图用甜言蜜语软化他们。当时，中国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次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企图依靠国会中的多数席位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害怕国民党分他的权力，暗中派人于上海刺杀了宋。对于宋的死，他还装出非常惋惜、愤慨的样子，表示要缉拿凶手，“按法严办”。不久，宋案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袁自知骗局已被戳穿，遂积极布置武力镇压。4月，他以“善后”为名，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充做军费。7月，便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发出讨伐令，派北洋军南下进攻南京、江西等地，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军阀的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

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即图谋把被人民推翻了的封建君主制重新加在人民头上。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步骤。1913年10月，派出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总统。接着，在进步党人的帮助下，先后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另行

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御用工具。1914年5月，他公然宣布废除他曾宣誓遵守的《临时约法》，同时公布按其意旨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取消国务院，设立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自己独揽行政大权，把进步党人也撇在一边。他又特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令其子袁克定编练“模范军”^⑭，掌握军权。他修改总统选举法，得终身连任，并可指定继承人。还制定各种反动法令，建立起“军政执法处”等特务机构，加紧对人民的迫害。另外，“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极力提倡尊孔”。^⑮叫喊“孔子之道，亘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⑯1913、1914年，他连续发布了一连串鼓吹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通令全国恢复祭孔。1914年9月28日，他亲率文武百官，钻进文庙祀孔；12月23日，又象历代皇帝一样到天坛祭天。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早已为日本大隈政府所识破。日本遂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于1915年1月，命令其驻中国公使日置益向袁当面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时暗示日本将赞同变更国体。袁世凯害怕人民反对，不敢一口允诺，而派卖国贼曹汝霖与日置益秘密谈判，佯作拒绝，阴行退让。延至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于9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日本在得到便宜后，秘密向他表示说：对于帝制“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⑰英国公使朱尔典为了与日本竞争，也对他说：“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⑱。卖国贼头子袁世凯得到这些许诺，自认为外交上已没问题，即决心废除共和体制，建立袁氏

王朝。

1915年8月，袁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F. J. Goodnow)发表了鼓吹帝制的文章，杨度、孙毓筠等，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敲响了帝制的锣鼓。于是，朱启钤、张镇芳、梁士诒等一批官僚和段芝贵、倪嗣冲等一帮地方军阀上下勾结，伪造民意：先策动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改行帝制；接着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国体投票”；最后由参议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推戴”袁为“中华帝国大皇帝”。^⑩袁世凯在假意推让之后，于12月12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⑪接着，他接受朝贺，封爵加官，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自以为一切安排停当，但等1916年元旦实行“登极”了。

但是，和袁世凯的愿望相反，历史的潮流是要民主共和，不要帝制。随着袁世凯称帝阴谋的暴露，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斗争沸腾起来。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和檄文，痛斥袁世凯“祭天祀孔，议及冕旒”，“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⑫。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首先宣布起义讨袁，组成护国军，云南军阀唐继尧和梁启超等进步党人也投机反袁。蔡锷率领护国军攻入四川。袁世凯着了慌，于1916年1月急派曹錕率领北洋军人川，妄想扑灭“护国运动”。同时他派周自齐为赴日特使，乞求日本援助。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看出他的统治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仅拒绝接待特使，而且联合英、法、俄、意等国向他提出缓办帝制的警告。不久，贵州、广

西接连宣布独立讨袁，护国军声威大振。“无可奈何花落去”，3月22日，袁世凯向全国公布取消帝制令，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

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了，但仍妄想保住总统职位。孙中山号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②全国各地纷纷通电宣布袁世凯背叛民国的罪状，坚决不承认他再为总统，要求“扑杀此獠，以绝乱种”。^③广东、浙江、陕西又相继独立，袁世凯狼狈万状，被迫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梦想依靠段团结北洋军阀势力，作最后挣扎。但是，全国人民的反抗怒潮，迫使其忠实爪牙也不得不抵制或“声讨”帝制以自保：段祺瑞逼他交出实权，组织责任内阁；冯国璋在南京召集未独立各省军阀开会，自树一帜；甚至他的宠臣，如湖南的汤薜铭和四川的陈宦之流也通电“独立”。众叛亲离，楚歌四起。到这时，独夫民贼袁世凯气急败坏，无计可施，于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6日，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注：

- ① 沈祖宪、吴闿生编：《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1，第4页。
- ② 李鸿章著、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1905年版，卷55，第7页。
-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8页，第14卷，第8、26、42页。
- ④ 袁世凯：《兵略录存》1898年10月新建陆军排印本。
- ⑤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册，第161页。
- ⑥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8页。
- ⑦ 袁世凯：《戊戌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册，第553页。

- ⑮ 荣禄练武卫军，以聂士成、马玉昆、董福祥、袁世凯为前后左右四军，自领中军。
- ⑯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1938年版，卷4，第17页。
- ⑰ 盛宣怀：《愚斋存稿》1938年版，卷37，第4页。
- ⑱ 张一麋：《心太平室集》1947年版，卷8，第36页。
- ⑲ 《段祺瑞致内阁代奏电》（1912年1月26日），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册，第173页。
- ⑳ 《临时政府公报》第16号，1912年2月14日。
- ㉑ 袁克定，1878年生，字云台，历任农工商部右参议、右丞，开滦矿务局督办兼董事长，“模范团”第二期团长。曾以“皇太子”自视，为“洪宪”帝制四处活动。袁世凯败亡后，匿居天津。
- ㉒ 《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全集》第1卷，第231页。
- ㉓ 《政府公报分类汇编》第4册。
- ㉔ 《驻日本陆公使致外交部电》（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档案）。
- ㉕ 《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谈之纪录》，见《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凤冈及门弟子编）1946年再版，第296页。
- ㉖ 《朱启铃等致各省请于推戴书中照叙四十五字并囑秘密电》。见《袁氏盗国记》（黄毅编）上篇，1917年5月版，第91页。
- ㉗ 《政府公报》第1294号，1915年12月14日。
- ㉘ 孙中山：《讨袁宣言》（1915年）、《讨袁檄文》（1916年），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上篇，第98、100页。
- ㉙ 《孙中山致各都督司令电》，《民国日报》1916年5月11日。
- ㉚ 《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见《袁氏盗国记》下篇，第13页。

徐世昌

李宗一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原籍天津，1855年10月20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生于河南省汲县。他的祖父做过河南中河通判，父亲为候选县主簿。他二岁时随家迁到开封，六岁入私塾读书。次年丧父，家景败落。成年后，他历就沁阳、太康、淮宁诸县署文书或为家馆教师。^①

1879年，徐世昌在淮宁县认识袁世凯，结为兄弟。他受袁资助，北上应试。1882年考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散馆，授职编修，先后兼充当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甲午科直省乡试磨勘官。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创练“新建陆军”。1897年12月，经袁奏请徐以翰林兼管袁军营务处，往来北京、天津间，为袁的重要谋士；同时袁的爪牙如张勋之流，羡慕翰林之名，多投帖拜徐为师，因此徐和他们也结成深厚的关系。1900年8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徐世昌随西太后逃到西安。次年6月9日经山东巡抚袁世凯保荐，徐被西太后召见，以道员升为国子监司业。1903年10月，为商部左丞，12月练兵处成立，由于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再次奏保，徐以内阁学士候补加副都统衔，任练兵处提调。1904年署兵部左侍郎，次年初以兵部侍郎兼会办练兵事宜，同时授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9月调任巡警部尚书。1906年11月，巡警部改名民政部，仍任尚书。不久奉命偕同

载振赴东北考察政治。12月底回到北京，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主张把东三省改为行省，设总督一员，“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②。

1907年4月，东北改设行省。徐重贿庆亲王奕劻，并通过袁世凯的举荐，得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权势在各省督抚之上。他用奉天巡抚唐绍仪办理东北“外交”，在“抵制日俄”的幌子下，极力主张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借国债”，引进美英侵略势力。^③同时他也为日俄侵略势力效力，如1907年日本攫取了吉长铁路借款权。7月，吉林各界代表成立保路会，赴奉天请愿，要求废除有关吉长路各约，徐世昌答复说“约章炳如指日，万难取消”，公然允许日本动工修建。^④他以推行所谓“新政”为名，加征捐税，“或新创名目，或增高旧率，涓滴不漏，聚敛称能”。^⑤因此激起人民不断反抗。为了镇压人民，他以“无兵殆不可以言治”为由，^⑥奏请把北洋军第三镇和由二、四、五、六各镇内拨编两混成协调出关外。又仿照袁世凯在直隶的办法，创立督练处，训练新旧各军。另外还增设官僚机构，以周树模、钱能训为左、右参赞，成立“巡警”、“劝业”道，以巩固清朝在东北地区的反动统治。

1908年11月，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当权。次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徐因与袁关系密切也受牵连。但他施展官僚手腕，用奉天公款和枪械向亲贵行贿，取得载沣的信任。1909年2月内召为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大臣。次年8月清廷召盛宣怀回邮传部，徐复为军机大臣，9月清廷又授徐为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5月，清廷裁军机处，改设皇族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为协理大臣。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徐世昌力主起用袁世凯，扼杀革命。他赴彰德与袁密谋，代袁向清廷要求权力。11月，袁至北京组织责任内阁，夺得清廷的军政大权。徐退出内阁，专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他表面上站在清廷一边，实际上仍暗中参预袁的机密，在袁逼迫宣统退位的过程中，扮演内线的角色。1912年3月，袁窃据民国总统后，他托言“国变忧愤，力辞太保”，^⑦避至青岛，以掩饰其观望政治形势的本意。

当袁世凯镇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并解散国会以后，徐接受袁的邀请，于1914年5月出任国务卿，充当帮凶，被人称为“相国”。1915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后，老奸巨滑的徐世昌窥测出袁世凯称帝，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荡的危险，即于10月要求辞职。当袁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⑧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由于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徐为国务卿。他果然为袁效力，依照袁的旨意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仅一个月即下台。下台前，他力荐段祺瑞为国务卿。6月袁病危，托以家事。袁死后，他虽有觊觎元首地位、继承反动事业之野心，但实力不足，乃故意表示淡泊，又回水竹村，自称“水竹村人”、“退耕老人”，等待时机。

1916年11月，徐世昌以北洋元老资格应邀到京，调解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力之争，事后移居天津。他

看到北洋军阀内部争斗的反复,认为有机可乘,曾一度图谋通过拥宣统复辟,由自己掌握北京政府实权。为此,1917年1月,他派人赴日本,试探日本政府对清室复辟的态度,又和复辟派张勋等人秘密串连。5月,黎、段之间的斗争因“参战”问题达到高潮,黎下令免段职后,拟以徐继任总理;段的党羽则计划在天津组织政府,推举徐为大元帅;徐都没敢接受。6月,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到天津,劝徐出山。当时,徐已得到日本政府全力支持段,并不赞成清室复辟的消息,乃幡然变计,力劝张勋暂时放弃复辟计划。7月1日,张勋在北京悍然发动复辟。徐被任为弼德院院长,托故未就职。张勋复辟失败后,徐始入京,向各方面活动,为清廷和张勋开脱罪责,竭力主张维持对清室的“优待条件”。

1917年8月,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任总统,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激化。徐世昌又以“调和者”自居。1918年10月,冯国璋任满下台,皖系首领段祺瑞指使其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为总统,因徐是文人,易操纵。同时,为缓和直皖矛盾,段也辞去总理职务,而由幕后操纵一切。徐出任“总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各国先后向北京政府和广东护法政府分别提出“停战议和”的“劝告”。因此,他上台后,极力标榜“偃武修文”,以“文治总统”自命。11月,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又召开南北军阀分赃的“议和会议”,^⑨千方百计地企图取得广州护法政府对其地位的承认,但南方政府认为“安福国会”的选举是违法的,根本不承认他为总统。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就象火山一样爆发了。起初,徐认为

对巴黎和约“应行签字”^⑩，并下令逮捕游行示威的学生，公开褒扬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体国公诚”，^⑪因此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后来，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他被迫免曹、章、陆职，并使其亲信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以缓和全国舆论的攻击。

这时，新文化运动高涨，尊孔复古分子极为惊慌。徐世昌适应反动派的需要，于1919年10月下令举行秋丁祭孔。又支持其亲信张凤台等人于1920年5月创办“四存学会”；次年4月发行《四存月刊》。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弢斋述学》等文章，攻击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妄想“转移风气”，阻挡革命潮流。^⑫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徐世昌一直以“调和者”的面目出现，而实际则效法袁世凯的故伎，操纵派系斗争以维持自己的权位。当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他支持段的亲信靳云鹏当总理，反对段的另一个爪牙徐树铮；同时又勾结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锟，企图打破皖系对政府的垄断。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奉直两系控制了北京，他又转而把自己的权位寄托在奉直两系的争斗上。但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败退关外，各系军阀的均势被打破，北京政府成了直系的囊中物，他就成了曹锟攫取最高统治地位的障碍。

1922年6月，曹锟、吴佩孚以恢复旧国会和由黎元洪复任总统为名，逼徐世昌下台；1日，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秉承曹、吴意旨，通电揭发了徐的“种种罪恶”，宣布他为“伪总统”。^⑬这个善于玩弄阴谋权术的老官僚智拙计穷，于2日称“衰病”辞职，溜回天津英租界私宅。

徐世昌用做官搜括的金钱,在辉县、青岛、天津各地购置大片地产。晚年,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二十余种。^⑩ 1939年6月5日,他病死于天津。

注:

- ① 徐世昌:《续修天津徐氏家谱》1908年养喜堂印本,下册,第72页。
- ② 徐世昌:《退耕堂政书》1914年版,第7卷,第14页。
- ③ 同②,第10卷,第14页,第33卷,第8页。
- ④ 《盛京时报》1908年9月24日,12月24日。
- ⑤ 《辽宁义勇军檄文》,《民报》第20号,1908年。
- ⑥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1911年版,第4卷,第1页。
- ⑦ 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1918年版,第23页。
- ⑧ 徐一士:《谈徐世昌》,《越风》第4期,1936年1月。
- ⑨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3页。
- ⑩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8页。
- ⑪ 同⑩,第267页。
- ⑫ 《徐大总统四存学会第一年纪念会训词》,《四存月刊》第4期,1921年7月。
- ⑬ 《通告全国宣布徐氏罪状由国会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东电》,《民国日报》1922年6月3日。
- ⑭ 如《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先哲传》、《颜李丛书》、《水竹村人诗集》等。此外,其奏议函牍多收入《东三省政略》、《退耕堂政书》。

段 祺 瑞

李崇一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生于1865年3月6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他是北洋军阀皖系的首领。

他的祖父段佩，以办团练屠杀捻军起家，官至淮军统领；父早死，自幼随祖父读书。1885年他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1889年毕业，由李鸿章派赴德国学军事，在克虏伯炮厂实习。1890年回国，先后任北洋军械局委员、威海随营武备学堂教习。1896年初，被袁世凯调到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担任炮队统带兼随营学堂监督。1899年，随袁军赴山东，屠杀反帝爱国的义和团。1901年，由袁奏保“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三品衔”，“兼充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①。

1901年底，袁由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他又随袁到保定。次年6月担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负责编练北洋常备军，不久升为补用道员。他带兵到广宗县，镇压景廷宾起义。因杀戮起义农民“有功”，被赏戴花翎，加“勇”号。1903年12月，清廷成立练兵处，袁为会办大臣。由于袁的保荐，他当上了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并加副都统衔，成为袁扩编北洋军的重要帮手。后来，人们把他与冯国璋、王士珍两人称为“北洋三杰”，又被人称为袁的“龙、虎、狗”。1904年，他兼署常备军第三镇翼长，次年2月调任第四镇统制，又担任河间秋操北军总统。1906年初，调署第三镇统制，兼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3

月，补授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北洋，充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此后，他又任陆军各学堂督理、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等官差。因此，北洋军官多半成了他的门生、故吏。袁世凯被罢官后，他于1909年12月被调充第六镇统制，次年12月调任江北提督，加侍郎衔，驻江苏清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起用袁世凯，同时召段入京，任以第二军军统，令往湖北镇压革命。段先到彰德见袁，请示机宜，然后入京请训，转赴湖北前线。袁于11月到北京组阁后，派他署湖广总督，并任第一军军统兼领湖北前线各军，驻孝感。12月，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召开，他以军事实力支持袁窃夺民国总统，对革命党人不断施加压力。和会上南方代表坚持以清帝退位作为让袁做总统的交换条件，这正是袁世凯所梦寐以求的；但当时清室皇族对“让位”问题迟疑不决，少壮亲贵尤坚决反对。于是段受袁指使，于1912年初率北洋将领四十六人两次致电清廷，“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即“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②。迫使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3月10日袁窃据总统，任命段为陆军总长。

1913年，他一度代理国务总理，调兵遣将，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此后又署理湖北都督，兼领河南都督，调集河南、湖北、安徽等省的军队数万人，血腥镇压白朗军，竭力为袁的独裁统一效劳。但是，由于他总揽军权，为袁所忌。1914年5月，袁创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把陆军部的权力收归自己直接掌握。因此他大为不满，遂把部务交给其心腹徐树铮（陆军部次长），不再到部办事，而袁在当时，也有心把他打入“冷宫”。次年5月，他又称“病”辞职，实际是在袁的帝制

活动中，他有自己的想法，从而采取消极态度。1916年3月22日，袁在全国人民反对复辟和护国军兴起的形势下，被迫取消了“洪宪”帝制，才又不得不把他请出来，帮助他收拾这一破碎局面。段接受袁的请求，于23日出任参谋总长，4月又代徐世昌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他一面与护国军打交道；一面迫使袁交出实权，恢复国务院，组织责任内阁。

袁世凯于6月6日毙命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掌握着北京政府大权。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当时，日本寺内政府成立，提出所谓“经济援华”政策，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它看准了段政府正是一个可以“援助”的对象^③，而段也就决心依靠日本的“援助”，树党营私。12月24日，他亲自与寺内派来的代表西原龟三密谈，商讨所谓“中日亲善”问题^④。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逐渐分化为直、皖两系。段是皖系的头子。这时，他大权在手，又俨然以北洋派正统首领自负，对非北洋派出身的总统黎元洪根本不放在眼里。所以，黎、段上台不久，他们之间就各以不同的国际势力为背景，争权夺力，演成了“(总统)府、(国务)院之争”。后经徐世昌调解，他们的矛盾一度和缓，但到1917年春，“参战”问题又成了双方的主要争执。段希望通过“参战”取得日本更多的实力支持，坚决主张对德宣战^⑤；而依靠国会支持的黎元洪以美国为奥援，表示反对。4月，段召集附己督军来北京，组成“督军团”，向黎和国会施加压力。当国会讨论“参战”案时，他唆使军警和雇用流氓，打着“公民团”旗号包围国会，毆辱议员，希图强迫国会通过“参战”案。结果遭到国会和大部分阁员的抵制，

造成僵局。

段祺瑞不甘罢休，暗中指使徐树铮策动“督军团”到徐州，去鼓动复辟派张勋，用武力驱逐黎元洪并解散国会。5月23日，黎下令免去他的总理职务，他愤然离京至天津，发表通电，不承认黎的免职令，煽动“督军团”倒黎。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独立”，奉、鲁、闽、豫、浙、直隸各省军阀相继响应，以武力威胁黎元洪。张勋遂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进京，乘机演了一出清帝复辟丑剧。段祺瑞见自己倒黎的目的已达到，即借助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威，在日本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打垮了张勋后，他于14日入京，重掌政权。黎元洪被迫去职，段迎直系首领冯国璋（原为副总统）为总统，自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并于8月14日对德宣战。

段祺瑞竭力主张“参战”的目的，是为了向日本借债。从1916年底起，他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亲日官僚，放手出卖中国主权，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八笔借款就有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①。这些卖国借款表面上是用作“经济开发”或“参加欧战”；实则几乎都用于打内战、组织“安福俱乐部”和编练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

段祺瑞打败张勋以后，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命，蛮横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而采纳研究系梁启超的“改造国会”的建议，召集临时参议院，企图另组新国会，以排斥旧国会中反对他的国民党议员。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于1917年7月间率海军军舰两艘南下。联合滇、桂等省实力派于9月10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和北洋军阀政

府对抗。段抄袭袁世凯的老谱，立即决定对南方用兵，1917年8月初，派其党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代替了与护法政府有联系的湘督谭延闿。谭指使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于9月18日护法“独立”，以示反抗。段即任命王汝贤、范国璋为湘南军正副司令，率军南下作战，10月6日开始，相继攻占衡山、宝庆。段兴高采烈，指望由湖南进攻两广，由四川进攻云贵，想在三五个月内平定西南，大做其“武力统一”的美梦。

皖系军阀的行动，引起直系的不满。在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怂恿下，冯国璋对向南方用兵的决策，采取了表面敷衍，实际掣肘的办法。王、范受冯指使，突然于10月14日从前方来电请求停战议和，并自动退守岳阳。傅良佐得讯于惊惶中奔长沙而逃。同时，入川的皖系北洋军吴光新部也溃败。段对于这些情况的发生十分气愤，但又无可如何，被迫于11月16日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这时日本政府见段内阁倒台，即派人见冯，表示对中国内阁变更的“关怀”，同时仍认段“为政局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①。段于辞职后，鼓动“督军团”主战，向冯施加压力。冯在内外逼迫下，只得于12月18日又任命段为“参战督办”。1918年2月，徐树铮又到奉天，引张作霖带兵入关助段。在“督军团”的要挟下，冯除被迫下令对南方继续作战外，又于3月23日请段复任国务总理。4月，段亲往武汉等地，催促北洋军对南方发动攻势，并暗中拉拢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进行分化。但不料善于辨认风向的前方主将吴佩孚于占领衡阳后，和参加“护法”的南方军阀秘密妥协，从8月初起接连发出“罢战主和”的通电，反而痛斥段政府的亲日卖国政策，使段的“武力统一”计划全成泡影。

吴佩孚以一个师长的地位，敢于出头反对段祺瑞，是由于这时国内外出现了不利于段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正是段祺瑞一系列倒行逆施所促成的。与对南方用兵的同时，段与日本加紧了勾结。他依靠日本的顾问和装备，编练自己的嫡系队伍“参战军”三个师四个混成旅，作为镇压人民，消灭异己的基本武力。他又派靳云鹏和徐树铮，于同年5月间同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军事协定》。^⑧根据这项协定，日本可以在中国境内驻兵，并可指挥中国军队。另外，段又唆使徐树铮、王揖唐等，利用卖国借款，收买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制造皖系把持的新国会（“安福国会”）。8月20日“安福国会”正式开张，9月4日，把老官僚徐世昌推为总统，供其利用。段的亲日卖国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引起英美的嫉视；在国内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与反对。《中日军事协定》消息一经传出，留日学生与国内学生纷纷成立救亡团体，采取行动；各界人士以及西南各省当权人物，也都纷纷通电责问。全国上下的反段气氛，把本已存在的直皖矛盾，进一步推向尖锐化。这时，冯国璋虽已任满下台，但直系势力仍在。曹锟、吴佩孚继冯而成为直系领袖。段为缓和直皖矛盾，于10月辞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但是，他只是退居幕后，实际上仍然操纵着北京政府。

1919年，我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引起了“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段控制的亲日卖国政府，成了众矢之的。卖国贼曹、章、陆受到北京学生的惩罚。段公然袒护曹、章、陆，主张镇压学生运动，并主张在“巴黎和约”上签字，^⑨充分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这时欧战已经结束，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

把“参战军”改称边防军，用徐树铮为边防军总司令；把“参战督办”改称边防督办，在“国防”的幌子下，继续使用卖国借款，扩充皖系实力，仍然准备内战。

欧战结束后，英美帝国主义有了更多的力量干涉中国的政局。在英美的支持下，曹锟、吴佩孚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情绪，积极部署反段。1920年5月，吴佩孚由湖南前线带兵北撤，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提出解散“安福俱乐部”，罢免徐树铮等条件，向皖系挑战。徐世昌于7月2日被曹、吴所迫，下令免除徐树铮边防军总司令职。段对此大发雷霆，立刻以边防军为主组成“定国军”，自为总司令，派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总司令，胁迫徐世昌于7月9日又下令免曹、吴职。于是，直皖战争于14日打响，两军激战于涿州、高碑店和杨村。奉军从东线助直攻皖，不过四天，战局即急转直下，皖军一败涂地。曲同丰被俘，徐树铮、段芝贵都丧师逃走。段只得通电辞边防督办。“安福俱乐部”也被解散。除浙江督军卢永祥外，皖系军阀全部垮台。从此，直、奉两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

段失败后，于第二年移居天津日租界，窥测动向，等待时机。随着直、奉矛盾的发生，他暗中勾结张作霖，并联络坚持反对直系军阀的孙中山，图谋再起。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国民军回师北京，推翻了直系的统治。冯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组织政府，段和张作霖也虚伪地附和。这时，孙中山已改组了国民党，结成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孙北上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段祺

瑞反对孙中山的主张。他一面和张、冯在天津会晤，密谋成立政府；一面与盘据在江苏、湖北等省的直系残存势力拉关系，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他还企图依靠日本的支持，重新集结皖系势力。末后，在冯、张妥协和直系残存势力的拥戴下，他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月24日在京就职，组成了临时政府。“临时执政”名义上“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⑩，实际上，是奉系军阀和国民军两大势力暂时妥协的产物，因此，段只能周旋于两大势力之间以维持自己的地位。

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外崇国信”^⑪，表示尊重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和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截然相反。他又独断地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⑫，和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性质完全不同。次年二月，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了以军阀、官僚为主要成分的“善后会议”，遭到全国人民的抨击与抵制。孙中山怀着对段此举的极大愤慨病逝于北京。

段祺瑞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极为仇视，诬为“赤化之祸”，鼓吹用孔孟的“道德仁义”，来对抗共产主义思想^⑬。

1925年冬，国民军已靠拢到革命方面来，并趁郭松龄举兵反对张作霖的时机，占领了天津。奉系和直鲁联军张宗昌、李景林以及于武汉再起的吴佩孚，在日、英帝国主义的撮合下，连成一气，于1926年初向国民军展开进攻。日本等八国为阻止国民军在天津布防，帮助奉鲁军阀，炮轰大沽口，又发出蛮横通牒。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于3月18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执政府请愿，段祺瑞竟唆使卫队开枪射击，死伤至百多人，造成“三·一八”惨案，成

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①。事后他反诬爱国群众是“暴徒”，通缉群众领袖，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

1926年4月，国民军放弃天津，退守北京。段及其党羽又图谋作奉军内应。但他的阴谋被国民军鹿钟麟所觉察，鹿遂派兵包围执政府。段仓皇逃入东交民巷。到国民军退出北京后，他又回执政府，通电复职，并向逼近北京的张作霖、吴佩孚乞怜告哀。但吴佩孚宿怨未消，随即命令京畿驻军监视他，并逮捕其党羽。他又企图联奉拒吴，奉张也没理他。于是，他知己到穷途末路，难于再有所施展，延至20日，狼狈下台，逃往天津，从此，做租界寓公，自号正道居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华北。1933年2月，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迎段南下”，他即移居上海。1935年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未就职。1936年11月2日病死。

注：

- ① 段祺瑞：《造呈年笈三代出身详细履历清册》，故宫军机处档案。
- ② 《段祺瑞致内阁代奏电》（1月26日、2月5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册，第173、179页。
- 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件》上册，1955年版，第424—427页。
- ④ 西原龟三：《梦の七十余年》1949年版，第170页。
- ⑤ 《1917年美日拉拢中国参战密报》，《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 ⑥ 同④，第271—274页。
- ⑦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组编：《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页。
- ⑧ 龚古今、军修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1—49页。

- ⑨ 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8 页。
- ⑩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东方杂志》第 21 卷，第 24 号，1924 年 12 月。
- ⑪ 《段执政就职宣言》，《时报》1924 年 11 月 25 日。
- ⑫ 《善后会议条例》，《政府公报》1925 年 1 月 7 日。
- ⑬ 《政府公报》1925 年 9 月 18 日。
- ⑭ 《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三册，第 190 页。

曹 锴

张振鹤

曹锴字仲珊，直隶天津人，生于1862年（清同治元年），其父为津市小贩。曹幼年失学，稍长，推车贩布于津沽间。二十岁投淮军当兵，继入天津武备学堂，1890年毕业后往宋庆的毅军当哨官。1894年中日战争，曹锴随军去朝鲜。战后，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投袁部，任右翼步兵一营帮带。袁任直督后，1902年委曹任直隶常备军右翼步队第十一营管带。1903年，京旗常备军成立，后编为北洋陆军第一镇，他任第一协统领。^①1906年彰德秋操时，曾担任北军第一混成协统领。1907年初，他以尽先补用副将升新军第三镇统制。同年，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调移驻长春，后升记名总兵。日俄战后，东北三省人民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加剧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榨，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曹锴因对人民血腥镇压“有功”，而屡获清朝统治者的嘉奖。1911年4月，授他以副都统衔，7月又“补总兵后以提督升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曹锴受袁命率第三镇全体官兵，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一带，镇压革命。

1912年2月，在南北议和的默契条件下，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派专员迎袁南下就职。时第三镇改为第三师，驻南苑附近，曹锴任师长，于29日在北京纵兵哗

变,焚掠内外城,为袁制造拒绝南下的借口。1914年4月,袁任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③曹率第三师进驻岳州,与湖南都督汤薌铭共同监视南方革命势力的活动。

曹锟死心踏地依附袁世凯,成为袁实行帝制的支柱之一。1915年9月,他和张绍曾以直隶代表名义上书袁世凯,请求改变国体。^④10月,袁授曹以“虎威将军”的称号。袁称帝后,封曹为一等伯。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领导护国军讨袁,袁决心以武力镇压。1916年1月5日,曹锟、张敬尧受袁命,率军人川,两部军纪极坏,沿途烧杀掳掠,川民恨之入骨。3月,曹、张统军和护国军战于叙(州)泸(州)间,张军大败,曹军亦受创后退。^⑤6月,袁忧愤而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曹率残部东归。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又成为段实行独裁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9月,曹任直隶督军,驻保定。

在黎段“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中,曹的态度基本上附和段,但也不愿结怨于黎。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段祺瑞职后,附段的各省军阀宣布独立,向黎示威,曹锟迫于形势,也于6月1日宣布独立,但仍与黎保持一定关系。^⑥在此之前,张勋在徐州召开“督军团”会议,策划复辟,曹锟派代表参加,对张的阴谋活动,早有默契。^⑦及复辟丑剧登场,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曹见风转舵,投靠段祺瑞,担任了西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借着这次政治投机,于军事结束后,担任了直隶督军兼省长。

复辟乱平,黎元洪下野,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仍然攫取了总理职位。段采纳梁启超、汤化龙的策划,拒不恢复被黎解散的旧国会,而以各省指定代表,炮制非法临时参

议院，代行国会立法职权。在北洋军阀纷纷随声附和声中，曹锟也通电助威。^⑦自此以后，国内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权的对抗，同时，北洋政府中的冯、段之间新的“府院之争”也发生了。冯、段分别以英、美或日本为靠山，成为北洋直、皖两系军阀的首领。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占有优势地位，段祺瑞妄想凭借日本的金钱与军火的支持，以武力削平南方护法各省的反抗。冯国璋为了打击段祺瑞，反作出“和平统一”的姿态，暗中勾结滇桂军阀，壮大自己。在冯段对峙中，曹锟采取了骑墙政策。段以权利诱惑他，他便附段；冯以直系结合为号召，抵制段的皖系势力扩张，他又附冯。1917年11月18日，在冯的授意下，他和直系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联衔通电，主张与南方议和，声称愿作“调人”。事后，曹锟又赶紧向段祺瑞加以否认，声称签名系他人代庖。到21日，他在徐树铮授意下，发表通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和议的先决条件。

段祺瑞的亲日卖国武力统一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并受到直系将领的牵制，在派往湖南作战的军队溃退之后，段就以退为进，辞总理职，另派徐树铮联络北洋派军阀多人，于12月2日召开“天津会议”^⑧。曹锟在徐树铮的利诱（许以“副总统”地位）下，摇身一变，又积极主战，成为天津会议上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冯国璋在皖系策动的“督军团”要挟之下，15日，被迫任命曹锟和张怀芝为南征军第一、第二路总司令，曹并兼两湖宣抚使；同时，又策动直系长江三督军拒绝南征军过境，并仍与滇桂军阀密商和谈。随后，在皖系压力下，冯渐软化，曹锟乃于1918年2月南下汉口，督师前进，命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指挥。由于护法方面的

湘桂军内部分歧，自动撤防，吴师于3月入岳州，占长沙，4月23日又进取衡阳。段祺瑞于这种“捷报”声中，于3月23日，又一次组阁。组阁后，他委任亲信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劫夺了曹、吴抢到的地盘，引起了曹、吴的不满。

段祺瑞为依靠外援，扩大实力，3月25日与日本秘密成立中日军事协定，进一步投靠日本，同时拟调徐树铮代曹锟为直隶督军。^⑨曹锟获悉，便以病为辞，急回天津，并与张怀芝及长江三督联合声明，表示厌战。6月，曹锟又一次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督军会议，他本拟策动议和，但徐树铮表示仍坚守“副总统”之约，于是曹又主战。2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想以此换取他重上前线，但他却又提出各种借口，留津不动。吴佩孚在衡阳前线和滇桂军阀信使往返，与对方暗订协定，前方战斗遂告沉寂。

当时，欧战即将结束，西方英美重新积极参与对中国的争夺。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吴佩孚于8、9月间，接连通电攻击段祺瑞，甚至与南方将领联名，公开要求停战议和。曹锟对吴的行动，佯作训斥姿态，实则暗中支持。

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籍，直系军阀乘机加紧策动反皖系活动，吴佩孚更加伪装同情群众运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他利用皖、奉两系间的矛盾，积极争取奉系。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会议，组成反段同盟，直、皖双方越接近正面交锋。5月，吴佩孚从湖南前线撤兵北上，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迎击准备，双方剑拔弩张。7月初，段祺瑞迫徐世昌下令给曹吴以处分，并自称“定国军总司令”，

下动员令，于是直皖战争遂于14日爆发。奉系从东战场助攻“定国军”，不过四天，皖系军队溃败，段祺瑞下野。从此直、奉两系军阀共同垄断了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

皖系败后，奉、直两系为争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不断发生争吵。1921年12月，由于张作霖的推荐，徐世昌任命旧交通系梁士诒组阁。梁士诒倾向奉系，并以亲日著名，他的组阁激化了美、英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⑩梁内阁于华盛顿会议期间，企图出卖山东利权，与日本秘密谈判借款，同时并起用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等人，引起全国各界的愤怒声讨。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将领们乘机纷纷通电斥责梁士诒媚日卖国，矛头实际指向奉张。张作霖乃调大军入关，向直系进逼。曹、张本系姻亲，因而曹锟对奉初主让步，但在奉军咄咄进迫的形势下，姻亲关系终不能不让位于集团和个人利益，他终于同意了吴的应战主张。1922年4、5月间，直奉战争终于爆发。吴佩孚在冯玉祥的支援下打败了张作霖，奉军被迫退回关外，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方的局面。

直系独霸北方后，曹锟及其左右亲信，原想驱逐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自己来当总统，但吴佩孚却主张召集民国六年（1917）旧国会，把黎元洪再次拉出来复位，用所谓“法统重光”的骗局来作为过渡办法，这样既可为通过国会正式选曹为总统铺平道路，又可用“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曹锟勉强同意了 this 主张，于6月间拥黎重新上台。

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军政大权操于曹、吴手中。曹急于爬上总统“宝座”，便唆使他的弟弟曹锐及其党徒高凌霨、吴毓

麟、边守靖等串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之流，收买议员，作“驱黎拥曹”的准备。黎元洪为延长自己的任期，主张先制宪法后选总统，曹家党徒则主张相反。同时，关于黎元洪的任期，黎、曹两派各有自己的解释，黎派认为任期应至1925年9月，而曹家党徒则扬言黎到1922年12月“任期已满，应行另选”。^①此时，直系内部又分为保(定)洛(阳)两派，以曹锟为首的保派积极策划倒黎，拥曹锟上台；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派则企图先以武力征服川湘，而后通过制宪与选举的形式以曹代黎。曹锟对吴的这种态度及其活动，甚“不见谅”^②。到1923年春夏之间，保、洛两派在“驱黎拥曹”的步骤上才趋一致。6月，在曹锟的示意下，直系军阀、政客通过策动内阁辞职、军警索饷请愿、围困黎的住宅、断水断电诸手段，把黎元洪逼下台。

曹锟于驱黎后，原拟立即进行总统选举。惟因国会议员纷纷离京，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他急不可耐，便采纳其党徒吴景濂等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五千元支票。这一办法果然奏效，南下议员中一些无耻政客，又由沪北返。10月5日，这批受贿议员(人们斥为“猪仔”)把曹锟选为“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匆忙地赶制了一部“宪法”(人们斥为“贿选宪法”或“曹锟宪法”)，企图用以掩饰其贿选罪行。10日，曹锟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由保入京，粉墨登场。

自曹锟当上总统起，表面上直系势力极盛，而实际上内部更加分裂，外部的反直系力量也酝酿成熟。1924年10月，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两军交

战的紧要关头，按照事先和奉军的约定，于20日从热河前线迅速回师北京，23日控制了全城。冯通电全国，痛斥吴佩孚，主张罢战言和。曹、吴对奉作战遂告失败。11月2日，曹锟不得不宣布辞职，被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乘舰南逃。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共推段祺瑞出来作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不久，冯、张矛盾又激化起来。1926年4月10日，冯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系，因而发动了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曹锟获释后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1927年2月，当国民革命军北伐将抵河南，奉系军阀渡河南下阻截之际，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西逃，曹锟又匆匆离开河南，窜回天津。此后，长期在天津作寓公。1938年5月17日，他病死于天津英租界本宅。^⑬

注：

- ① 张联棻：《北洋军的建立》。
- ② 《时报》1914年4月27日。
- ③ 《时报》1915年9月15日。
- ④ 《叙泸之收复》，《护国军纪事》第4册，战讯，第70—71页。
- ⑤ 《曹锟朱家宝等通电独立》，《中华新报》1917年6月2日、8日。
- ⑥ 上海新文艺编译社：《复辟始末记》卷上，第17页。
- ⑦ 《民国日报》1917年8月6日。
- ⑧ 1917年12月6日《徐树铮致各省督军鱼电》，《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页。
- ⑨ 同上，第93页。
- ⑩ 白坚武：《知白堂日记》（原稿本），1922年1月19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 ⑪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第95页。
- ⑫ 书同⑩，1922年11月26日。
- ⑬ 《晨报》1938年5月18、19日。

张作霖

黎光 孙继武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城县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其父张有财开小商铺，兼设赌局抽红。张作霖十四岁丧父，家贫无力就学，得村师帮助入塾读书，数年后辍学，改学兽医；后又改习他业。他一度流浪于营口县的大高坎镇上，与赌棍流氓厮混。^①

1894年甲午战争中，清军赴朝鲜，路过黑山，他投入毅军马三元部下当兵，不久离开，回大高坎镇开一小兽医庄，并与黑山南赵家庙地主赵占元次女结婚。

甲午战后，辽河下游各县的失业群众与散兵游勇纷纷竖起绿林旗号（俗称“马胡子”），从事劫夺。张作霖以医治马病的关系，与各帮首领多所结识，因此，曾被人视为“窝主”。当时各帮绿林有的以割据形式，划定范围，到界外劫夺，在界内为地主富绅“保镖”，令居民摊派一切费用，号称“保险队”，又称“大团”。张作霖经岳父协助也纠集了几十人，当上赵家庙一带的“保险队”头目。某次，他率队到新民姜家屯劫夺了蒙族好马五十多匹，全队由步卒变为骑兵。其后，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各带一小帮来归，声势日大。

1902年张作霖率部二、三百人，经八角台豪绅作保，由新民府知府增韞呈请盛京将军增祺批准收编，张被任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所部驻新民数年，名为官军，并不改劫掠

旧习。

日俄战争开始时，张曾倾向俄国，后来随着战局变化，转而为日本作掩护日谍、刺探情报的勾当。

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设立两个军事机关：一个是负责训练新军的督练公所，派日本士官毕业生蒋方震为总参议。一个是负责整顿地方旧军的巡防营务处，以出身绿林的张锡奎为总办。张锡奎将全省旧军编成八路巡防队，张作霖任前路统领。1909年初，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将奉天八路巡防队改为五路，张仍任前路统领。张作霖等视新军为其发展障碍，极力排斥新军将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东北革命党人张榕与蓝天蔚等新军将领拟策动奉天独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采纳反动士绅袁金铠建议，急调驻防辽源一带的张作霖部入卫。张早已窥测时机，密令所部向沈阳移动；闻召令后，便星夜兼程进省。当时赵尔巽慑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革命尚未敢立即采取镇压手段，但他也不肯独立，而是与当地反动官绅相勾结，成立了装点门面的“奉天国民保安会”，赵不再称总督，而改称会长。张作霖到沈不久担任了该会的军事部副部长。随后，形势略稳，赵尔巽依靠张作霖剥夺了蓝天蔚的军权，并赶走了蒋方震。1912年初，赵尔巽又指使张作霖与袁金铠将张榕骗杀并掠夺其家产。接着又捕杀了新军干部与革命青年一百余人。之后，以赵尔巽和张作霖、冯德麟为首的三十三名旧军将领发出愿效忠清廷的反革命通电，电达袁世凯。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清政府迅速覆灭，袁世凯窃权上台了。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赵尔巽率东北各将领致电祝

贺。赵被袁改任为奉天都督，张作霖与冯德麟分任二十七师与二十八师师长。自此，张作霖一面讨好袁世凯，一面向日本帝国主义靠拢，他深知欲攫取奉天大权就必须取得日本的支持。1912年12月，日本关东都督福岛路过奉天，他前往拜访并表示：今后，他“愿按日本的指示行动”。^②

1913年3月，当袁世凯于“宋(教仁)案”之后亟谋对南方用兵时，为免除后顾之忧，特召见张作霖并加以慰勉。张返奉后，竭力镇压反袁的国民党人，为袁世凯效劳。此时奉天都督为张锡奎。张作霖用各种手段排挤了许多旧将领，逐步成为张锡奎手下最有实力的人物。随着张作霖的羽毛日丰，袁对他渐不放心，1914年8月，袁企图给以将军职衔调他至内蒙。张闻讯立刻鼓动奉省绅商上书挽留，迫使袁打消了原意。

袁为了笼络并箝制张作霖，1915年8月，把自己的亲信段芝贵调到奉天任奉天督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张作霖佯示欢迎。此时，袁正亟谋复辟帝制，张密电袁世凯劝进，声言“关内外有异议者，以身当之”。^③袁“登极”时，论功行赏，段芝贵封公爵，张封子爵。张不高兴地说：“我何能为人做子！”1916年春他看到袁的帝制梦行将破灭，就改变了过去对段芝贵的亲热态度，迫使段逃回北京。当时袁正陷入四面楚歌中，不敢开罪于张作霖，被迫任命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任冯德麟为帮办。到此，张实现了攫取奉天军政大权的宿愿。6月袁世凯死，张被黎元洪与段祺瑞掌握的北京政府任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1917年初，北京军阀政府以对德绝交与参战问题发生“府院之争”，张作霖依靠日本为后台，站在段祺瑞一边。他派

代表参加徐州督军团会议，要求解散国会，并一度宣布奉天“独立”，向黎元洪示威。在“独立”期间，他乘机扩充军队成立了二十九师，任吴俊陞为师长。同年6月张勋策划复辟活动时，张作霖开始采取骑墙态度，观察风向；及复辟失败，张乘机把因参加复辟活动在京被捕的冯德麟所部二十八师收入自己掌握。其后不久，张又借黑龙江内部政争的机会，把势力伸张到黑省，向北京政府保荐了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任黑龙江督军。对吉林方面，张也企图伸手，但为吉林督军孟恩远所抗拒。

复辟事件过去后，北京政府由冯国璋与段祺瑞所掌握。其时国内政局除南北对峙（南方成立护法的军政府）外，在东西方帝国主义支持下，北洋军阀内部又酝酿直、皖两系之互斗。在对南方问题上，皖段主张用武，而直冯则予以掣肘。1918年春，经皖系政客徐树铮的拉拢，张作霖派兵入关，以支持对南方用兵为名，谋取更大权力。9月，皖系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大总统，副总统一职，徐树铮为换取军阀在南征中卖力，曾以之为诱饵，既许给直系将领曹錕，又许给张作霖，终以各方牵制而暂时搁置。徐树铮为疏通对张的关系，同月示意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当了东三省巡阅使。是年冬，欧战结束，英美等国为与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日本争夺中国，策动南北“和谈”。12月2日，日本也被迫加入“五国劝告和平”。在此情势下，日本指使张作霖把他伸入关内的势力暂时退回关外。

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作霖在东北用严厉防范与坚决镇压反日的措施，博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宠爱。事后，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嘱驻奉总领事向张“面谢”。④

张作霖退回关外后,在日本帮助下,1919年7月,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恩远解除职务,孟屈服,解决了吉林问题。随后,北京政府在张的示意下调鲍贵卿任吉林督军,以孙烈臣任黑龙江督军。到此,张作霖把整个东北三省纳入其统治范围,被拥为奉系首领,为其以后争霸关内打下进可以攻,退有所守的基地。

张割据东北以后,野心益炽,急于向关内伸张势力。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先是,张作霖鉴于皖系掌握的边防军势力日大,成为对自己的威胁,同时也看到段祺瑞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不得人心,所以他一变过去对段的支持,而暗中加入了直系策划的反皖八省联盟。等战争一爆发,张即迅速率军入关,助直倒皖,结果皖系大败。于是奉系和直系军阀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徐世昌成了两系的傀儡总统。张趁此时机把他的势力伸张到察哈尔与热河,除以镇威上将军头衔任东三省巡阅使外,1921年5月又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区都统。

直皖战后,张作霖与直系新首领曹錕开会,共同支持靳云鹏组阁。但其后在分割地盘,任用疆吏上双方迭生矛盾。张为对抗直系,暗与皖系势力重修旧好,并利用旧交通系梁士诒、叶恭绰等倒靳阁。1921年12月,张亲自入京支持亲日官僚梁士诒组阁。梁上台后,对外屈从日本要求,对内则照张作霖的意旨办事。这样就引起了直系第二号首领吴佩孚的不满。其时,帝国主义国家正举行与中国利权攸关的华盛顿会议。在赎回胶济路问题上梁士诒准备借日款赎路,并允许由中日“合办”。吴佩孚抓住这一题目,接连电斥梁士诒亲日卖

国，并攻击梁的后台张作霖。吴电说：“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人民之公敌。”^⑤于是直奉关系日趋紧张。1922年4月初，奉军大举入关。29日，在直隶境内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奉军素质甚差，指挥上又失误，不到一周，奉军防线迅速瓦解，被迫撤回关外。徐世昌当即下令免张本兼各职。但张在东三省的统治地位有日本作支柱，绝非北京政府一纸命令所能动摇。他的御用工具东三省议会立即通电推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遂即宣布东北“独立”。

张作霖于“独立”之后为了向直系复仇，埋头整军，设陆军整理处，增聘日本顾问，扩建兵工厂，推行“精兵主义”，将所部十六万人统一编制，称“镇威军”。他为了孤立直系，还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退居天津的皖系首脑段祺瑞及浙督卢永祥联系，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同时，他秘密拉拢了冯玉祥以分化直系势力。在对日本方面，他给日本以“合办”投资的便利，换取日本的更大支持。

当张作霖锐意整军备战的时候，直系曹、吴正把国事搞得乌烟瘴气。曹锟以“贿选”而成总统，秽声四溢；吴佩孚滥用武力，各地兵连祸结。因此，反直浪潮不断从各方面兴起。到1924年9月江浙战争开始了。有了两年准备的张作霖认为时机成熟，立即响应浙卢，通电讨直。15日张自率六路大军向山海关、热河方面出动。由于奉军战斗力提高，又有日本提供的大量军火和情报，战争对直系不利。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吴佩孚逃走，直军迅速溃败，张大获全胜。

奉军战胜后，张作霖背弃了与冯约定“奉军不入关”的诺言，把一部分奉军开到天津及津浦路北段。冯被迫，与张共同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此时，冯部已改称国民军，关于此后政局的通盘处理，冯比较倾向请孙中山主持，积极电邀孙中山北来。而段、张与孙中山的“联盟”，却随着曹吴倒台而瓦解。于是，奉系与国民军之间的矛盾就跟着发生了。1925年春，段祺瑞为了平衡张、冯间关系，允许冯以西北边防督办名义，据有西北地区及京汉线北段；同时加任张为东北边防督办，允许其沿津浦线发展。同年5月，奉军大举入关，8月后，奉系由山东南下，据有了江苏、安徽两省，把势力伸展到东南财富中心的上海。

奉系势力向东南的扩张，使新任浙江督军的孙传芳感受威胁。因此孙联合闽、赣、鄂、苏等省的直系旧部，并暗与冯玉祥联合，酝酿共同反奉。1925年10月，孙传芳先发制人，出兵五路对奉军发动进攻。张在东南的势力迅速瓦解。11月8日，孙军攻占徐州，奉军撤回山东。当孙军胜利北进时，吴佩孚在武汉复起，自封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但吴的目的不在反奉，而在反冯，兵锋指向河南。是时冯暗中策动奉系将领郭松龄反戈讨奉。11月23日，郭松龄自滦州率军出关，迅速攻占锦州、新民等地，张的大本营沈阳危急万分。张准备逃往大连。日本政府见此情况，趁机向张作霖提出了关于日本在满蒙地位的新条件（即当年二十一条中的南满与东蒙的条款），张立即表示接受，以换取日本出兵干涉，结果郭军受阻失败。24日郭被擒杀。

当郭回军反奉时，冯部将领打败了直隶境内亲奉拥吴的

直鲁联军李景林部，占领了天津。郭死后，冯部进援郭军残部，与奉军夹滦河对峙。冯、张间的冲突既已激化，张作霖乃与进军河南的吴佩孚弃嫌修好。1926年2月，吴、张间订立了共同对冯的盟约六条。随后又把山西督军阎锡山拉进了反冯的战线。于是3月间张、吴、阎以及直鲁联军共同展开了对国民军的作战。由于各帝国主义敌视国民军，冯军接连放弃大沽、天津、北京，而在南口、晋北及西安三个战场上与敌军相持。

同年7月，当南口战场上还在激烈拚斗时，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已经出师北伐了。由于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大工农参战，北伐军节节胜利，10月初攻下武汉，11月初平定江西。盘踞在华中的吴佩孚和东南一带的孙传芳，势力都大为削弱。这时北方的张作霖，仍拥有重兵三十五万，成为旧军阀中最大的实力派，孙传芳不得不亲自到北方来向他求救。当时段祺瑞已辞“执政”，北方军阀群龙无首。11月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等举行天津会议，12月1日借十五省“推戴”名义，张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反共讨赤”。

1927年2月，张以“援吴(佩孚)”为名，派兵入河南，先抢夺了吴的地盘。不久，蒋介石在沪宁地区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南方出现了宁汉对峙的局面。张作霖与南方的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京搜查俄国使馆，逮捕并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借此向帝国主义争宠，并希望与蒋谋妥协。5月底，自潼关东来之冯玉祥国民军与武汉革命政府派出之唐生智北伐军会师郑州，南京方面的军队也北上攻占了徐州。张作霖

乃于此时提出“和国反共，联阎讨冯”的口号，企图用来分化对方，幻想造成以黄河为界的局面。6月18日安国军政府成立于北京，张作霖自称海陆军大元帅，他认为这样可以南北对等，便于和议。6月25日，张以“大元帅”名义下“息争令”，并发表通电，恬然自称是中山的“多年老友”，他的作为“实以继中山之志，并非有政见之殊”，只是对于“甘心赤化者”，要“问罪兴讨”。^⑥其目的仍在联合蒋、阎，以对付冯、唐。从6月底到7月中旬，冯玉祥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继蒋介石之后，也走上反革命道路。在此以前，善于投机的阎锡山也已投靠南方，于是张所希望的“蒋阎奉”联合落空，而成为“蒋阎冯”联合对奉的形势。但到8、9月间，南方新军阀内部发生了宁、汉、粤、桂之间的派系争权斗争，蒋介石临时宣布“下野”。河南境内也发生了冯、靳(云鹗)之争。于是孙传芳部乘机反攻，夺徐州，占浦口，渡长江而进军龙潭。张作霖也趁此时机于10月间向京汉、京绥之间的阎锡山部发动了攻击。当奉晋两军相持不下时，冯玉祥在陇海线向张宗昌展开猛攻，12月初冯军与南京方面北来之师重新夺取了徐州。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总司令，国民党新军阀编成一、二、三、四集团军，重新分配了“北伐”任务，在各条战线上对奉军展开了攻势。山东战场上张宗昌节节败退，4月底放弃济南，偕孙传芳渡河逃走。到此，张作霖鉴于大势已去，遂决定从各线上撤退，并于5月9日通电，借口停战息争，作退回关外的安排。

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而起家的；国民党新军阀与奉系旧军阀的斗争，反映着当时英美与日

本在华的争夺。因此南北混战过程中，日本一再对华增兵，企图挽救奉鲁军阀的垮台。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使得张作霖在接受日本权利要求上，不能不有所顾虑；同时也由于美国在东北问题上的插手，从而使日、奉关系复杂化而产生若干矛盾。先是，1927年前张作霖曾令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筹款自行修筑了奉海、吉海、呼海等路的一部分，并修筑了与南满路平行的打通路。日本认为这些铁路的修建，是东北当局的排日行为，特别是认为建成打通路对日本“在满蒙的经济发展实大有损害”，^①向张作霖提出抗议。张还计划向西方国家借款修建葫芦岛港，又在南满路沿线设卡征税，也都引起日方的不满。另外，日本政府要求张作霖趁掌握北京政权之时，履行前在消灭郭松龄时曾允许日本实现其在满蒙权利的诺言。张慑于人民的反帝浪潮，不敢实行前言。同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召开由驻华公使、关东军司令、奉天总领事等参加的“东方会议”，要求加强对张作霖的控制。会上决定向奉方提出日本在“满蒙”境内各项特权要求，并决定必须迫使张作霖答应全部要求，否则即寻找机会解除其武装。会后，8月，日本公使芳泽回北京，即向张作霖提出所谓《满蒙觉书》，要求解决一切悬案。但这消息一传出，就引起美国政府的嫉视，更引起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北三省人民的愤怒抗议。东北人民纷纷举行反日示威大会。张作霖虽竭力制止反日运动，但日本仍疑心是张作霖暗中放火。10月田中加派满铁社长山本赴北京，设法包围张作霖，力求迅速解决。经过一段交涉，张对日方所提出的“满蒙新五路”表示可订密约，但日方要求非由双方政府签订正式合同不可。反复纠缠到1928年5月上半

月，张同意在敦化至图门江、长春至大赉、两路合同上签字，吉林至五常一路，留待日后再议。但这消息又一次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抗。日本对敦图路的施工，遭到群众阻挠。随后，日本首相田中指令芳泽继续迫使张作霖采取果断措施，满足日本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等)，但张从自己利益出发不敢全部承诺。至此，日方对自己多年来所扶植的这个工具，大为恼恨，便决心采取另外的手段来对付他。

5月17日，日公使芳泽向张作霖面递日本政府“觉书”，声称中国战事即将波及京津，如果满洲治安受到影响，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与递交“觉书”同时，芳泽劝张早日退回关外。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其左右亲信开会研究战局形势，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3日张作霖乘回奉天的专车由北京出发，4日清晨五时许，张的专车到达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当穿过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洞时，一声巨响，铁桥被日本预先埋好的炸药炸塌，张所坐的几节车厢也被炸碎，同车的吴俊陞登时丧命。张作霖受重伤，被救回沈阳后，当日死去。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曾极力掩盖真相。到二十多年以后，谋杀人之前一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作为战犯，在中国人民的审讯面前，供认了他们谋杀张作霖的经过。

注：

- ① 钱公来：《辽海小记》第32页。
-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MT 115。
- ③ 《盛京时报》1916年4月8日。
- ④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862—863页。
- ⑤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483页。
- ⑥ 1927年6月27日上海《新闻报》第四版。
- ⑦ 《日本外务省档案》P, 57, P. V. M 23, 第940页。

陆 荣 廷

李宗一

陆荣廷字干卿，广西武鸣人，1859年（清咸丰九年）生。他出身于一个僮族的贫民家庭^①，父母早故，幼年就成了孤儿，曾在县城当学徒。十六岁时流浪到龙州。后经水口村盐贩谭某收养，在龙河上操舟贩盐，并娶谭女为妻。中法战争爆发后，他投到唐景嵩部下当兵，驻防中越边界水口关一带。战后被裁，他便和“游勇”、秘密会党成员结伙，入中越边界山林中活动。数年后，逐渐扩大成有数百人的绿林武装，他成了这支武装的首领。

1893年，陆荣廷被广西提督苏元春招抚，所部编为一营，当上了管带。1904年至1905年，他奉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命令，镇压广西各州县人民起义，捕杀起义首领多人，升为巡防营统领。1906年，他率领“荣字军”十一营^②，驻扎在龙州、镇南关（今友谊关）等地，陈炳焜、林俊廷、谭浩明（他的内弟）都在他手下充当管带。同年夏，他到日本考察军事，年底返回龙州。1907年12月，孙中山、黄兴指挥革命党人一举攻占镇南关右辅山炮台，广西巡抚张鸣岐奉清廷严旨，限令陆和边防军总统龙济光七日夺回。他们如期攻陷了炮台，乘机对革命人民大肆杀戮。事后，陆荣廷超升为右江镇总兵，不久改任左江镇总兵，1911年6月，又升为广西提督，驻南宁。当时广西旧军巡防营三十二营，其中十营又称边防军，由陆直接指挥。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顷刻瓦解。广西巡抚沈秉堃和布政使王芝祥，于11月7日在桂林通电宣告“独立”。沈、王为正副都督，陆荣廷也被推为副都督。陆荣廷对于突然到来的革命怒潮，原没有思想准备，当他在南宁接到广西独立的通电时，十分震惊，不知所措。后来，在革命党人和新军的压力下，他才顺风转舵，不得不于9日作出“附和共和”的表示，组成了以他为首的南宁军政分府。但当时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识破了他假独立的阴谋，想继续发难，被他侦知，于是他就逮捕了革命党人谭昌等，并“发兵包围新军，勒令缴械”，^③从而巩固了他在南宁的权位。

不久，沈、王两督不安于位，扬言北上“援鄂”，先后率队离桂。陆荣廷便由安边道陈凤昭、标统陈炳焜等地方实力派推举为广西都督。他于1912年2月率军进入桂林就都督职，次年又兼任广西民政长，并把省会迁往南宁，从此独揽了广西的军政大权。他打着“桂人治桂”的旗号，把旧军中的陈炳焜、谭浩明、沈鸿英、莫荣新等人，以及广西籍旧官僚和立宪派豪绅陈树勋、唐锺元、韦锦恩等网罗在自己的周围，逐渐形成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桂系军阀集团，他是这个集团的首领。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反抗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血腥统治。陆荣廷支持袁世凯，逮捕境内革命党人，残酷地镇压了响应“二次革命”的柳州起义。^④他还把军械供给于辛亥革命后退处在梧州的龙济光，促其向广东起义军进攻。“二次革命”平息后，袁世凯授他为耀武上将军（原为宁武将军），他的长子陆裕光也加少将衔。

但陆荣廷对袁世凯也有不满的一面：首先，袁对已升任广东都督的龙济光更为重视，给予龙比他更高的宠信，引起他的嫉恨；其次，袁又派王祖同到广西任巡按使，对他进行监视。因此，当1915年袁进行复辟帝制活动时，他表面上附骥北洋，上书劝进，暗中却和各方面反袁势力互通声气。到12月下旬，云南蔡锷、唐继尧宣布独立讨袁以后，他见帝制丑剧遭到全国人民激烈反对，他的老上司岑春煊和进步党人梁启超以及政学系人物也都对他进行劝说，他终于秘密作出了反袁的决定。

1916年1月，贵州宣布独立讨袁。陆荣廷为了骗取饷械，向袁请求讨伐贵州。3月7日，袁果然任命他为贵州宣抚使，他即向袁索军费百万元，枪五千支，带兵进驻柳州，做出征黔的姿态。先是，袁曾打算派北洋军假道广西进攻云南，他指使民间团体呼吁，拒绝假道；袁不得已，又委派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令其带兵从广东出发，经广西攻云南。因为龙觐光和他有儿女亲家，他不好再拒，便一面表示欢迎，一面派陆裕光与部将马济带兵“助龙”。^⑤当龙军抵滇桂边百色的时候，陆裕光和马济按照他的事先密令向龙军发动袭击，尽夺其饷械，并将龙觐光俘获。他在柳州得讯后，即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讨袁，组成“武卫军”，以马济为司令，向湖南进军。

4月初，龙济光在广东民军的压力下，为求自保，也居然宣布“独立”。这时，陆荣廷偕同潜入广西的梁启超，随军东下，进入肇庆。他们已预定推戴岑春煊为首领，以便于驾驭龙济光，统一两广军权。4月19日，岑春煊带着刚从日本借来

的一百万元(日币), 抵达肇庆。^⑥ 陆荣廷即率领各将领于 27 日通电拥戴岑为两广都司令。5 月 8 日又扩大组织, 改称为军务院。为了照顾云南实力派的情绪, 又改推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 岑为副抚军长, 摄行抚军长职权。按照军务院的《宣言》, 他们是遥尊黎元洪为总统, 把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对内对外的中枢机关。当时陆荣廷虽只是九个“抚军”之一, 但因他手握重兵, 实际上是军务院的后台老板。

军务院成立后, 岑、陆一方面令李烈钧率领滇军入广东, 拟由粤北攻江西, 一方面陆自己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率军进入湖南。这时, 袁的忠实爪牙湖南将军汤薌铭已被迫宣布“独立”。陆兵不血刃, 前锋就进入长沙。他自己于 5 月底也到达衡阳。6 月 6 日, 袁世凯毙命, 北京政府以黎元洪继任总统, 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掌握实权。龙济光闻讯, 就宣布取消独立, 投靠段祺瑞。因此, 入粤的滇军在韶关与龙军发生战斗。陆荣廷遂令莫荣新率桂军入粤, 与滇军夹攻龙军, 迫使龙军退据广州。7 月 6 日, 段祺瑞政府被迫发表陆荣廷为广东督军, 但不久又让他暂署湖南督军, 准备把广东仍留给龙济光。陆深知湖南情况复杂, 对湘督不感兴趣, 而对于号称“财富之区”的广东这块地盘早已垂涎三尺, 于是, 遂坚辞湘督不就, 而自动率军回广东, 迫使龙军退入海南岛, 自己正式就任广东督军。在此之前, 军务院向段政府索取了一批“军费”, 也自行宣告取消, 所谓“护国之役”就此结束。

1917 年春, 陆荣廷亲自到北京, 争取段政府承认他对两广的统治权。当时, 黎、段都想拉他, 根据他的示意, 4 月 10 日段政府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 陈炳焜为广东督军, 他升为

两广巡阅使。从此，他操纵着两广的军政大权，把桂系军队扩充到五万人，成为西南地方最大的一股军事力量，时人有“北张（作霖）南陆”之称。在此期间，他大借外债，加税开捐，滥发纸币，搜刮民财。又在原籍武鸣山中建起豪华的“宁武庄”，供其享乐。

同年夏，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所谓“府院之争”激化后，由此而演变出了张勋发动的复辟政变。段祺瑞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势，讨平张勋，迎冯国璋入京代理总统，自己重任总理。为加强独裁统治，段拒绝重开复辟期间被解散的国会，废弃了《临时约法》。于是，孙中山于7月中旬率领起义的海军由上海到广州，宣言护法。先是，陆荣廷于6月间，借口黎元洪被胁迫，已宣布两广“自主”，至是，他为了借用孙中山的名望，以增加“自主”的声势，提高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的资本，也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8月底，广州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组成军政府。但陆对另组军政府，阴持异议，因而对元帅一职是否接受，不肯作明确表示；他仍深居武鸣山中，以“老师”自命，发号施令，指挥陈炳焜、莫荣新（时任广惠镇守使，后又任广东督军）等桂系军阀，对孙中山明迎暗拒，处处掣肘，“假护法以行破法”。^⑦

这时，段祺瑞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积极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派北洋军入湖南，准备进攻两广。陆荣廷感受到段的威胁，即派谭浩明带领桂军“援湘”，但他寄希望与段祺瑞有矛盾的代总统冯国璋，企图联冯制段，“联直倒皖”，^⑧以便对付在广东的孙中山及其他异己势力。因此，他接受美帝

国主义分子安德森等策动，与江苏督军李纯及曹錕、吴佩孚等直系军阀不断勾搭，到1918年4月，与吴佩孚部在衡阳暗中妥协，湖南战场上暂时沉寂下来。这时，他便回过头来进行策划改组军政府，排斥坚持民主革命立场的孙中山。他申通了非常国会中政学系和益友社两系议员，通过“修改军政府组织法”，于5月20日把军政府改为总裁合议制，推选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陆荣廷、林葆懌、唐继尧、岑春煊七人为总裁，而以岑为主席。这样，军政府就完全成为桂系军阀控制下的工具。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在其辞大元帅职的通电中气愤地指出：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

1919年下半年，北方直系军阀已形成七省（后发展成八省）反皖联盟，直皖矛盾日趋激化。同时，南方在孙中山影响下的粤军陈炯明部在闽南漳州一带，得到福建督军李厚基（皖系）的支援，大力扩充，准备回广东驱逐桂系势力。1920年春，陆荣廷根据上年与吴佩孚签订的反段军事同盟密约，供给吴军六十万元“军饷”，敦促他撤军北上。到7月，北方发生直皖战争，结果，皖系大败，段祺瑞下台，直系和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当直皖战争发生时，陆荣廷在龙州召开军事会议，准备进攻闽南粤军。8月中旬，桂军攻闽开始，陈炯明立即出动反击，到10月下旬，桂军战败，广东督军莫荣新奔广州逃走，岑春煊和陆荣廷通电宣布撤销“护法军政府”，并取消两广“自主”，公开投靠了直系军阀。11月底，孙中山又回到广州，着手重组正式政府，翌年5月，经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陆荣廷反对孙中山在广州重组政府，妄图以直系军阀为

奥援，重占广东地盘。1921年1月，北京政府任命他为广西边防军务督办，他陈兵于粤桂边界，伺机反扑。当时，孙中山为准备北伐先肃清侧后敌人，乃号召粤、滇、黔、赣各军讨陆。粤桂两军于6月下旬接触，桂军刘震寰部首先倒戈，粤军遂顺利地占领梧州。握有桂军主力的沈鸿英见势不妙，宣布“自治”，逼陆下野。其他桂系军队也望风而逃。陆见军心瓦解，于7月19日通电辞职，由南宁逃往龙州。当滇粤各军分占南宁和桂林后，他又于9月逃往上海。

1922年6月，由于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发动叛乱，粤军从广西撤退，陆荣廷的旧部林俊廷、韩彩凤等以“自治军”的名义占据城邑，电邀陆回广西，于是，他又返回龙州，于9月12日通电就广西边防督办职务，重温“广西王”的美梦。1923年12月，他到南宁就任北洋政府委派的“督理广西军务”。当时沈鸿英正调军进攻广东，他令其部下趁机夺取了沈军占据的桂林和柳州，表面上统一了全省。次年春，他又以“出巡”为名，带兵到桂林，秘密接受吴佩孚给他的军械。

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在广州组成革命政府。革命气氛弥漫广东，广西人民也不断掀起反军阀斗争。驻在梧州的桂军李宗仁部和黄绍竑部，已经分别接受了孙中山授予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和“定桂军总指挥”的名义，通电讨陆。李、黄又利用沈鸿英与陆的矛盾，把沈拉过来，共同进攻陆。1924年5、6月间，李、黄袭取了陆的老巢南宁和左右江各县；沈则趁陆出巡到桂林时，突然用兵包围了桂林。陆困守桂林孤城达三月之久。后来，由于吴佩孚指使湖南军阀赵恒惕派湘军一旅入桂，以武力“调停”，沈始解

闰,让他撤至全州。他到全州后,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遂于9月23日通电下野,经湖南逃到上海,以后又移居苏州。1928年11月病死。

注:

- ① 据《武鸣县志》(曹唯儒编,1915年版)记载:陆荣廷“家赤贫,世业农”。
- ② 《光绪三十二年夏季广西水陆防营》册,见故宫档案。
- ③ 《邕宁县志》,转引自《广西辛亥革命资料》(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1960年版)第188页。
- ④ 覃子权:《二次革命柳州起义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522页。
- ⑤ 马济(1886—1927),字慎堂,旧军官家庭出身,陆荣廷的义子。历任广西督军署副官、旅长、“武卫军”司令、广东兵工厂总办等。1924年陆下野后,他带领陆的队伍北上投靠吴佩孚,以后又投张宗昌,充“直鲁联军”15军军长,1927年5月在蚌埠作战被击毙。
- ⑥ 岑春煊:《乐斋漫笔》,《中和月刊》第4卷,第5期,1943年5月。
- ⑦ 《孙中山致林修梅书》,《总理全集》1930年版,函札类第331页。
- ⑧ 南京史料整理处编:《北洋军阀直皖两系混战史料》。

李 纯

张振鹤

李纯字秀山，直隶天津人，1867年9月12日（清同治六年八月十五日）出生在一个小官吏的家庭里。幼读私塾，二十二岁入天津武备学堂第二期。1895年毕业后投袁世凯主持的新建陆军，任督队稽查先锋官。1902年5月，袁奏设军政司于保定以编练常备军，自兼督办，委令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派李纯在冯手下任提调。1903年，以铁良为翼长的京旗常备军（后改为陆军第一镇）也在保定编练，李纯由军政司调该军任管带，后升统带。1907年，李纯经铁良保举，由参将升副将，调任陆军第六镇第十一协统领^①，驻保定。1911年4月，清廷赏给他协都统衔。同年10月，武昌革命爆发，第十一协组成第二十一混成协，编入冯国璋指挥的第一军，李奉命率部南下，参与对革命军的战争。10月27日，冯国璋指挥清军猛攻汉口，李纯自孝感绕道蔡甸，偷袭革命军侧翼。11月6日，他继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并被授以陆军副都统衔^②。李纯于提升之后，参加了27日冯军攻陷汉阳之战，加倍为清廷卖力。

民国成立后，镇改为师，李任第六师师长，驻河南信阳。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袁命李部进驻湖北境内，伙同黎元洪严密监视南方革命党人，并作好发动内战的准备。^③6月上旬，袁首先下令免国民党人李烈钧的江西都督，随后又接连免了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两省的都督，令李纯

特别注视江西方面国民党人的动向。7月12日，李烈钧于湖口起义，宣布讨袁。袁立即发表李纯任九江镇守使，催他火速向九江推进。沙河镇战役李纯击败了赣军林虎，25日占领了湖口。8月4日，李升任护军使。8月18日，他又攻陷南昌，27日，暂兼江西民政长^④。9月29日，署江西都督。

李督江西后，采取极其严厉的高压政策：取缔国民党的各级组织，解散省议会，逮捕议员，严禁群众集会，查封报馆，箝制舆论，不准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有任何批评^⑤。他更以各种政治嫌疑为借口，拘捕无辜群众，严加拷打，南昌出现“逐日刑人”的恐怖气氛^⑥。袁对他信任日笃，恩宠有加，1914年6月，授为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全省军务。

李纯也是一个唯利是图、见风转舵的军阀。1915年，袁党酝酿帝制，他先是积极附和，9月由江西赴京，追随段芝贵等人，向袁密呈劝进电^⑦；但是，到12月底，护国军崛起后，全国出现一片反帝制声浪，连袁的心腹大将冯国璋、段祺瑞也露出了反对帝制倾向，在此形势下，李纯又一变而附和冯国璋。1916年3月，他列名于冯国璋策动的五省将军联名密电（就取消帝制，征求各省意见）。4月16日，冯发出劝袁退位电前后，李纯暗中和段祺瑞、靳云鹏、陈宦等密电往返，与冯的活动相策应^⑧。6月6日，袁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7月6日，改各省将军为督军，李纯被任为江西督军。

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随着英、美、日在中国的角逐，日益明显地分化为以冯国璋和段祺瑞各自为首的直、皖两系。李纯原为冯的部属，又与冯是直隶同乡，便成为直系的主要骨干。1917年8月，冯入京代理大总统，委任李继任江苏督军。

同年秋，“护法”开始，孙中山联合桂、滇、湘、粤各省实力派在广州建立的军政府，同北洋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这时，以冯、段为首的直、皖两系，仍以帝国主义对华的利害关系为背景，在对护法各省和战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李纯站在冯国璋一边，用“和平统一”的口号来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政策。9、10月间，他对段祺瑞借日款、购军械、准备发动内战的行为，多次表示反对。10月下旬，当段祺瑞决定派兵入湘时，他联络湖北王占元、江西陈光远形成所谓“长江三督”，提出停止征湘、改组内阁等主张，向段施加强大的压力。11月14日，进入湖南前线的北军师长王汝贤、范国璋在冯的示意下，通电撤兵。李又联合王占元、陈光远并拉上曹錕于11月18日联衔通电主和。他们的这些活动使段祺瑞对南用兵的计划迭受挫折，乃不得不辞去国务总理职务（由王士珍代理），退居幕后。李纯地处长江下游，一时成为被重视的风云人物。

当时，南方湘、桂军阀把李当作同盟者，极力拉拢他；北方主战的段派军阀、政客，则把他作为北洋派的“内奸”，纷纷责骂他。因为他的活动受到冯国璋的支持，所以他仍声称自己是北洋派的一员。于是，南北的许多军阀代表都相继到南京来，和他商讨时局^⑨；他派亲信南下，访问陆荣廷等^⑩，企图实现冯国璋与南方军阀妥协的“和平混一”。12月间，他利用驻浦口的冯玉祥旅，并策动地方团体出面，阻止北京派出征湘的第二路军过境，又一次引起了主战派的叫骂。他虽然扯住了主战派的后腿，但“和平混一”的企望，终由于南北军阀的利害不一致，短期内无法达成协议。

1918年1月下旬，南方的湘桂联军，乘北洋军阀内部的

纷争,突然攻占了岳州。岳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军事要冲的易手,刺激了北洋派军人,主战派嚣张起来,形势顿时发生了变化。段的谋士徐树铮趁机分化直系,拉拢曹锟为皖系効力。同时又策动亲段派的各省督军,通电斥责主和政策,矛头更多地对准李纯。另外,徐又跑到关外去勾引张作霖。2月下旬,张作霖派大批奉军入关,一部分进驻北京近郊,向冯国璋施加压力。另一部分沿津浦铁路南伸,向李纯示威。随后,徐树铮与张作霖组织关内奉军司令部,由徐兼副司令。徐策动亲段军阀通电叫嚣:“欲求国事进步,非先更易阁王,苏李,万无着手之地”,^①要求罢免李纯并再起用段祺瑞组阁,3月中旬,曹锟部下吴佩孚部趁湘桂军主动撤军之际,进占岳州、长沙,“捷报”传来,主战派越发嚣张。到此,冯国璋不得不低下头来,请段再任阁揆。在几经邀约之后,3月23日,段祺瑞再次组阁。这时,以李纯为首的长江三督也不得不随着冯的软化而消沉下来。段祺瑞一时踌躇满志,悍然派亲信去湖南夺取曹、吴抢来的地盘,引起曹、吴的不满。7月以后,吴佩孚忽从前线发动主和;有电致李纯痛诋段内阁的种种罪行。于是,李纯想利用时机,再度对时局有所主张。10月,冯国璋代理总统期满下台,李失去凭借,他高唱“和平”的调子才日趋于消沉。

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李纯和曹锟代表了直系两大势力;然而李的实力远弱于曹。一时李虽被视为长江三督的领袖,但鄂督王占元和赣督陈光远各有打算,并不完全信赖他,他的实力也局促江苏一省。上年吴佩孚从湖南前线发动向皖系的攻击后,李暗中和吴信使往还,引为同调。其后,曹、吴、

张作霖暗中酝酿反皖，他也参与其中。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奉两系八省反段的联盟会议时，李派代表参加。7月，直皖战争爆发，李纯因须防备浙江卢永祥，无力北上助战，仅能虚张声势，遥为呼应。到皖系战败后，曹、吴和奉张两系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在政治分赃中，李纯无力染指。然而，当时的北京政府表面上仍然不得不把他摆在各省督军的地位之上，以示对他的尊重，特别是战后继续留任的大总统徐世昌，还想借重李纯作为与南方谈判的“和平”掮客。8月4日，徐任命他为北方议和总代表，时北方曹、吴和奉张正欲借武力扩张势力，南北议和一时无从谈起，他力辞不受。9月16日，又任命他为长江巡阅使，但他知道这只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衔，又坚辞。10月2日，北京政府改任他为苏皖赣巡阅使，10月10日又授以英威上将军的称号，他也不肯拜命。当时，江西督军陈光远早有不愿接受他节制的表示，对他是个极大的刺激。李纯本来患有精神失常症，时局的变化，又多次使他不如己意，日益表现消极。这期间，江苏省各界又发动了反对财政厅长文和(他的干儿子)贪污的风潮，报纸连篇累牍地影射他任用非人，遗祸全省。在“内忧外患”中，他不时放声大哭，表示悲观绝望。10月12日晨，他写好遗书五封，于督署中自杀身死。

注：

- ① 宣统三年清陆军部档案。
- ② 《镇协赏銜上谕》，《正宗爱国报》(北京)宣统三年三月十日。
- ③ 《黎大总统政书》卷19，第1页。《民立报》1913年5月12日。

- ④ 《民立报》1913年5月23日,6月5日;6月21日,6月25日,8月24日。《时报》1913年9月16日。
- ⑤ 《时报》1914年4月18日。
- ⑥ 《时报》1913年9月10日,10月16日;1914年1月1日。
- ⑦ 《时报》1915年9月6日。
- ⑧ 《民国日报》1916年5月2日,5月3日。
- ⑨ 《民国日报》1917年11月26日,27日。
- ⑩ 白坚武:《知白堂日记》(稿本)1917年12月4日,8日,12日。
- ⑪ “阎王”指王士珍,“苏李”指李纯。《徐树铮致各省督军附电》,《徐树铮电稿》第3页,中华书局1962年。

徐 树 铮

李宗一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省萧县人，生于1880年11月11日（清光绪六年十月初九）。他的父亲徐忠清是拔贡生，一生以教书为业。^①

1892年徐树铮十二岁时中了秀才，十七岁到南京考举人，没有考中。1901年冬他到济南上书山东巡抚袁世凯，企图由此谋取出路，不成功，却无意中结识了段祺瑞，受其赏识，当了书记官，从此成为段的亲信人物。1905年由段保送去日本士官学校，两年后以第七期步兵科毕业。回国时，年方二十七岁，入段幕府，赞襄帷幄，少年“得志”，十分自豪。先后任第六镇军事参议，第一军总参谋。^②

民国建立以后，1912年3月段祺瑞为陆军部总长，派徐树铮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9月调任军马司司长兼管总务厅事。11月创办《平报》，由臧荫松主编，吹捧段祺瑞，宣扬段的政治观点，被人称为“陆军部机关报”。1914年升为陆军部次长。同年在北京创办正志中学，自任校长，聘请林纾等人为教员，提倡古文。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他力劝段祺瑞抵制帝制。6月段以“病”辞职，徐也被免职。

1916年袁世凯败亡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依靠日本支持掌握北京政府实权，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不久，黎元洪受美国策动，和段发生权力斗争。段遂少人

总统府，专由徐树铮持稿入府要求盖印；徐依仗段的奥援，意态倨傲，因政见不合，迭与黎争吵。加以徐在国务会议上恃势越权，多所主张，为内务总长孙洪伊所反对；于是黎、孙结合以抗段、徐，势如水火。后经徐世昌调解，11月20日徐树铮和孙洪伊同时免职。

1917年春，黎、段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徐树铮代表段到徐州，极力煽动张勋反黎。5月，黎下令免段职，徐即以同意清朝复辟为诱饵，策动张勋于7月1日把黎元洪赶下台。事后，他又以“讨逆军”总部参赞的名义，追随段讨平了张勋复辟。接着，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继任总统，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仍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掌握北京政府。8月徐又被任为陆军部次长。当时，孙中山联合西南地方军阀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徐极力推行段的“武力统一”政策，派兵攻入湖南，妄图一举消灭“护法”运动。但是，冯国璋也以英、美帝国主义为背景，主张所谓“和平统一”，暗中指示前方的直系军队消极退守。段和徐不得不于11月辞职。

徐树铮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在当时的政局中，纵横捭阖。他于1918年初到奉天勾结张作霖，自任奉军副司令，随奉军入关，压迫冯国璋同意对南方“护法”军作战。^③3月，冯国璋被迫再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徐和王揖唐等人组织“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选举，包办新国会，把持北京政府。徐又谋杀了在直系中策划主和的陆建章，拉拢直系军阀曹錕，进攻南方。段祺瑞的重大措施，大半出于他的策划，因有“小扇子军师”之称。

1918年9月，因徐树铮挪用奉军军饷，张作霖解除了他

的奉军副司令职务。段祺瑞随即任命他为参战处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他与日本代表斋藤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之详细协定》，又用“参战借款”二千万日元，从日本购买武器，延聘教官，编练“参战军”，组成段祺瑞的嫡系部队。10月，冯国璋任期届满，徐世昌由皖系支持，出任总统。11月，徐树铮被授陆军上将衔，派赴日本观操。在东京，他与日本当局秘密谈判，图谋出卖东三省的权利，换取日本对皖系更多的支持，没有得逞。12月16日回国。

1919年2月5日，他与日本陆军代表乙东彦在北京签订延长军事协定的协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极力主张镇压学生运动和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参战军”改称“边防军”，他被任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在外蒙古声明取消“自治”后，又兼任外蒙善后督办，并以外蒙活佛册封专使名义，于1920年元旦在库伦主持册封活佛典礼。

徐树铮亲日卖国的行为不断激起全国人民反对。1920年夏，亲英、美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乘机通电攻击徐“祸国殃民”、“卖国媚外”，要求“免徐树铮各职”，^④并率领军队逼近北京。6月，徐由库伦回到北京，极力主战。7月4日，徐世昌被直系逼迫，下令免去他西北筹边使等职务。段祺瑞立即组成“定国军”准备向直系迎战，派徐树铮为总参谋长。徐指挥“边防军”第二旅沿京津铁路南下，与曹锟的部队战于杨村。17日，皖系军队一败涂地。段祺瑞通电辞职，徐树铮避匿日本使馆。北京政府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通缉徐树铮等首要分子。11月，他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到上海公共租界。

1921年，徐树铮著《建国论真》，宣扬他的反动政见。

次年1月,他代表段祺瑞赴广西见孙中山,又与张作霖联系,策划孙、张、段三方面的军事联盟,共同反对直系。10月,他潜赴福建省延平,联络皖系余部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按照《建国诤真》组成“建国军政制置府”,自任总领。又联络许崇智的粤军,赶走倒向直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17日移住福州。不久,王永泉也倾向直系,借口“闽人自治”,强迫他于11月2日返回上海。1924年10月,趁江浙战争爆发的时机,他招集在浙、沪一带的皖系残余队伍,自称“浙沪联军总司令”,妄图东山再起。但是,由于英国人不允许他在上海公共租界活动,被迫于11月出国“游历”。

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被张作霖和冯玉祥推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1925年1月派徐树铮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当时,他正在巴黎,即组成考察团,先后到法、英、瑞士、意大利、德、苏联、波兰、捷克、比利时、荷兰、美、日本等国考察,12月11日回到上海。这时广东革命政府已经成立,冯玉祥也倾向革命,徐树铮遂鼓吹皖、直、奉三系军阀联合以对付广东革命政府。23日到北京见段祺瑞,29日离京赴上海。冯玉祥对徐树铮谋杀其有知遇之恩的内姑丈陆建章早已怀恨在心,现在政治冲突又趋尖锐,遂密令部下,于30日晨当徐乘火车到廊坊车站时,把他逮捕枪毙。

注:

- ① 徐树铮:《先考妣事略》,《视昔轩遗稿》北京文楷斋1931年版,第2卷,第1页。
- ② 段祺瑞:《陆军上将远威将军徐君神道碑》,同上书,附录。
- ③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组编:《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页。
- ④ 张一麟:《直皖秘史》上海世界书局1920年版,第29—30页。

孙传芳

张振鹤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生于1885年4月17日（清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日）。1904年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由练兵处以直隶官费生送往日本留学。1908年底，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孙留日期间曾混迹同盟会。1909年初由日回国，经陆军部考试，名列上等。11月13日陆军部奉清廷上谕赏给孙传芳“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①，发往北洋陆军近畿第二镇，任步队第五标教官。民国以后，第二镇改为第二师，驻防湖北，他又历充该师辎重第二营营长、步兵第六团团团长，步兵第三旅旅长等职^②，深为湖北督军王占元所赏识。1917年升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起，王占元拘留皖系的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8月，以孙传芳代替吴职。1921年8月，“湘鄂战争”中，王占元兵败逃离湖北，28日，北京政府任命孙以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继王兼第二师师长^③。时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任湖北督军，孙遂转依吴佩孚。

1922年5月，以英、日帝国主义对华争夺为背景的直奉战争发生，直系迅即取得胜利。奉系失败后，退守山海关外。直系曹錕、吴佩孚为了赶走安福国会选出来的总统徐世昌，垄断北京政权，并对抗南方护法政府，阴谋策划抬出黎元洪充当傀儡总统，并准备恢复“民六”旧国会，演了一出所谓“法统重光”

的丑剧。孙传芳在这幕丑剧中充当了曹、吴的急先锋。5月15日,他领先通电全国,要求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位,电文说:“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即复,异帜可销。”^④28日,再次发出劝告南北两总统孙中山和徐世昌应同时下野的通电。6月2日,徐世昌被迫卸任,11日黎元洪被捧了出来。这是孙传芳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从此,他逐步成为曹、吴集团中的一员要将。为了夺取福建地盘,孙奉命于1923年1月率部从湖北,经江西入闽,3月20日,北京政府任孙为福建军务督理。

孙任军务督理之前,福建政局与反直三角同盟(孙中山与奉、皖两系的结合)的形势密切联系着。在1922年5月以后到1923年3月以前,福建境内成为皖系军人、孙中山的北伐军与直系策动的陈炯明部队错综复杂的斗争场所。孙传芳率部入闽后,经营一年,到1924年春,才把接近皖系的王永泉与臧致平部赶走。王、臧旧部入浙江境内,接受皖系卢永祥的委任。浙卢收编王、臧旧部,成为直系齐燮元进攻浙江的借口。同年9月初,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序幕的江浙战争又打起来。孙传芳奉曹锟的命令,以闽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助江苏的齐燮元。当苏、浙两军在黄渡前线对峙时,孙传芳军突然越仙霞岭,占领衢州,使卢永祥迅速失败。曹锟政府于9月20日任命孙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孙由于收编了卢部五个师,实力大为加强^⑤

奉张为了援助浙卢,出兵讨直,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底,由于直系冯玉祥部和奉张秘密停战议和,致使曹、吴

兵溃失势。从此，北京政府处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之下。11月24日，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曹、吴虽倒，但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齐、孙、萧等仍在。他们通电表示拥段，段也愿挟他们以自重。但奉张怂恿前浙江督军卢永祥向齐燮元夺回江苏地盘，于是段于12月11日下令免齐燮元江苏督办职，任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张作霖派奉军张宗昌部随卢沿津浦铁路南下。孙传芳在浙江感受威胁。1925年1月11日，他伙同齐燮元，组成“江浙联军”，以阻挡奉军前进。段为分化孙、齐联合，于1月16日任卢兼江苏督办、孙为浙江督办，并宣布上海永不驻兵。孙觉得自己有了保障，即不再参与齐、卢之争。齐受孤立，被迫宣布下野。2月初，孙、卢签订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双方取得暂时妥协。

不久，“五卅运动”爆发，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都惊恐不安。在此之前，奉军并未履行“江浙和平公约”，完全从上海撤兵，至是，奉军在帝国主义的纵容下，又大批地进驻上海。同时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杨于9月分别到皖、苏就职。奉系势力向东南的伸张，终于又使孙传芳和奉系军阀的矛盾再次激化。孙为了自保，一面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络反奉，一面拉拢江苏资产阶级张謇、张一麐等地方代表人物，制造反奉的舆论^⑥。10月中，孙出敌不意，突然向奉军发动猛攻。杨宇霆猝不及防，又恐战线过长，急令奉军撤退，于是孙军一举夺得松江、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10月17日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发布命令让孙传芳立即撤回原防^⑦。时鄂、皖、赣三省直系军人及旧苏军师旅长多人纷纷通电响应讨奉，并电请吴佩孚与孙传芳

共同主持讨奉“大计”。奉军见势不敌，即放弃苏、皖两省，将军队全部集中徐州，与张宗昌部汇合，准备反攻。11月初，孙又亲到蚌埠督师，与张宗昌的反攻部队交锋，在安徽固镇以南战役中，重创张部的白俄雇佣军，俘获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山东帮办军务、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并把施处决。11月8日，孙在徐州召开庆功大会。同月底，他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任章太炎为顾问，蒋方震(百里)及日本军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成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五省的实际统治者，也成了直系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誓师北伐，8月初，北伐军进抵湖南岳州。当时主要打击的对象是盘据两湖与河南的吴佩孚。这时孙传芳虽然在南京有些惊慌，但他还希冀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让他坐收渔利。因此，他暂时伪装中立，声称“保境安民”^⑧。为了对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炮制了一套“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的所谓“三爱主义”，来蛊惑群众。等吴佩孚在两湖败挫，北伐军于9月初进入江西时，他才慌忙地派兵迎战，并通电叫骂北伐军“共产共妻”。^⑨9月21日，他亲赴九江督战，妄想挽回败局。但革命洪流是不可抗拒的，孙传芳虽然在江西战场上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垂死挣扎，仍然被打得一败涂地。11月初，他狼狈逃回南京，陷于日暮途穷的境地。19日，他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化装潜赴天津，去会见了张作霖。在此之前，靳云鹏、王占元来往天津南京间，虽然已为双方撮合^⑩，但尚未合拍。当时张作霖正在天津蔡园召开奉系将领会议，孙传芳的突然到来，使奉系将领深感惊讶和

“钦佩”。孙向张作霖求救。于是，他们在反对革命军的共同基础上，化仇为友。张作霖答应派张宗昌带一部分“直鲁联军”南下支援他，孙也表示对张的衷心拥戴。11月30日，孙传芳和张宗昌领衔通电拥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孙、张分任安国军副司令，孙仍兼五省联军总司令。会谈结束，张宗昌把直鲁军开到浦口，孙回到南京，指挥他的部队摧垮了当时蔡元培等搞的“浙江自治”，重新夺取了浙江地盘。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了杭州，战线渐次逼近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为了响应北伐军，组织武装起义，遭到了孙传芳的血腥镇压。先是上年10月，当孙在江西指挥作战时，已指示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镇压了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至2月22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起义时，孙传芳又一次命令李宝章和各帝国主义的陆战队配合，对工人、学生实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和屠杀。孙虽然镇压了上海工人的二次起义，但他的前方作战部队已经涣散无力，24日后，他不得不把浙江防线和京沪移交给张宗昌的直鲁联军。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张宗昌代替了孙传芳，但并不能扭转他们的败局。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取得了胜利。24日，北伐军又收复了南京。孙传芳惊慌失措，退处扬州，收集残兵败将，设司令部于蚌埠。4月12日，由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叛变，北伐停顿，才使孙得到苟延残喘的机会。6月，张作霖企图联蒋反共，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参加会议，主动劝张晋升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承认取消“五省联军”番号，改任安国军第一军军团长。早在5月底，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军已

会师郑州；南京蒋介石的军队也占领了徐州。7月，安国军趁宁汉分裂，发动反攻。孙奉张作霖命反攻徐州。由于蒋介石的反革命而造成的人心涣散，士无斗志，蒋军望风而溃，使孙军一战而夺回徐州，并把蒋军赶回浦口。8月底，孙传芳又利用国民党新军阀内部蒋、桂分裂的混乱局面，决定孤注一掷，分兵三路渡江，与蒋、桂军在京沪铁路沿线栖霞、龙潭一带激战五天，结果遭到失败，损失了数万人。从此，他再没有多少实力，只有仰承张作霖的鼻息了。1928年春，他奉张作霖的命令，任鲁西前线总指挥，和蒋军激战于金乡、鱼台、丰县；和冯玉祥部激战于曹州附近。当沿津浦铁路的张宗昌所部溃退北逃后，孙部阵脚立刻混乱，他本人也逃回济南。

1928年4月10日，以新军阀蒋介石为首，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等，向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发动总攻击。张宗昌在鲁南的防线未战先溃，孙传芳军在鲁西南的后路，被冯玉祥军截断而全线溃退。孙、张两人于30日离济南渡河北逃。6月初，张作霖逃离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的残部退缩在冀东滦州一带，由阎锡山派人加以收编。随后，孙传芳即逃往沈阳，寄食于张学良门下。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的次晨，孙害怕祸及自身，仓皇逃避大连^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把全家迁回天津英租界居住。经皖系政客靳云鹏介绍，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军阀，竟摇身一变成了佛门信徒，过起“念佛韬晦”的生涯。1935年11月13日下午，当他正在天津紫竹林清修院跪着念经时，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从背后用手枪结束了他的生命^②。

注:

- ① 《正宗爱国报》1909年11月4日、5日、24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十月十二日)。
- ② 《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录·头班步兵科》第8页。
- ③ 《时报》1921年8月28日大总统令。
- ④ 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册,第228页。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12月再版,第500页。
- ⑤ 马葆珩:《齐卢之战纪略》。
- ⑥ 杨文恺:《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
- ⑦ 《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0日。
- ⑧ 《孙传芳覆总商会电》,《申报》1926年8月18日。
- ⑨ 《孙传芳第二次通电》(阳),《申报》1926年9月9日。
- ⑩ 《申报》1926年9月16日,17日。
- ⑪ 任作楫:《孙传芳在东北》。
- ⑫ 《大公报》1935年11月14日。

张 勋

李宗一

张勋字绍轩，江西省奉新县人，是个以搞复辟失败而臭名远扬的封建军阀。1854年（清咸丰四年）生于一个小商贩家庭里。十岁入私塾读书，次年其父病死，即辍学。

1884年张勋在长沙投军当兵，后转入广西提督苏元春部，1891年升为参将。1894年随四川提督宋庆调驻奉天。1895年到天津投靠袁世凯，充任工兵营管带，1899年随袁到山东屠杀义和团，升副将、总兵。1902年调到北京宿卫端门，多次充当慈禧和光绪的扈从。1906年调到奉天，为“奉军辽北总统”，驻昌图县；两年后被清廷任命为云南提督，又改为甘肃提督，仍留奉天驻防。1910年接统江防营，驻浦口。

1911年8月，清廷任命张勋为江南提督。10月南京新军第九镇准备响应武昌起义，两江总督张人骏召张勋入南京，商议对策。张勋对倡议人员大声叫嚷说：“独立即造反，反则皆贼也。”^①遂率江防营与新军战于雨花台。新军被迫退到镇江。张勋在城内搜捕革命党人，恣意滥杀，“凡剪发、悬白旗、携白布者辄遭暴戮”。^②不久，江浙革命联军围攻南京，张勋负隅顽抗，与联军战于紫金山、天宝山、狮子山等地。12月2日战败北窜，退守徐州，清廷又授他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张勋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极端仇视。他伙同盘据皖北的倪嗣冲，不时向革命军挑衅，孙中山曾通电严厉斥责其反革命行动。2月清帝退位，袁世凯窃据民国大总统，张勋的队伍改编为武卫前军，驻扎在山东省兖州。但他仍以清朝的忠臣自命，自称“非坚忍无冀于挽回”，^③一直包藏着复辟的祸心，时刻梦想推翻民国。他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人们称这个怪模怪样的军阀为“辫帅”，他的队伍也有“辫军”之称。他暗中和蛰伏于各地的清朝复辟分子建立了联系，并成为复辟集团中握有兵权的代表人物。^④1913年4月，他曾图谋拥溥仪复辟，因“事泄而止”。^⑤7月，袁世凯命他率兵镇压“二次革命”，他率“辫军”于9月1日攻陷南京，纵兵烧杀，大掠三天，袁世凯提升他任江苏督军。12月转任长江巡阅使，移住徐州。1915年武卫前军改称定武军，袁授张勋为定武上将军，1916年又为安徽督军。此时“辫军”已扩编为五十七营，约二万人。

张勋一心恢复清王朝，对袁世凯于1915年12月称帝表示不满。但西南各省发动护国战争后，他又转而支持袁，以蔡锷鼓动他反袁的密电向袁告发。1916年5月，冯国璋企图左右时局，谋取个人权位，在南京召开未独立各省会议，张勋派其参谋长万绳栻参加，主张讨伐西南。由于袁世凯突然毙命，会议无结果而散。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实权操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手中；北洋军阀与国民党人及西南地方势力之间矛盾重重，政局十分混乱。张勋认为这是进行复辟的大好时机，他一边发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通电，支持以康有为为头子的“孔

教会”，大造复辟舆论；一边以团结北洋军阀对抗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势力为理由，召开徐州会议，图谋通过徐州会议争取北洋军阀支持他使清朝复辟。6月9日，张勋邀集七省的军阀代表在徐州开会，公然组织军阀的攻守同盟。此时段祺瑞企图利用徐州会议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经段暗中策动，七省同盟扩大为十三省区。9月21日，张勋召开第二次徐州会议，正式组成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制定联合章程，以张勋为盟主。由张勋领衔发表一系列通电，对国民党议员和阁员大肆指责。随后，又开第三次徐州会议，主张“取缔国会”，“淘汰阁员”，气焰更为嚣张。

1917年3月间，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在所谓“参战”（即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爆发。段主张对德宣战，黎和国会则坚决反对，势如水火。由于德国暗中表示“支持清朝的复辟”，^⑥并“愿以德华银行资本”“协助”张勋，^⑦所以张勋反对对德宣战，但他又蔑视国会和黎元洪，因此黎、段双方争相拉拢张勋以为己助。张勋乘机伪装成为黎、段之间的调停人，企图利用矛盾，坐收渔人之利，伺机控制中央政权。同时，他暗中勾结德、日帝国主义，招纳清朝遗老、帝制余孽，四面八方拉拢关系，拼凑实力，积极为复辟作准备。

5月22日，张勋在徐州举行督军团会议，是为第四次徐州会议。段祺瑞派其心腹徐树铮参加，嗾使张勋领头以武力推倒黎元洪并解散国会。23日黎元洪下令免段祺瑞职。消息传到徐州，督军团大哗。张勋乘机公开提出“事已至此，非复辟不可”的主张，“各督军表面亦赞张意”。^⑧会议结束后，按预定步骤，先由各省督军相继宣布独立。在独立各省的武力

威胁下，黎元洪于6月1日电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遂于7日带领“辫军”十营三千余人及随从百余人由徐州启程。翌日抵天津晤段，遂即向黎元洪提出“调解”条件：限日解散国会。黎被迫于12日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到达北京。

张勋入京后，表面上向黎元洪表示支持李经羲组织责任内阁，并通电独立各省，取消独立；暗中却叫万绳栻密电各地复辟分子急速进京，“赞襄复辟大业”。这些丑类纷纷窜入北京，主张迅速发动。张勋和康有为、张镇芳、雷震春、刘廷琛、梁敦彦、梁鼎芬等复辟分子经过一番策划后，于30日傍晚潜入清宫，开所谓“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发动复辟。深夜又召集北京的军警头目王士珍、吴炳湘、江朝宗等人到张勋住宅，迫使其同意开放城门，并即命令“辫军”占据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同时，派出代表劝黎元洪“奉还大政”，遭黎拒绝。张勋遂不顾一切，于7月1日凌晨3时，换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群丑，闯入清宫，拥十二岁的溥仪“登极”，接受朝拜，复辟丑剧正式揭幕。

在张勋导演下，当天傀儡溥仪发布“上谕”，把民国6年7月1日改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易五色旗为黄龙旗，恢复清末旧制。中央设议政大臣、内阁，各省督军改称巡抚或总督。张勋自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张勋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复辟既是徐州会议的预谋，只要他一发动，“即可坐收全功”。^⑨但是，他的反动妄想的事实面前很快地破灭了。复辟消息传出后，立刻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群众纷纷集会，舆论一致声讨。黎元洪逃

进日本使馆避难。段祺瑞看到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势，知道机会已到，马上四出活动，在日本的支持下组成了“讨逆军”，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云集京津一带的“讨逆军”达五万余人，分东、西两路沿京津、京汉铁路进攻。“辫军”一触即溃，复辟分子见势不妙，纷纷溜出北京。张勋知大势已去，束手无策，不得不辞去一切伪职，央求驻北京的公使团出面“调停”。段祺瑞提出解除“辫军”武装，保全张勋生命财产。张勋却坚持要求带兵回徐州老巢，企图保存实力，作一个地方军阀。

12日，“讨逆军”发动总攻，驻扎在天坛的“辫军”立即乞降，守卫南河沿张勋住宅的卫兵亦作鸟兽散，张勋在两个德国人的保护下狼狈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丑剧仅上演了十二天，就在万人唾骂声中彻底失败。段祺瑞假惺惺地下了一道通缉张勋的命令；但是，到1918年10月这个罪行昭彰的复辟祸首竟被北洋军阀政府“特赦”了。1921年他又被任命为热河林垦督办，但没有赴任。1923年9月12日在天津病死。

注：

- ① 胡嗣瑗：《松寿老人自叙》签注》（未刊稿）。
- ② 《民立报》1911年11月11日社论《共讨残暴之张勋》。
- ③ 张勋：《松寿老人自叙》，1922年刻本，第4页。
- ④ 胡嗣瑗：《松寿老人自叙》签注》载：“壬子春，公移军兖州，王给谏宝田……以兴复大计说公，极相契合，每夜公微行过宝田密语，或达旦乃归，幕客皆不得闻。时恭亲王居青岛，朝士如于侍郎式枚、刘副大臣廷琛……先后会岛上，谋讨贼反正，介宝田纳交于公，诸人游充必至宝田所，公辄密就筹议。”
- ⑤ 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

- ⑥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3 卷，第 255 页。
- ⑦ 《金永致张勋函（1917 年 3 月 10 日）》，《近代史资料》总 35 号，1965 年。
- ⑧ 章宗祥：《复辟问题小记》（未刊稿）。
- ⑨ 胡思敬：《退庐笈牍》1924 年刻本，第 3 卷，第 12 页。

梁士诒

郑则民

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是北洋军阀旧交通系的首领。1869年5月5日（清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于广东省三水县冈头乡。父梁知鉴，清朝举人，曾在三水、广州、香港等地书院讲学。

梁士诒幼年随父读书，二十岁在佛山书院读书时，与梁启超同学。1890年和1892年梁士诒两次赴京会试不中。南归经上海时，搜求译本新书，回家后与友人共同研读，他特别留心于财政、河渠方面的问题。1894年考中进士，1895年授翰林院编修。当年冬告假南归，在家乡凤冈书院讲学。1897年又赴京任国史馆协修。

1903年梁应经济特科试，因他的名字和康有为（祖诒）、梁启超的姓名各同一字，有人在慈禧面前说他是“梁头康尾”，慈禧因而认为他是康梁同党，不予录取。直隶总督袁世凯听说他通“时务”，经过唐绍仪介绍，聘他为“北洋编书局”总办，这是梁士诒投靠袁世凯的开始。次年，英国加紧侵略我国西藏，清政府派唐绍仪为议藏约全权大臣往印度与英国谈判，他随唐出国任参赞。1905年冬他随唐回国，唐奉命兼任督办京汉、沪宁铁路大臣，他被任为铁路总文案，由此走进了交通部门。1906年，清廷新设邮传部，总管轮、路、电、邮。次年春派他为邮传部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铁路提调。同年冬，他

协助邮传部尚书陈璧筹设交通银行，事成后被派为该行帮理。不久邮传部把五路提调处裁撤，设铁路总局，他改任局长。从此，梁在铁路交通系统中安插党羽，逐步培植起自己的势力。他和陈璧，唐绍仪等都与袁世凯关系紧密，1908年年底，慈禧与光绪死后袁世凯被逐，陈、唐相继去官，到1911年春，与袁有怨隙的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后，他也被参劾撤职。

1911年10月以保路风潮为导火线的武昌起义发生后，盛宣怀成了众矢之的，被清廷革职；接着清廷又起用了袁世凯，这给了梁士诒再出头的绝好机会。果然不久袁派人秘密通知他说：“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预为布置。”^①于是，他秉承袁世凯意旨，积极活动和策划。11月16日袁内阁成立，他先署理邮传部副大臣，后又署理大臣。为了配合袁世凯逼宫的需要，他同外务大臣胡维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等多次进宫，声称财源枯竭，大局难保。另外，他还在幕后策动北洋将领与驻外使节电逼清帝退位。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梁当上了总统府秘书长，受袁信任，参与机密，人们叫他“二总统”。5月，他兼任交通银行总理。他利用职权，使交通银行取得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的特权。1913年5月，他又署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当袁世凯急于变临时总统为正式总统，在国会中策动议员“先选总统、后制宪法”时，他奉命组织了御用的公民党，替袁活动。1914年起，袁世凯已由大权独揽，逐步作着复辟帝制的安排，梁在这过程中，又大卖气力。3月，他以总统代表身分到孔庙祀孔，讲演“圣道”。到5月，他因与袁党皖

派首领新任政事堂左丞杨士琦之间的矛盾激化，调离了总统府，改任税务处督办，又任“参议院”参政。但他并不因外调而灰心，仍然积极向袁献媚争宠。7月他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修改总统选举法，使袁世凯能任期十年，并可连选连任。同时，他凭借垄断的交通事业与银行事业，和税务督办的职权，对外借款，对内搜刮，为袁世凯筹措帝制经费。8月他被任为内国公债总理。他为袁政府发行民国三、四年“内国公债”约五千万元；又在一年之内由他治成了数笔对外借款，这就使袁世凯从财政上得到支持而可以放手地为帝制而加紧活动。

梁士诒是袁党中的粤派首领。粤派与皖派争宠，互相攻击。1915年6月，皖派策动肃政厅发动了“五路大惨案”，矛头指向了梁士诒及其亲信叶恭绰。此案开始声势很大，但在袁世凯的庇护下，最后轻轻了结。但这毕竟是对粤派的一次打击。8月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打着“研究学术”的幌子，作为推行帝制的机关。9月梁士诒为向袁表示“忠心”，急忙发起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向参议院请求变更国体，并准备假“国民”之名，把袁世凯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他的这一着，手续上较筹安会为简便，博得袁的欢心。1916年6月，袁世凯的帝制失败并死去后，梁士诒等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继任的黎元洪和段祺瑞政府的“通缉”。这种“通缉”是虚假的，令下之后，他从容地避往香港。

梁在香港住了一年之后，应日本财阀涩泽和大仓的邀请，于1917年10月赴日本，受到日本财阀们的盛大接待。他和日本的财阀、政客进行了广泛接触，密谈了在华合伙设银行、办企业等问题。可见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眼里仍是个用

得着的人物。

1918年初，正是北洋政府中冯、段暗斗并在对南方问题上发生和战分歧的时候，经皖系政客们的活动，北洋政府取消了对梁的通缉。2月梁回到北京。先是，为调解冯、段之争，徐世昌从河南原籍北来，有所活动，成为时局中注目的人物。梁回国后便先去天津和徐世昌秘密措商。接着，他奔走于北洋各派和南北军阀之间，企图借调和他们的矛盾，从中捞取政治资本。6月梁被推为交通银行董事长。梁原来是所谓“交通系”的首领，但当他外逃期间，曹汝霖在交通部门中，培植党羽，形成了所谓“新交通系”。梁归国后，又纠集旧部，恢复了自己的势力，人们称他们为“旧交通系”。新、旧交通系其实是一丘之貉，并无多大区别。这年上半年，皖派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8月召开非法的新国会（“安福国会”），新、旧交通系在安福国会中占据了仅次于安福系的席位，梁士诒当上了“安福国会”的参议院议长。交通系和安福系共同把徐世昌选为“总统”。徐上台不久，欧战结束。美英帝国主义为遏制日本支持皖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对中国政局倡导“和平”，徐世昌也愿借南北妥协，使自己非法取得的总统地位，得到南方的承认；南方军阀也想从和议中分得一定的地盘和权力，遂有1919年春南北和会在上海的召开。双方代表经几个月的谈判，终以无结果而破裂。在此期间，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的态度是和徐世昌一致的。

南北和议破裂后，北方直皖两系以东西帝国主义为背景发生了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战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着以徐世昌为“总统”的北京政府。他们分别在美英和日

本帝国主义扶植下，进行着激烈的争夺。战后的靳云鹏内阁是直奉两系保持均衡的产物。梁士诒很想组阁，便策动交通系阁员叶恭绰、周自齐等从财政上倒靳阁的台。又经叶恭绰的活动，他们的计划取得了张作霖的支持。1921年12月下旬，奉系与交通系迫使靳云鹏辞职，张作霖接着便推荐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梁内阁出现的背后，实际上又是日本策动的结果。日本为了与英美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把奉系与新、旧交通系拉在一道，以便供它利用。因此，梁士诒的组阁激化了英美与日本的斗争，也激化了直奉之间的矛盾。这时在美国控制下的华盛顿会议，正就山东问题进行争论。日本为保持其在华的侵略权益，就派驻华公使小幡见梁士诒，声称愿提供借款给北京政府，诱使梁士诒接受山东问题改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的主张。梁同意了借日本款赎回胶济路，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聘用日人为车务长及会计长的条件。梁当即电令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专使，接受日本要求。这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群众纷纷抗议，上海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这时，善于观看风向、利用民意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乘机发动反奉的运动。他大骂梁士诒“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②。到1922年1月25日，梁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直系军阀的攻击下，不得不请假出京，躲到天津去。

1922年4、5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打响，结果奉军失败。徐世昌赶快褫夺叶恭绰、梁士诒职务并下令通缉。但下令前，梁士诒已得到通知，5月7日，他和叶恭绰一同逃往日本，数月后回香港家居。

1924年春梁自香港起程到英、法、德、意、美、日等国漫游，9月回香港。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1925年2月，梁应段祺瑞约，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不久，任“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并再度任交通银行总理，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

1927年初，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聘梁为“政治讨论会”会长，接着又任税务督办。5月，他曾访英驻华公使蓝浦生，希望通过蓝浦生促成奉张与蒋介石合流，但无结果。1928年在北洋军阀面临土崩瓦解的形势下，梁再次逃往香港。

1932年蒋介石召开所谓“国难会议”，梁也被邀回国。其后，“国难会议”展期，梁又回港。1933年3月，梁又北来，准备有所活动，但到上海未久，即于4月9日病死。

注：

- ① 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100页。
- ② 同上书，下册，第183页。

主要参考资料：

- 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下册，1946年版。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
谢彬：《民国政党史》，学术研究会丛书部（上海）1925年版。
张忠绶：《中华民国外交史》卷上，1936年版。
《燕京学报》第33期，1947年12月版，第292—302页。

陆 征 祥

郑则民

陆征祥字子欣，又字子兴，1871年（清同治十年）生于上海。其父陆诚安是外国传教士所雇佣的“传教员”，“以助基督教牧师传教为生”。^①由于父亲的引导，陆自幼入基督教。

陆征祥幼年时进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读书，继往北京入总理衙门所办的同文馆学法文。1892年被清政府派往彼得堡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的翻译。1897年继任驻俄、奥、荷公使杨儒的翻译。1899年他在彼得堡同比利时一将军的女儿培德结婚。1903年任驻俄公使胡维德的参赞。1906年升任清驻荷兰公使。1911年转任驻俄公使。同年十月改入天主教。

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征祥在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密电授意下，为配合袁世凯的逼宫需要，在1911年12月25日，联合一些驻外使节，发通电劝清帝退位。^②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任命陆征祥为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他是当时著名的买办外交官，外国话讲得流利，讲究应酬交际，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夸奖。在当时的官场中，他又常标榜自己是无党派的“超然主义”，这又恰合袁世凯的政治需要。1912年6月，唐绍仪辞职，陆征祥代理总理，继而奉命组阁。7月18日，他秉承袁世凯旨意，向参议院提出补充六个阁员名单，亲自到会宣布“政见”，开口便讲“补充阁员名单”就好比“开菜

单作生日”，致使全场哗然，成为笑柄。至于“政见”，连一句话也没说。议员们对他大失所望，将他提出的人选，一一否决，致使新阁流产。后经袁世凯以武力威胁和收买拉拢的办法，使议院通过另外提出的五名阁员，但陆征祥却因受到失职弹劾而称病不出。数月后陆改任赵秉钧内阁的外长，1913年4月参加了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二千五百万镑的《善后借款合同》，为袁世凯筹集内战经费。^③5月又与俄国公使议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协定（草约六款）。^④因被参议院否决，不久便退出内阁，改当袁世凯的外交顾问。

1915年1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又起用陆征祥代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他与外交次长曹汝霖一起，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经过几个月的交涉，至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声明，除第五号五项“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接着，在卖国头子袁世凯授意下，陆征祥于5月25日和日本公使正式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计有关于山东、南满等条约二件，换文十三件，^⑤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

同年10月，由于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徐世昌预感到政局危机即将来临，托故辞去国务卿，袁命外交总长陆征祥代理徐的职务。12月正式任命陆为国务卿，仍兼外交总长。次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再次起用徐世昌任国务卿，陆继续任外长，至袁于6月死时为止。

1917年初，陆征祥被聘为段祺瑞内阁所设的外交委员会成员，支持对德、奥宣战的主张。继而任王士珍、钱能训等内阁的外长。

1919年1月，陆征祥以外交总长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与顾维钧（当时驻美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驻美代表）等其他代表，在人民的压力下曾向“和会”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有：一、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二、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三、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但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中国的要求全被与会列强所拒绝，而日本夺取的山东权益却被明文载入对德和约。这样就激起了我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成为爆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在国内人民和旅法华侨、留法学生共同斗争的压力下，陆征祥等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陆征祥回国后，又蝉联几任外长。从1922年6月起，改任北洋军阀政府驻瑞士公使。同年10月，兼任出席国际联盟代表，到1924年前，他曾以北京政府代表身分多次出席国际劳工大会。^④

1927年初，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国人民革命的沉重打击下，面临土崩瓦解的困境。此时陆妻在瑞士病故，他送遗体返比利时殡葬。7月，陆征祥入比利时布鲁日（Bruges）本笃会圣安德修道院。此后一直从事宗教职业，初为修士，1935年6月升为司铎（神父）。1946年5月罗马教廷授他为比利时圣伯铎禄修道院荣誉院长。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在布鲁日城病死。^⑤

注:

- ① 罗光:《陆征祥传》香港真理学会 1949 年版,第 10—11 页。
- ② 《宫中电报档》,见《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 册,第 154 页。
- ③ 张忠绶:《中华民国外交史》1936 年版,卷上,第 109—110 页。
- ④ 同上书,第 133—135 页。
- ⑤ 《中外约章汇集》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2 册,第 1100—1114 页。
- ⑥ 陆征祥:《国际劳工大会报告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抄本。
- ⑦ 同注①,第 280 页。

曹汝霖

郑则民

曹汝霖字润田，1877年1月23日（清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十日）生于上海。父曹豫材，主管江南制造总局材料库多年。

曹汝霖幼年入私塾，继往汉阳铁路学堂读书。1900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政大学。在留日期间，他对日本帝国势力的发展，十分崇拜，并站在维护清朝反动统治的立场上，鼓吹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2年清政府派载振出使日本，曹以留学生代表身分，“极力逢迎，大得载振欢心”。^①

1904年曹汝霖归国，被派任商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不久，他通过留学生特科考试，中进士，授六品奏任官主事，归商部候补。次年冬，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派代表来北京，要求清政府承认其在此次战争中从俄国手里夺得的有关我国东三省的特权。曹充当袁世凯的随员，参与同日本代表谈判，订立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使日本的侵占合法化。此后，曹被调入外务部。1911年春，清朝政府设立以奕劻任总理大臣的新内阁（即“皇族内阁”），曹任外务部副大臣。

辛亥革命后，曹汝霖改当律师。1913年袁世凯指派他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同年8月，就任外交次长，“仪同特任，与总长同等待遇”。^②

1914年9月24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借口对德宣战，派兵在山东龙口等地登陆。先是袁世凯政府已宣布中国守中立，至此又被迫划潍县以东为“交战区”。但日军竟于9月25日悍然占领潍县车站，准备西进。10月2日，曹汝霖以外交次长身分声明：胶济铁路将不转让给日本以外的第三国；战后日、德如对该路订有任何协定，中国政府将“不持异议”，^③企图用出让主权来缓和日军的行动。但日本帝国主义不予理会，继续西进，强占了胶济铁路全线和青岛。

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隈重信内阁经过预谋，向袁世凯正式提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接着袁起用陆征祥代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和曹汝霖一起，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曹不仅参与正式谈判的全部活动，而且曾受袁世凯之命，多次私访日使，探听日方意图，密议成交条件，起草有关文件。^④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日本以最后通牒方式，迫使卖国头子袁世凯于5月9日声明，除第五号五项“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5月25日，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关于山东、南满的条约二件，换文十三件。^⑤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1916年4月曹汝霖当上了交通总长，5月兼署外长，至袁世凯毙命时为止。同年秋，曹继梁士诒任交通银行总理。次年1月曹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台湾、朝鲜银行团借得五百万日元，此为“西原借款”的开端。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段祺瑞以“讨逆”名义，起兵进京，重握北京政府大权。在此期间，曹汝霖通过日本银行替段祺瑞筹措军费。7月17日，曹任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1918年3月又兼任财政总长。当时，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企图

以借款等方式,支持段祺瑞政府,以便达到进一步独霸中国的目的,又派西原龟三来华活动。曹汝霖按照段祺瑞的旨意,和西原密谋,向日本特设银行团(由兴业、台湾、朝鲜等银行组成)进行大宗借款。曹直接经手者,公开数字达一亿多日元,是“西原借款”的重要组成部分。^⑥这些借款主要供段祺瑞反动政府用于购买军火,充作军饷,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行内战。他们为了取得借款,不惜把中国的银行、矿山、交通事业等作为抵押品。

1918年秋,日本寺内内阁眼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深怕日本从山东掠夺到手的利益有所丧失,除用两千万日元借款取得对济顺、高徐二条铁路的控制权外,又向中国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照会,其中包括战后胶济铁路“归中日合办”等七项内容。北京政府只求有钱可借,不惜断送山东主权,而予以承认。由曹汝霖电驻日公使章宗祥,授权他以“欣然同意”的复照,交付日本。

曹汝霖依仗着在交通、财政方面所窃据的要职,取代了交通系头子梁士诒的地位,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曹汝霖继任钱能训内阁的交通总长。当时,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曾经向“和会”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等要求,但仅有“山东问题”一项被列入讨论。中国方面要求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利。日本却以“二十一条”业已签订并有1918年“欣然同意”的换文等为借口,坚持其既得利益。后来,中国的要求全被与会列强所拒绝,战前德国在山东权益由日本继承被明文载入对德和约。消息传

来,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但曹汝霖仍然坚持媚日卖国的立场。他向大总统徐世昌进言:“决不可失日本之欢心,必须顺从其意。”在国务会议上,还公开为日本侵占青岛辩护,叫嚷什么“独索日本之青岛,甚非公平之道”。^⑦

5月4日下午,北京学生三千余人,集会于天安门前,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学生游行队伍向曹的住宅赵家楼进发,包围并冲入曹宅。曹汝霖躲藏起来,正在那里的章宗祥遭到痛打。有人还放火烧了这个卖国贼的巢穴。在工人阶级、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威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下令罢免曹、陆、章三人,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此后,由于北洋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曹依赖搜刮所得的资财,进行投资剥削。他在继续担任一个短时间的交通银行总理后,被他所投资的井陘正丰煤矿公司等推为董事长。抗日战争时期,曹在北平,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扶植汉奸建立伪临时政府,曾“聘曹(汝霖)为最高顾问,月赠公费二千元”。继又聘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咨询委员”。^⑧解放战争时期,他从北平迁居上海。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曹汝霖逃往台北。1950年经香港赴日本,在东京等地居住,受到日本反动派吉田茂等的庇护和豢养。1957年曹汝霖迁居到美国,1966年8月4日死于美国底特律。

注:

- ① 粤东闲鹤:《曹汝霖》第9页。
- ②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07页。
- 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66页。
- ④ 参见曹汝霖给陆宗舆的四封信,同上书,第6卷,第60章。
- ⑤ 《中外旧约章汇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册,第1100—1114页。
- ⑥ 张忠绶:《中华民国外交史》1936年版,卷上,第336页;周叔廉:《西原借款》。
- ⑦ 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4月19日。
- ⑧ 张炳如:《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

张宗昌

黄德昭

张宗昌字效坤，绰号“狗肉将军”，山东掖县祝家庄人，生于1881年2月13日（清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①。其父是喇叭手，母为巫婆。张年十二三，助其父掌饶钹混日子；十五六岁时，随其母至营口，在一家“宝棚”为赌棍帮闲，日与扒手小偷为伍。后来，流落北满当胡匪，又辗转到海参崴的华商总会当了门警小头目。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宗昌乘民党在关东招兵之机，由关东率胡匪百人至烟台，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后又跑到上海当上了光复军团长。在“二次革命”时，于徐州背叛民军，投降了北洋军江淮宣抚使冯国璋。1916年春，民党陈其美在上海策动反袁时，张经过冯的关系，接受袁世凯的金钱收买，密派其营长程国瑞将陈其美暗杀^②。自是张深得冯的信赖，经冯提拔，先后升任旅长、军官教育团团长。同年11月冯国璋任副总统后，委他为侍从武官长。1918年初，张宗昌任苏军第六混成旅旅长，率所部随湘赣检阅使张怀芝假道江西攻湖南，4月下旬在攸县以南与湘、桂系的护法军交战，一触即溃，大败而逃，沿途烧杀、掳掠，造成人民的极大灾难。其后经醴陵转至湘南，收集大量溃兵，改任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到1920年6月张部退入江西袁州（今宜春）驻防。1921年初，其军队在吉安因闹饷被赣督陈光远解散，张只身北归。

张在赣南失败后本想再钻曹锟的门路，曾到保定向曹送寿礼进行活动，但为吴佩孚所反对，无结果。钻营曹锟的门路不成，他转往奉天投靠张作霖^③。开始不为张作霖所重视，只安排给他带一营宪兵，他由师长降为营长，自不能满意。1922年5月下旬，正当第一次奉、直战争过后，奉直两军仍在榆关对峙时，前吉军师长高士侯（高是前吉督孟恩远的外甥，吉林地盘被张作霖夺去，高不服），联合绥芬河胡匪卢永贵于中东路五站起兵，声称受吴佩孚命令反奉。张作霖令张宗昌出兵迎击，他带领一营宪兵从哈尔滨迎击由绥芬向西推进的高、卢军。因卢部胡匪中小首领多与张宗昌为旧相识，对他怀有好感，且他又得到日本关东军的帮助，干是一战获胜，高、卢被杀。张乘机收编其败兵成立三个团，由此见重于张作霖，被委为绥宁镇守使，升任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同年冬，他又收容了一批逃入中国境内近万人的白俄匪军，得到大量枪炮马匹及铁甲车等物，遂成为奉系的实力派之一。

1924年秋第二次奉、直战争中，张宗昌任奉方镇威军第二军副军长，率部向热河进攻，连占要地，到冷口与直军激战。由于冯玉祥等举行“北京政变”，直军正面防线动摇，后退，张先于奉军各军由冷口插入关内，进占滦州，切断了榆关方面直军退路，使直军一败涂地。张乘势收编了吴佩孚的军队四个旅，他的队伍一时猛增。二次奉直战后，段祺瑞的执政府成立。张临时改称宣抚军第一军军长，协助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南下，他统率四个混成旅又两个梯队的庞大队伍，继续去打盘踞江苏的齐燮元（直系）。由于齐军内部涣散，没有经过重大战争，张部就到了上海，奉系势力遂伸张到长江下游。1925

年2月，段祺瑞先发表张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驻节徐州。到4月，由于张作霖的压力，段祺瑞执政府又改任张为山东军务督办。从此张宗昌独霸山东，成了以“祸鲁”著名的地方军阀。

1925年10月，感受到奉系威胁的浙督孙传芳率部反奉，爆发了浙、奉战争。浙军迅速攻占南京、蚌埠北进。张宗昌出动所部鲁军八万，在徐州以南地区与孙军激战；孙在反奉前曾与冯玉祥有所联合。这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亦与奉军开战（国、奉战争）。在二次奉直战中失败后从武汉再起的吴佩孚，也乘机抢夺地盘，构成纵横交错极其复杂的混战局面。11月初，张与浙孙战中已放弃徐州，退回山东。但接着河南国民二军派李纪才攻鲁西南，张与李军战于曹州至寿安地区。其时，吴佩孚曾委派靳云鹗率部增援李纪才军，靳、李两部一度推进到济南附近的八里洼。但不久吴准备联奉反冯，指示靳云鹗作折回河南的准备，于是张乘机拚命反击，保住了他在济南和山东的地位。与此同时，直督李景林（奉系）在天津与国民一军作战，李被逐出天津，逃到济南向张求救。12月初，张为援李合组直鲁联军，自任总司令，派褚玉璞带兵北上，与国民二、三军相持于德州、沧州之间。1926年初，奉张（作霖）与直吴（佩孚）取得共同“讨赤”（反国民军）的谅解，张宗昌代表奉系与靳云鹗代表吴佩孚在泰山订合作条约。随后，张派直鲁联军北进与奉军会攻津、京国民军，并派其渤海舰队北上助攻。3月下旬，国民军退却，直鲁军与奉军占天津并于4月进入北京。当时，国民军退守南口至大同一线，受到直鲁、奉军、吴佩孚部及山西阎锡山三面攻击。战斗到8月，国民军为保

存实力，自南口撤退，张宗昌以前敌总指挥令所部首先进入南口。战斗结束后，由吴佩孚举荐，北京政府授张为义威上将军。

张宗昌独霸山东期间，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依靠地主豪绅，残酷地压榨人民群众，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他征收的田赋，“每地丁银一两，至少八元，多至二十元”。按正额累计，竟“征至民国二十八年”^④。其他军事特捐及各项苛税，名目多至五十余种。滥发的各种毫无基金的纸币、军用票、金库券，不计其数。他把搜刮来的大批钱财存入大连日本银行。他的生活极端奢糜腐朽，姨太太有数十人之多，而且到处抢劫蹂躏妇女。酗酒赌博，一掷千金，不算回事。他手下的大小爪牙，也为非作歹，闹得济南城内乌烟瘴气。他到处招兵，但毫无军纪，又常不发饷，一任其贩毒抢劫，胡作非为。山东人民称张宗昌有“三不知主义”，即“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⑤。其祸国殃民，可见一斑。

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竭力反共反人民。他到任不久，就封闭进步报刊，把大批的进步学生关进监狱。1925年5月间，他一手造成的镇压工人的“青岛惨案”，更是骇人听闻。当时，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三万余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对日本财阀的剥削与压迫，举行大罢工，他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电令胶澳督办（青岛市长）温树德调集三千余军队，开到四方（青岛郊区地名），打死工人八人，重伤十七人，轻伤者更多，被押解回籍的三千多人。6、7月间，青岛人民继续开展斗争，张又在其日本主子指使下，亲到青岛进行镇压，将工人领袖、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及青岛《公民报》进步记者胡

信之等多人逮捕杀害。

此外，张宗昌还在山东各地肆意逮捕屠杀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和人民群众。当时在各地传开的“切开亮亮”（把人头当做西瓜，切开晒太阳）、“听听电话”^⑥（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这两句刽子手的黑话，就反映了张宗昌的统治是如何黑暗和恐怖。因此，到处怨声载道：“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⑦人民群众对他切齿痛恨。

1926年4月张宗昌率军入北京后，立即把他在山东的暴政搬到北京来施展。他委派各级税官，进行搜刮，强迫商号居民使用奉票和山东军用票。8月6日，他下令杀害了《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同时并封闭了好几家报馆。

张宗昌虽然自称“绿林大学毕业”^⑧，演过“炮轰青天”的怪剧（为天旱不雨），但他也居然主张尊孔读经，对孔丘行跪拜礼，还重新刻印了《十三经》。直到垮台前夕，他仍上书北京政府总理潘复，要求强制黄河以北各学校，都“读吾孔子之书”，以“移易人心，安危定变”^⑨。他又与孔丘七十六世孙孔令贻（所谓“衍圣公”）拜把兄弟^⑩。还“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⑪。

但是，张宗昌耀武扬威的时间并不久。1926年7、8月间，当他还在南口鏖战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已经出师北伐，盘踞在华中和华东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及孙传芳迅速被击败，北伐军的炮火眼看就要烧到张宗昌与奉系军阀盘踞的地区。11月，张宗昌和北来求援的孙传芳与张

作霖等举行天津会议，张宗昌、孙传芳等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就职。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率直鲁军“援孙（传芳）”，二次南下。1927年初，张调集十多万人枪，分兵两路南进，一路直趋南京、上海，接孙军防务；一路由他自己指挥进取皖北合肥。由于北伐军的迅速推进和归附了南方的皖北地方军强烈抵抗，张在安徽方面连遭挫败。

3月上旬，北伐军推进到上海附近。3月21日，上海八十万工人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行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张宗昌的直鲁军在沪东天通庵车站及闸北宝山路和北站一带，用机枪、大炮轰击工人，并在闸北放火烧毁民房，特别是白俄匪军还用铁甲车开炮射击工人群众，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凶残本性。但是英勇的起义工人终于胜利地占领了上海，直鲁军纷纷弃械投降，张宗昌令其残部退回山东。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张宗昌与孙传芳乘着宁、汉分裂之机一度挣扎反攻。7月孙传芳夺取徐州，进迫蚌埠，8月孙传芳渡江攻南京失败。这时张继续在津浦、陇海线与国民党的蒋、冯各军开展拉锯争夺战，先后在蚌埠、徐州及兰封等地区，受到沉重打击，12月再次退回山东老巢。

1928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继续“北伐”。由于强敌压境，张宗昌于月底逃出济南。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其侵略权益，曾出兵侵占济南，但也未能延缓张的败北。他的腐败军队由济南一路溃退到德州、天津至冀东。他和褚玉璞一度宣言“班师”回奉，但结果受到张学良与国民党白崇禧部的双方夹攻，9月他的残部五万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编。此后，他即跑

到大连,寻求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

张宗昌失败后,一直妄图东山再起。1929年初,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一度纠合鲁军余孽到烟台登陆,但旋即失败,逃往日本别府当寓公。“九·一八”事变后,他侈谈“抗日”,大摇大摆地回国,企图重新获得山东的地盘。1932年9月,张从北平窜回济南,引起了当时山东统治者韩复榘的注意。9月3日,韩复榘指使张的仇人郑继成将他刺杀于济南车站^⑫。

注:

① 北平《世界日报》1932年9月5日第四版。

② 蔡寅:《英公被刺案情概要》,《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一。王翰鸣:《张宗昌兴败纪略》。

③ 张宗昌投靠张作霖,得力于时任北京政府财政次长潘复的介绍。(见陶菊隐:《政海逸闻·张宗昌》第95页。)

④ 永乐:《张宗昌祸鲁记》(中),《逸经》杂志第六期,1936年5月20日。

⑤ 参见《张宗昌实录》,《郑继成杀张宗昌案》。

⑥ 中直:《张宗昌祸鲁记》(上),《逸经》杂志第六期,1936年5月20日。

⑦ 泰山老人:《张宗昌祸鲁记》(下),《逸经》杂志第七期,1936年6月5日。

⑧ 同④。

⑨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103。

⑩ 孔府档案号:6538。

⑪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第252、253页。

⑫ 张宗昌的被杀,是韩复榘有计划的布置郑继成顶名为父报仇去干的,原来郑的叔父郑金声系冯玉祥部下的军长,1927年10月被张宗昌所俘,11月被张杀害。(见王慰农:《韩复榘的特谍队和张宗昌的被杀》)

韩复榘

沈庆生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生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父韩静原，在本村私塾当教师。韩随父在塾读书。1910年，因家庭困难，他辍学投军，入陆军二十镇冯玉祥营，为司书生。1911年11月，韩在冯玉祥营当队官，随冯等参加滦州起义，事败后被递解回籍。

1912年春，冯玉祥任左路备补军前营营长，韩复榘再投入冯部。以后随着冯的升迁，韩也得到不断的提拔，自排长、连长至营长。当时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等十余人，都是冯的亲信，有“十三太保”之称。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韩由团长升任国民军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25年春，升任第一师师长。1926年5月，当国民军与直奉联军在南口大战时，阎锡山出兵晋北，抄袭国民军后路。韩复榘任前敌总指挥，和石友三等率部往援晋北，韩在大同、天镇一带同晋军作战，非常卖力。8月，国民军在南口失败，退向绥远，并拟续向甘肃撤退。韩复榘、石友三见军心散乱，乃与晋军将领商震联系，接受晋军收编。

1926年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到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后，召韩归来，韩初不敢归，经解释后，率部回到冯处。9月下旬，冯玉祥出师甘、陕，任韩为援陕第六路总指挥。1927年6月，冯玉祥所部国

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整编，韩任第六军军长。7月，韩代方振武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出潼关，在豫东一带打垮奉、鲁军各部。1928年4月，蒋、桂、冯、阎四派新军阀联合“北伐”，韩复榘奉令率部沿京汉线北上，6月6日首先进抵南苑。7月，河北省政府成立，韩自认为战功不小，但仅得一河北省政府委员职，很不高兴。10月，第二集团军缩编，韩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一师师长。不久，韩部又改编为第二十师，韩任师长，回驻郑州。12月，冯玉祥荐韩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但把他兼任的二十师师长开了缺，改由与韩素有矛盾的石敬亭接任，使韩深受刺激。他常觉得自己过去有“投晋”的一件事，怕冯对他有怀疑。现在韩丢了二十师的实力，只当一名空头主席，越认定冯对他不信任，对冯渐怀不满。

蒋桂战争于1929年3月爆发。蒋介石以中央名义任韩复榘为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令其率部讨桂。而冯玉祥则令韩屯兵信阳，暂不进兵，以观时局变化。4月，桂系失败，冯玉祥急电促韩率部向武汉推进。行至孝感，蒋介石立即电韩停止进兵，并派人携款至孝感，借劳军之名，对韩进行收买。韩又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至汉口见蒋。蒋以优礼相待，极表亲切。这与冯有时对他粗鲁的责骂对照起来，大不一样。韩遂对蒋抱有好感。5月，冯玉祥在华阴开会，策划反蒋。冯将原驻山东、河南之西北军撤至陕西和河南西部。韩复榘反对冯的西撤计划，被冯痛斥，遂召集他的二十师旧部将领密议，率部东去，叛冯投蒋。5月22日，韩在洛阳发出“养”电，表示“维持和平，拥护中央”；23日，又连发两电，表示拥蒋。

1930年4月，中原大战正式揭开。韩复榘向蒋介石要求，

把所部调往山东抵挡晋军。4月15日，蒋任韩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山东境内与晋军作战。9月，冯、阎失败后，韩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6月，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1月，被任命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8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

从1930年9月至1938年1月，韩复榘统治山东近八年之久。他在山东的统治与以前督鲁的奉系军阀张宗昌同样是土皇帝式的，但外表上不一样。他摆出一副“急于求治”的架式：严禁部下穿丝绸衣服，不准士兵上街游荡，他常到各地“巡察”或“私访”，随个人喜怒滥用赏罚。他可以把彻夜赌博的小职员误认为“能早起”而提升为县长，也可以据一封匿名诬告信而惩办他的僚属。他喜欢自己审案，当时流传着他判案的笑话：“左立者开释，右立者枪毙”，人们戏称他为“韩青天”，他很高兴。他成百的诱杀降俘，手段非常残暴。从1932年至1933年期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捕共队三次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山东省委员会，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在此期间，共产党人发动益都、博兴、诸城、日照、柴城、海阳等地的农民举行武装暴动，以反抗国民党和韩复榘的残暴统治。这些暴动都先后被韩复榘所镇压。

与此同时，韩复榘又利用梁漱溟在邹平、菏泽等专区推行旨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用欺骗的手法来强化其封建统治。

1932年9月，韩复榘指使山东省府参议郑继成（郑借口为他叔父报仇）刺杀了应邀回到山东来的前山东督军张宗昌。

韩复榘的山东省政府对蒋介石的“中央”保持半独立关

系，韩与蒋之间矛盾重重，韩复榘害怕蒋介石向山东插手，两次截留“中央”税收；有时也明里暗里打击国民党党部，甚至暗杀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因之，韩又暗向张学良拉拢合作。1932年9、10月间，韩复榘在张学良的炮兵援助下，向盘据在胶东的第十七军刘珍年部进攻，迫使蒋把刘部调往浙江。1935年后，随着华北形势的变化，韩夹在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之间，力求自保。为此，他一方面取缔反日宣传，解散抗日组织，竭力讨好日本，与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交往密切，挟日本势力不让蒋介石的“国军”进驻山东；另一方面，他也不完全听日本摆布。1935年后，日本几次诱使他参加“华北自治”时，他怕被人骂作“汉奸”，而不肯干。日本驻济领事怕他“蛮干”（一次，日领事邀他“赴宴”，他调炮队巡守在使馆外），也不敢过分胁迫他。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12月21日韩复榘发出“马”电，对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支持，并准备派兵袭击由何应钦率领攻陕的“中央军”的后路。韩的这一举动，深为蒋介石所痛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韩一方面表示对日“决绝”，限令日领事与日侨即日撤走；同时在其第三路军政训处内，容纳进步青年，作出要对日抵抗的姿态，但实际上他对抗战持观望态度，一心只想保存个人实力。8月，蒋把韩的第三路军和东北军于学忠部编为第三集团军，任韩为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要韩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但韩认定蒋介石借抗日为名，意在消灭异己部队，故只派少数部队过黄河与日军周旋，遂即撤退。1937年12月22日，韩复榘放弃济南。接着放弃泰安和济宁，径自退到鲁西南的钜野、曹县

一带。

1937年冬，蒋介石退出南京，到达武汉，准备入川。韩复榘与刘湘密谋，企图由刘湘封闭入川道路，不让蒋介石入川；韩则准备向南阳、襄樊、汉中一带撤退，并派人联络宋哲元，要宋部撤守潼关以西，然后由刘、韩、宋联合倒蒋。蒋介石接到了这一策划的密报，遂决心杀韩。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借口在开封召集北方将领会议，邀韩到会，将他逮捕，押解至汉口。24日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将韩处决。

主要参考资料：

《申报》1929年5月25日、26日。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10月版。

高兴亚：《国民军革命史》1930年初稿。

高步瀛：《韩静原先生墓表》《霸县新志》，文竹斋1934年版，第7卷。

《山东省志资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期，第3期。

石友三

沈庆生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省长春县人，生于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家贫，父名玉琨，当长工、赶大车。石友三年少时，经人介绍到长春一家粮店当徒弟，后进当地小学读书。其时，商震在该校当教员。1908年，石因家庭生活困难，弃学从军，投到驻在长春的陆军第三镇吴佩孚营当兵。1912年春，在北京改投左路备补军冯玉祥营当马夫。1914年冯玉祥入陕，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见石机灵敏快，颇为赏识，提为贴身护兵。此后石升迁很快，1919年升任模范连连长，不久升营长，与韩复榘同为下级军官中“十三太保”之一。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石由团长升任国民军一军第八混成旅旅长。1925年春，又升任第六师师长。1926年5月，当国民军与直奉联军在南口大战时，阎锡山出兵晋北，抄袭国民军后路，石友三、韩复榘等奉令率部往晋北。石在雁门，左云一带同晋军作战，很卖力气。8月，国民军在南口失败，向绥远等地撤退，时雁北国民军受前后夹击，军心离散，石、韩等乃与晋军将领商震联系，接受晋军收编。

同年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到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后，召石归来，石深怀疑虑，经冯派人解释，石才率部回到冯处，被冯任命为援陕第五路军总指挥。1927年5月，冯玉祥由潼关出师攻豫援鄂，

任石为北路援军副总指挥。6月，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整编，石任第一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进占郑州。1928年4月，蒋、桂、冯、阎四派新军阀联合“北伐”，石率部在山东鱼台大败孙传芳部，受到蒋介石的“嘉奖”。石密派其秘书长刘郁周到徐州谒蒋，蒋赠以巨款。1928年“北伐”结束后，经过“编遣会议”，石部缩编为第二十四师，石任师长，驻防河南南阳地区。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时，冯玉祥令石友三部进驻襄樊，暂持观望态度。4月，桂系失败，冯电促石友三率部急向武汉挺进。蒋介石立即电石停止进兵，并派人携款赴襄樊，借劳军之名，再次对石进行收买。蒋邀石到武汉见面，石怕冯见疑，不敢亲往，派其亲信副官李志明密赴汉口见蒋。

1929年5月，冯玉祥策划反蒋。5月22日，韩复榘在洛阳发出“养”电，表示“维持和平，拥护中央”，把石友三的名也列在通电上。石与韩的叛冯投蒋，是早有默契的，因为他们对冯都怀疑惧，又都受蒋收买。蒋介石见韩、石通电喜出望外，立委石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石即率部到郑州与韩会合，共同投蒋。7月，蒋介石委石友三为河南省政府委员。10月安徽主席出缺，蒋改委石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0月下旬，石率部进入安徽境内，尚未就职，蒋介石又以广东地盘相许，命石南下，去和广州方面的李宗仁、陈济棠作战。这时，驻河南的唐生智和广州方面先后派人向石游说反蒋。他们都向石说，蒋可能趁他南下途中，把他的部队分割消灭。石很相信这个分析。1929年12月初，他率部到浦口后，突然与蒋决裂，以大炮轰击南京；蒋事先毫无准备，于是南京城内，乱成一团。

石于炮轰南京后，自知终无法敌蒋，赶紧率部从浦口北撤，退入河南商丘，时韩驻兵河南，得韩复榘的帮助，暂驻豫北新乡一带。

1930年春，冯玉祥、阎锡山酝酿反蒋逐渐成熟。冯事先派人与石疏通前嫌，阎又许以山东省地盘，要石采取一致行动。石既已得罪了蒋，乃又与冯、阎携手。并与韩密约，暂时各投一方，以便于胜负决定之后，互相提携。4月2日，石在新乡就任阎、冯加委的第四方面军总司令，接着宣布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职，派秦建斌暂时代理。5月至8月，石随冯、阎在中原地区与蒋方大战。8月中旬，晋军溃退，济南失守。石探知张学良即将派兵入关帮助蒋介石，时局将急转直下。即放弃阵地从前线撤兵，并电张学良，“服从东北，愿效前驱”。9月18日，张学良“拥蒋”通电发出后，石立即通电响应。当石擅自撤兵时，陇海线上，蒋、冯双方尚处于胶着状态，石的行动，给冯军以重大打击。10月，大战结束，石退据河北与河南之间，收集了一部分溃散的晋军和大批物资，实力反而加大。经张学良、韩复榘从中斡旋，蒋介石复任石友三为十三路总指挥，受张学良节制，驻顺德（今邢台）。

1931年5月，汪精卫、李宗仁等与西山会议派的政客集中广州，促成粤、桂合作，在广州另组成“国民政府”，再与蒋介石集团相对抗。粤桂方面派李汉魂到顺德与石友三联络，许以广州国民政府委员、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联合反蒋。此前，石曾到沈阳谒张，张以优礼相待，但石好猜疑，反疑张将不利于自己。他还认为东北军将骄兵惰，不值一击。待返回顺德，得到广州方面许给的条件后，他经过一番布置，于7月18

日在顺德就任广州政府所委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决定先行北指，把东北军逐回关外，然后挥兵南下。但东北军在于学忠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把石部诱至保定附近，然后反击；同时南京方面，也派刘峙率军北来。在东北军和蒋军南北夹攻下，不到半个月，石部六万余人，全军覆灭。8月初，石逃往德州。后寄居济南韩复榘的山东省政府内。

1932年秋，石在日本特务的保护下潜往天津，与日本驻华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并勾结土匪、汉奸，组织伪军，在冀东一带活动。1933年8月，被国民党华北当局改编为河北战区保安队，驻扎冀东玉田一带。1936年1月，“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委石为冀北保安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哲元将石部扩编为一八一师，石任师长，隶属宋之第一集团军，随宋军逐步南撤，辗转于冀、鲁边境。他收集了些散兵和各地自发的游击队，于1938年2月，扩编为六十九军，得任军长。5月，徐州撤守后，石部进入沂蒙山区，又扩编为第十军团，石任军团长。

石生平反复无常，又嗜杀人，动辄把人活埋，因得“倒戈将军”绰号，又称“石阎王”。抗战初期，为了发展势力，他还一度表示进步，并得到进步力量的帮助。但到1938年武汉失守后，由于蒋介石加紧了反共投降活动，他于12月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冀察战区副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遂专门进攻八路军。1939年初，石率部由山东入河北，驻枣强、南宫、宁津、盐山一带。不久石部扩编为三十九集团军，石任总司令。此后，石友三伙同张荫梧、朱怀冰等不断向八路军冀南部队寻衅，逮捕、活埋八路军政治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偷袭八路军部

队。石又经常密派其弟石友信等前往北平、天津、开封等地与日寇进行勾结。为了制止石友三的投降活动并打击其反共气焰，1940年2月间，八路军冀南部队在山东馆陶下坡寺将石部包围，予以沉重打击。石率残部逃至濮阳。3月下旬，又移驻山东曹县。6月初，石派石友信和参议黄广源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了所谓“防共协定”。7月初，石部遵照日军命令，回驻濮县、濮阳一带，与日军实行“联防”，专门对付八路军。不久，石又派代表向济南日军接洽投降条件。日军准备给石以河北省省长兼治安军总司令名义，要石公开投降，宣布与华北伪政权合流。石的投降活动，为所部多数将领所不满。蒋、石矛盾本已很深，蒋介石早有除石之心；石部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与石也有矛盾，同时，石的总参议毕广垣又为蒋介石所收买，石已处于众叛亲离之境。1940年12月1日，高树勋、毕广垣与蒋介石派来的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共同商定，乘石前来濮县柳下屯高军军部时，将石扣押，当夜将石活埋，第二天又将石友信杀死。

主要参考资料：

李泰荃：《国民军史稿》1930年版。

高兴亚：《国民军革命史》1930年初稿。

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45年版。

邵鸿基：《冀鲁豫边区挺进军抗战史》1945年版。

黄广源：《反复无常的石友三》。

高树勋：《石友三酝酿投敌和被捕杀的经过》。

秦 德 纯

沈庆生

秦德纯字绍文，山东沂水县人，生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早年入济南陆军小学。后入保定军校第二期，1914年5月毕业，到驻在济南的陆军第五师见习，不久在该师补充二旅任上尉团附。1918年经人介绍到皖系参战军第一师任上尉参谋。1920年皖系垮台，秦由北洋政府的陆军部派遣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六期。1923年毕业后，经人介绍到豫东镇守使王文蔚处任上校参谋长，王属直系。1924年10月，直系首领吴佩孚于第二次直奉战中失败后，辗转退据河南，调王文蔚为二十四师师长，秦德纯任该师参谋长兼骑兵团团长。12月，国民军二军岳维峻部攻入河南，吴佩孚逃走，王的二十四师被岳收编，改为国民军二军第五师，王文蔚任师长，秦德纯任参谋长，仍驻防豫东一带。

1925年11月中旬，岳维峻派兵两路攻山东奉系张宗昌，一路由其将领李纪才部由归德向鲁西进攻，一路由其收编的王文蔚、田维勤、陈文钊等旧直系部队由徐州进攻鲁南。秦德纯随王文蔚进军至泰安。

先是，10月间浙江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吴佩孚乘机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11月，当岳军进至泰安时，吴派其豫东讨贼军第一路司令靳云鹗到豫东，以协助岳指挥直系旧部会攻山东为名；俟靳到徐州，经其联络，王文蔚、田

维勤、陈文钊相率脱离国民二军，仍回直系；王文蔚部又恢复了二十四师番号，秦任该师四十七旅旅长。时直奉联合对付国民军之势已成，靳反而与张宗昌联合，率王、田、陈三部于1926年1月突然转攻李纪才部并回军河南，驱逐岳维峻。秦德纯随王文蔚等于1926年3月进占郑州。4月，吴佩孚令二十四师北上，与奉军会攻南口国民军；秦旅驻防琉璃河。5月，吴至保定督师，升秦为二十四师师长。

10月，广东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吴令二十四师回防郑州。11月，秦调任二十七师师长。1927年1月，奉系头目张作霖趁吴佩孚新败之后，派张学良率大军南下，声称愿帮助吴收复武汉，要求进军河南。但秦认定奉军要求是“假虞灭虢”，真正目的在一举而占有河南，吞并直军，所以他力劝靳云鹗坚决拒奉。靳转与吴佩孚商议，吴同意拒奉，并将直军全部交靳指挥。3月，靳在信阳就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准备与奉军作战。靳将直军各部拼凑为十几个军，任秦德纯为第四军军长。这时，张学良派人秘密与秦联系，劝秦投奉，在几经磋商后，秦表示：一旦奉军渡河南下，愿率部撤离郑州，撤往京汉路以西，不与奉军作战，俟奉军全部占据河南后，再“有以报命”。张学良对秦的这一表示，认为“这人不简单”，意在“坐观成败，看风驶船”。3月底，奉军打败靳军，占领郑州后南下，时秦部在漯河，他果然对奉军只略事抵抗，即撤至遂平、西平一带。

同年6月，冯玉祥率领其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打败奉军，占据河南，时秦部无所归属，乃托人与冯玉祥联系，由冯收编为二十三军，秦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二十三军军长。不久，和冯治安对调，任十四军

军长，旋调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1928年6月，冯系将领石敬亭、孙良诚先后掌握了山东省政府，秦任省政府委员。

1929年春，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激化。到10月，宋哲元奉冯玉祥令率西北军出潼关反蒋，秦德纯任国民军副总参谋长，随宋哲元对蒋军作战，11月失败，退回陕西。次年4月，冯、阎联合反蒋，冯玉祥在潼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组织第二方面军，以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秦德纯任参谋长。10月，冯、阎失败，退入山西的西北军张自忠、赵登禹等残部归张学良改编为二十九军。时孙良诚与宋哲元争着统带二十九军，后宋哲元赖肖振瀛、秦德纯活动之力，张学良同意委任宋为军长，同时秦被任命为二十九军总参议，肖任军法处长。从此秦、肖两人为宋出谋画策，成为宋的“智囊”。“九·一八”事变后，当张学良处境困难时，秦示意宋向张学良表示拥戴到底，因此1932年秋，张以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秦任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3年春，张学良终于被迫下野，蒋介石将北平绥靖主任公署改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由亲日派何应钦、黄郛主持，秦德纯兼任军分会委员。1935年6月初，发生所谓“张北事件”，日寇乘机要挟，国民政府指派秦德纯同日军代表土肥原谈判，于6月25日订立了屈辱投降的所谓“秦土协定”。“协定”订立后，秦恐受到舆论责骂，向外界透露说“这是何应钦同意的，应该叫‘何、土协定’。”在这一事件发生期间，何应钦恐事态扩大，密报蒋介石，将宋哲元察省主席职务解除，而以秦德纯代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并准备将二十九军南调。宋被免职后，甚不满，秦遂未就察

主席职。

同年7月何应钦于订立了“何梅协定”后，借口回南京“述职”一去不返。政客肖振瀛利用平津空虚的形势，乘机活动，为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谋取冀察地盘。时日本土肥原等正暗中策动“华北自治”，肖振瀛向日方说明，宋哲元愿率二十九军与日本“亲善合作”。他借日军驻华北势力要挟南京政府，公开提出“拥宋驱黄(郭)”，二十九军不能调走。秦对肖的这一活动，出谋划策，积极支持，肖在前台，秦居幕后，通力合作。南京政府为安抚宋哲元，先后任宋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公署主任。11月，土肥原及日本华北驻屯军促使宋哲元进一步成立“华北防共自治政府”，图谋中国愈急。秦为宋策划，主张取得华北政权，须“名正言顺”，“避免带上汉奸头衔”，最好办法是逼使何应钦荐宋以自代。因为当时北平军分会虽已形同虚设，但何尚担任委员长名义。秦以军分会委员名义电何应钦，故意促其“北来主持大计”。蒋介石被迫派何应钦等于月底北上处理华北问题。何在秦、肖鼓动及日军威胁下，报请蒋介石核准，于12月初宣布成立了半傀儡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秦德纯为常务委员兼北平市长，肖振瀛为常务委员兼天津市长。当时北平学生为反对冀察政权特殊化和蒋介石的投降政策，掀起了有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爱国运动，秦德纯对示威群众采取了驱散、逮捕等镇压措施。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在对日本勾搭事项上，多由肖振瀛出面，对南京政府的联系上，多由秦德纯负责，秦与肖互为表里。西安事变后，1937年春，宋哲元派秦密赴南京，摸蒋介石

石今后对日政策的底。秦向蒋表示，愿照蒋的意旨，“应付华北危局”，蒋当面嘉奖了秦，并嘱秦与宋“忍辱负重”，秦因知蒋介石对日政策未变。因此于返平后，直到“七七”事变前，对日军的陆续向华北增兵，无所戒备，幻想冀察局面仍可苟安一时。等到芦沟桥炮声响起，秦看到全国人民和二十九军士兵的抗日情绪高涨，虽有主战表示，但实际仍摇摆不定。到7月26日宋哲元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任秦为北平城防总指挥，秦才作防守部署。在平郊只抵抗了一天，到28日，宋哲元即委张自忠自代，偕秦德纯退往保定。宋哲元深怕蒋介石把放弃平津的罪责，加在他一人身上，派秦德纯到南京见蒋，经秦活动，蒋介石不但未予“追究”，反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宋哲元为总司令，秦为总参议。

1938年3月，第一集团军番号被蒋介石撤销，秦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点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0年，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五巡察团主任委员。不久，又改任军法执行总监部副总监。1944年，任兵役部政务次长。当时，国统区走私之风盛行，秦派他的兵役部上校部附张任之往来香港等地，秘密贩卖药品及日用百货，并与肖振瀛合伙大搞走私活动，牟取暴利。1945年调任军令部次长。1946年改任国防部次长。

解放战争开始后，全国青年学生不断掀起反蒋浪潮。1948年，北平爆发了反迫害、反饥饿的“七·五”运动，蒋介石派秦于8月上旬往北平以“调查”为名，策动对进步青年的镇压。从8月22日起，北平、天津两地军警逮捕了大批学生入狱。

是年12月，济南已解放，蒋介石令秦出任山东省政府主

席兼青岛市长。1949年2月，秦先在上海圆明园路设立山东省政府临时办公处，3月中旬，到青岛就职。到任仅八天，南京解放，秦飞逃广州，复任国防部次长。8月，逃往台湾。1963年9月病死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1930年10月版。

高兴亚:《国民军革命史》1930年初稿。

《正风半月刊》1936年第3卷,第8期。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

宋哲元口述,兆庚记录:《西北军志略》,《近代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第4期。

秦寄云等:《秦德纯的一生》。

张 睿

朱信泉

张睿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1853年（清咸丰三年）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张五岁入塾，十六岁中秀才。1874年外出谋生，初给江宁发审局委员孙云锦当书记；1876年去浦口，在庆军统领吴长庆幕中办理公文，1880年随军移驻山东登州。1881年袁世凯投庆军，张睿与袁相识，并为袁修改过文章。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睿随庆军开赴朝鲜，因办事干练，受到朝鲜国王和吴长庆的赞誉。张睿曾代吴长庆草拟了关于时局问题的条陈，受到当时任军机大臣工部尚书翁同龢的赞许，但被北洋大臣李鸿章斥为“多事”。1884年5月吴长庆归国，不久病故，张睿离开庆军。

1885年张睿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在此后的十年中，他除四次赴京参加会试，一度应孙云锦邀请参加开封府幕外，主要掌教于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和崇明瀛州书院。中法战争后，张睿鉴于“国势日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影响下，有了“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的思想。^①

1894年4月，张睿再次赴京参加会试，考取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边疆紧急，张曾上疏痛劾李鸿章奉行妥协政策，“战不备，败和局”。^②张睿目睹国事日非，京官疆吏不足为谋，虽科

举成名,却不愿以此求官,而另走兴办实业和教育的新路,“以为士生今日,固宜如此”。^③

1895年初,张謇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在通州海门地区主办了几个月的团练。同年4月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有允许日本人在内地设厂的条文。为了在外资输入前抢先一步,张之洞要求张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创办纱厂。不久张之洞调职,张謇又得到继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

他把筹建中的纱厂,取名“大生”。自1896年9月在通州唐家闸规划厂基,到1899年5月纱厂建成,其中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是筹集资金不易。有钱人对于把大宗款项交给一个书生去办厂,心怀疑虑。加之上海棉纱市场萧条,为纱厂集股尤难。其次,通州和上海的董事之间,在是否领用官款买来的机器和承担投资份额上意见相左,结果上海的董事退出。再次是工厂短缺周转资金,刚投产就面临关厂的威胁。想把工厂出租,又遭到商人的压价。但这些困难,经过张謇等人的努力都一一克服了。

大生纱厂1899年5月建成时,有原始资本四十四万五千一百两,纱锭二万零四百枚。投产后,在较短期限内,就经受住了洋货和洋商的竞争,年年盈余。这是因为通州地区具有产棉旺、销纱多,运费省、工资廉等有利条件。张謇正是凭借这些条件,用压价收花,抬价销纱的办法剥削农民;用压低工资的办法剥削来自四乡的工人,尤其是女工和童工。所以大生的利润常比他厂为高。为了增加利润,张謇等人对改进经营管理也很注意。

1904年,张謇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和续招新股,增加资

本六十三万两，增加纱锭二万零四百枚。1907年，在崇明久隆镇(今启东县)办了大生二厂，资本一百万两，纱锭二万六千枚。从1899年到1913年大生共获净利约五百四十万两；发展成为拥有资本二百万两和纱锭六万七千枚的大厂；是“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④

为了使大生能自成系统，张謇还陆续办了其他企业。为增加棉花来源，1900年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为解决棉子出路，1902年办了广生油厂；为了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1904年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为了维修和制造机器设备，1906年办了资生铁冶厂……等等。

张謇为实现以实业所得兴办教育和用教育来改进实业的主张，他用大生纱厂的小部分盈余以及劝募所得，在本地举办一些教育文化事业。1902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所师范——通州师范，后来又办了女师、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他还创办了十多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和医校较为有名，后来三校扩充为专科，1920年又合并为南通大学。在外地，由张謇倡议或资助而设立的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学院，龙门师范，扬州两淮两等小学、中学及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此外又在通州创办了图书馆、博物院、气象台、盲哑学校、伶工学社、剧场、公园和医院等。张謇由于举办实业和教育，在社会上曾博得一些“声誉”，并受到清政府的重视，1904年清政府赏他三品衔为商部头等顾问官，1911年学部奏任他为中央教育会会长。

在政治上，张謇是从封建绅商转化过来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

十九世纪末，当康有为搞维新变法时，张謇正埋头建厂，1895年虽列名强学会，但对康的变法活动不尽以为然，认为“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③

对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张謇完全持敌视态度，害怕动乱扩大到南方，说“揭竿之徒，在所可虑”，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参加“东南互保”。^④

在二十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中，张謇居于重要地位。立宪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抵制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浪潮，并借以限制封建顽固势力，制造一个比较适合他们所需要的政权的一次政治运动。1901年，张謇响应清廷“更新”诏令，著《变法平议》。1904年5月，替张之洞、魏光燾起草《拟请立宪奏稿》。同年7月刻印《日本宪法》，分送达官贵人以至北京内廷，向清统治者游说，乞求变法立宪。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欺骗性质的预备立宪后，张謇兴高采烈地和江苏、浙江、福建的立宪派汤寿潜、郑孝胥等人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任副会长，进行所谓开通绅民政治知识的宣传。1909年9月，江苏谘议局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他率先发起各省谘议局代表去北京联合请愿，要求清政府在1911年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立宪活动达到高潮。1910年1月和6月，各省谘议局和各界的代表曾两次联合到北京上书，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同年10月的第三次请愿，虽然清政府表面答应缩短预备立宪期为五年和在国会召开前先成立责任内阁，但1911年4月清政府成立的责任内阁，却是以清皇族成员为主体，这就完全暴露了统治者借立宪为名来加强皇族专制的阴谋。张謇目睹这一情况，也不得不指责清政府“举措乖张”，使“全国

为之解体”。^⑦立宪运动的破产，促使张謇另作打算。为了窥测政情，1911年6月张謇去京，中途特意去彰德和袁世凯见面，密商如何应付政局的变化。^⑧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张謇闻讯，从汉口赶到南京，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和总督张人骏派兵“亟援鄂”并“奏请速颁决行宪法谕旨”，但张人骏“大诋立宪，不援鄂”。^⑨不到一月功夫，十四省相继宣告独立，清朝大势已去，张謇赶忙发表若干通文章函电，一变而“拥护”共和。同年11月，江苏省諮议局改为省临时议会，张謇被推为议长；12月，应江苏都督程德全邀请，担任江苏两淮盐政总理。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邀张担任实业部总长，但他却疏远孙中山而倾心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认为“非溷上不能统一全国”，不久借口反对汉冶萍公司与日本人合办而去职。^⑩还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会于上海的南北双方代表已开始举行和议，其后持续进行。和议期间，张謇为袁世凯谋划奔走，通风报讯，帮助袁窃取革命果实。当他获得南方将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选袁为总统的消息后，立即密电给袁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⑪

1913年9月，张謇当上北洋政府以熊希龄为首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他想通过这个政权来改良政治，发展资本主义。他就职时发表了《实业政见宣言》，任内制订了二十多种农林、工商和矿业方面的法令。但面临的是“财政竭蹶，无可措手”，所能做的只是“日在官署画诺纸尾”罢了。到1915年8月，袁世凯公然要恢复帝制，张謇才辞职南归。^⑫

张謇回到南通，继续搞他的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张謇经营的企业也获得短暂的发展。他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又继招新股和向钱庄大量借款，加速扩充企业。到大生副厂于1924年建成时，大生已发展为四个纺织厂，资本增加到九百万两；纱锭十五万五千枚，约占当时全国华资纱厂总锭数7%强；布机一千五百八十余台。在盐垦方面，先后在苏北沿海一带开办了二十个盐垦公司，计圈地四百十三万五千亩（已垦地九十八万亩），资本估计约为二千万元。根据1921年一个调查材料，张謇所经营的各企业的总资本约为三千四百万元。^⑮

可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好景不长。1920—1922年各盐垦公司连续遭灾，使主要投资者大生纱厂负债愈重。加之军阀连年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压迫转剧，因而民生凋敝，百业衰退，到1923年，连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也转为亏损。为了争取企业的生存，张謇一再呼吁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但这全是幻想。1923年年关，张謇不得不把大生一厂向银行押款还债。1925年7月，大生一、二两厂已负债一千余万元。同年，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组织银行团到南通清查帐目，正式接管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

在企业日趋破产和阶级斗争加剧的情势下，张謇晚年的思想更加趋于保守和没落。五四运动时，他反对罢课、罢工、罢市斗争，抵制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男女平等，提倡尊孔。以后他对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尤其反对和恐惧。

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死于南通。

注:

- ①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年谱”第54页。
- ② 同上书,“年谱”第37页。
- ③ 同上书,“传记”第82页。
- ④ 严小平:《中国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7页。
- ⑤ 同注④,第45页。
- ⑥ 同注④,第50页。
- ⑦ 同注④,第66页。
- ⑧ 刘厚生:《张謇传记》。
- ⑨ 同注④,第70页。
- ⑩ 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4卷,第15页。
- ⑪ 同上书,第4卷,第1页。
- ⑫ 同上书,第9卷,第19页。
- ⑬ [日本]驹井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南通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油印本,第38页。

徐 润

江绍贞

徐润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省香山(今中山)县人。1838年12月14日(清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生。其父徐宝亭，曾任清政府军官，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其伯叔都是外国洋行的买办。

徐润七岁在家中延师就读。1852年，徐十四岁时，由在英商颠地洋行当买办的叔父徐荣村把他带到上海，转赴苏州读书。由于口音隔阂，不数月辍学折回上海，由伯父徐钰亭(上海英商宝顺洋行买办)介绍到宝顺洋行学徒。入行后，拜买办曾寄圃为师，开初学习丝茶业务，后来由帮理账务到充任主账。1859年，他与曾寄圃在外面合开了绍祥字号，为洋行兜揽丝茶和棉花生意。次年在浙江温州自开润立生茶号，大得其利。以后又在江西上饶之河口、宁州(今修水)等地与人合开茶号。

1861年，曾寄圃病死，徐润继曾为宝顺洋行的副买办。同时在上海与人合开宝源、立顺兴、川汉各货号，经营丝、茶、麻、烟叶以及鸦片。1864年投资钱庄、布庄。他在广泛投资商业的同时，还先后报捐了光禄寺署正、员外郎等官职。1866年李鸿章调兵到浙江、福建镇压太平军余部时，徐润积极帮助转运饷械，受到李鸿章的赏识，经向清政府保奏加四品衔。

1868年，宝顺洋行股东拆股，徐润离开宝顺洋行，自开宝

源祥茶栈,除其原在河口、宁州开设之茶号照旧经营外,又在江西漫江、湖北羊楼洞、崇阳、湖南湘潭等处增设茶号。他先后担任了上海茶叶公所、丝业公所、洋药局和仁济医院等处的董事,并掌握了广东旅沪商人组织广肇公所的财务权。

1872年,李鸿章创办上海轮船招商总局,次年,徐润与盛宣怀同被李鸿章委派为招商局的会办。徐在招商局先后投资四十八万两,又为招商局招徕各亲友入股不下五、六十万两,^①被推为商董,成为招商局较有实权的人物。1876年,他与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人集股创办仁和水险公司,后又开办济和水火险公司,徐共投资十五万两,为我国自办保险事业之始,之后他们将这两公司转让给招商局经营。1877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急欲将一批陈旧的轮船和在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栈房、码头拍卖,徐润代表招商局以二百二十二万两收买下来。徐润自认为其值不只此数,赚了便宜。但后来刘坤一参奏此事,说他等于以新制原价承受,吃了大亏,且当时旗昌公司即将倒歇,股票下跌甚剧,而招商局此举,反使其股票猛涨,让美商获得大利。不过,这件事却受到李鸿章的庇护,称之为“利权可渐收回”,“大局转移,在此一举”。^②并称徐润是“殷实明干”的人材。1878年,湖广总督李瀚章以徐润办理漕粮海运出力为由,向清政府保奏加二品衔,两年后又经李鸿章保奏以道员本班尽先补用。

1877年,徐润伙同唐廷枢用局款投资安徽池州煤矿,为股东之一。1881年徐被委任兼办开平矿务局会办。1882年徐润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在池州矿附近招股兴办贵池煤矿,想借此吞并池州矿。但贵池煤矿由于招股未足而停办,吞并池

州矿之目的，也未达到。

1882年，徐润与其从弟徐宏甫等集股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仿效英商所办点石斋石印图书，十余年；印书多种，到1898年停办。

徐润在经办上述各业同时，还大搞房地产的经营。他在上海购地产三千余亩，建房数千间，用银二百二十余万两，年收房产租金可达十二万余两。1883年，中法战争影响上海，市场发生混乱，徐润所搞房地产投机失败，几乎破产。由于欠招商局款十六万二千余两，被盛宣怀以徐润“股私营私，亏欠局款”，向李鸿章具禀，将其革职。

徐润自被参革离局后，一段时间内（约六、七年）很失意，曾借资二十余万两经营茶叶，受到亏损。1888年受刘铭传邀赴台湾办基隆煤矿，因水土不服而折回。1890年，还清招商局欠款，经李鸿章奏请准予开复，由粤督李瀚章委他会办香山县天华银矿，亦因招股不足而停办。此后接连由北洋大臣李鸿章、王文韶委派办理开平局林西矿，热河承平银矿，建平、永平等处金矿。还在天津、塘沽一带购地造房开办广益房产公司，在锦州大凌河与人合办天一垦务公司。1898年徐被荣禄撤去永平矿的职务。1902年，他在上海与人合资收买云章衫袜厂，改名为景纶衫袜厂，聘用在奥商洋行当买办的汪少云经理。

1903年，徐润被北洋大臣袁世凯派回招商局重任会办，次年充上海商务总会协理。1906年12月，招商局总办杨士琦调京，袁世凯又委徐代理总办。这时招商局已为盛宣怀所把持，袁世凯想依靠徐润从盛宣怀手里夺回招商局的控制权，

徐润拉拢一些香港股东站在自己一边,很想替袁出力;但到职未久,又被袁世凯怀疑,1907年5月,袁解除了徐润代理总办的职务。

徐润被解职后,1908年将景纶衫袜厂外股收买为独资企业,自任经理,增添资本,扩充设备。1911年2月,徐润在上海病死。后景纶厂由其子孙经营,在民国时期一直开办,为上海几家较大的衫袜厂之一。

注:

- ① 见《徐愚斋自叙年谱》第83、86、87页。
- ② 《李鸿章致唐景星、徐雨之两观察手谕》，《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第90页。

穆藕初

朱信泉

穆藕初名湘玥，以字行。民族工业资本家。^①以相继创办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和较早在厂内采用一套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改进生产，增加利润，为上海工商界所知名。

1876年6月18日（清光绪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穆出生在上海浦东。^②父穆琢庵在本地开设花行，晚年营业衰落。1881年穆入学读书。1889年进某花行当学徒，后任职员。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外侮日亟、国难严重的情景使他感到痛苦，想学习西方的办法来求国家的富强。他和胞兄穆恕再约定，一个致力于“中学”，一个从事“西学”，谋求将来能“效力于社会国家”。^③1897年穆进夜校学英文，两年后能浏览英文报纸，又跟外国人补习历史、算术。1900年，穆考入上海江海关，任办事员。1904年他和马相伯等组织“沪学会”，练习枪操，提倡尚武精神；还参预办义学、创音乐会、演文明新剧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活动。1905年，上海各界掀起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斗争，他邀集海关邮政员工，开会声援。^④1906年，穆担任上海龙门师范监学兼英文教员。1907年，任江苏铁路公司警务长。

为了从事“西学”，1909年夏穆获得友人资助去美国学习。起初进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一年后获得江苏省留学生官费，1911年转入伊立诺斯大学（Uni-

versity of Illinois)农科,1913年毕业。同年秋,他进得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Texas 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al College)研究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1914年夏得农学硕士学位毕业回国。

穆藕初回国后,见棉纺业有利可图,就和穆恕再筹划在上海开办纱厂。1914年10月收买一家未建成的纱厂,次年6月建成投产,厂名德大,穆恕再任董事长,穆藕初任经理,资本二十万两,有纱锭10,000枚。在建厂同时,他翻译出版(美)泰勒所著《科学管理法》一书。后来把此种管理法在本厂推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德大纱厂的产品曾在1916年的北京赛会上“得列第一”,利润也大为增加。^⑤

穆藕初因为创办纱厂和改进经营管理而显露头角,上海的一些资本家竞相邀他创办新厂。1916年夏他和颜料商薛宝润等合伙创办上海厚生纱厂,1918年6月建成,资本120万两,纱锭16,000枚,由他任总经理。1919年他选择产销两便的郑州创办豫丰纱厂,资本200万两,纱锭30,000枚(后增加到56,000枚),布机234台,并线机5,600锭。穆是豫丰的主要投资人,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⑥在经营纱厂同时,还举办植棉试验场,著《植棉浅说》,致力改良棉种和推广植棉事业。1920年,穆参加发起组织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被选为理事长并多次连任。1921年又集股100万元在上海创办中华劝工银行。此外,在上海恒大纱厂和维大纺织用品公司也有投资。

穆藕初经办企业的成就,受到北洋政府的重视。1920年北洋政府农商部聘他为名誉实业顾问,1922年秋派他担任

“太平洋商务会议”的首席代表，到美国檀香山开会。

1923年，中国棉纺业因帝国主义国家加强对华经济压迫和棉贵纱贱而普遍发生困难，亏损严重。穆藕初主张厚生纱厂采取由股东增加资本的办法来解决困难，和主要董事发生分歧，同年4月辞去厚生纱厂总经理职务。此时，豫丰纱厂也遭到同样困难。豫丰为了摆脱困境，曾一度出租给上海美商慎昌洋行。1934年中国银行加入股本，占豫丰纱厂股权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由中行派人直接管理。从此，豫丰纱厂实际上已沦为官僚资本的产业。^⑦

从创办和经营企业的活动中，穆藕初深感帝国主义和军阀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他反对不平等的国际税则，赞成裁厘加税和抵制外货；反对军阀破坏生产，诛求无厌。但1927年后，他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却抱有幻想。1928年，他接受孔祥熙的邀约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次年冬，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穆任该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穆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时，他和史量才、黄炎培等组织地方维持会（不久改名为上海地方协会），“尽力募捐，供应军需”。^⑧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他任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给养组主任，筹供难民给养。1938年，他再次应孔祥熙的邀约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国民党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他曾对手工纺纱机进行改良，并配上弹花机和摇纱机组成一套，取名“七七”棉纱机，加以推广，对抗战期间国民党区增产棉纱起过一

定的作用。1941年，他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主管国民党统治区花纱布反动统制政策的实施；次年冬解职，专任农产促进会主任委员职务。

1943年9月16日，穆藕初因患肠癌在重庆病逝。

注：

- ① 见《新华日报》1943年9月21日《悼穆藕初先生》。
- ② 《藕初五十自述》卷首简史。
- ③ 同上书，第6页。
- ④ 同上书，第10页，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453页。
- ⑤ 同上书，第52页。
- ⑥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455—456页。
- ⑦ 同上书，第1辑，第456页。
- ⑧ 毕云程：《穆藕初先生传略》，《农业推广通讯》第5期，第11期。

吴 蕴 初

朱信泉

吴蕴初，名葆元，江苏嘉定人，化学工业资本家。以创办上海天厨味精厂、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气厂和天盛陶器厂等化工企业而知名。吴和当时在天津创办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范旭东齐名，有“北范南吴”之称。

吴生于 1891 年（清光绪十七年），因家境清寒十三岁才入塾读书，十五岁进上海“广方言馆”学习，为了赚钱养家，辍学任小学教员半年，后入陆军部上海兵工专门学校学习化学，1911 年毕业。在上海制造局实习一年，回兵工学校任教。

1913 年“二次革命”时，上海兵工学校停办，吴去汉冶萍公司汉阳钢铁厂任化验师。一年后任该厂制砖厂厂长。1915 年冬，应邀去天津筹办硝碱公司，未成，入天津造币厂任化验师。1916 年复去汉口，先后任汉阳兵工厂理化课课长及制药课课长。

1921 年吴在汉口与开办燮昌火柴厂的资本家宋伟臣合伙开设燮昌硝碱公司。宋出资本，吴任技术指导，生产火柴原料。同年又去上海和施耕伊合办燮昌新制胶公司，生产制造火柴用的牛皮胶。当时日本调味粉“味之素”行销我国，获利颇巨，引起吴的注意。1922 年，吴对“味之素”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研究并获得廉价成批生产的方法。1923 年上海酱园商张逸云投资五万元开办天厨味精厂，吴任经理，生产“佛手

牌”味精。天厨味精行销后，与日货“味之素”竞争激烈。1926年后，在国内抵制日货运动影响下，天厨味精销路日广，不但畅销国内，且远销南洋。天厨厂年营业额不断增加，由数十万元增至一百数十万元。1927年每日产量最高达1,600磅，年盈利达数十万元。

天厨味精厂的设立给吴蕴初带来优厚的利润。该厂创办时吴与资方议定，每生产味精一磅，付吴“技术酬劳”大洋一角。仅此一项，吴每月即可收入银元二千元。于是几年之间，便积累起现金数十万元，用它向“天厨”入股，吴就成了股东兼经理。

吴对化工的科学研究颇为重视，1928年创办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自任董事长。该所从事化学实验，以应本厂和化学工业界的需要，经费由天厨厂负担。由于他对化工研究的提倡，后被推举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会长、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及上海化学原料公会理事等。

1929年，吴用天厨厂的盈利在上海开办天原电化厂，生产盐酸、烧碱、漂白粉和其他氯化制品。在此以前，制造味精所用原料盐酸，都是日货，吴设此厂为了解决天厨味精所需原料。“天原”，即天厨原料之意。天原厂最初资本二十万元，后经多次增资，到抗战前夕已达一百零五万元，产量也大为提高，比初建时增加六倍多。

1932年，张逸云的后人因搞投机失败使天厨厂资金发生困难，因而被迫改组，吴蕴初利用这一时机增加了自己的股本，从而取得了对该厂的控制权。天厨改组后，资本额大增，并增设天厨第二、第三分厂，又附设淀粉厂和葡萄糖厂，使天

厨厂的生产规模和产品种类都有所扩大。

天厨厂在当时的抵制日货运动中更是连年获得厚利。1933年吴用十二万元购买战斗机和教练机各一架，命名“天厨号”，捐给“中国航空协会”，以讨好国民党当局。同时又用“献机爱国”大作广告，因而使天厨味精在国内外销路猛增。当年仅在南洋方面，即多赚利润三十多万元。1935年7月，吴进一步改组天厨厂为股份有限公司，再次增资，营业更形发达。

1935年吴创办天盛陶器厂。以往酸碱容器依赖进口，该厂成立后月产耐酸碱陶器20—40吨，完全可以自给了。

1936年，利用天原厂的副产物——氢气制造氨，建成天利氮气厂。不久又增添设备，生产硝酸。

吴氏扩展企业的资金，除来源于新集股份和天厨的部分盈利外，还得到政学系所控制的金城银行的大笔投资。

抗战爆发后，吴把上海天厨、天原两厂的重要机器设备迁往四川，留在上海的企业，一部分毁于战火，一部分则挂上德国商人企业的旗号以避免日本侵略军的侵占。

此外，设在香港对岸九龙的天厨味精分厂则在1938年建成，产品销售南洋。1939年该厂添设酸碱部，谋求盐酸自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厂被日军占领，但一部分重要设备已先期运往四川。

迁入四川的天厨、天原两厂，1940年在重庆先后复工，生产味精、盐酸、烧碱和漂白粉。由于资金短绌，官僚资本趁机进一步插手，到1942年金城银行已占有天原(渝)厂股本的百分之六十。1943年资源委员会也向该厂投资。其后中央、中

农两行又贷出四千万元巨款建立天原宜宾分厂，从此天原厂遂为官僚资本所把持。

吴蕴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资源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经济部计划委员会委员”、“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和“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等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蕴初把在上海的企业收回，经过修复于1947年相继开工。他满以为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会得到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机，但实际面临的却是美货泛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和恶性的通货膨胀的摧残，企业处境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吴蕴初经营的企业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才得到恢复和发展。吴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曾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同时在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和上海市工商联担任工作。1953年10月15日，因病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

落霞：《人物评述》生活书店1937年版。《吴蕴初及其化工事业》，载《新世界月刊》1944年8月15日出版。

徐盈：《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华书局1948年版。

谭熙鸿：《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一书之《十年来之化学工业》部分，中华书局1948年版。

《中国国货工厂全貌》初编，上海文明书店1947年版。

荣宗敬 荣德生

江绍贞

荣宗敬(名宗锦)、荣德生(名宗铨)兄弟,江苏无锡人。宗敬生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德生生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其父荣熙泰,原在浙江乌镇一家铁冶坊当管帐,1883年去广东,先后十余年跟随官僚朱仲甫在广东三水县等地厘金局和肇庆府衙门任总帐。

荣氏兄弟幼时入塾读书。均在十四、五岁时先后去上海,在钱庄学徒。德生于1893年去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帐务,宗敬于1894年因所在钱庄倒闭而归家。

1896年,荣熙泰携德生回无锡,与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资本三千元,荣家出一半,派荣宗敬任经理,德生管正帐。不久又设无锡分庄,德生任分庄经理。1898年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兼营茧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华北混乱,粮食减产。荣氏兄弟见面粉北运免税,能获厚利,便与离职回乡的朱仲甫共同发起在无锡开办保兴面粉厂。共集股三万九千元,荣氏兄弟从广生盈利中提取六千元入股,依靠朱仲甫在官场的活动得到专利十年。保兴于1902年建成。初时仅有法国石磨四部,日出粉三百包,并无大利。次年朱仲甫退出,荣氏兄弟又与买办张石君等合伙,将保兴改组为茂新,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在上海兼任批发经理。

1905年荣氏兄弟又与买办荣瑞馨等合股集资二十七万元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1907年建成。起初振新实权在荣瑞馨手中，后董事会推德生任经理。

荣宗敬还向买办张麟魁、荣瑞馨等合办的裕大祥号投资。该号专营投机，1908年亏损倒闭，宗敬动用广生钱庄资金赔补，致使广生停业。1909年茂新因受外国面粉竞销的影响，亏损很大，各股东失去信心，纷纷将股出售，而荣宗敬却趁机压低股价买下十四股，增加设备，决心继续经营。

辛亥革命后，荣德生于1912年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提出扩充纺织等提案，想依靠北洋政府发展实业。同年，面粉营业好转，荣氏兄弟各出资一万元，与王禹卿等集股四万元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其后两年，以福新盈利开办福新二厂和三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急需粮食，不但外粉在国内市场绝迹，而且国产面粉一度远销欧洲、南洋，荣氏粉厂得获厚利。于是荣氏以企业盈利和向日本银行借款，进一步扩充营业。通过收买兼并，荣氏在无锡建立了茂新二厂，在上海建福新四、六两厂，并在汉口新建福新五厂。振新方面，由于股东间存在矛盾，荣氏遂于1915年退出，次年在上海招股创办申新纱厂，荣宗敬自任总经理。1917年又收买恒昌源纱厂为申新二厂。

“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兴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荣氏趁此时机作继续扩展企业的准备，派人赴欧美订购机器，在无锡建公益铁工厂，并先后在上海、济南等地购置土地，准备建厂。经过几年筹划在上海建起了福新七厂、八厂，在无锡和济南分建

茂新三厂、四厂，在无锡和汉口分建申新三、四两厂。

荣氏企业经过不断扩充，截至1922年止，粉厂达到十二个，生产能力占全国民族资本粉厂的三分之一左右，被称为“面粉大王”。纱厂四个，拥有纱锭十三万余枚。自有资本一千万余元，二十年中增长了二百余倍。（但借入资本对自有资本的比例以1923年申新和福新系统为例，均在百分之一百七、八十以上。）荣家企业体系大致形成，1921年成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于上海，荣宗敬自任总经理。并在苏浙皖等省设立棉麦采购和纱粉经销机构达十九处。荣氏凭借雄厚财力，操纵纱布、粉麦市场，加强剥削农民，排挤小厂。

与此同时，荣德生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1918年和1921年先后当选江苏省议员和北洋政府国会议员。

1922年后，外国资本卷土重来，荣家企业出现亏损。他们兴建大型粉厂的计划被迫放弃。1922年初，荣宗敬即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以常年一分一厘五的高息，用申新一、二两厂全部财产作抵押的苛刻条件，借了三百五十万日金，以应付资金周转困难。为加强竞争，荣德生于1924年在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代替工头管理生产。订出一整套资本主义性质的厂规和罚则，提高了生产效能，也加重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在“五卅”运动和大规模的抵制外货高潮中，荣家企业扭转了亏损，转为盈利。荣宗敬还在日汇套购中获利，趁机兼并，增设了申新五、六两厂。在抵制外货运动中，荣宗敬发表提倡国货宣言，并在工人、学生推动下参加了罢市。但当帝国主义对上海华商各厂以停电相威胁时，他代表纱厂联合会要

求北洋政府设法使电气工人复工，并追随大买办虞洽卿等人，接受帝国主义工部局的条件，迫使电气工人复工，换取工部局电气处供给电力。同时勾结军阀政府和反动军警强迫本厂工人复工。

北伐期间，荣宗敬、荣德生对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非常恐惧。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荣宗敬要求白崇禧解除工人武装“以维治安”；^①荣德生则阻挠申新三厂工人迎接北伐军。

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荣宗敬因不愿认购蒋介石以“政府”名义摊派的库券，被蒋介石下令通缉，并查封其财产。荣宗敬被迫屈服，以后逐渐向国民党政府靠拢。他先后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的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与官僚资本加强联系，在资金、原料、市场等方面取得一些帮助，又得到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支持，以做押款的办法，先后收买东方、三新等纱厂，建立了申新七、八、九各厂。1931年，申新发展到九个厂，拥有纱锭四十六万枚。

此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袭击和国民党政府的苛税，加上在投机事业上的亏蚀，总公司负债已达四千余万元（其中向中国、上海两行的借款占借款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荣家企业面临危机。荣宗敬依靠美麦加工虽然获得一些利益，但远不能抵补亏损。（他求助于英美帝国主义，建议向英国赊购纱锭，还想借用美麦美棉以及分沾国民党政府的棉麦大借款，结果一一落空。）为转嫁损失，荣德生于1932年起在申新三厂大力推行“劳工自治”，用强制工人在厂内住宿来提高劳动出勤率，和在厂内设同仁储蓄部办理“储蓄”等办法加

重对工人的盘剥。

到1934年6月，申新资产总值六千八百万元，而负债已逾六千三百万元，以致荣家各厂大部分被抵押。在银行停止放款，债主宣告收取旧欠下，申新搁浅。荣德生去南京，向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请求发行公司债，得不到切实回答。荣宗敬又向实业部请求救济，实业部长陈公博乘机提出“整理”方案，企图用三百万元将申新攫为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荣宗敬致函蒋介石、孔祥熙，指责实业部的整理方案“实有企图宰割之嫌”，^②荣德生在无锡联合申新三厂股东和同业通电反对“整理”申新。这些活动得到吴稚晖出面支持，最后由于官僚资产阶级内部派系矛盾，才使申新幸免被吞掉。

1935年，申新七厂借英商汇丰银行的押款到期，无力偿付本息，荣宗敬再向国民党政府呼吁援助，仍无效。乃向汇丰请求转期，汇丰不但不予考虑，竟不顾中国法律，悍然将价值五百万元以上之申新七厂财产以二百二十五万之低价拍卖给日商。消息传出，上海各界愤英商违法，对申新强烈声援，申新七厂职工更群起护厂，坚决反对。汇丰慑于人民压力，才签订了押款转期合同，使申新七厂得以保存。

1936年上半年，宋子文当上了中国银行董事长，企图利用债权将申新吞为己有。但迫于社会舆论，加之与上海银行有债权矛盾，宋的目的未能达到。

经过几次波折，荣家企业虽然保存下来，但在资金上不得不依靠中国、上海等银行垫款营运，许多厂的经营管理权亦为中国、上海等银行组成的银团所掌握。在抗战爆发前，荣家各厂奄奄一息，仅勉强维持生产。

抗日战争爆发后,荣宗敬留驻上海,荣德生则去汉口。荣宗敬在上海曾一度参加敌寇策动下的“地方协会”,因受人警告,避居香港,1938年2月10日在香港病死。

荣德生于荣宗敬死后返回上海,他的子侄们要推他做申新总经理,他为避开日本人的胁迫未出任。企业分别由子侄们管理,福新系统则被王禹卿控制。这时荣家许多厂虽遭受日寇破坏,但位处租界的各厂仍继续生产,并趁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机会,获得暴利,一、二年内即将债务偿清。

太平洋战事爆发前,日寇曾想与荣德生“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荣德生没有同意。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于1946年在无锡投建天元实业公司,建成天元麻、毛、棉纺织等厂,同时在上海作进出口交易。1947年,荣德生由他儿子荣毅仁出面,与上海几个大粉厂合组小麦联购处,得到国民党政府粮食部的支持,他得以垄断了安徽、江苏部分的麦源。又借国民党政府“劫收”的机会,低价买进了敌伪遗留下来的原麦物资。这样就使他能将战争中遭受破坏的茂新等面粉厂修复开工,并将王禹卿控制的福新系统重归荣家掌握。

1948年,荣德生曾将他儿子们所控制的企业组成总管理处,由荣德生担任总经理,由于他儿子们各自闹独立,未能真正统一。

荣德生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本来抱有很大幻想。他想通过国民党政府向日本索取荣家企业在战争中的损失赔偿,同时还想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帮助来发展企业。这些幻想,后来都破灭了。1946年,荣德生遭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

军统特务的绑架。1948年他的侄子荣鸿元又被蒋经国逮捕。两次敲诈勒索达美金百万元以上。这些事实，使荣德生对国民党政政府感到绝望。在解放前夕，他表示不愿再跟国民党政政府走。当他的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要拆迁申新三厂机器去台湾时，他赶到厂里和工人一起制止了这一行动。

解放后，荣德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务。1952年7月在无锡病逝。

注：

- ① 《上海总商会会议记录》，《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4页。
- ② 《荣宗敬致财政部长孔祥熙函》，《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28页。

主要参考资料：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
- 《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卅周年纪念册》1929年。
- 黄逸峰：《旧中国荣家资本的发展》，《学术月刊》1964年第2期。

郭 乐

江绍贞

郭乐,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出生在一个自耕农的家庭,少年时协助父亲务农。

1892年郭乐十八岁时,因家乡遭受水灾,出国到澳洲的悉尼(旧译雪梨)谋生。在那里,他先后作过佣工、小贩和店员。1897年他与旅居该埠的几个同乡共同筹集资金一千四百澳镑,盘进了一家侨商果栏(店),改名“永安果栏”,郭乐任司理,是为郭氏兴办企业之始。

郭乐为谋取厚利,经常前往盛产香蕉的斐吉,廉价收购产品。同时他联合另外两家侨商果栏“永生”与“泰生”号,与贩运商订立代销合同,垄断货源。1905年前后,三家在斐吉组织了以永安为主体的“生安泰”公司,在当地自辟蕉园,雇佣廉价的侨工与当地居民生产。最盛时,拥有蕉园十八处,雇工一千余人。此外,郭乐还以永安果栏兼营对华侨的存汇款。他对来自广东谋生的贫苦农民代领入境证,贷给旅费,抵澳后转往斐吉以充当他所属蕉园的佣工来抵偿债务。这样,郭乐便由商业资本家兼为农场主,并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

随着经营的发展,郭乐先后将他四个弟弟:郭泉、郭葵、郭浩、郭顺招来海外相助。

郭乐为寻求更大利润,将经营重心逐渐移往国内,1907年在香港创设了永安百货公司(并附设银业部),资本港币十六

万元，派郭泉任司理。1909年郭乐由澳回港，自任总监督，^①增添资本，扩大规模，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次年在中山石岐设永安公司银业部，经营储蓄、侨汇。1915年又在香港开设永安水火保险公司。此外还兼营酒店和房地产。把商业和金融业结合经营对永安资本的扩大，起了重要作用。

1915年，郭乐又开始筹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有资本港币二百五十万元。香港永安企业和悉尼永安果栏入股六十七万元，其余在华侨中招股。为求得英帝国主义保护，他向香港英当局注册。1918年9月正式开业，以营“环球百货”为主，兼营旅馆、酒楼、茶室、舞厅、游乐场、银业部等业务，到1936年盈利共达港币二千三百九十六万元，资本利润率（即纯益占资本额）平均每年达百分之五十点四，十九年的盈利近于原始资本的十倍。

“五四”运动后，中国纺织业仍有发展的空隙，郭乐兄弟于1920年底发起招股筹办上海永安纱厂。这是郭氏企业由商业推销转向工业生产的开端，得到许多侨胞的支持。原订资本额为三百万元，但招股很快达到六百万元，1922年9月正式投产，拥有纱锭三万余枚。郭乐自任董事长和总监督，郭顺任总经理。永安纱厂开工时，正面临民族棉纺业萧条时期。若干同业，在外国资本卷土重来的打击下被迫停工、出让，永纱除依靠用提高劳动强度，残酷地剥削工人外，还靠经营高利放款、套汇套息、花纱倒手等投机活动来弥补亏损。同时也由于它资金较厚，有联号支援，以及设备新、效率高等条件，加强了它的竞争能力，不仅支持了局面，而且于1925年初还用低价购进了设备较好的大中华纱厂，改名为永安二厂。

在 1925 年“五卅”反帝运动中，郭乐等民族资产阶级人物在工人、学生的推动下，参加了罢市，但在租界工部局的停电威胁下，又动摇起来，他们接受负担工部局电气处工人部分工资的条件来换取供电，同时对本厂工人在罢工期间应付的工资却加以克扣。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乐等人追随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撕毁了大革命高潮时所订增加工人工资的协议。同时与日、英纱厂资本家相勾结，参加以镇压工人运动为主要目的的“上海纱厂联合会”。

1929 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中国因实行银本位，物价反见上升，棉纺织业出现一时表面的繁荣。于是棉纺资本家们便认为“否极泰来”，纷纷要求扩张。郭乐也表示对“实业前途应抱有无限希望”。^②他雄心勃勃地打算扩充永纱老厂，增设新厂，发展成为一个有百万纱锭，包括纺织、印染和纺织机器制造的综合企业。除在 1928 年春，他收买鸿裕纱厂，改名为永安三厂外，1930 年又增建永安四厂，还在上海筹建永安银行。到 1931 年，永安纺织系统发展到拥有纺织厂四个，合股厂一个（纬通纱厂），共计纱锭二十四万余枚，布机一千五百多台，工业资本总额达三千六百多万元。其规模仅次于申新纺织公司，为当时上海第二大纺织企业。

但是，好景不常，从 1931 年下半年后，在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交互影响下，加以国民党反动政府征收“棉纱统税”的打击，民族棉纺织业出现了一蹶不振的局势，永安企业也就结束了它发展的黄金时代。直到抗战前止，只建得一个大华印染厂，其他扩充计划均告流产。1934 年，国民党政府公

布维护官僚资本的储蓄银行法，不仅使筹设中的上海永安银行无法建立，连原永安百货公司银业部也被迫改为商业部。在业务逐年下降，资金渐形枯竭的情况下，从1933年起郭乐向外商银行大量借款。1936年又向官僚资本求助，以非常苛刻的条件为代价，得到宋子文批准，由永安百货公司发行了五百万元公司债。但是这样一来，不仅使永安企业依附官僚资本，还被宋乘机攫取了股额二十余万元。

郭乐为转嫁其经济损失，采用各种办法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因此，曾引起工人多次的反抗和罢工。1931年12月，郭乐等资本家，勾结国民党反动军警镇压二厂工人的正义斗争，造成了工人死伤的流血事件。

抗日战争的前一年，郭乐鉴于形势紧张，预将永安二、四两厂向美国慎昌洋行作假抵押，并向美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企图一旦战争发生，可依靠美帝的保护。但“八一三”战起，永安一、二、四厂及印染厂均为日军占领，在租界内的三厂也遭到轰炸。郭乐曾企图假借英、美、意等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掩护、保全财产，均未达目的，大量物资遭到日寇掠夺。

日军方面曾多次向郭乐提出“合办”永安二、四两厂，郭乐以该两厂与美慎昌洋行有抵押关系加以推托。1937年冬，郭乐又与德商美最时洋行签订了一项转让一厂和大华印染厂的虚假合同，分别由慎昌和美最时出面向日军部交涉收回一、二、四各厂和印染厂的产权，但日军部不理，依旧作为战利品加以霸占。郭乐在日寇的强力面前，乃于1938年3月，将永纱各厂与美慎昌洋行合组大美企业公司，把永纱股票更换为大美股票，伪装中美合股的企业，向美国注册，由原慎昌美籍经

理吉利兰担任总裁，郭乐任副总裁。同时，并将上海永安百货公司也改向美国注册。然后由吉利兰出面以美商名义向日军部交涉收回产权。但日军部非但不予接受，而且指名要郭乐出面。郭乐派代表前往应付，竟遭日军部扣留。郭乐见不能以美国的势力抵制日寇，便避居法租界，并于四月底出走香港。

郭乐出走后，永纱资本家在日军的胁迫下，以大美的名义与日本裕丰纱厂签订了合办合约。这样就与日本帝国主义走上间接合作的道路。1939年郭乐虽一度返沪，但不久就以参加旧金山金门博览会为名，带了一批货物去美国，从此在美留居。

郭乐去美后，仍保留他国内企业中的职务，他先后在美国纽约和旧金山设立了永安分公司，为上海、香港永安公司负责采购和经销。而上海永安公司自郭乐赴美后，实际上已改由郭顺主持。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永纱各厂连同大美在内，皆作“敌产”，遭日军军管。在此情况下，郭顺将一、二、四厂及大华印染厂分别与日本企业结成合营公司，走上了与民族敌人合作的道路。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以永安二、四等厂曾与日本合作，将其查封。后经永安负责人向宋子文等人进行贿赂，得到发还，随后郭顺也去美国。上海永安公司（包括永纱、永百）又交给郭棣活与郭琳爽主管。

1946年，由于美棉压价倾销，永安各厂运用郭乐在美采购的低价美棉获得厚利。但从1947年下半年起，随着国民党政府内战政策的加紧推行，民族工业遭受管制和勒索，永安企

业不但始终未能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而且直线下降转入衰败的境地。上海解放前夕，永纱各厂生产处于全面瘫痪状态，直到解放后才获得改造新生。

郭乐于 1956 年死在美国。

注：

- ① 总监督是临驾在总经理之上，直接控制企业，掌握实权的职务。
- ② 1929 年 1 月 16 日郭乐在永安 36 次董事会议上的发言。引自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等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 1964 年出版，第 122 页。

夏 瑞 芳

熊尚厚

夏瑞芳字粹芳，商务印书馆创办人，江苏青浦县人，生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他父亲是上海董家渡的小摊贩，母亲在美籍牧师家做保姆。1882年夏随母到上海，入长老会清心堂南市小学读书，毕业后升入清心书院^①。1889年去同仁医院当护士，一年后改入英商《文汇报》馆学排字。1894年转至英商《字林西报》馆做排字工，其后，在英商《捷报》馆做工头。

1897年2月，夏瑞芳和排字工人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集资三千七百五十元，置印刷机数架（手摇四开机二部，圆盘脚踏架三部），在上海江西路创设一个小型印刷工场，取名商务印书馆，由夏主持，鲍氏兄弟做帮手。初以承印外商商业文件为主，并替英美圣经会及广学会等印刷教会书籍。1898年6月，清廷下诏变法。夏鉴于学习外文风气日盛，乃增资一千元添购机器，租赁房屋，印行《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书，销路甚好。1900年商务接盘日商修文印刷局。次年，夏等吸收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上海闸北纱厂老板印有模等参与经营，创刊《外交报》杂志（为商务出版的第一种期刊），并将商务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扩大资本至五万元，夏任总经理。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通令全国遍设学校。夏见兴办新学急需教科书，遂定商务中心业务为出版学校用

书。次年更建立印刷所，添设编译所和发行所，并聘请主持爱国学社的蔡元培任编译所长。不数月，蔡因“苏报案”离职，又改聘张元济任编译所长，编印《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发行。数月间风行全国，行销达十余万册。以后，又续出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及英语辅助读物等。由于教科书利润优厚，销数有增无减，商务营业赳赳日上。

1903年，日本商人金港堂计划在上海经营出版印刷业务，商务吸收日资，改组为中日合办，资本二十万元，中日各半。当时规定公司依中国法律注册，由中国人任董事和经理，日方仅任监察一人。次年向清政府商部注册，仍名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任总经理。同时，商务接盘北京直隶官书局，改名京华印书局。商务在闸北宝山路自建的印刷所和编译所新屋于1907年落成，规模更加扩大。其后，夏瑞芳一面聘请日人技师培训技工；一面派员去日本学习技术，并亲去日本进行考察。从1904年到1914年，除出版教科书和各种读物外，还先后创办发行《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法政杂志》及《少年杂志》等刊物。此时商务资本已陆续增至一百五十万元，职工七百五十人，全国各主要城市设分馆三十余处。此外，夏还附带兴办教育，先后创设了小学师范讲习所、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和养真幼稚园等。商务遂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家近代化印刷出版企业。夏瑞芳成了著名的出版印刷业资本家。

正当商务营业顺利发展的时候，上海大资本家席子佩和福州大商人曾少卿见印刷业有利可图，于1906年创设中国图书公司与商务竞争。夏暗中收买股票折价抛售，使图书公司

的股东不敢续交股本。后来该公司即被商务收买，改名中国和记图书公司。

1910年上海发生帝国主义流氓骗子制造的“橡皮股票风潮”^②，夏用商务的资金进行橡皮股票投机，结果失败，亏蚀很大。翌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各地分馆不能汇款接济，致使商务资金短绌，无法应付。夏一面解雇部分编辑人员和工人以转嫁损失；一面变卖宝兴里房产并向钱庄借垫以偿付欠款。馆内陆费逵、沈知方等乘机暗中联络，于1912年1月退出商务，另创中华书局与商务竞争。陆费逵等还在报上揭发商务与日商合办的关系。夏为了对付中华的竞争，不得不向董事会提出退还日股，并亲去日本交涉。结果，给日方以优厚条件，于1913年退还了日股，重向北洋军阀政府工商部注册。

1913年7月，国民党人陈其美在上海发动反袁，欲占闸北福州会馆作司令部。夏与吴子敬等害怕在闸北发生战事，遂暗中勾结英美租界工部局，派兵驻扎闸北入口处阻止陈军，陈部被迫改驻吴淞。1914年1月10日，陈其美派人将夏瑞芳暗杀。

注：

① 清心书院相当于中学。

② 1903年英国流氓麦边在上海组织蓝格志拓殖公司，用招摇撞骗手法哄抬橡皮股票价格。随后，英国冒险家嘉道理、白克尔父子等也分别创设橡树种植公司参与哄抬橡皮股票。1910年上海许多官僚、地主、资本家、买办群起争做橡皮股票投机生意。3、4月间，当橡皮股票价格暴涨达于顶峰时，帝国主义分子们使用“金蝉脱壳计”大量抛出股票，套走了几千万两银

子,制造了上海著名的“橡皮股票风潮”。

主要参考资料:

商务印书馆:《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附刊第1—8页。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

蒋维乔:《民元前后见闻录》,《人文复刊》1947年第1卷,第1期,第6—8页。

宋 则 久

熊尚厚

宋则久字寿恒,1867年(清同治六年)生,河北天津人,出身小商人家庭。十五岁进天津德泰绸布庄学徒,出师后在庆祥、聚隆、德生锦等布店做店员多年。1899年任敦庆隆绸布庄经理。1903年到1912年间,他先后与人创设天津制胰公司(宋任董事兼协理),天津北洋保险公司和天津报国公司(制造牙粉)等企业。此外宋还兼任上海华通保险公司董事,以及天津工商研究总会会长等职。

1912年6月,宋创设直隶国货维持会,以顾琅为会长,自任副会长。宋为该会起草章程,聘宣传员和调查员,编辑出版《白话报》,宣传国货的销售与改良,并计划设立国货介绍所。宋长于演说,他的提倡国货讲演颇受听众欢迎。嗣后,宋改任正会长。1917年该会会员发展到三千人。

1913年5月,宋辞去敦庆隆经理的职务,以资本二万银元,收买前清直隶省工艺总局的实习工厂和天津工业售品总所,创办了天津工业售品所,自任经理。宋规定所内店员和学徒均须加入国货维持会,并遵章使用国货。1915年2月,又创刊《售品所半月报》,进行所谓实业救国的宣传。同年,宋借救国名义,创办“救国储金会”以吸收资金。宋通过这些活动,在贩卖“爱国布”中大发其财。

1916年宋加入基督教,积极宣传宗教思想。他规定售品

所职工必须加入基督教，用宗教控制职工思想。1917年宋任中国基督教自立会执事。次年，任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干事。以后，宋又创立了基督教救国会，并著有《民德与宗教》、《宗教白话谈》等宣传宗教思想的小册子。

1915年至1918年间，宋利用群众爱国热情，宣传推销售品所商品。曾多次举办国货展览会、音乐会、游艺会及广告游行等活动以宣传国货，使售品所的营业得到很大发展。为了增辟货源，他与人合办毛巾、牙刷、肥皂等小型工场。此外，宋还举办一些社会事业：如创办小学和教养院，以博取社会的同情，从而推动国货运动的开展。1918年售品所的货品增至二千余种，职工六十余人，年营业额和盈利额大为增加。同年，宋被聘为直隶省实业厅谘议，成了当时天津提倡国货运动的著名商业资本家。

“五四”运动期间，宋为天津救国十人团总联合会副会长、天津各界联合会干事与天津国民大会委员会委员。在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他改天津工业售品所为天津国货售品所。“五四”运动后，军阀政府镇压爱国运动，取缔抵制日货斗争，并宣布救国十人团和国民大会等爱国团体为非法组织。1920年1月，宋将救国十人团等组织迁入租界。次年，他任天津各团体代表会干事，并加入了天津救国联合会。1924年任天津总商会董事。1925年任天津国民大会促成会主席。当冯玉祥到天津时，宋与冯相结识，帮助冯部国民军解决部分物资。在这期间（自“五四”后），宋的社会声望日高，天津国货售品所的营业更加发达，货品增达八千余种，职工增到一百余人。但到1926年奉系军阀李景林入天津，3月以“赤化”罪名

封闭售品所，并逮捕职员。宋遭到勒索而负债，即被迫辞去总经理职务。售品所被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他任名誉顾问。

1927年，国民党反革命政权建立后，宋投机加入了国民党。次年，他去河南见冯玉祥，由冯出资十万元设立开封国货商店，宋任总经理。1929年3月，宋由商而官充任了河南省政府委员兼工商厅厅长，河南省赈务会顾问，并任河南省政府“特派清理共产军事犯负责委员”，参与了反共活动。1931年他回到天津，任售品所监察人。次年任董事兼董事长。“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形势危急，他又一次利用群众抗日热情来开展他的国货运动，1935年到1937年在北京、济南、青岛、上海、郑州、太原、西安等地先后设售品分所或分庄，大力扩展售品所的营业。

“七七”抗战爆发后，日寇侵占天津，售品所营业萎缩。在日寇压迫下，宋放弃了推销“国货”的旗号而改营中外百货，1939年将天津工业售品所，改名为天津百货售品所股份有限公司。后不久宋即离开天津避居北京香山。

1945年抗战胜利后，售品所一度又打出“专售国货”的招牌，并于1947年又改名为中华百货售品所。但在美货大量涌入下，他也又一次放弃“专销国货”的招牌，添设国外贸易部经营进出口业务。这时他已年满八十岁，退居香山养老，1956年1月病死于北京香山。

主要参考资料：

宋则久：《宋则久论著》1933年12月天津国货售品所出版。

纪华：《国货售品所始末》。

杨家骆：《宋则久》，《民国名人图鉴草创本》1937年辞典馆初版，第10卷，第31—32页。

简照南 简玉阶

熊尚厚

简照南、简玉阶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照南名耀登，字肇章，号照南，1870年（清同治九年）生于广东南海县。简照南幼读私塾，十三岁死去了父亲。十七岁时随叔父简铭石^①去香港巨隆磁器店学生意，其后驻日本为巨隆店收理帐款。后“巨隆”歇业，简照南在日本神户自设东盛泰商号，经营海货布匹批发。简玉阶生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1893年随简照南去日本学生意。其后，简氏兄弟在香港合开“怡兴泰”，贩运土洋杂货，在简玉阶主持下，几年间获利上万。同时，简照南独自经营航运业，创设了顺泰轮船公司，租船行驶越南、缅甸间，随后，又购置“广东丸”一艘，向日本政府注册。1902年4月，简照南入日本籍，取名松本照南。不久，“广东丸”失事沉没，便放弃了航业。

1903年前后，简照南见卷烟利大，决意离日返港筹建烟厂。1905年3月，简氏兄弟与越南华侨曾星湖等在香港创设广东南洋烟草公司，资本额港币十万元。开办后受到英美烟公司的多方排挤，于1908年亏本歇业。

1909年3月，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得简铭石全力支持再度开业，更名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向香港当局注册，由简照南、简玉阶分任总副司理。简玉阶为了给公司积累资金并偿还旧债，即去马来亚一带经商，在缅甸开设怡生公司，推销

南洋香烟及洋杂商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作宣传,产品畅销华南,并远销南洋群岛,很受华侨欢迎。1911年起,公司由亏损转为盈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暂时放松,加上举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国内市场为该公司推销产品提供了有利条件;广州、上海、武汉、沈阳、哈尔滨、张家口及印尼等地烟商竞相要求代售,营业不断增长。1915年7月,该公司向北洋政府正式立案。次年冬在上海设立分厂,资本额增至一百万元,虽日夜开工仍供不应求。简氏兄弟采用增开夜班,延长工时,大量使用童工及施行严格惩罚制度等手段,加紧压榨工人,追逐利润。1916年至1919年间,每年盈利均高达一百万元以上。仅三、四年间,港沪两厂积累资本即超过六百万元。

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开办以来,英美烟公司不断以削价竞销,增出新牌,附加赠品,控制代理商号等手段与之竞争。又造谣说该公司产品系“日货”改装,以破坏商誉的卑劣手段予以打击。1914年,英美烟公司派买办邬挺生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提出倍价收买办法。1917年2月,又派邬挺生向该公司威逼利诱,提出合并条件,在上海谈判,企图通过占股百分之六十达到控制该公司的目的。简氏兄弟虽曾采取某些措施以资抵制,但态度软弱,尤以简照南为甚。在公司内部讨论关于是否合并问题时,简玉阶等主张“合政府与国人之力对抗”,“以先对外招股为对策”,^②反对合并,把希望寄托于北洋军阀政府的支持上;简照南则认为“国货不足恃,招股非良策”,^③而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合并,梦想从妥协中求得英美资本的“保护”。此项谈判,几经挫折,简照南曾想亲赴美国与英美烟总

公司直接谈判，以求达成协议。后因英美烟公司自动停止谈判，方算了事。同时，简氏兄弟还希求在“卷烟专卖”形式下与北洋政府合办，也因张勋复辟，政局变化而中止。在向英美和北洋军阀势力谋取妥协都不成功的情况下，简氏兄弟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发展的有利时机，于1918年3月，将企业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五百万元，再度向北洋政府注册。同时，改上海厂为总厂，香港厂为分厂，两厂均添置机器进行扩建。

1919年5月，英美烟公司为了搞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再度施展阴谋，他们乘五四运动中，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的机会，借口简照南曾入日本籍，指使上海流氓商人黄楚九等向北洋政府农商部控告该公司纯为“日资”。北洋政府农商部竟然据以吊销该公司执照，饬令停业。为了对付这次打击，简照南即去日本办理脱离日籍手续，并发表公开驳辩声明。在这场斗争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得到国内重要商团的赞助和国内舆论的支持。10月，简照南恢复国籍被批准，该公司得以恢复注册。

简照南、简玉阶等为了对付英美势力的压迫，于1919年8月登报招股，宣称“一家公司惧难持久，不如公诸国人”，并以“振兴国货”，“杜塞漏卮，挽回权利”^④等口号进行宣传。随即将公司扩大改组，以英商买办劳敬修、陈炳谦^⑤等为发起人，拉入北洋军阀黎元洪、王占元等为股东，10月1日成立新公司，资本额港币一千五百万元。简氏兄弟以旧公司作股七百五十万元，占股份二分之一，为新公司最大股东。简照南被举为“永远总理”，规定“有权将其职任日后交与受托人”，^⑥简玉

阶任协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扩大改组后,于上海、香港两地共设五厂,男女职工万余人。同时开办宝兴锡纸厂,并在河南许昌、安徽凤阳、山东潍县及坊子等地设立烟草收购处,新建或扩建焙叶场,直接盘剥农民,新公司从创立至1923年,每年盈利均达三、四百万元之巨。1922年7月,简照南与刘晓齐等发起创办上海东亚银行,任该行董事。

简照南由一华侨商人,成了著名的民族卷烟业资本家,并以其实业界的声望,曾任上海总商会会董和上海华侨联合会董事等职。

1923年10月28日,简照南病死于上海。

简照南死后,简玉阶接任公司总经理直至1936年。同时,并兼上海康元五彩花铁印刷制罐厂、联合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油灯公司(属孔祥熙官僚资本)等的董事。

简玉阶接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后,由于英美烟公司的压迫,国内军阀混战与各省新增纸烟特税,公司利润大为下降。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大批熟练工人进入南洋烟厂。在全国人民抵制英、日货和提倡国货的推动下,该公司销量突增,产品供不应求,连库存零烟都销售一空。趁此时机,简玉阶将南洋公司再度扩大,在汉口、浦东两地新设分厂。公司营业额又出现高峰,年盈利达二百万元以上。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统治建立后,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的排挤压迫加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发生连年亏折现象。1928至1930年间,亏损达五百七十五万元,资金周转不灵,财务支付困难。1929年1月,被迫向英商

汇丰银行借款，并停办浦东分厂以资维持。次年1月，宣布上海厂停工，总分公司一律缩小范围。面对上述萧条景况，简玉阶等一面采取“关厂重开”（先宣布关厂辞退工人，然后重新开厂，老工人照新工人待遇），大量使用童工、女工、计件工资和延长工时等手段，拚命加紧剥削工人以资维持；一面则极力追随地主买办阶级；开始是巴结汪精卫、陈公博等广东派官僚资本集团，继后又幻想依靠四大家族宋子文官僚资本的“合作”以“复兴”企业。1936年宋系官僚资本乘机侵入。次年4月，宋子文使用巧取豪夺手段，通过低价收买股票迫订合同，取得半数股权。同时，从组织上加以改组，新公司以宋子文为董事长，以宋的亲信程叔度为总经理，从而完全控制了该公司，简玉阶变成徒具空名的董事和设计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产分散于沪、港及内地，为宋系官僚资本所把持。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知简玉阶已无实权，但仍想利用他过去在实业界的地位与声望，拉他搞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勾当，他没有被利用。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简玉阶作为全国工商界代表，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公私合营后，他任副董事长。从1949至1957年，他先后任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7年10月9日，简玉阶在上海病死。

注：

- ① 简铭石为简照南的叔父，初在香港巨隆瓷器店任职，常川住日本收取帐款，后受“巨隆”委托至越南料理客户欠款。“巨隆”歇业后，曾独自在越南

开办陶玉瓷器号和棉经布号,成为越南华侨商人,死于1912年。

- ② 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12页。
- ③ 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9页。
- ④ 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33—34,99页。
- ⑤ 劳敬修,广州人,任英商泰和洋行买办三十余年,曾任通达企业公司及艺华工艺社董事长,华东民丰造纸公司、马宝山饼干公司、大同企业公司,以及长城、华业、大安等保险公司的董事。
陈炳谦,广东香山县人,生于澳门人葡籍,久任英商祥茂洋行买办,曾任广东银行沪行及香港国民银行沪行参事,上海先施公司参事,新新公司董事以及怡和纱厂、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扬子银公司等董事。1938年8月,死于澳门。
- ⑥ 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36页。

主要参考资料:

- 《简照南哀挽录》第1集,1923年11月(石印)。
-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 汪敬虞:《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4月版,第1辑,第1003—1005页。
-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11月版,第1辑,第489—501页。

严裕棠

熊尚厚

严裕棠号光藻,1880年(清光绪六年)生于上海。他的父亲严介廷是英商自来水厂小买办,叔父严介坪为英商老公茂洋行买办。严幼时学过英语,青年时经叔父介绍到英商老公茂洋行当听差。以后,他父亲改介绍他去公兴铁厂当跑街。在公兴铁厂,由于他对招揽外轮生意颇多门路,很得老板欢心。但随后,因他私下捞钱,引起老板不满,无法再干下去,遂离开了公兴铁厂。1902年,他与铁匠出身的褚小毛办了一家小型作坊,取名大隆铁工厂。初办资本七千五百两,雇用工人六、七人,学徒四人,为几家中外丝织厂和轧花厂做修理生意。次年添购机器,又为外轮修配机件,营业十分得手。1907年,严裕棠施展手段,排走了褚小毛,大隆即成了他独资开办的工厂。

1907年后,大隆以修理纺织机为主,营业十分发达。1912年有往来固定客户四十余家(其中有几家英、日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纺织业兴起,大隆又多了一批客户。1918年扩大生产规模,在大连湾路建造新厂房。1920年严裕棠派长子严庆祥任厂长,承制纺织机的全部传动装置,并试制各种小型机器,拥有大小车床一百部,工人和学徒三百余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工业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制和摧残下,多数发展停滞,有的甚至破产。大隆因有严裕棠另外经营房地产为后盾,不但能维持不坠,且能继续发展。

他早期经营房地产，是在杨树浦一带零星买下一一些小块地皮，随后找机会高价出售，并兼充房地产买卖中间人获取佣金。1918年以后，他拉拢英、日商人扩大其房地产经营，获利更巨。他还拥有大批里弄房屋、公寓和楼房，收取高额租金。房地产营利的大宗收入，大大增强了大隆厂的资金来源。

1922年大隆开始仿制棉纺织机，但因华商轻视国货，产品销路不畅。为给大隆产品寻找出路，严裕棠于1925年租办了苏纶纱厂。次年，他把大隆迁到光复西路新址，正式进行纺织机的制造。1927年，严裕棠组设光裕公司总管大隆、苏纶两厂，自任总经理，以严庆祥为副总经理。同年底，他依仗流氓头子杜月笙的支持，正式买进苏纶纱厂加以扩建。1928年大隆分设车床工段、刨床工段、装机间和设计室，以适应装备苏纶纱厂的需要。次年，大隆在大连湾路设了分厂和农具传习所，除为苏纶制造纺织机外，还制造引擎和农具。两三年间，生产各种农业机器千余台，年销近三百台。1931年，营业额曾达八十万两。

严裕棠买进苏纶纱厂后，以第四子严庆祺任厂长，由大隆供应机器设备，两年后陆续新设纱厂和织布厂各一所，纱锭二万枚，布机三百台。1930年到1931年，销纱三万余包，布十一万匹，年盈利达四十万两。苏纶的开办使严裕棠的企业成了棉铁联营。

1932年严裕棠的第六子严庆龄留德回国，出任大隆厂长，次子严庆瑞任经理，对大隆厂进行技术上和经营管理上的改革，实行了计件工资制等措施，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当时在“一·二八”事变之后，华商纱厂机件损毁甚大，给大隆产品

的销售造成了有利条件。到抗战前止，它能仿制日本、英国、瑞士等各式纺织机和各种机件，年生产成套纺机纱锭四万枚左右。

1934年严裕棠又以贱价收买了隆茂纱厂，调严庆瑞任厂长，改厂名为仁德纱厂。该厂设备经过修整和扩建后，有纱锭一万七千余枚，布机四百七十余台，资本额一百万元。

严裕棠的棉铁联营企业，到抗战前发展到了它的顶峰。1937年大隆资本总额为法币五十万元，各种工作母机五百余台，工人多达一千三百左右，所获纯利，1935年即达十五万九千余元。苏纶与仁德两纱厂也都有可观的收益。同时又从房地产和花纱投机中获取巨利。此外他还投资常州民丰纱厂，江阴通仁棉毛厂和郑州豫丰纱厂。因此严裕棠成了当时著名的资本家。

严家和一切资本家一样，都是靠剥削工人发财致富。而严家特别大量地使用学徒童工，剥削更加残酷。大隆工人中学徒童工占百分之八十。在管理上选拔少数被认为“忠诚”、“亲近”的学徒出身的工人升任工头、领班和各部主任，他们对严家唯命是从，对广大工人残酷压榨。严家工厂中镇压罢工，开除工人的事不断发生。1934年大隆一次就解雇工人四百名。

1937年抗战爆发，严裕棠不愿内迁，他将部分贵重器材存放租界，而将次要器材装运苏州存入苏纶厂的仓库，假称“内迁”。上海沦陷后，他的企业均为日寇所强占。

1938年后，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形成畸形繁荣状态。这时严裕棠将存放的器材安装起来，开办泰利制造机器有限公

司,资本定额五十万元。聘美商恒丰洋行安特生为董事长,以严庆龄为总经理兼厂长,以第五子严庆禧为经理,假美商名义进行经营,重新招了大量学徒童工。到1940年,工人由筹办时的三十人增至一千一百余人。在当时,上海租界新办纱厂骤增,泰利生产的成套棉纺机、织布机和各种机件,销路很好。

1940年夏,日寇发出所谓“归还”华商企业的通告,作为诱降手段。严裕棠赶忙派严庆祥出面,要求发还大隆等三厂。日寇以出让大隆为发还苏纶、仁德的条件,他对日屈服,接受了日方的条件。

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接管了上海租界。泰利被日军强制生产军火,原生产设备遭到严重破坏,营业开始走下坡路。在生产不利的情况下,他又另设一家德孚机器厂,假机器厂名义专门从事五金投机买卖,用以辅助泰利。此外,严庆龄还运用其资金于1943年开办利达重工业银行,转到高利拆放、地产、物资和股票等投机方面谋取暴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隆、苏纶、仁德都为国民党政府所接收,1947年,通过各方面的活动才赎回三厂。严家赎回三厂后,虽分别进行了扩建或增添设备,但在美蒋资本垄断市场的情况下,各厂的生产不振,陷于瘫痪之中。从1947年到1949年,严家父子还与人合资在苏州开办了苏州纱厂,在香港开办了怡生纱厂。但发展不快,获利有限。在此情况下,他们仍从投机事业中寻找出路。上述期间,严庆龄在上海开设泰利事务所,运用大隆、泰利等厂的资金,套购官价外汇,进口五金器材,从中赚得黄金万余两。

严裕棠从1902年开办大隆到1949年的四十七年间,由

一个弄堂作坊发展成棉铁联营，拥有三个现代化大厂和好几个中小型纱厂，并有银行和房地产，在千万工人血汗的基础上，筑起了严家资本的金字塔。

1948年冬，上海解放前夕，严裕棠、严庆龄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偷拆了他所属各厂的部分机器，携带资金追随蒋帮残余逃亡台湾，以严庆龄出面在台湾开设裕隆机器厂。1958年11月，严裕棠病死于台湾。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58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第595—596页。

徐妙祥：《用工人血汗创立的“家业”》1965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

杨 燊 三

熊尚厚

杨燊三名培英，字燊三，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四川重庆人。其父杨文光是重庆进出口商号聚兴仁的大老板。大哥杨培德与人合伙开设聚兴成商号。他读了几年私塾，就在聚兴成学生意，当助手，并被派往万县、汉口、上海等处坐庄，经营桐油、汇兑。1908年，聚兴成合伙人退股，由杨家独承经营，遂改名聚兴诚商号。两年后，杨培德病死，其父命杨燊三接办聚兴诚。杨家财富经过二十年的积累，拥有资产约为百万两左右。

杨燊三的二哥杨培贤，先后在日本和美国留学，曾多次向家中写信介绍日本三井、三菱洋行的事业，主张走垄断资本三井、三菱的发展道路。1913年杨培贤由美回国，力主将商号革新扩大。商号资本遂由二万银两增至十万银两，增设国外贸易部和航业部。随着规模的扩充，资金周转需求大增，杨氏兄弟决定筹创“聚兴诚银行”。银行为股份两合公司，资本定额定额一百万元，分有限无限各半，设“事务员会”（类似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杨培贤以事务员兼总经理，杨燊三以事务员兼协理，于1914年底呈北京政府财政、农商两部立案。次年3月，聚兴诚银行正式宣告开业。

聚行开办后，原商号改称“诚记”，由其七弟杨培善主持，杨培贤主持国外贸易部，杨燊三则为银行的实际负责人。随

着银行的成立，原商号在成都、万县等地所设分号，均改作银行分支机构。开始，银行经营虽以汇兑为重点，但与商号业务并未划清界限；既在宜昌、沙市为中、汉各纱厂办理押汇，又代四川铜元局在贵州采办铜铅，并为井盐商采购机件和运销食盐；将银行资本与商业资本结合经营，而仍以商业经营为主。

聚行成立后八、九年间，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先是哈尔滨分行因亏累而关闭，后北京分行又因用人不当而倒账。特别是，当时四川军阀连年派捐借垫，层出不穷。聚行为了对付军阀的勒索，曾以高薪雇用外国人作代表出而应付，但终无成效。1923年冬，只得用躲避的办法，将聚行总管理处迁到汉口。与此同时，杨燊三与杨培贤之间因经营上意见相左，家族内部不和，也影响到业务的开展。1924年，杨培贤病死，杨燊三接任聚行总经理兼国外贸易部经理。从此，统一事权，进行整顿。但当时军阀混战如故，摊派勒索照旧，聚行的营业仍多风波。杨燊三为给聚行打开出路，乃创设储蓄部，注重吸收小手工业者的存款和试办农贷、农仓，办理抵押放款。同时，除继续经营四川土产外，又收购各县沙金，炼成赤金到上海出售。另外还进行公债、纱布等投机活动。其间有盈有亏，而以1930年在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所作公债投机损失最大，亏折达一百余万元。

自上海投机失败，杨燊三深感力不能与江浙财阀势力竞争，便于1930年冬将总管理处迁回重庆，准备向西南发展。回到重庆后，他一面调查云贵经济状况，一面以重庆为中心，在川东、川南各县广设办事处，并新设长沙、常德两汇兑所，作伸入湘、桂及滇、黔的准备。同时，撤销了天津分行，裁并了国外

贸易部,并自行设厂提炼桐油。1932年改贸易部为代办部,增设信托业务。经过数年的整顿,到1933年前后,业务大有起色。1934年他偕亲友数人和他的儿子去欧美考察,路经伦敦时,与英商“德善公司”经理商议合组“联益金融有限公司”,投资四川工矿企业,以图扩张业务。事为中国留英学生所知,群起反对,所拟合同作废。同年聚行增设了地产部。1935年他创设华兴保险公司,派其子杨锡远主持。

杨燊三为了拉拢四川地方官僚资本势力,扩大社会基础,早有将聚行改为有限公司之意。1937年3月,聚行召开十二届股东大会,决议将两合公司改组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订资本为二百万元,吸收刘航深、何伯衡、董庆伯、杨晓波、龚农瞻等为董事,以董庆伯为总经理,任望南为协理,他自任董事长。这一改组,表面上好象聚行已非杨氏家族银行了,但杨家股票仍占多数,实权仍为杨氏掌握。

抗战爆发后,人员、游资涌入四川。在物价上涨,商业利润骤增的刺激下,西南金融市场反形活跃。聚行以本地风光,并早着眼西南,遂乘机大事扩展业务。从1938至1941年,聚行相继在昆明、贵阳设立分支行,在衡阳、柳州等地设办事处,在四川境内增设自流井分行及新都、金堂、简阳、泸县、乐山、犍为、南充等办事处,大力扩充营业区域。此时,资本增至四百万元。到1943年又增资至一千万元。是年第二季度放款达七百七十余万元,投资工矿企业达五百余万元。1941年时盈利可观,职工要求分红与杨燊三发生斗争,部分董事及其弟,也和他发生纠纷,故于1942年初,他以其侄杨晓波代董事长,自己退居幕后。1943年10月聚行召开股东大会,杨燊三

再被推为董事长,并兼总经理,权力更加集中。

在抗战期间,聚行对大后方各城市企业进行了大量投资,从而由聚行干部和杨氏兄弟任董事和监察的企业,达数十家之多。仅杨燊三就先后担任川康毛织公司、四川丝业公司、重庆人造棉公司等企业的发起人、董事,四川兴业公司常务董事、重庆国货介绍所、四川合江煤矿、重庆自来水公司和铜梁造纸厂等董事,四川水力、四川电力、四川机械及华西兴业等公司监察人。并任四川省银行理事及重庆银钱业公会和银钱业公会联合公库常务委员。

杨燊三经营聚行,总是以“便利人群,服务社会”相标榜,但实际并不只靠正常的银行业务,也象国民党统治区其它企业一样,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他通过他侄儿杨晓波与国民党官僚资本勾结,用“永聚”名义暗中从事买卖黄金、美钞活动,还从承受国民党政府公债中大发国难财。

抗战胜利后,杨燊三召开聚行“复员会议”,由于家族内部纠纷迭起,他不得不再一次以退为进,于1945年10月宣布“退休”,12月辞董事长及总经理职,由其九弟杨培荣出任董事长,李维城代理总经理,他以元老资格任高等顾问。退居幕后的杨燊三仍是聚行的重心所在。1946年1月,他提出“刷新行务”。3月,聚行被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指定为经营外汇银行之一,这在当时川帮银行中是唯一的一家。聚行地位为之提高,他也为此而沾沾自喜。于是,他指示聚行增设了国外部,同时又再次于津、穗两地增设分行,并恢复南京、长沙两支行及宜昌、沙市、常德、香港等办事处。同年秋,在上海设办事处,计划将总管理处移至上海,力图将聚行发展成全国性银

行。到1947年止，聚行发展到三十三个单位，职工一千三百余人。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亲美卖国，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致使通货膨胀，工商倒闭，正常的银行业务极难经营。在一片混乱之中，杨粲三虽仍靠投机、做暗账等手段勉力挣扎，但对前途发展，却深感渺茫。

正当杨粲三走投无路的时候，1949年上海、重庆相继解放。是年冬，他从香港到北京，会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欲保持聚行的私人经营，不想加入公私合营，自然不得要领。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帮助下，聚行于1953年实行了公私合营，杨粲三任重庆市联合银行副董事长。

1962年3月，杨粲三病死在重庆。

主要参考资料：

- 聚行月刊社：《本行艰难缔造的经过》，《聚星月刊》1947年版，第1卷，第1—6期。
- 李维城、宫廷璋：《杨氏家族与聚兴诚银行》。
- 新世界月刊社：《聚兴诚银行素描》，《新世界月刊》1944年10月号，第15—19页。

杜月笙

江绍贞

杜月笙是上海的大流氓头子之一，原名月生，后来改名镛，号月笙。1888年8月22日（清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镇一个商人家庭里。

杜幼时父母双亡，寄居舅家；从小嗜赌，将父亲遗产当卖净光；后因偷了舅父的钱，被赶出门外，流浪于高桥镇上。1903年，他到上海一家水果行当学徒，不久，也因偷窃聚赌，被老板驱逐。此后他就在上海鬼混，偶然做小贩生意，但基本上是靠盗窃诈骗为生。在这期间，他拜了一个妓院老鸨做干娘，又在妓院里结识了青帮流氓陈世昌，拜陈为老头子。自此与一些青帮流氓在黄浦江轮船码头上干敲诈勒索和劫夺的勾当。1911年加入了专为毒贩提运黑货的“八股党”，同时还被法捕房的包探雇用做包打听伙计。

当时，上海著名大流氓头目黄金荣任法捕房督察长。杜任包打听伙计后，有机会出入黄的家门。他极力向黄献媚讨好，由起初给黄拿拿衣包，到后来参加捕房探目的聚会，逐渐得到黄的赏识与信任。经黄的介绍，他与上海最大的潮州帮烟土商发生关系，把持鸦片的提运，进而武装抢劫，成为黄浦江码头一霸。一次，黄金荣触犯了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遭监禁，杜与另一个大流氓张啸林出力营救，使黄获释，黄感其“恩义”，三人结拜为把兄弟。

1925年，杜与黄、张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策划下，伙同一些潮帮土商开设“三鑫公司”运销鸦片。这项罪恶事业给法租界当局以巨大的经济收入，由此，杜被任为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杜与黄、张接受蒋介石的指使，纠合上海青红帮头子，盗用辛亥革命时期“共进会”的名义，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反革命政变。他们向蒋介石领取经费、武器，在蒋派遣的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协助下，将流氓党徒编成队伍。这帮家伙自称“投袂奋起……甘作前驱”。①4月11日夜，杜月笙以有要事相商为名，将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骗出杀害。同时，指使流氓党徒，臂缠“工”字符号，由租界冲出，向在北伐中立有极大功勋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凶残的进攻和屠杀，并由蒋介石反动军队配合，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紧接着，杜又率领党徒随同杨虎到宁波“清党”，逮捕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建立起反共、卖国的“国民政府”，杜月笙这个流氓刽子手，被蒋介石任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法租界当局也任命他为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他凭借权势，多次破坏租界地区的工人罢工斗争和居民的抗捐斗争，并肆无忌惮地从事各种罪恶活动，如在法租界开设五大赌台；为蒋介石在上海包销截获的鸦片；在宋美龄授意下伙同吴铁城等在上海南市密设吗啡制造厂等等。

杜为了充分利用自己手中聚集的大量游资、赃款，1929年伙同大买办徐懋棠等开设了中汇银行，自任董事长，从事鸦

片押款等各种肮脏业务。他想在上海纱布交易所当董事，故意唆使流氓趁该所交易时进行捣乱，然后由他装腔作势地出面喝止，以达到他的目的。

随着杜的权势增大，不少买办、官僚、党棍之类的投机分子拜倒在他的门下，向他递帖称徒。他为了运用这帮人，于1932年11月建立了一个“恒社”的组织，打着所谓“进德修业”、“服务社会”、“效忠国家”等幌子，以公开社团面目从事反动政治活动^②。他指使“恒社”理事陆京士在邮务工会中建立“毅社”、“心社”、“畅社”、“明社”（类似帮会组织）来控制工人，又建立“工人武装勇进队”配合宪、警、特逮捕工人和学生。

1933年，蒋介石为了筹募反革命内战经费，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杜与戴笠专门组织“大运公司”为经销奖券机构，将其部分盈余供戴作特务活动经费，是为杜、戴勾结的开始。

1934年11月，“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史量才被蒋帮特务暗杀后，杜趁机窃取其会长职位，同时又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俨然成了上海的“地方领袖”。1935年4月，他又当上了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一二·九”运动时，他协助上海市长吴铁城破坏学生的游行示威，阻挠学生去南京请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他立刻以上海市地方协会名义急电张学良，要求保全蒋介石的性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特务头子戴笠紧密勾结，于10月间建立“江浙行动委员会”，由他任主委，在其属下建立“淞沪别动总队司令部”，派“恒社”分子充当骨干。1938年这股武装匪徒，经戴笠改编为臭名昭著的“忠义救国军”。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杜逃居香港。12月初，他专程到武汉面见蒋介石，经蒋简派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他领命返港，成立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自兼主任。同时，还在港挂出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的牌子。他用这两个机构为掩护，帮助军统搞情报活动。另外，他与戴笠合伙设立“港记公司”，运销国民党政府在川、康、滇、黔以禁烟为名掠夺的烟土。

1939年夏，CC分子吴开先奉“二陈”之命到上海整顿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其成员已大批投敌），建立了“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吴任书记长，聘杜当主任委员。杜请其把兄黄金荣协助吴在上海活动。是年冬天，戴笠召杜到重庆，让他协助把各地流亡到大后方的青红帮、袍哥分子收罗起来，建立了一个“人民动员委员会”。该会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指挥在沦陷区的党徒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收集共产党的情报。

自1941年冬，香港陷落，杜即留居重庆。他在重庆建立起“恒社”总社，并在西南各重要城市建立了分社。1942年3月，他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自任董事长。该公司得到戴笠在交通、检查方面提供的方便，由华中各地抢购物资内运经销，大发“国难财”。同时，他又将中国通商银行迁到重庆，自兼总经理。这年秋天，他亲自窜往内江、成都、宝鸡、西安、洛阳、兰州等地设通商银行分行，各分行内都成立起“恒社”分社。从此，他有了一条自重庆经西北到洛阳的政治经济通道。到1943年，杜与戴笠合伙在重庆设立“通济公司”，又在河南商丘、界首设分公司，经由西安、洛阳这条交通道，直接与上海日寇特务机关开设的“民华公司”搞物资交换。民华主

持人就是杜的留沪代表、充当汉奸的徐采丞（其他参加者有汉奸汪曼云以及周佛海的亲信金雄白等）。这样，他不仅可以与日寇加强经济联系，并且还可以为蒋介石与日寇之间搞政治交易。

1945年6月，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在望，蒋介石指派杜月笙随同戴笠到浙江淳安，与美特梅乐斯一起策划如何让美军在沿海登陆。但是，他们的策划未定，日寇即宣布投降了。于是杜在9月初赶忙窜回上海。

杜回到上海老巢，除首先在“劫（接）收”中大捞一把外，他还想谋取上海市市长一职，因而与吴绍澍发生了矛盾。后来蒋介石指示他继续保持“在野之身”来为其反动统治效劳。于是，他在1945年10月即着手整顿和扩大上海的“恒社”组织，除将原有的“恒社”分子通通收罗起来之外，又在党政军头目中，军统、中统特务中以及工商企业、新闻文化等部门的代表人物中发展一批成员。接着又在全国二十多个大中城市中发展“恒社”组织。与此同时，他极力在金融工商企业中渗透其势力，先后当上了七十多个部门的董事长、理事长，还挂了二百多个“董事”和“理事”的头衔。1946年4月，蒋记上海市参议会进行选举。选举前夕，他发动爪牙，四处收买拉拢，威胁利诱，当选为议长。在当选之日，他又故意将议长当场让与别人，以博取更大的“声誉”（因为他在背后已实际掌握了市参议会的大权）。这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他立即抬出十八个商业同业公会和六个工业同业公会的招牌，响应蒋介石的内战叫嚣。10月，蒋介石的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派徐亮到上海，与杜一起将原“人民动员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

会事业建设协会”，让杜任常务理事。这个组织作为“军统”的外围，专事刺探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情报，搜捕共产党人。

1948年，杜在上海操纵选举，当上了伪“国大代表”。年底，眼看上海快要解放，杜受美帝唆使，企图搞上海“国际化”，他与潘公展在上海会见司徒雷登，打算在上海搞一个类似租界时代万国商团的组织。为此，他发起成立了“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成立自卫保安团，准备先以此配合美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然后实现其“国际化”的阴谋。但是，他们的阴谋还来不及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杜月笙见大势不妙，于1949年4月底逃到香港。

1950年，美帝发动侵朝战争，杜月笙大为兴奋，妄想依赖其美国主子，重新恢复他失去的天堂。但美帝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败，这时的杜月笙也已病入膏肓，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死。

注：

- ① 《申报》1927年4月8日。
- ② 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

主要参考资料：

- 《大流氓杜月笙》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编，1965年群众出版社出版。
- 《杜月笙六十年大事记》，《商报》1947年8月27日。

康有为

耿云志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康的曾祖做过福建按察使，祖父曾任连州训导，父亲康达初，为江西补用知县；他的一个从叔祖曾随左宗棠镇压太平军，官至广西布政使，一度护理广西巡抚。

康有为自幼读书，十八岁起，受学于朱九江。朱强调“经世致用”，对康很有影响。后来，康有为逐渐对传统儒学发生怀疑，认为“言道当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并说“千年来文家颀颀作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①1879年，他结识了在北京作翰林院编修的粤人张鼎华，从而得“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②这一年，他开始读了一些西书，并初游香港，“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③1882年，他到北京应顺天乡试不中，归途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④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启发下，康有为看到中国处于列强环逼之下，“兵弱财穷”，“人情偷惰”，^⑤极感“忧愤迫切”，希望学习西方，赶紧变法图强。1888年，他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时，“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⑥这是他第一次上书，但没得上达，反被视为“狂生”而遭到攻击。

上书失败后，康有为离京回乡，“专意著述”，为变法维新

建立理论基础。他受到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影响，着手从统治阶级所崇奉的儒家“经典”中，寻求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开始讲学。来学者逐渐增多，著名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等。这年，刊出了他的第一部代表作《新学伪经考》。

1893年，康有为中举人。1895年春，他偕梁启超等入京会试，正好赶上清廷与日本媾和，即将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康有为得讯，十分激愤，即同梁启超等鼓动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要求光绪帝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从此，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不久，会试发榜，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没有到任，继续活动变法。5月末，他再次上书，提出“富国、养民、教士、练兵”^⑦等改革主张。这次上书，光绪帝看到了，表示“嘉许”。一个月后，他在第四次上书中，更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建议。但此书又为守旧分子所阻止。书既不得上，他感到要变法，非先在上层制造舆论不可。8月，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后改称《中外纪闻》），命梁启超主笔，日印千余份，分送朝官。稍后，更创立强学会，组织维新派的力量。会务颇得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支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亦参与会事。10月，康有为离京去上海。11月，创上海强学会。他的弟子在次年初，办起了《强学报》。但不久，北京强学会被劾解散，上海的强学会和《强学报》也因难于支撑而自行解散。

1896年1月，康有为以母寿回广州，随即在万木草堂继

续讲学。是年，写成《孔子改制考》。这本书和《新学伪经考》同是康有为建立维新理论的重要代表作。

1897年11月，德帝国主义强占胶州湾。康有为看到外患日亟，赶忙到北京，再度上书，希望光绪帝能“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一意维新”。^⑤这时，他在京一面为胶事奔走，一面积极联络同党，结成“粤学会”、“知耻会”等团体，为变法救国造声势。受此影响，“蜀学会”、“闽学会”、“陕学会”（又称“关学会”）等相继出现于北京。这时全国各地的学会、学堂、报馆也纷纷设立，风气为之一变，维新运动渐入高潮。

1898年1月，光绪帝谕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在问对中，康当面驳斥了荣禄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随后，他奉命上《统筹全局折》，指出，中国处于当时的形势下，非变法不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⑥他要求光绪帝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大誓群臣，以定国是”，^⑦立即着手变法。4月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组织保国会，标榜“保国、保种、保教”。这时，顽固派乘机散播流言，说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弹劾康有为，但弹劾者受到光绪帝的申斥。当时的清廷官僚中分化为“帝党”与“后党”。后党即依附于西太后的一群顽固守旧的大官僚，他们得到帝俄的全力支持，其势力远较帝党为雄厚。帝党虽也有英美为背景，但得到的仅是表面的“同情”，缺乏实力。他们中一部分人支持变法，含有引进维新派，壮大帝党力量，以与后党夺权的意图，与康有为的维新观点和主张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康有为所赖以推行变法的上层势力，是极为脆弱的。更不用说，他们是完全脱离群众的了。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定国是诏”，开始变法。16日，康有为受到召见，详陈变法要领。光绪帝本想重用康有为，但碍于“后党”阻挠，仅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来，为推动变法进行，光绪帝提拔了维新派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光绪帝的意旨通过他们转给康有为，康有为的奏议也通过他们上达到光绪帝。

康有为从1888年到1898年变法前夕，先后七次上书，在“百日维新”期间，又上了三十余道奏议。在这些上书和奏议中，他提出了一条在不根本改变现行帝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他指望用自上而下的改良办法来取得有限的民主权力；他幻想通过变法，使国家在列强面前取得平等独立的地位。这无疑表现了康有为及其所代表的维新派地主资产阶级和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一定的进取精神和爱国思想。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脆弱：一方面，他们不敢反对帝国主义，不敢同卖国的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害怕和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这就注定了变法必然失败的命运。变法开始之日，也正是顽固派开始部署政变之时。在变法进行期间，顽固派多次发动反攻。后来，更策划了要借天津阅兵的机会，废黜光绪帝、镇压维新派以扼杀变法的阴谋。在斗争最紧急的时刻，康有为等去向握有兵权而又曾伪装同情维新运动的袁世凯求救，结果被袁世凯出卖。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废除新法，重行听政。28日，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康有为被迫逃亡日本，变法完全失败了。

戊戌变法前后，孙中山已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戊戌变

法失败，说明了在中国，改良主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是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

康有为初到日本，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热望和他联合起来进行反清革命。但他念念不忘他的“圣上知遇”之恩，拒绝中山建议，坚持改良立宪的主张，决心保皇。从此便走向反动了。

1899年3月，康有为离日本去加拿大。7月，他在加拿大的千岛地方组织“保皇会”，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抵制和破坏革命的活动。1900年，国内发生义和团运动，康有为与梁启超乘机鼓动唐才常、林圭等建“自立军”，搞勤王运动。唐、林在国内主持军事，康、梁在海外募款。但康有为始终未以募款接济国内军事。对此，保皇会内颇多不满，指责康有为中饱私囊。是年8月，唐才常等以事泄被杀，勤王运动失败。此后，康、梁等完全放弃了任何暴力的尝试。

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极力诅咒革命，并说什么，只要“皇上一复辟”就会“立于国民自由自主”。^①他的这种反动宣传受到革命派章炳麟等人的有力批驳。（见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是年，康有为在印度大吉岭完成了他的《大同书》。

康有为和他的门徒在海外的头几年，奔走于北美、南亚和南洋各地，积极经营保皇会，并在多处集资办报，散布他那套“满汉不分，君民共治”的保皇主张，还颇能欺骗一部分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潮流日趋高涨，康、梁改良派对革命更加恐惧与仇恨。革命派逐渐认识到，只有从思想上大力摧毁

改良派的谬论，才能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是年11月，《民报》在东京出版，集中地宣传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当时正在日本主办《新民丛报》的梁启超便对《民报》的革命论拚命施以攻击。从而使前此数年在海外各地分散进行的两党的论战，这时集中于一个主战场，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经过这场论战，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保皇党的反动面目为更多的人们所识破。

1906年9月，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下了一道所谓“预备立宪”的诏书。这是妄图平息民众的不满，以便抵制革命的骗局。对此，康有为欢欣鼓舞，跟着吹捧说“预备立宪”是开始“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秕政”，“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⑬。遂决定将他们的保皇会招牌换记，称为“宪政会”，仍然充当清廷破坏革命的工具。

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⑭连写《救亡论》和《共和政体论》两篇文章，攻击革命，反对民主共和。他胡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⑮提出他的所谓“虚君共和”的反动主张，并妄想以“旧朝旧君”，或用孔丘嫡裔充当他所梦想的“虚君”，唯恐封建帝制就此葬入坟墓。

民国成立后，康有为以清室遗臣自居，念念不忘复辟清王朝。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极力丑诋共和政体，诬之为祸乱的根源。1912年秋，他指使门徒陈焕章等在上海组织孔教会，大搞尊孔复辟活动。1913年2月，又命其弟子在上海出版《不忍》杂志，一意鼓吹复辟。是年11月，康有为从日本回国，被门徒拥戴，当上孔教会会长。他把定孔教为国教作为孔教

会活动的中心目标，妄图以此敲开复辟之门。1913年8月，他的弟子陈焕章、梁启超等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在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1916年9月，康有为亲自上书北洋政府，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⑭

康有为鼓吹孔教是直接和张勋的复辟阴谋活动相联系的。早在1913年春，他就与张勋勾通关系，密谋复辟，“因事泄，中道而废”。^⑮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不久，康有为即致信张勋说：“挟旧君即以安中国，将军其有意乎？”^⑯力劝张勋乘时搞复辟。

1917年6月，张勋乘北洋政府大闹“府院之争”的混乱时机，假“调停”为名，率五千辫子兵进北京。紧接着，康有为化装入京，与张勋一道策划。7月1日，他们拉出溥仪“登极”，宣布清朝复辟。康有为受命为弼德院副院长。

复辟丑剧可耻地失败后，康有为躲进美使馆藏身近半年之久。这期间，他写了一本《共和平议》，攻击辛亥革命、诋毁民主共和，咒骂“中国若仍行民主，……终遂灭亡”。^⑰反动立场极其顽固。

1917年12月，康有为离开美使馆。这时的康有为已丧失了任何政治活动的资本。但他却如同生活在梦幻里，野心不死。此后数年，他游散于国内各地，作为亡清的孤臣孽子，与许多反动军阀政客来往，对“猛志除孙”（即反对孙中山）的吴佩孚更是特意联络逢迎。时代越前进，康有为的思想越僵化，政治立场越反动。到了1924年初，他还在给溥仪的师傅庄士敦的信中梦呓般地讲他的一套复辟清室的反动计划。

1927年3月21日，康有为抱着他那永远无法实现的复

辟梦想病死于青岛。

注:

-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以下简注为《戊戌变法》某册某页)。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新1版,第113页。
- ② 同①,第114页。
- ③ 同①,第115页。
- ④ 同①,第116页。
- ⑤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23页。
- ⑥ 同①,第120页。
- ⑦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71页。
- ⑧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94页。
- ⑨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97页。
- ⑩ 同上,第199页。
- ⑪ 康有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第12页。
- ⑫ 康有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见《民报》第13号。
- ⑬ 康同璧:《续康南海自编年谱》(油印本)。
- ⑭ 康有为:《共和政体论》第6、13页。
- ⑮ 《时报》1916年9月20日。
- ⑯ 康有为:《与大隈侯书》,《不忍》九、十合册。
- ⑰ 引文见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第232页。
- ⑱ 康有为:《共和平议》第43页。

蔡元培

宗志文

蔡元培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生于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父亲蔡光普是钱庄经理，叔父蔡铭恩是举人。蔡元培十岁丧父，幼年在叔父指导下读书。1883年入学补诸生，后来在绍兴著名藏书家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1889、1890年连中举人、进士，1892年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

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后，蔡元培开始接触西学，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898年变法维新运动中，他同情维新派，很佩服其中激进的改良主义者谭嗣同。戊戌政变后，他认为维新派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惜见势绌”。^①同年9月他自北京回绍兴，立意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曾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后，他进一步认识到清廷的腐败，开始倾向反清革命。是年，他到上海，先任南洋公学教员，继任爱国女校校长，又兼中国教育会会长。1902年夏天，曾游历日本，结识了一些中国旅日的革命者。同年秋天，他在上海创设一所新校，名“爱国学社”，在社中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并施以军事训练。其间，蔡与社中教师轮流为《苏报》撰稿。1903年冬，他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报（后改

名《警钟》日报),反对帝俄侵略我国东三省,介绍俄国虚无党的历史,意在鼓吹革命。同时蔡又受到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于1904年元旦,发表小说《新年梦》,宣扬废财产、废婚姻的主张。

1904年冬天,蔡元培与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反清的革命组织光复会,他被推为会长。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是年,蔡元培在上海经何海樵介绍加入该会,并被指定为上海同盟会分部主盟员。以后,又加入何海樵等在上海组织的暗杀团,与杨笃生、苏凤初、钟观光等秘密赁屋,试制炸弹,想用暗杀清吏的手段进行革命。

1907年蔡元培赴德留学,在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和心理学,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深受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后,蔡元培回国。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时,任命他为教育总长。2月,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荐袁世凯继任。蔡元培等被派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因受了袁世凯纵兵哗变的欺骗,蔡等于3月13日发表文告,说明北来经过及不得不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原因。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唐绍仪任内阁总理,蔡元培仍任教育总长。7月,因不满意袁世凯擅权,与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对全国教育进行过一些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代替清朝封建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他提出停止祀孔,废除读经,把清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主

义的教育宗旨，改为资本主义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他解释说：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所谓富国强兵之主义也”。公民道德，“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②用这种资产阶级教育宗旨为指导，他主持了学制改革，课程修订，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实行小学男女同校，等等。这些不彻底的改革，反映了资产阶级一定程度的反封建的要求。

蔡元培辞教育总长职后，旅居德国。在莱比锡大学听讲，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13年夏天，因宋教仁被刺案回国，奔走调停。7月，二次革命爆发，他发表《敬告全国同胞》文，主张“爱袁氏者”，劝告袁世凯退位，和平解决南北争端。是年秋去法国，在那里从事著述，曾著有《哲学大纲》、《石头记索隐》等。并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1916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在清末十几年中，该校所招学生多为京官，校中官僚习气很重。民国以后并无多大改变，学生一心追求升官发财，整天游荡，校风非常腐败。蔡元培决心整顿革新北大，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讲就号召学生不要追求做官发财，要研究所谓高深学问。他在学生中发起成立各种学会、研究会，以及体育会、音乐会等，力图把学生的精力和兴趣引到研究学问和正当的娱乐方面去。

在他的影响下,学生创办《新潮杂志》,组织讲演团,举办校役夜班,开设民众夜校,进行军事训练等。当时各大学还没有招收女生的先例,蔡元培说教育部“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③1920年北大收女生旁听,暑假正式招收女生,这是我国大学男女同校的开始。

蔡元培治理北大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资产阶级所谓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提倡学术研究自由,主张无论何种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听其自由发展;各派教员,无分新旧,即使主张不同,也让他们并存,使学生自由选择。在“五四”前后的新旧思想斗争中,他基本上是站在卫护新文化的立场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五四运动中,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遭到封建顽固分子的激烈反对。林琴南在《公言报》上发表给蔡元培的信,攻击北大的教育“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虽然没有正面驳斥对方,但他强调“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④这对于捍卫新文化运动是起了相当作用的。

五四运动中,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许多学生被捕。蔡元培同情学生,多方营救被捕者。后来被捕学生虽被释放,而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仍然采取镇压的态度,学生则继续罢课斗争。他既反对政府镇压学生,又不赞成学生罢课。当时社会上传言政府将免去他的北大校长职,他颇为愤懑,于5月10日辞职出京。当五四运动发展成群众性更广泛的革命运动,不断前进,不断深入的时候,7月23日,蔡元培发表《告北大

学生及全国学生书》，却劝告学生停止罢课斗争，不要纠缠于政治问题，号召学生“力学报国”。9月，他返回北大。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越来越不满。1920年4月，他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用洪水喻新思潮，猛兽喻军阀，希望有人“驯伏猛兽”，“疏导洪水”。同年冬，他赴欧美考察教育，1921年回国。他说：“回国以后，看见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⑤到1923年1月，北洋政府因金佛郎案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当时罗在北大兼课，^⑥蔡元培愤而发表声明，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未等批准，即行离京。同年7月他赴欧洲，1925年到德国，在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是年，“五卅”运动发生，国内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8月，他在欧洲一些报纸上发表《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说明惨案真象。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孙中山提名，蔡元培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蔡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当时他尚在国外。1926年2月回国。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他参加北伐，在江浙一带从事组织工作。冬天，他任浙江政治分会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蔡元培站在蒋介石方面，追随国民党右派，参加清党运动，反对革命。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全体紧急会议，蔡元培任主席，会议议决，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处置各地共产党员。^⑦4月9日，蔡

元培又和吴稚暉、张静江、李石曾等联名发表所谓“护党救国”通电，与反动派相呼应。^⑧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蒋记国民政府。蔡元培到南京，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担任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所谓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院长、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1928年又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代理司法部长、监察院长以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29年他辞去所兼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刺激下，蔡元培的政治倾向又有所转变，他主张对日抗战。1932年12月，他同宋庆龄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副主席。同盟曾设法营救政治犯（包括共产党员与各地被捕的抗日分子）。

蔡元培与鲁迅的关系比较密切，鲁迅曾几度在他主持的部门中工作。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他与宋庆龄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亲为执紼送殡。1938年为《鲁迅全集》作序，尊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淞沪沦陷后，蔡元培由上海移居香港，本打算转桂林或昆明，因多病未成行。他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表示高兴，曾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的大幸。^⑨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注:

- ① 蔡元培口述, 黄世暉记: 《蔡子民先生传略》商务印书馆 1943 年版, 第 2 页。
- ② 蔡元培: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9、331 页。
- ③ 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294 页。
- ④ 蔡元培: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79 页。
- ⑤ 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295 页。
- ⑥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 “十一年冬, 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朗问题被逮, 释放后, 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 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 在公议上, 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 在私情上, 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 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 他的操守, 为我所深信, 我不免大抱不平。”
- ⑦ 居正: 《清党实录》1929 年版, 第 383 页。
- ⑧ 《东方杂志》第 24 卷, 第 11 号。
- ⑨ 《中国文化》第 2 册, 延安中国文化社 1940 年 4 月版。

邵 飘 萍

耿云志

邵飘萍名振青，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新闻记者，《京报》的创办人。由于追求进步，同情革命，敢于揭露军阀的罪恶，被张作霖杀害。

邵是浙江金华人，生于1884年11月1日（清光绪十年九月十四日）。他的父亲邵桂村是个教员。他弟兄共五人，其他四人都在家乡务农。邵飘萍幼年就特别喜欢读书，十四岁中了秀才。后来因受戊戌变法的影响，他丢弃了“子曰诗云”的一套，改而攻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1902年，他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在杭州，他开始读到多种书报杂志，眼界逐渐开阔。那时，改良派首领梁启超，在思想文化界仍有很大影响。邵飘萍对梁的新文体及其“笔端常带情感”的议论，颇为倾倒，用心加以模仿，不时为《申报》写些通讯文章，反映杭州及金华地方情况。不久，他被聘为《申报》特约通讯员。

1905年，邵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回到金华，在一个中学里教书。他继续为《申报》写通讯，对新闻事业的兴趣更加浓厚起来。他看到报纸颇能影响人心，便认定报纸是救国的有力工具，发展进步的新闻事业可以成为救国的一种途径。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幻想“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一样，邵飘萍则可以说是一个“新闻救国论”者。

1911年的辛亥革命，赶跑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

的封建君主专制。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的《约法》里，曾规定了“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时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于各地。这时，幻想“新闻救国”的邵飘萍，心情非常激动，于1912年离开金华到杭州，与一个叫杭辛斋^①的报人合作，办起《汉民日报》。邵在《汉民日报》上，经常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恶，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也时有讥讽。所以，他办报还不足三年，竟先后被捕三次。“最后，《汉民日报》遂承袁世凯之电令而封闭”。^②到这时，邵飘萍以其亲身经历，敏锐地觉察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汉民日报》于1914年被封禁以后，邵飘萍逃往日本，入法政学校读书。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策划对中国进行侵略。他感到无比愤慨。于是联络三个中国同学，“设东京通讯社，为京津沪汉著名报纸司东京通讯”，^③极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阴谋和野心。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首先在外国报纸上透露出来。邵飘萍立即驰报国内，从而激起全国人民对袁世凯的愤怒声讨。他在通讯里，还经常反映留日中国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对国内正在酝酿的反袁斗争起了促进作用。

1916年春，邵飘萍应上海《申报》和其他几家大报的邀请回国。抵沪后，同时担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的主笔。他以“阿平”的笔名，经常发表反袁的政论，很快地引起舆论界的注意。6月，袁世凯倒台身死，军阀政客们又群集在北洋军阀的新首领段祺瑞的周围，北京政局仍是群魔乱舞的局面。邵于此时，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员。

邵到北京后，奋力改变新闻界只靠摘引官方文件发消息的陋习，千方百计，必欲得事实的真相而后发出第一手新闻消息。在邵的要求下，《申报》大大扩充了北京电讯的篇幅。于是，《申报》的《北京特别通讯》，以其内容丰富和真实生动，受到重视，引起各家报纸的效法。邵飘萍通过《北京特别通讯》，及时地较详细确实地揭露了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的种种丑行，因而遭到反动派的忌恨。

1918年7月，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④。这是在北京，由中国人自办通讯社的开始。它的业务是一面采编本国新闻，一面择译外电，然后分发各报馆。当时“北京报纸和外国驻北京记者购用的很多”^⑤。这有利于打破外国通讯社和报纸对我国舆论的操纵。

是年10月，邵又在北京创办《京报》，他在《创刊词》中写道：“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⑥在他的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颇以舆论界“中流砥柱”自命。然而，这毕竟带着很大的幻想成分，恣睢暴戾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听命于多少反映一些民意的舆论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邵飘萍激于爱国义愤，在报上揭露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因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段政府下令查封《京报》，并派军警包围报馆，要逮捕邵飘萍。邵仓促化装，逃出北京到上海。不久，他接受大坂《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前往日本，担任该报的特约记者。

邵到日本后，一面当记者，一面注意研究思想和社会政治问题。在1920年内，他写成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前者介绍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

学说，并较多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后者专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邵根据他当时所能看到的材料，严正地指出，各国反动派所散布的对新俄国的种种诬蔑，皆属荒谬无稽：确认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⑦

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从日本回国，在北京重新办起《京报》。根据对日本新闻事业的观察研究，他看到国内的新闻事业急待改进，且必须发展新闻学的教育。是年，他与另一个新闻学者徐宝璜，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商议决定，在北大开设新闻学研究会，^⑤邵与徐在其中担任讲授。邵主讲新闻采访技术。1923年，邵又在汪大燮办的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讲授同一课程。并在这年写成《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出版。1924年，邵又受聘于北京政法大学，讲授新闻采访技术以及报纸经营方法，并于是年写成《新闻学总论》一书出版。

《京报》复刊后，邵飘萍锐意革新。1925年初，《京报》陆续增出各种周刊，其中《莽原》周刊，是鲁迅先生主编的。其他有《妇女》、《儿童》、《电影》、《戏剧》、《民众文艺》等共12种周刊，此外还刊行三种社会科学半月刊，这些定期专刊深受读者的欢迎。这期间，邵飘萍追求进步，同情革命的倾向更趋明显，《京报》成为最活泼而有生气的北方报纸。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它是北方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3年“二·七”大罢工时，邵在《京报》上怒斥军阀禁遏工人合法集会并枪杀工人群众的暴行。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广

东革命政府。邵对南方出现这一新局面，自始就持欢迎态度。是年11月，趋向进步的北方军人冯玉祥率部入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的总统曹锟，并把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宣布废除帝号。邵对这一进步行动非常赞扬。

1925年初，孙中山为谋求政治统一而北上。《京报》上几乎每日报道孙中山的消息，并以“全国景仰”为题，刊出孙中山照片，表示了对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高度敬仰，热烈地希望他北上成功。而对于段祺瑞搞的善后会议，则一直持批评态度。曾指出：“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⑨邵的这种政治态度，再度激起段祺瑞政府的忌恨。当时邵曾写信给反动学者胡适，向他指出，进步青年对他参加善后会议十分不满，同时在讲到自己的态度时说“微闻当局对弟极为不满，此固意中，亦无所惧。”

接着，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邵在《京报》上连篇著文，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是“已退化于野蛮阶级之人中豺虎，自称文明绅士之强盗化身”；^⑩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以“排外”、“暴动”、“赤化”的罪名，作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借口；指出英日等国政府应负杀人罪责；提出“打倒外国强盗，严办外国凶手”^⑪的口号。他在《愿国民注意根本问题》一文中，还指出了斗争应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最终目的。

“五卅”反帝运动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群众日益奋起，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被吓坏了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在“讨赤”的黑旗下，联合起来向革命人民疯狂进攻。这时，邵飘萍又在《京报》上发表《中

国今后之趋势》一文，相当深刻地分析了所谓“讨赤”的巨大欺骗性和它的反动实质。然后指出，被帝国主义、军阀、政客指为“赤化”的“祸源”的广东革命政府，其“治绩为全国第一”。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写道：“腐旧的军阀必归失败，帝国主义者必遭覆没，革新派虽困苦艰难，千回百折，而最后胜利必归于革新者。”^⑩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充满着信心。

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段祺瑞下令卫队向举行反帝游行的学生群众开枪，造成又一起大惨案，全国为之震动。邵飘萍怀着极大愤慨，连续在《京报》上发表评论，严厉声讨段政府的罪行；揭露其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对爱国人民穷凶极恶的反动嘴脸；指出段祺瑞是惨案的祸首元凶，应当逮捕法办。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对邵飘萍恨之人骨，遂把他秘密列入通缉名单，企图进行迫害。

“三·一八”惨案过后不久，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进攻冯玉祥所部国民军。4月15日，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奉军入京后，疯狂肆虐，不但封闭报馆，箝制舆论，而且残酷镇压爱国运动，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于邵飘萍同情国民军，反对“讨赤”，还曾支持郭松龄倒戈，并多次指名谴责奉张亲日卖国的罪行，张作霖对他早已怀恨在心。邵为免遭迫害，当奉军入京时，便避入六国饭店。4月24日，奉军设计将邵诱捕，当即封闭《京报》馆。然后，不经审讯，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于4月26日将邵飘萍杀害。

注:

- ① 杭辛斋(1869—1923),浙江海宁人。清末曾从事革命活动,在北京办过《中华报》。据《警钟日报》说,该报“内容丰富以恢复国权,启导民智为主”。
- ② 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转引自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油印稿)。
- ③ 邵飘萍:《愚与我国新闻界之关系》,转引自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
- ④ 据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6期)及曾虚白《中国新闻史》所记,新闻编译社创立于1918年7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记为1916年7月,误。
- ⑤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上册,第289页。
- ⑥ 转引自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
- ⑦ 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1920年初版,第2页。
- ⑧ 据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一文,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为1918年,误。
- ⑨ 《京报》1925年2月7日。
- ⑩ 《京报》1925年6月2日。
- ⑪ 《京报》1925年6月6日。
- ⑫ 《京报》1925年2月18日。

陶行知

宗志文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他原名文潜，早年信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改名知行，后来他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行知。父亲靠教书谋生，家境清寒。1906年陶行知进入歙县耶稣堂内地会设立的崇一学堂学习，毕业后，经教会资助，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1914年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先入伊利诺斯大学学政治，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是美国著名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学生。因此，留学期间，除了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外，还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

1916年陶行知由美返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后来该校改为东南大学，又任教育系主任。1920年辞去东南大学职务，与一些留美回国的人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任总干事，鼓吹教育改造运动。不久，又与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平民千字课》，设平民读书处，推行平民教育。这时，他虽然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和强烈的救国愿望，但没有投入“五四”以后的革命运动，而是自认为站在“超政治”的立场从事教育活动，幻想“教育救国”。他认为“平民教育”是中国的“希望”，“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说“要把平民教育输入军队里、善堂里、工厂里、监牢里、尼姑庵

里、济良所里”。^①这个时期，他还常常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当时的传统教育，提出自己改革教育的主张。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推行几年之后，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是“到处碰了壁”，如他自己所说：“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出路”了。^②但是，他所找的路，仍然脱离不开改良主义的轨道。当时，他把中国“穷和弱”的原因归根于“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③因此，他的所谓出路，就是办乡村教育。1926年，他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作为改造乡村教育的纲领。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④1927年3月，他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合力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简称晓庄师范。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在办晓庄师范的时候，陶行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一系列新颖动人的口号，构成了他的所谓“生活教育”论的主要内容。这套“理论”在晓庄师范的实际运用，就如他所说的：“全部课程就是全部生活，我们没有课外的生活，也没有生活外的课。”^⑤他引导师生整天忙于烧饭、种田、做工、演戏、说书、开茶馆、当会计、办民校、会朋友、放哨守夜等等，以这类活动作为其教学的全部内容；学生很少认真读书和学习系统的科学知识。晓庄师范的招生广告上写着：“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要来。”这些做法，从反对关门读书的传统的旧教育而言，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翻版。他虽然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颠

倒了一下，“翻了半个筋斗”，而实际上并没有跳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框框。

陶行知对晓庄师范师生的政治信仰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学校里有国民党，有国家主义派，也有共产党员。那里的进步势力确实是比较强的，学校中的骨干多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1930年5月，晓庄学校师生在共产党员的鼓动和带领下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对日本把军舰开入长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件事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不久，反动派借口学校里有共产党活动，派兵包围并封闭了学校，捕杀师生十余名。陶行知也受到通缉，逃往日本。到1931年春天，才由日本回到上海。经过这次打击，他心情沉痛苦闷，对反动派颇感失望，但仍然盼望着晓庄启封，继续他的“事业”。开始他隐蔽在商务印书馆借译书谋生；后来他的活动又逐渐展开，着手普及科学教育。他提出“科学下嫁运动”的口号，幻想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把科学“下嫁给儿童”，“下嫁给大众”，让下层民众都能享受到现代科学的成果。他创办了自然科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还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等。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创办一种业余学校——山海工学团。参加学习的主要是农民，也有工人，他们受军事、生产、科学、识字、民权、生育等六项训练。他曾主观设想把“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实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造成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⑥自然，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式的幻想。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的新进攻激起了中国

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陶行知得到共产党友人的帮助，积极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他先后参加发起和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提出组织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从这时起，他开始认识到：“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作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⑤他的政治思想起了显著的变化。

1936年7月，陶行知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国民党与红军议和，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建立统一的抗战的政权。11月，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当时，陶行知恰好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受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国外访问，免遭逮捕，但却又一次遭到通缉。他在国外访问了欧美二十八个国家，所到之处，揭发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努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发动华侨捐款救国。

1938年夏天，陶行知回国。经过香港时，他说愿意在抗战中从事三件工作：一是创办晓庄研究所培养高级人才；二是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三是在香港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这时，国民党政府发表他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8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冬季，他到重庆。1939年，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在会上提出抗战教育方案，主张动员全国的物

资、人力与日寇总决斗，以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他的提案虽经大会通过，交到国民党政府手里，却如石沉大海。

陶行知从国外回来后，蒋介石曾拉他加入国民党，想叫他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个高级职位，他断然拒绝了，以后，就常常受到监视。他想办晓庄大学，国民党政府不批准。教育部长、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威胁他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产党。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北碚附近的合川凤凰山上的一座古庙里，靠自筹经费办起了育才学校。育才的办学方针虽然仍受到他那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错误指导，但这时他在政治上已更加倾向进步，学校里容纳不少共产党人，因此国民党反动派总企图用种种卑鄙手段扼杀它。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暴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异常困难，有时衣食都难以为继。国民党政府对这所学校，不但一钱不给，而且还对它进行刁难。陶行知为了筹款，到处奔波，经常碰壁。

抗日战争后期，陶行知对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越来越不满，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统治区反独裁、反内战的政治活动，并自觉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1945年春，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除继续坚持办育才学校外，又和李公朴等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吸收职业青年补习高等学校课程。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10日，重庆许多人民团体在校场口开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遭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被毒打。当时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师生在场，他目睹特务的暴行，非常气愤，回校后对大家说：“沉着，要知道民主需要用血、用

生命去争取，才会到来的。”^⑧

1946年4月，陶行知由重庆回到上海，一方面筹划育才迁校，一方面忙于民盟的工作。他到处讲演，为反独裁、争民主而大声疾呼。6月23日，他在上海北站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的群众大会上高声呼喊：“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⑨7月11日、15日，民盟的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同时，社会上传闻陶行知已名列“黑榜”，国民党特务已经准备暗杀他。他冷静沉着，不怕牺牲。7月17日，他给重庆育才师生写信说：“如果消息属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的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来顶补。”^⑩

在国民党特务暗害的严重威胁下，陶行知日夜忙着整理自己的诗稿。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去世。延安各界代表二千余人曾举行追悼大会，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送了挽词。

陶行知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中国大众教育问题》、《行知诗歌集》等。

注：

- ① 陶行知：《作十万新民寿六旬王母》，《知行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27页。
- ② 白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

第 23 页。

- ③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8 年版,第 131 页。
- ④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同上书,第 129 页。
- ⑤ 陶行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同上书,第 139 页。
- ⑥ 陶行知:《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 1949 年版,第 198 页。
陶行知最初对工学团的解释是:工是做工,学是科学,团是团体。
- ⑦ 《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新北京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99 页。
- ⑧ 《陶行知先生纪念集》第 470 页。
- ⑨ 同上书,照片注文。
- ⑩ 同上。

朱自清

姜献阁

朱自清，字佩弦，1898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日）出生于江苏东海县。原籍浙江绍兴；祖父和父亲做过些地方小官；1903年他全家从东海搬到扬州定居。

朱自清幼年随父母课读，后入私塾，以后又入小学。在小学时，他的英文已学得不错。1912年考入扬州两淮中学读书，学习成绩很好。

1916年夏天，他离开扬州赴北京，进北京大学预科，第二年入本科哲学系，三年中修完了哲学系全部课程，1920年大学毕业。

朱在北大读书时，是校内学生刊物“新潮”杂志社（1919年1月创刊）的社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试作新诗。

从大学毕业到1925年暑假，朱自清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十中学、宁波四中、白马湖春晖中学等处教书。在此期间，他一面授课，一面努力写作。1920年冬文学研究会成立，他为早期的会员之一。这年他在杭州一师教书和俞平伯共事。1922年1月，他同俞平伯、叶圣陶等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五四”以来最早的一个诗刊。同年6月，又和俞平伯、叶圣陶、郑振铎等人合印了诗集《雪朝》。与此同时，他还加入了当时一些新诗

人组织的“湖畔”诗社。

从这年 11 月起,他和俞平伯在通信中多次讨论当时小资产阶级文化人中所流传的一种“刹那主义”。他不同意只求刹那享受的刹那主义,而主张每一刹那都要充分利用起来做一些事,以求心之所安。用他的话说是:“随顺我生活里每段落情意底猝发的要求,求个每段落的满足”。^①他自认为这是比较“积极”的,其实,仍跳不出小资产阶级以个人趣味为中心的圈子。

1923 年 3 月,他的第一首长诗《毁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引起了当时诗坛上的广泛注意。同年 10 月写成《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此文发表后,被人誉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②后来收在《踪迹》一书里。

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他为抒发胸中的愤懑,写《血歌》一首。

这年八月,北京清华学校聘朱自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此后他的创作转向散文,同时开始了古典文学的研究。

1926 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在游行的队伍里,亲身目睹了这一历史惨剧。事后他以愤怒的心情写了具有历史价值的《执政府大屠杀记》,详细地叙述了惨案经过:“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他在文章末尾说: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问执别人之口!“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③

但是这次流血事件,并没有使他立下决心更勇猛的前进。“三·一八”过去,他仍回到书斋,继续做自己的研究工作。1926

年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掀起了大革命风暴，但由于蒋介石的叛变，1927年继之出现的是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与白色恐怖。在这种局势下，他感到苦闷，而由于缺乏勇气，表现为徬徨。1928年2月，他的《那里走》一文坦率地表露了这种心情。他承认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离开了小资产阶级，就‘没有血与肉’”。他说：“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也总得找个依据，好“安心地过日子”。于是就选择了钻进“国学”里去消磨一生；他虽然意识到这只是“暂时逃避的一法”，^④但是仍然选择了这条道路。他的这段自白清楚地表述了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有些正义感而又害怕阶级斗争的共同心理。

同年10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这本书收集了他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背影》一文曾被选为中学国文教材。

1930年暑假后，朱代理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1931年8月到英国留学，并漫游欧洲数国。“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英国，他虽关心事变，但感到“没有法子”。1932年8月回国。从9月起他正式主持清华中文系。这时间一多也从青岛来清华任教，这是他们两人共事的开始。

1934年，他担任了《文学季刊》和《太白》杂志的编辑。1935年7月起，着手为《新文学大系》编选《诗集》。同年冬，爆发了“一二·九”救亡运动。12月16日，他随清华学生游行队伍进城，眼见到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学生，他很愤懑。但是这种愤

慫出于一时激发的正义感而不能持久。当时的民族危机已经很严重,但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去挽救,他并不明确,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他也缺乏认识。因此,当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清华教授开会决定发讨伐张学良的通电时,他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起草委员会的召集人。其后不久他在日记中曾明确写道:“余之立场与政府相同。”^⑤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清华与北大、南开联合成立临时大学于长沙,次年又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朱随学校南行。这一重大事变,暂时打断他的安居治学生活,他为南迁以来未能集注精力于研究工作而感到十分苦恼。1939年寒假以后因健康关系他辞去联大中文系主任。

1940年到1941年他在成都休假期间,看到了一群一群的贫民抢米仓、吃大户的情形,后来他写了《论吃饭》一文,对饥民表露同情。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一般贫民没有饭吃,他的生活也感到日渐困难,休假结束后,他把眷属留在成都,自己返回西南联大。为躲避敌机轰炸,他随清华文科研究所住到乡下,有时进城去上课,人们常见他衣服的纽扣掉了,缀上些布条系着。

到了抗战后期的两三年,一般教学人员的生活更加困苦,但他仍然认真地进行教学、研究和著述的工作,几年内写成了《新诗杂话》、《诗言志辨》、《国文教学》等不少著作,但是他的身体面貌却变得更加衰弱和憔悴。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屠杀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大中学师生,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一”惨案。这对朱自清是个很大的刺激,他“悲愤不已”,^⑥积极支持昆明

师生向反动当局抗议。1946年1月20日，他公开签名于昆明文化界反内战的时局宣言。

同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师生分批离滇返平，6月他先回到成都家中。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负责人李公朴在昆明遇刺身死；四天之后，民盟又一负责人、他的好友闻一多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这对朱自清是更大的刺激。他在日记中写到：“此诚惨绝人寰之事。”“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⑦8月16日他写《挽一多先生》诗，把闻一多比作“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的“一团火”^⑧。他于同年10月回到北平清华，受学校委聘为“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的召集人。他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编成了《闻一多全集》，在为《全集》写的《序言》中称闻是斗士，又是诗人和学者。

在闻一多被害前的一两年内，他的政治见解已经有了一定提高。1944年他曾在成都对他的夫人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我们总要把路线看清楚，勇敢的向前走”，他自己承认不如青年人走得快，但要求“赶着走”^⑨。闻一多的惨死加速了他的转变。1947年2月23日他领衔发表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5月24日他又签名于反饥饿反内战的宣言，并手持宣言稿到处请人签名。此后他走出书斋，接近青年，几次和同学一起扭秧歌。秧歌是解放区流行的民间舞蹈，因此人们称赞他这是“向一个新时代学习的态度”^⑩。

1948年初，他已受着胃病的折磨，身体越来越坏。此时，国民党对青年学生的压迫日甚一日，殴打与逮捕学生的事不

断发生；各校师生员工用罢课、罢教、罢工来反对迫害的行动也一天比一天激烈。4月9日与11日，国民党的特务暴徒先后冲入北平师范学院和北大，肆意毒打并逮捕学生。为此，12日清华开教授会，决定13日罢教以示抗议，他被推为宣言起草人之一。这时，他身体虽然不好，但他除继续写作外，仍积极参加群众运动。

同年6月，北平学生掀起了反美扶日运动，朱为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名。这事影响他家庭生活甚大，但他宁可让家人挨饿，也不愿再领这种面粉。他说：“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绝不应逃避个人责任。”^⑩7月9日他又签名抗议国民党北平当局“七·五”枪杀东北学生事件。

在这期间，他的胃病几次复发。7月23日，他扶着手杖带着重病，参加《中建》半月刊社在清华举行的“知识分子今天任务”的座谈会。在发言中他比较清醒地估计了自己，承认自己需要向工农学习，需要改造。到8月初他的胃病更加严重了，入院救治无效，12日终于在贫病交迫之下死去。当他死前神志尚清醒的时候，还嘱咐家人不要购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美粉。毛主席对朱自清晚年从民主自由主义者转变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立场上来，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粉”的反抗精神，给予称赞，赞扬他和闻一多一样，都“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⑪。他的全部著作共约一百九十万言，大部分收在《朱自清文集》里。

注:

- ① 朱自清的信,见《我们的七月》。
- ② 浦江清:《朱自清先生传略》,《国文月刊》第72期。
- ③ 朱自清:《朱自清文集》开明书店1953年3月第1版,第765、773页。
- ④ 朱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第3号。
- ⑤ 转引自王璠:《朱自清先生的日记——纪念他逝世一周年》,《光明日报》1949年8月10日。
- ⑥ 同注⑤。
- ⑦ 同注⑤。
- ⑧ 转引自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见《朱自清文集》。
- ⑨ 同注⑧。
- ⑩ 同注⑧。
- ⑪ 同注⑤。
- ⑫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385页。

史量才

耿云志

史量才名家修，1880年1月2日（清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于上海青浦县泗泾镇。其父史春帆是个商人。1899年，史量才考入松江府娄县县学为附生。但以后他放弃了科举致仕的道路，开始研究日文及理化等近代科学。1901年秋，他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投身上海教育界，先后在育才学堂、兵工学堂、务本女学、南洋中学等校任教。1904年，史量才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即苏州女子蚕桑学校前身）。1907年，他积极参与江、浙两省绅商的拒款保路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史量才在上海与陈其美、章梓等人结识，乘机多方联络，因而于民国初年，被委任主办沪关清理处及松江盐务局。

史量才早年任过《时报》主笔。1912年，以特殊的机缘盘进《申报》，以后遂将一生主要精力经营报馆。《申报》是在中国出版最早的报纸之一，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原为英人美查（E. Major）所办，后美查返国，由席子眉、席子佩兄弟接办，即逐步变成华商企业，但仍用外人名义发行。到史量才接办后，《申报》才真正成为中国报纸。史接办后，初任席子佩为经理，继又将席挤走，改任张竹平为经理，自任总经理，悉心经营，销路日增。1912年销七千份，1917年销二万份，其后仍逐年上升。其间还先后增出多种专栏、专刊，成为国内

著名的大报。

1927年，史量才买下《时事新报》；1929年，他又从美商福开森（John. C. Ferguson）手里购进《新闻报》大部股权，成为上海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申报》在史量才的经营下，规模不断扩大，1932年4月，《申报》销数已达十五万份。同年7月，创办了《申报月刊》，1933年开始编印《申报年鉴》。同时期，还陆续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及申报流通图书馆。1934年，出版了翁文灏等绘制的中国新地图。随着这些业务的发展，《申报》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史量才凭借他在新闻界的地位，扩展其社会活动。1921年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创办中南银行；同年发起民生纱厂；又曾帮助项松茂扩大五洲药房；协助陆费逵复兴中华书局。特别是中南银行的成立，使史成为金融界有力分子，而《申报》也有了经济后台。

《申报》从史量才接办以来，其政治立场基本上是保守的。但为销路着眼，又以“民众喉舌”相标榜，对时政亦偶有批评。袁世凯搞帝制活动时，《申报》等上海报纸持批判态度；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申报》政评甚少；蒋介石统治初期，《申报》采取了拥蒋的立场。

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史量才及其《申报》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政治态度逐步地有了变化。当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时，他曾捐巨款支援抗战，因而被推为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地方协会）的会长。同时，《申报》

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开始有所批评。国民党政府为了拉拢史量才及其《申报》，曾给史各种荣誉职衔，如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及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但这并未改变史量才及《申报》对国民党政政策的批评倾向。相反，随着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日益丧失人心，《申报》对它的批评也愈趋激烈。《申报》从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进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停止训政，实行宪政”。1932年12月，宋庆龄等组织人权保障同盟，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斗争。史量才积极支持了该同盟的活动。他代觅通讯社发表人权保障同盟的宣言，并在《申报》上发表宋庆龄尖锐批评国民党的文章，登载有关人权保障同盟的代电和报导。这时期，史量才还聘请了一些爱国和进步的人士参加《申报》馆工作，如用李公朴主持业余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以黄炎培主持设计部。同时还经常刊登陶行知、胡愈之、茅盾等人的文章和作品。从1933年1月至1934年5月，鲁迅先生用各种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

1932年，《申报》曾连续发表短评，抨击国民党的军事“剿共”政策，要求结束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引起了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严重不安和仇视。与此同时，《申报》报导关于“中大学潮”的真相，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黑暗情况，蒋介石遂下令对《申报》禁止邮递。后来，蒋介石得到其特务机关关于史量才的种种“告发”材料，终于下令要戴笠亲自部署暗杀史量才。1934年10月6日，史量才携眷去杭州休养，11月13日下午乘汽车由杭州返上海，途经浙江海宁县翁家埠附

近,为蒋介石特务狙击遇害。

主要参考资料:

《中报月刊》1934年第12期。

马相伯

姜献阁

马相伯，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晚号华封老人，原籍江苏丹阳，1840年4月（道光二十年三月）生于丹徒（今镇江）。父名松岩，是个医生，并开过药铺和米布店。其父母和外公、外婆都是天主教徒。他生后不久就受了洗礼，教名叫“若瑟”。

马幼年入塾，先读教中经典，续读儒书。到十一岁那年，他背着父母，跑到上海，进了法国人办的天主教会学校——依纳爵公学（后改名徐汇公学）读书，学名叫“马斯臧”。第二年他弟弟马建忠也到这个学校来念书。马相伯在公学普通科学习期间，学会了拉丁文和法文，数学和天文学也学得不错，深受意籍校长晁德莅（Zottoli）的赏识。

1862年，马入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小修院，受所谓“神修”训练。1864年小修院学习期满后，在耶稣会研究中国文学和拉丁文学，后又入大修院学哲学和神学。1870年得神学博士学位，经教会授职为神甫，成为耶稣会教士。

1871年他奉耶稣会长命，先后到南京、徐州等地传教。从1872年起，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兼管教务；教学之余，仍研究哲学及数理科学，译书百余卷。他对学生除宣扬宗教外，还灌输孔孟之道。教会怕他把学生变成“异教徒”，于1875年指定他专研究天文、数学。翌年，又调他到南京任编撰，翻译数理书

籍，因与当地教会外国传教士矛盾，不久便不辞而别，跑回上海。自此，他暂时脱离耶稣会，但并不脱离天主教。

马相伯的大哥马建勋早年为李鸿章幕僚，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为淮军办理粮台。马相伯离开耶稣会后，经其大哥介绍，到山东藩司余紫垣处掌理文案。1877年余兼署山东巡抚，委他接任潍县机械局的差事。次年又奉李鸿章命调查山东矿务。

1881年马随驻日公使黎庶昌赴日本任使馆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当时曾与日本维新要人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往还酬酢。同年秋为兄病回国，过南京，适李鸿章轮泊南京，他往谒李，随李到天津办事。这时他弟弟马建忠已留法回国，也在李鸿章幕中。

马相伯到天津不久，朝鲜政府向李鸿章要求推荐办理新政人才，李即派他前往协助。1882年上半年他到朝鲜，“首请彼政府编练新军，……次则整理他们的外交”^①。他还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其他一些改良主义的条陈，其中有省刑罚、定刑典、广取材、兴学校等项目。为时不到半年，朝鲜发生政变，清廷派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等带兵前去助朝鲜“平乱”。事后马相伯仍留朝鲜襄助办理“新政”。翌年，他回天津述职时，鉴于朝鲜“新政”难于进行，向李鸿章要求不再回去，并请李“即早决定对韩政策”^②。

1884年，李鸿章委派马建忠任招商局总办，同时派马相伯到全国有关各埠调查招商局财产、帐目。他从天津动身，经烟台、上海、汉口、厦门而至广州。翌年，他提出改革招商局建议。当他离广州北返，行至厦门时，得台湾巡抚刘铭传之邀，

到台湾住了一段时间，曾劝刘借款开发台湾经济，未被采纳。1886年被李鸿章召回天津。当时李正奉命筹办海军，苦于经费短绌。马趁机劝李向美国资本家借款，开设银行。李听了他的话，便派他赴美接洽借款。其时美国资产阶级渴望输出资本，所以他在美备受政府、商人、银行家欢迎，各商团及银行家争相贷款。结果商定“以五千万(美金)为正式借款，以三万万(美金)为银行存款，存款以三厘起息，视中国财政缓急、需要提用。”^③但由于清政府中地主阶级顽固派与洋务派官僚之间的矛盾，李鸿章遭到攻击，筹办银行事流产。马无奈，只好溜之大吉。他离美赴欧，在英、法等国游览，曾到罗马觐见教皇宗良十三世，1887年回国。

从1892年起，马又一度任驻日本长崎领事、驻日使馆参赞，后归国。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请他主持筹设译学馆，事将告成，由于政变发生而成泡影。他对于康梁的失败，深感惋惜，但也颇怀畏惧。次年，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他也离京回沪，重度书斋生活，与其弟合著《马氏文通》，后以其弟之名出版。

马回沪后，转向文教界活动，除主持徐家汇天文台事外，仍从事译著数学和宗教书籍。这时他因教授拉丁文结识了南洋公学教授蔡元培，后来蔡又从学校选派一批青年跟他学习，于是风声所播，各地来学的人日渐增多。马早有创办中国新式大学思想，这时便联合同道，借耶稣会之助，着手筹办震旦学院，企图实现其“教育富国”的理想。学院借徐家汇老天文台为校舍，于1903年2月成立。他自任监院，监院下，除设一总干事与会计外，其余各项行政由学生自己管理。学院标榜：

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谈教理。于右任、邵力子、马君武等都曾是该院的学生。1905年担任讲座的外籍教士趁马养病之际，改变办校方针，学生大哗，相率离校。他招集离校学生，并与熊师复、袁观澜等商议另创新校，得两江总督周馥赞助，拨地拨款。新校定名为“复旦”，以吴淞提督行辕为临时校舍，于是年秋开学。马被推为校长，李登辉主教务，惨淡经营，逐步打下了复旦大学的基础。

1906年马应两江总督周馥之聘，至南京讲演，大肆鼓吹君主立宪的主张。1907年12月，马徇梁启超之请，参加立宪派组织政闻社，任总务员（相当于干事长）。并曾为此专程赴日。赴日期间，复旦校长改由他人接任，到1909年他复任复旦校长。并于是年被选为江苏省谏议局议员。

民国成立后，马相伯被江苏都督府聘为外交司长。1913年他到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请，曾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旋辞去，改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同年他与北京天主教上层分子英敛之联合上书罗马教皇，建议在中国兴办大学。他居北京四年，历任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这期间，曾与章太炎、梁启超拟议创办“函夏考文苑”（类似研究院），用以“校勘古籍，编纂词典，奖励著述，表彰硕德”^④，但没有办成。又与英敛之发起辅仁学社，社址在北京西山，招集生徒，讲授经史百家之学，此即辅仁大学之前身。

当袁世凯进行帝制活动，袁家党徒及孔教会分子准备在起草的宪法中规定尊孔教为国教时，马以“信教自由”为理由，加以反对。1916年他曾与雍剑秋发起“信教自由会”；同时他

在所写的《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及为教会代拟的五篇请愿书中，驳斥了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主张。后来，他鉴于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人心，便出京蛰居上海。1918年发表《民国民照心镜》，表现他立宪共和的思想。此后他虽然担任过江苏财产交代核算委员会会长、中国科学社董事、上海天主教办的《天民报》总主笔等职务，但已年老体弱，多是挂名虚衔。1926年整理出版了旧稿《致知浅说》一书，此外他还先后撰写了一些有关宗教和政治方面的文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之后，国难深重，马在这时痛感“国亡无日，非朝野一心，武力抵抗，无以自救”^⑤。当时他在上海积极参加救国工作，坚决主张对内团结，对外抗战，被尊为爱国老人。发表了很多抗日言论，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说“今后非国民之公意，对内绝对不许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⑥。他曾提出《国难人民自救建议》和《实施民治促进宪政以纾国难案》，并发起中国民治促进会、江苏国难会和不忍人会，主张抵制日货，号召为抗日将士劝募义勇捐。1933年他又要求“立即召集国民大会，政府与全民统筹国是”^⑦。他虽然主张抗日，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但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却始终抱有幻想。1936年蒋介石五十岁生日时，他亲书寿字，为蒋祝贺。蒋介石也为借重马在资产阶级中的“声誉”，1937年3月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当时他正在南京替天主教反动头子于斌当顾问。同年10月上海沦陷，日军迫近南京，桂系军阀李宗仁等请他移居广西桂林风洞山；1938年11月，于右任又请他移居昆明，马在赴昆途中因病留居谅山。1939年4月，马相

伯活满了一百岁(虚龄),国民党政府对马颁令“褒奖”,并在各大城市为他举行遥祝百龄大会。罗马教皇也派于斌向他颁送“圣像”。半年后,11月4日他就病死凉山了。他的著作大部分收在《马相伯先生文集》里。

注:

- ① 王瑞林:《一口一谈》第42页。
- ② 同①,第56页。
- ③ 刘成禺:《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逸经》第33期,第46页。
- ④ 方豪:《马相伯先生事略》,见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
- ⑤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27页。
- ⑥ 徐景贤编:《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版,第35页。
- ⑦ 同⑥,第68页。

王 国 维

耿云志

王国维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他的父亲王乃誉，本为儒生，太平天国时期弃儒经商。又曾一度在江苏溧阳县做小官。他的家庭是“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篋”，^①是个有读书传统的中等地主家庭。

王国维三岁丧母，六岁入塾读书，十五岁进州学。他于1893年、1897年两次赴杭州应乡试，都没有考中。当时西学已渐盛行，他便放弃举业，于1898年到上海，在汪康年办的改良派报纸《时务报》当书记校对。是年6月，开始以业余时间去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跟日本人藤田丰八等学习外文及理化等科学。学社只有六个学生，王在文史方面的才识很受罗振玉赏识，王事罗以师礼，并终生依庇于他。戊戌政变发生后，《时务报》停办，罗振玉把王国维留在东文学社治庶务，资助他继续学习。1900年秋，东文学社解散。次年春，王应罗振玉之招，赴武昌，在罗主持的农务学堂任译授。秋天，罗资助他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1902年夏，因病回国。

1903年，王国维受聘于南通师范学堂，任心理、论理学教员。次年，因罗振玉就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王国维随去，在该校任心理、论理及社会学诸科教员。1906年，罗振玉被调

入京，在学部做官。王国维又跟随入京。次年，由罗振玉举荐，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以后又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止。

王国维治学开始，对西方哲学发生兴趣，倾心研读尼采、康德的著作，对叔本华的书尤为爱好。1902年他从日本回国后，住在罗振玉家中为罗编译《农学报》及《教育世界》杂志，直到1907年。他在《教育世界》上发表过大批哲学论文。到北京以后，他的治学兴趣集中于文学方面，特别潜心于词曲。先后有《人间词甲稿》、《乙稿》和《人间词话》问世；并写成《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等数种整理与研究古代戏曲的著作。在此基础上，于1912年流亡日本时撰成《宋元戏曲史》（最初发表时，书名为《宋元戏曲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于当年12月携眷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开始过亡命遗臣的生活。到日本后，罗振玉对王国维说：“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返经，土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返经信古末由也。”^②从此，王国维“尽弃前学，专治经史”^③。

王国维居日本四年多，以研究整理罗振玉“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为事，并常与日本学者相交流。其间，考释甲骨文与“流沙坠简”，先后写成《简牍检署考》、《流沙坠简考释序》、《殷虚书契考释序》以及其他考古学论文多篇。

1916年春，王国维应犹太富商哈同(S. A. Hardoon)的聘请，回国到上海，为哈同编辑《学术丛编》杂志，并继续从事甲骨文及考古学的研究。1918年，王国维兼任哈同办的所谓“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19年，应藏书家蒋孟苹之请，为他编写

《密韵楼书目》(1923年初完成)。同年,参加纂修《浙江通志》;担任总纂的,是与王国维关系非常密切的清室遗老沈曾植。

王国维在上海一直住到1923年春。这是他学术活动最盛的时期,著述极多,主要为甲骨文及古史考证。较重要的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来在清华研究院将其改写为《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及《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等。1921年,王国维将辛亥以来的主要著述辑为《观堂集林》二十卷,于1922年刻印完成。

1923年4月,以罗振玉的关系,王国维又被清末陕甘总督、宗社党主要成员蒙古贵族升允举荐,召为故宫“南书房行走”,给废帝溥仪当先生。他5月入京就职,得到“五品”官禄。从此,作为已经退位但还不甘心灭亡的清室的臣仆,拖着长辮随侍废帝左右,梦想复辟。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宫,溥仪避居日本使馆,王国维“侍行未敢稍离左右,其后又时往日使馆觐见”。^①而且为了表示效忠清王朝,还几次要投“御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

当时,清华学校筹设研究院,由胡适推荐,拟请王国维当院长。他以“时变方亟,婉辞谢之”。^②次年初,溥仪亲自劝他去就任,他才接受聘请,允充教授。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两年多,除教授经史小学等科外,还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曾刊行《蒙古史料四种校注》。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到1927年4、5月间,北伐军进抵河南,冯玉祥部亦由陕西东进。当时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对革命十分恐惧,感到清室复辟的幻想已经破灭。6月2日,他写就遗书,其中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便到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④

注：

- ① 《自序》，《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 ② 罗振玉：《海宁王忠愍公传》，《海宁王忠愍公遗书》。
- ③ 罗振玉：《观堂集林·序》，《海宁王忠愍公遗书》。
- ④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第一卷，第3期，第126页。
- ⑤ 同上书，第126页。
- ⑥ 《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卷，第421页。

丁文江

耿云志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887年4月13日（清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出生在一个富绅的家庭里。五岁入塾读书。十五岁时，得到泰兴知县龙璋的赏识，拜龙为师，在龙的鼓励下，去日本留学。但他在日本一年多，没进什么正式学校，曾一度参与《江苏》杂志的编辑工作。1904年3月，丁离开日本到英国去留学。先在英国东部一个名叫司保尔丁的村镇读中学；两年后，考入剑桥大学，但只住半年就因故辍学了。他趁此机会到欧洲大陆游历了一番。1908年，他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动物学和地质学。

1911年4月，丁文江毕业回国。他为了游历和考察内地情形，从越南海防上陆，乘滇越路火车入云南，经黔、湘、鄂等省，7月才回到家乡。在家没有呆多久，他就赶往北京去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清廷赏给他“格致科进士”。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的家乡颇有震动，他“倡编地方保卫团”^①以维护地主豪绅的权益。

1912年，丁文江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写了一本《动物学教科书》。

1913年2月，他到北京就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当时地质工作还不被人们重视，地质科几乎无事可办，北京大学原有地质门，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了。丁文江便把

北大地质门的图书标本等借过来，为工商部办了个地质研究班，次年，改称地质研究所，由地质学家章鸿钊任所长。丁文江和稍后回国的翁文灏都在该所讲课，丁担任讲授古生物学。1913年至1914年，丁奉派先后到山西和云南作地质调查。他在云南除调查锡、铜等矿产外，还调查了金沙江水道，并注意搜集人类学的材料。1916年，北京大学从地质研究所收回自己的图书标本，续办地质系。这时，丁文江又为农商部(原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创办了个地质调查所，他自任所长。

1918年，丁文江在北京高等师范兼课，开始与北大哲学教授胡适结识。是年底，他随梁启超、蒋百里等，以半官方的身分，到欧洲考察战后形势，兼充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1920年初，他经由美国回国。在美国时，他为北京大学聘请了葛利普(A. W. Grabau)作地质系教授。此人来华后，除任北大教授外，长期兼为地质调查所主持古生物的研究工作。

1922年，丁文江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是年，他与翁文灏合著的《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一书出版。

不久，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就任官商合办的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但他作为地质调查所的顾问，仍参与该所的工作，他一直是该所创办的《中国古生物志》的主编。

丁文江自欧游归国后，与胡适等亲英美派知识分子，更紧密地联在一起。由于他们都在海外留学多年，都深受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思想的熏染，所以同气相求。1921年5月，胡适、丁文江等集议成立性质为秘密的“努力会”，开始进行有组

织的政治活动。1922年5月，他们在北京办起《努力周报》，以“学者”的身分发表政治言论，大力鼓吹“好人政府”等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丁用“宗淹”的笔名，发表了许多篇政治论文。1923年8月，他在《少数人的责任》这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宣称：“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②这里充分表现了这些亲英美派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思想，以及他们自我夸张的高傲态度和强烈的政治野心。

1923年2月，丁文江与张君勱掀起了一场颇为轰动的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在这场持续半年多的论战中，丁虽然炫耀“科学”的词句，骂张为“玄学鬼”，其实，他不过是以马赫主义的唯心论来反对张的直觉主义的唯心论，同样是贩卖帝国主义的文化思想。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丁文江与梁启超等发表了一个宣言，公然反对罢工、罢课、罢市的群众爱国运动，主张与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友谊的磋商，同情的谅解”，激起人们极大的愤慨。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势力伸张到苏、皖和上海，引起江苏大资产阶级的反感。丁文江参与他们“驱奉救苏”的秘密运动。1925年7月，他到上海与刘厚生等细谈奉军入苏后的情形，然后到岳州去见吴佩孚。回到上海后，又应邀到杭州去见孙传芳，商量驱奉问题。10月，孙在杭州组织五省联

军,分五路出兵讨奉,一个月就把奉军赶走,从而据有了东南五省的地盘。丁认为孙的军事实力可为他施展政治抱负的凭借,于是决定靠近孙。1926年初,他辞去了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的职务,2月,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他是中国委员之一)的事南下。当时,孙传芳为了一面讨好帝国主义,一面笼络江浙资产阶级,设立了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自任督办,要搞什么“大上海”的计划,便请很受帝国主义分子欣赏的丁文江出来干这件事。是年5月,孙正式委任他为淞沪督办公署的总办,从而,他就成了反动军阀孙传芳的一个帮凶。在他任总办的半年多时间内,孙传芳数次封闭上海总工会、学生总会及其他许多进步机关,禁止一切群众爱国运动,大肆逮捕进步学生,残酷镇压了上海第一次工人起义。丁文江就任总办一个月,国民革命军就从广东开始北伐了。当北伐军席卷长江一带时,丁见势不妙,赶紧于1926年年底辞职,避居到大连。

丁文江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与胡适一起,陪同来华的英国委员卫灵顿(V. Willingdon)等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进行调查,为时两个多月。他出任孙传芳的总办,曾与卫灵顿详细商量过。由于就任总办,他没有参加全部调查活动,也没有赴英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但由于他与胡适等长期担任此职,并且还在管理美国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担任过董事和秘书等职务,所以能在文化教育界迅速扩大他们的影响,逐渐形成中国买办文化的基本势力。

丁文江在匿居大连期间,编定了《徐霞客年谱》,整理了《徐霞客游记》,于1928年,合在一起出版。是年夏,丁到广西

去作地质考察。当时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托他踏勘计划中的川广铁路线，广西地方政府也请他帮助探察矿产。11月他到上海，不久，回到北平。1929年，由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进行西南地质调查，丁任总指挥，他接受铁道部资助，一面探察矿产，一面继续调查川广铁道的路线，至1930年夏，才结束工作，回到北平。1931年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他为地质系研究教授。

“九·一八”事变后，丁文江与胡适、蒋廷黻等一起专事研究对日妥协让步的问题，准备向蒋介石统治集团献策。1931年10月，他与胡适应召到南京见蒋介石。那时，蒋介石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工农革命的反动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其反动统治危机四伏。丁胡见蒋之后，邀集蒋廷黻、傅斯年等，决定创办政治刊物《独立评论》，在标榜“独立”的伪装下，替蒋的法西斯统治和卖国投降政策效劳。该杂志于1932年5月开始在北平出版。丁先后发表政论文章二十多篇。他主张“遇有机会”就赶紧“与日本妥协”；^③他认为中国没有抗日的可能，“对日宣战，完全是等于自杀”。^④他为了替国民党反动派丢弃大片国土的不抵抗政策辩解，竟然歪曲列宁对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所采取的保护革命的策略，蛊惑人心地提出“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大家准备退到堪察加去！”^⑤他的谬论遭到一切抗日爱国的人们的同声谴责。他在《独立评论》上曾极力宣扬所谓“新式的独裁”政治，直接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张目。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反共文章。在《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这篇文章中，他恶毒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狂妄地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

暴力革命。

丁文江的拥蒋反共立场和对日妥协的主张，很投合蒋介石的胃口。1933年3月，长城抗战紧急，蒋亲自跑到保定破坏前线抗战，布置退却。3月13日，蒋特邀胡适、丁文江等会见。之后，胡、丁等回北平又与何应钦会见，密商对日妥协问题，5月便出现了塘沽协定。

是年8月，丁文江和葛利普、德日进（T. De Chardin，法籍学者）去美国参加第十六届国际地质学会。回国时，途经苏联，作了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回国后，曾在《独立评论》上陆续发表了十多篇《苏俄旅行记》。其中除了记述他参观经历和一般印象外，还表明了他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

1933年，丁文江与翁文灏、曾世英主编的《中国分省新图》由申报馆出版，次年他们又合编了《中华民国新地图》，也由申报馆出版。

1934年6月，丁文江辞去北大教授的职务，接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5年12月初，他受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委托，前往湖南为粤汉铁路调查煤矿，并为准备内迁的北方学校寻觅校址。当时国民党政府曾酝酿请丁文江出任铁道部长，丁尚在犹豫未决时，于12月8日夜在衡阳煤气中毒，并发生脑中枢血管破坏，遂移往长沙救治。1936年1月5日，死于湘雅医院。

注：

① 丁文涛：《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独立评论》第188号。

- ②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第 67 号。
- ③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 35 号。
- ④ 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独立评论》第 37 号。
- ⑤ 丁文江：《苏俄革命史的一页及其教训》，《大公报》1935 年 7 月 21 日《星期论文》。

邹 鲁

闻少华

邹鲁字海滨，广东大埔县人，1885年2月20日（清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六日）生。他的父亲是个裁缝兼小贩。

邹鲁从八岁入塾读书。塾舍附近有家书报社，邹常往阅览，从中获得一些新知识。^①1903年（十八岁）进潮州韩山书院学习。1905年，离书院到大埔县教书，经人介绍加入兴中会会员尤列组织的革命团体中和堂。^②同年又加入同盟会。1907年邹到广州进广东法政学堂，和教员朱执信、同学陈炯明过往密切。1908年，邹参加赵声、朱执信在广州发动的起义。

1911年4月，邹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逃香港。10月武昌起义后，11月广东响应。邹鲁和姚雨平等在广东组织北伐军，姚任总司令，邹任兵站总监，随军经上海至南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邹回到广东任官银钱局总办。

1913年邹鲁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当时，他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应当让袁当选为正式总统。3月袁世凯暗杀宋教仁，4月袁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准备发动内战。袁的凶相毕露，国民党党员大哗。在这种情况下，邹仍对袁抱有幻想。对于宋案问题，他主张由司法解决；对于善后借款问题，主张由国会解决。

“二次革命”以后，袁首先以武力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然后下令解散国会。并下令逮捕国民党议员。邹到这

时，只好逃出北京，前往日本，进了早稻田大学。

1914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同时在东京出版《民国》杂志，邹鲁任编辑。不久《民国》杂志停刊，邹回香港作倒袁活动，并到南洋筹款。

1915年底，云南反袁起义后，邹鲁在广东的水东、北海等地策动军队起义，均遭失败。

1916年，袁世凯死，国会恢复，邹与各省议员先后入京，复任议员。

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任邹鲁为财政部次长。1920至1921年，邹任两广盐运使。

邹鲁和桂军刘震寰部关系较深，对粤军内部情况也较熟悉。1922年孙中山决定讨伐陈炯明时，任邹为大总统特派员，让他策动桂军讨陈，并进行瓦解粤军的工作。陈炯明被打败后，邹任广东省财政厅长。

1923年孙中山任命邹鲁为广东高等师范校长。不久广东高等师范、法政大学和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邹为筹备主任。1924年夏，广东大学成立，邹任校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邹鲁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执会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但在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他却对孙中山确立的三大政策阴持反对态度，认为“联俄容共实为一大问题”。^③并即着手进行破坏。当时在广东学生中，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个“新学生社”，团结革命青年，工作非常活跃。邹鲁密令各校员生，组织“女权运动会”、“民权社”、“民社”等反动社团，与“新学生社”对抗。邹鲁还不断派人打入共

产党，侦察党的活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认为反共时机已到。邹鲁利用其国民党中央执委和青年部长的身份，对工运、农运、青年运动等方面，极力摧残。同年8月，廖仲恺被反革命分子刺杀，革命群众把这一血案的仇恨，集中到国民党右派分子身上。于是邹鲁、林森等纷纷逃离广州，跑回上海。他们纠集了谢持、戴季陶、邵元冲等，策划到北京自行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分裂国民党，另立中央。

1925年11月23日，他们的“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正式开场。这次会议非法地通过：“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共产党员”、“取消政治委员会”、“解雇顾问鲍罗廷”、“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因反对共产党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者分别恢复党籍”等一系列反动决议。

“西山会议”后，邹鲁一伙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地方党部，在北京还和日本驻华公使取得了联系。他们又在上海组织了伪中央党部，创办了《江南晚报》作为宣传机构。1926年3月29日，他们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产生了所谓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邹鲁任执行委员。

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于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给“西山会议”头目邹鲁等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西山会议派虽遭到谴责，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日益猖獗。1926年3月蒋介石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

件”。邹鲁、谢持等拍手叫好，给蒋介石拍发贺电，要他采取更彻底的反共措施。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是年9月，国民党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沆瀣一气，在一致反革命的基础上，组成了国民党的特别委员会，邹鲁为该委员会委员。特别委员会内部由于分赃不均，矛盾重重，到同年11月终于解体。政治上的失意，使邹鲁想起了实现他“十五年来常在心中策划旅行的绝好机会”。④1928年1月，他跑到国外去了。在国外逍遥了一阵之后，回到上海，他开始编写《中国国民党史稿》。

1929年，邹鲁去日本。1930年，在新军阀中原大混战声中，国民党反蒋各派联合起来，邹鲁以西山会议派代表的身分参加，在北平组织“中央扩大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组织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反蒋失败后，邹由太原逃到天津。

1931年，由于“约法”问题上的争执，蒋介石在南京软禁了胡汉民。以此为导火线，国民党又分裂为宁、粤两方。粤方在广州成立了反蒋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邹鲁任粤方中央党部的委员和国府委员。

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由于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谴责，南京和广东方面不得不宣称“共赴国难”、暂时停止战争，在上海开“和平统一会议”。会议结果，广州成立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邹任西南执行部委员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

1932年，邹鲁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在校长任内，他诬蔑学生的救国运动为“害国”运动，主张复古、读经，要中文系把《孝经》列为必修课。

1932至1935年，邹鲁是主持西南党务和政务的骨干分子。他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等曾打起“抗日”、“倒蒋”的招牌。到1935年11月，蒋介石派戴传贤、马超俊赴广州，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头面人物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一番拉拢后，邹的态度即明显地从反蒋转到拥蒋的立场上去了。他表示对蒋介石“非特不能再说推翻的话，而且应该极力拥护他。”^⑤1935年12月，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邹被选为中央常委及国府委员。

七·七事变后，邹鲁由广州经武汉到重庆。1939年国民党设国防最高委员会，邹鲁为常委之一。1943年邹任国民政府委员。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邹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抗战胜利后，邹回到南京。1949年，蒋家王朝覆灭，邹跑到台湾。1950年邹为国民党评议委员。1954年2月13日，邹死于台湾。

注：

- ① 邹鲁：《回顾录》第1册，第11页。
- ② 1901年尤列等在新加坡组织中和堂，宣传革命排满。1905年同盟会成立，中和堂主要成员皆加入同盟会。
- ③ 同注①，第159页。
- ④ 同注①，第215页。
- ⑤ 同注①，第2册，第454、457页。

主要参考资料：

- 邹鲁：《回顾录》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
邹鲁：《澄庐文选》正中书局1948年版。
邹鲁：《二十九国游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初版。

刘 师 培

朱信泉

刘师培字中叔，号左龠，江苏仪征人，1884年（清光绪十年）出生在一个地主阶级的“书香人家”里。他的曾祖父文洪、祖父毓松、伯父寿曾都以给“春秋左氏传”作新疏而列名《清史稿》儒林传。^①由于“家学渊源”，刘师培十二岁就读完被奉为儒学经典的“四书”、“五经”。稍长，又遍览家中藏书，在旧时代的经学方面打下一定的根底。

1898年他的父亲刘贵曾病故，家境从此衰落，但他仍沿着“读书、中举、做官”的老路挣扎着。1901年他考取秀才，第二年又考取举人。1903年他赶到北京参加会试，未中。归家途中他在上海停留，想找个教员职务解决生活问题。

二十世纪初年，经过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和约”的签订，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的反动腐朽的本质，社会上反清革命的思潮更加高涨起来。刘师培在上海结识了章炳麟、蔡元培等“爱国学社”的成员，在他们的民族革命思想影响下，这个儒生居然也赞成革命，一时兴起，竟改名为刘光汉，表示他也有“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决心。^②

不久，刘师培从上海回家乡和一个后来名叫何震的女人结婚，并把她带到上海进“爱国女校”读书，自己则专事文字宣传活动。

1903年冬天，他以“光汉子”署名的《中国民族志》和《攘

书》等反对清廷的小册子在上海出版。与此同时，他还给蔡元培主持的《俄事警闻》撰写反对帝俄军队强占我国东北和抨击清政府外交失败的文章。1904年《俄事警闻》改组为《警钟日报》，刘师培担任主笔。同年秋，他参加光复会。1905年春天，《警钟日报》因清政府和上海租界当局的敌视遭封闭，刘被迫避往浙江平湖。半年后他转往芜湖皖江中学和安徽公学等处教书，化名金少甫。教学之余，他常给上海《国粹学报》写稿，宣传反清复汉的思想。

1907年春，刘师培应《民报》主笔章炳麟的邀约到日本东京担任《民报》编辑。随他同往的有妻子何震和姻弟汪公权。三人到东京不久，都加入同盟会。

1907年夏，刘师培和东京的日本社会党人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往来密切，在他们的影响下，转而热衷无政府主义。他和张继在东京举办所谓“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和何震创办《天义》半月刊和《衡报》等刊物，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这时他从单纯复汉排满的立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公然反对民族革命，以至“光汉”这个名字也很少使用了。1908年春，他和章炳麟、陶成章等人发生矛盾，与革命党人的关系逐渐恶化。这一年东京同盟会内部各派之间常起纠纷，刘师培妄图夺取干事职权，竟提出要改组同盟会本部。他的提议遭到拒绝以后，对同盟会组织渐有异志。此时，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等为了分化革命党，派人到东京用官职金钱暗中收买留学生和同盟会员，何震、汪公权首先上钩，刘师培也随即变节，投靠端方。

1908年冬，刘师培、何震、汪公权一伙从东京回到上海，

正式充当端方的暗探。当刘师培的反革命面目还未暴露时，他利用同盟会员的身分，常去江浙革命党人在上海的联络机关活动，有时竟能列席会议。1909年夏，他把江浙革命党人准备武装起事的计划向端方告密，江浙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被查抄，同盟会员张恭被捕，武装起事的计划遭到破坏。事后革命党人得知，王金发激于义愤，带着武器找刘算帐，斥责他变节卖友，为革命所不容，宣布要把他处死。刘吓得跪地求饶，表示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全张恭以自赎，才免被处死，从此他不敢再来上海。另一叛徒汪公权自以为无事，仍继续来沪侦探革命党人的活动，这一年冬天终于被王金发处决了。

刘师培的叛卖活动得到端方的犒赏，当年就被延揽为两江督辕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为了邀宠，他向端方上书，建议奏设“两江存古学堂”，培训“国学教员”，妄想日后通过这一班人在各地用孔孟之道去“正人心，息邪说”，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苟延清政府的反动统治。^③1909年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于1910年赶往天津，任直隶督辕文案和学部谘议官等职。

1911年9月，端方以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身分带兵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刘作为参议官追随前往。11月28日端方在资州(今资中县)被所部鄂军起义官兵杀死，刘师培只身逃往成都，后经谢无量介绍到四川国学院教书。民国成立后，刘师培耽心革命党人追究他过去的罪行，常闭门不出，革命党人也耻与往来。1913年，刘到太原，充当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高等顾问。1914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阎锡山把刘师培推荐给袁世凯。刘到北京后，袁委充公府谘议。这个意外的宠

遇,使刘感激涕零,赶忙上了个“谢恩折”,说什么“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称报”,表示愿为新主子效劳。^④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逐渐从秘密走向公开。8月,刘师培追随杨度发起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并担任理事。刘除参加筹安会的复辟活动外,还写了《君政复古论》等文章为袁鼓噪,胡诌什么“天生丞民,无主则乱;事勿稽古,无以承天”,^⑤似乎袁世凯不当皇帝,中国就会大乱,天也会塌下来。奴才的捧场博得了主子的欢心。同年10月袁明令刘师培署理参议院参政,11月又授予上大夫。可是袁的复辟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称帝八十三天就被迫取消帝制,到1916年6月6日独夫民贼袁世凯在内外交困和忧病相煎中死去了。刘师培这个“袁朝”的“上大夫”则活象一条丧家犬,夹着尾巴溜到天津蜷伏起来,更为社会所不耻。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本着他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所谓“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和“惜才”的想法,把困处天津的痲病鬼刘师培找到北大去教经史。

刘师培在北大期间,新文化运动正逐步高涨,后来更高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当时在北大的一小撮封建文人,对积极宣传新文化的《新青年》杂志十分害怕和嫉恨,于是聚集起来商量对策。刘师培也参与其事。他们“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⑥,准备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恢复起来和《新青年》相对抗。针对他们的鬼蜮活动,鲁迅先生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指出:“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⑦信中所指的“侦

心探龙”就是叛徒刘师培。他们恢复《国粹学报》的计划虽未实现,但到1919年初,还是拉起了一个“国故月刊社”,刊行《国故月刊》,奉刘师培为总编辑,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名,和新文化运动相对抗。^③这时刘师培的肺病已更沉重,和他所要“昌明”的“国粹”一样,俱是病人膏肓不可救药的了,就在这一年的11月20日,刘师培在北京死去。刘师培的著作很多,1936年由南桂馨编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出版。

注:

- ①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七,儒林三。
- ② 《刘申叔先生遗书》函一,第1册,总目第8页。
- ③ 刘师培:《与端方书》,同②函一,第1册。
- ④ 陶菊隐:《六君子传》第239—240页。
- ⑤ 同②函七,第15册,《君政复古论》(上)。
- ⑥ 《国故月刊》第1期,“本社记事录”。
- ⑦ 《鲁迅致钱玄同信》,原件藏北京鲁迅博物馆。
- ⑧ 同注⑥。

罗振玉

耿云志

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祖籍浙江上虞，1866年8月8日（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生于江苏淮安。其父罗树勋，曾先后任江宁、清河县丞。

罗四岁入塾读书，十五岁举秀才。1882年、1888年两次乡试落第。1890年至1895年在乡间做塾师。1896年与蒋黼（字伯斧）合作，在上海办农学社，从事搜集翻译外国农学著述，并于次年创刊《农学报》。由于缺乏翻译人才，乃于1898年6月创办东文学社，请日本人藤田丰八及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人员在社中任教。社中只有六名学生，其中有王国维，罗振玉很欣赏他的才识，两人遂结下终生之交。

那时，正值戊戌变法运动进入高潮，罗振玉的政治态度十分保守，对康、梁一流维新志士很反感，皆斥为“浮华少实”而“不与相征逐”。^①因此，当戊戌政变后，清廷极力取缔报纸、查禁书刊时，《农学报》不但未遭封禁，反而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特命上海道拨款资助其继续出刊。自此，罗振玉和清朝一些重要官僚拉上关系，并颇受重视。

东文学社办了两年多，到1900年，罗振玉鉴于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造成的形势动荡，加以经济支绌，遂于是年秋将学社解散。不久，罗振玉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聘请，去武昌当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罗请王国维到武昌任

农务学堂译授。1901年夏，罗辞职。是年，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年底，由刘坤一和张之洞奏派，罗振玉去日本考察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小村寿太郎、近卫笃磨、长冈护美等探知罗与刘坤一、张之洞等清朝重要官员有密切的私人关系，遂频于交往。长冈且邀罗密谈，向他提出劝诱清政府在东北另立“满蒙帝国”的计划。这个企图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后来虽未实现，但罗在归国后曾密招近卫来中国为此事奔走。^⑧

1902年，罗任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1903年冬，曾应邀入两广总督岑春煊幕中参议学务；1904年夏，受江苏巡抚端方委托，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1906年春，罗振玉被调入京，在学部充二等谘议官，1909年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当时，清朝统治者为了抵制革命，搞所谓“预备立宪”，进行一些欺骗性的改制活动。罗振玉十分顽固，主张恪守旧制，反对任何改良。在此期间，罗振玉一度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并奏请学部购运敦煌石窟古文物。这些文物史料后来有相当部分转入他自己手里。宣统年间，罗振玉大力搜购安阳出土的甲骨，先后得三万余片，这是他以后从事考古研究的重要条件。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同当时也在学部做官的王国维，于12月初携眷逃往日本京都，成了亡命遗臣。在日本期间，罗振玉利用他的大量收藏，先后著录《殷虚书契前编》、《后编》及《殷虚书契菁华》等书；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虚书契考释》与《流沙坠简考释》。罗振玉早年即留心于古器物的鉴别，几乎一生未断。他每搜购一批古文物，经过考

校，出书之后便卖掉，然后再买一批，如此反复。所以鲁迅说他是“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③

1919年春，罗振玉自日本归国，住天津。一度举办京旗赈务，与柯劭忞等组织京旗生计维持会。此后，纠合封建遗老，以保存封建文化为宗旨，组织所谓东方学会。不久，即自行消散。1924年9月，罗振玉被清废帝所召，“入直南书房”，^④与王国维一起检理宫中器物。是年11月，清室被冯玉祥驱逐出宫，罗振玉当时是清室善后委员之一。当他看到象征皇权的“御宝”被封时，痛不欲生。据他自己表白说：曾“欲投御河自沉”，然而终觉“不可徒死”，只生了一场病。^⑤病愈后，他与陈宝琛苦心策划，将废帝溥仪从醇王府偷偷地护送到日本使馆。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大使馆庇护下，罗振玉和他的儿子罗福葆于深夜将溥仪秘密送到天津，在日租界“张园”（清末湖北提督张彪的别墅）住下。罗振玉以此有功，被委为“顾问”，经常出入“张园”。后来，罗在遗老之间惹起怨忌，于1928年迁居旅顺。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这时，一向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勾结的罗振玉，认为复辟帝制的时机已到。他对日本军部说：“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⑥日本军部很欣赏他的献计。于是他大肆活动，频频奔走于东北的汉奸与日本军部之间，秘密筹划，成为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炮制伪满洲国的重要汉奸之一。是年11月，日本天津驻军司令部派武装士兵护持溥仪偷离天

津，把他安置在旅顺。罗振玉一心想望溥仪一到东北就能重登皇帝宝座，自己则以“开国重臣”位居显要。但日本帝国主义却决定暂不行帝制。1932年3月，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任罗振玉为伪参议府参议，罗不愿就职。改任伪临时赈务督办，不久亦辞职。1933年，任罗为伪监察院长。是年，伪满日文化协会成立，罗为常任理事，后任会长(1936年)。1933年底，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议决改行帝制，罗振玉是所谓“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1934年3月，溥仪“登极”，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罗振玉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7年6月，罗振玉退休。此后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1940年6月19日病死于旅顺。

注：

- ① 罗振玉：《集蓂编》，《贞松老人遗稿(甲集)》第8页。
- ② 同上书，第14—15页。
- ③ 《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卷，第421页。
- ④ 同注①，第37—38页。
- ⑤ 同注①，第39页。
- ⑥ 同注①，第44页。

江亢虎

曾业英

江亢虎是一个无耻政客和汉奸。他原名绍铨，1883年7月18日（清光绪九年六月十五日）生，江西弋阳人。祖父澍昫，光绪三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父亲德宣，光绪十二年进士，任工部主事。江亢虎十二岁时离开江西，到北京求学。1898年，开始“研习西文与科学”^①。

1901年春，江出于为清朝统治者效劳的打算，中止了北京东文学社的学习，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半年后回国，被直隶总督袁世凯看中，聘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纂。为报袁知遇之恩，他上书袁世凯，敷陈“经世之宏图，中兴之要略”，巴望袁成为“全球万世之伟人”^②。不到一年，复去日本留学。1904年因病辍学。回国后任刑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1910年春，江亢虎出国旅游，经日本而至欧洲各国。他看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海外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影响甚大，就大讲“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以相抵制。7月，江在比利时写成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无家庭主义意见书》。次年春，其父病死南京，这个提倡“无家庭”的江亢虎仍然回国奔丧。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江亢虎由南京避居上海。他以为革命之后，将实行“政党政治”。于是在上海独立后二日（11月5日），他即将两个多月前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

改组为中国社会党。并发表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专征地税、奖励劳动等八条党纲。据江亢虎解释,这些纲领“多与三代井田、学校制度及孔子《礼运》所称道者先后一揆”^③。这说明它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和中国封建阶级思想的杂烩而已。而且它吸收党员漫无限制,“无论何人,不须介绍”,“皆得为党员”^④,且来去自便。这样建立的中国社会党也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政治思想。至于江本人,他曾说“鄙人自闻知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来,见个人本位、社会本位两派极端之冲突,常妄思有以调和而折中之。”^⑤由此可知,他标榜的“社会主义”是与科学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

迫于辛亥革命的迅速发展,江亢虎诡称“赞同共和”^⑥。但又拟就一纸致武昌革命军公开信,以“社会主义家某君”名义,在上海《天铎报》上公布出来。江在信中肆意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并咒骂辛亥革命是“多事以自扰”^⑦。江的卑鄙行径引起了革命派的极大愤慨。袁世凯窃取政权以后,认为“政党”尚有利用必要。因此,对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十分“赞成”,并愿出重金,收为己用,令国务总理赵秉钧加以“保护”^⑧。江也利用中国社会党积极为巩固袁的反动统治服务。1912年夏,他到北京多次晋谒袁、赵,并秉承袁、赵旨意,“遍访各党各界,联络感情”^⑨。1913年7月,“二次革命”发生,江亢虎一面通电全国,要求李烈钧等“四督罢兵回防,行止二次革命”^⑩;一面奔走运动,联络各省商会、教育会共同反对孙中山,“为釜底抽薪之计”^⑪。

同年秋,当袁世凯准备踢开一切政党、团体,以利其大权

独揽时，便首先令中国社会党解散，以“假此立威，为解散一切党会之入手”^⑫。江立即遵命照办。其后，他就离国去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中国文化课讲师，并把家藏的八千多部图书捐赠该校。1917年夏，江又回国搜得两千多部中国地方志去美，为美帝国主义分子的侵华活动提供了大量资料。

1920年夏，江亢虎回国。次年4月，去苏俄旅行。他打着中国社会党的旗号，混进了当时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2年8月，经欧洲回国。9月，他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自任校长。这个曾经见过列宁的江亢虎回国之后，却“深感赤化东渐，颇为人心世道之隐忧”^⑬，遂写《新俄游记》，恶毒攻击十月革命。与此同时，他又从英国费边社的垃圾堆里拾来“资产公有”、“劳动报酬”、“教育普及”和“选民参政”、“职业代议”、“立法一权”等几件破烂，拼凑成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所谓“新社会主义”纲领，兜售于各派军阀之间。妄图以“因势利导”之法，收“曲突徙薪”之功，抵消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革命运动迅速高涨。江亢虎忧心忡忡，如坐针毡。为了抵制革命，他一面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接受苏俄的国际主义援助；一面再三托请清室内务府大臣金梁“介见”溥仪，乞求这位清朝废帝出来“救亡”^⑭。他认为“逊帝英明，前途有望，宜广求知识，博采輿情，用非常之才，以应非常之变”。^⑮他还把自己写的东西赠给溥仪。6月15日，江再次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1月，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作为他投靠北洋军阀的敲门砖。他反复向

军阀们申述：“唯有及早施行社会主义，乃可防止过激思想之蔓延，并可减免社会革命之危险。”^⑩由于中国社会党的反动性和投机性十分露骨，所以当《中国社会党复活宣言》发表后，立即受到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及进步舆论界的抨击。

同年10月，“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段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决定召集御用的善后会议。江马上代表中国社会党声明支持，接着他以所谓“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者”的资格出席了这次反革命会议，并成为段的制宪要员。1925年8月，江亢虎上年“请觐”溥仪的信函和同时期康有为、庄士敦（英人）等人与金梁的来往信函，一起被冯玉祥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查获并公诸于世。南方大学认为江参预“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案件”，因而掀起驱江风潮。江依仗段祺瑞反动政府的支持，以反对他的“教员及学生为赤化派”^⑪，而蛮横地镇压了这一运动。

南大驱江风潮虽然平息，但由于“甲子复辟案件”的牵连，江亢虎已声名狼籍；加上北洋军阀并不理睬他的什么“社会主义”，江不得不在“环顾国中，无可共事”的哀叹之下，决定“退而讲学”。^⑫并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主持南大校务。但他仍不忘为巩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效力。这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举行反共分裂会议，江又跳出来代表“新社会民主党”发表宣言，声称他“谨认”这些右派分子为“先辈友党”，并要和他们“竭诚联络”，一致反共。^⑬1926年上半年，直奉军阀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威胁，在日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谋求反革命联合。江上书吴佩孚，建议他们“扩而充之，以图政学

各界、朝野上下大联合之实现”，“然后赤祸庶几可免”^{②0}。直到北伐战争的怒涛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江亢虎所依庇的军阀统治陷于土崩瓦解时，他才不得不解散新社会民主党，于1927年夏，如丧家之犬，逃到美国。不久，又去加拿大，任加拿大大学中国文学学院院长及汉学主任教授。

1928年秋，国民党南京政府初步稳定下来，10月，蒋介石出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自称“耻于阿附”的江亢虎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连忙上书蒋介石，讴歌这个反革命头子是什么“俊杰”，“丰功骏烈，近古所稀”^{②1}。此后他多次为巩固蒋的反动统治上书言策。1930年7月，江“以海外旁观之身，念兴亡有责之义”，不远万里，向蒋介石提供“速立民宪”，以“免革命而促进化”的“根本大计”^{②2}。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面对日本侵略铁蹄，江在“绝交”、“死守”的幌子下，又向蒋介石献一“不宣战”、“不进攻”，实行民族投降的所谓“治标之策”^{②3}。

1933年秋，江自美回国。1934年，蒋介石为了配合他在军事上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正在玩弄一套“新生活运动”的把戏。江亢虎一眼看出“近来政府当局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其实就是旧道德，不过换了一个新名字”。^{②4}为了配合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江就在这“旧道德”上大做文章。1934年12月至次年春，他在上海以《孔子的人生哲学》为题举行每周一次的定期讲座，狂热鼓吹忠君、孝弟、温良恭俭让等封建道德。说什么“现在君主虽不存在，应该忠于国家”^{②5}，“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②6}，“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②7}，等等，妄

想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放弃武装革命。1935年2月，江特地重刊旧作《善生十箴》，宣扬节欲习劳等一套说教。他自己也虚伪地穿起粗布长衫，住进清凉寺，实行斋戒，决心做蒋介石的“模范新生活运动员”。4月21日，由江亢虎发起，以保存文言、反对白话文和汉字改革为宗旨的“存文会”在上海文庙成立，江被选为该会干事，并主编《讲坛》月刊。

1936年11月，江亢虎针对当时世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大搏斗，发表《我们的出路》。胡说“中道主义”是“防止共产”和防止所谓“独裁”的“正本清源之道”，“不但为中国之出路，实亦世界之出路”^②。妄图诱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放弃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江亢虎多年来一直认为废科举兴学校的结果，使封建的“师道荡焉无存”。为了“宏化育”，“矫时风”，必须恢复封建书院，提倡私人讲学。1937年6月，他刊出《亢庐讲学征收弟子通启》，要青年“自行束脩”，以“最敬礼（依今例三鞠躬）”和“终身归仰”，“决不反戈”的忠心，拜他为师。苦心孤诣为地主资产阶级培养所谓“善人”^③。

抗战爆发后，江亢虎避居香港。1939年9月，他接受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邀请，由港到沪。10月，他发表《双十节对时局宣言》，操着日本侵略者的腔调，叫嚷“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中心，建设东亚新秩序”^④。同时，又一次打起中国社会党的旗号。之后，他为建立汪伪的“中央政府”，奔走于南北伪政权和日汪之间。1940年3月29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江亢虎半生奔走、梦想做官的宿愿总算实现了，他出任伪国府委员和伪考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1940年7月）、院长（1942年3月）等职。他厚颜无耻地诡称，投降日本并非“非卖

国而实爱国”^①。6月1日，江亢虎向汪伪提出旨在压榨人民的《新经济政策建议》，获准“发财政，工商，农矿三部参考”^②。9月3日，他又献出两件“思想防共武器”。他叫嚷要用以佛教、道教、儒教为骨干的“固有的东方文化”和“不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新的社会主义”作为日汪“思想上共同防共之绝大武器”^③。10月，汪伪举行所谓“抡才大典”的高等考试，江受命为典试委员长。他“每早六时即起，夜十二时方睡，所有命题阅卷，大小事必躬亲”^④，为日汪效尽犬马之劳。1944年10月16日，为了适应日寇“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江发表《国际的孔子与孔子的国际》，狂妄主张以“孔子做中心”，建立“孔子的国际”^⑤。

抗战胜利后，江亢虎潜藏南京清凉寺当和尚，后又逃往北京。虽被蒋介石政府抓获，但并未受到应有的制裁。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甚至以“附逆之举，心理上属多矛盾”^⑥，为他开脱卖国罪责。只是由于害怕人民反对，蒋政府才终不敢把他释放。

解放后，江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1954年12月7日，病死狱中^⑦。

注：

- ① 江亢虎：《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3）》，《华文每日》第十卷，第一期。
- ② 《江亢虎文存初编》1944年版，第21、26页。
- ③ 江亢虎致袁世凯信，《社会世界》第二期，1912年5月15日。
- ④ 同②，第117页。
- ⑤ 同②，第100页。
- ⑥ 同②，第114页。

- ⑦ 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第5页。
- ⑧ 同⑦,第46页并参见①。
- ⑨ 同②,第86页。
- ⑩ 江亢虎:《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2)》,中文《大阪每日》第九卷,第十二期。
- ⑪ 同②,第121页。
- ⑫ 同②,第121页。
- ⑬ 同②,第276页。
- ⑭ 同②,第252页。
- ⑮ 同②,第252页。
- ⑯ 同②,第220页。
- ⑰ 同⑦,第44页。
- ⑱ 同②,第272页。
- ⑲ 同②,第258页。
- ⑳ 同②。
- ㉑ 同②,第286、287页。
- ㉒ 同②,第300页。
- ㉓ 同②,第310页。
- ㉔ 《晨报》1935年1月9日。
- ㉕ 《晨报》1935年2月27日。
- ㉖ 《晨报》1935年1月13日。
- ㉗ 《晨报》1935年2月22日。
- ㉘ 《江亢虎最近言论集》,万国道德总会1937年6月版,第83页。
- ㉙ 同⑲,第102页。
- ㉚ 《中华日报》1939年10月11日。
- ㉛ 《中华日报》1940年8月7日。
- ㉜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03册(油印本)。
- ㉝ 《中华日报》1940年9月3日。
- ㉞ 《中华日报》1940年10月29日。
- ㉟ 《申报月刊》复刊第二卷,第十期。
- ㊱ 《中央日报》1946年7月13日。
- ㊲ 据上海市劳改局档案材料。

田 耕 莘

雷镇闻

田耕莘字聘三，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人，生于 1890 年 10 月 24 日。父开良，以教书为业，曾应聘为本县坡里庄天主教小修道院国文教员，并受洗入教。

田耕莘十岁时，父亲已死，得一个外国传教士支持，就学于教会主办的坡里庄小学。1901 年十一岁时受洗入教。1904 年入兖州小修道院就读，1910 年毕业，后即转入本区大修道院攻读神哲学。1918 年 6 月任神父，传教于山东单县、曹州、范县、鱼台县等地。他募捐办小学和短期训练班，用“免膳宿”为诱饵，拉拢青少年入教。

1929 年 3 月，田耕莘加入属德国势力的天主教圣言会，并到山东济宁戴家庄圣言会初学院受训两年，后到嘉祥、郛城等地传教。1932 年 7 月，罗马教廷传信部把山东阳谷、寿张、观城、朝城及范、濮等六县划为“独立教区”，田耕莘任该区代理主教。1933 年 12 月该独立教区改为“阳谷监牧区”，次年 2 月罗马教廷任命田耕莘为该区首任宗座监牧，坐镇坡里庄。1939 年 7 月，罗马教廷又把阳谷教区升格为“宗座代牧区”，委田耕莘为宗座代牧，领主教衔，并召田耕莘去梵蒂冈。是年 10 月底，田耕莘跑到罗马，接受“祝圣”。罗马教皇嘉奖他的阳谷区“教务发展奇速，常列于全国最前若干名之内”，^①并赠金十字一枚。当时参加“祝圣”的共十二人，独有田耕

莘被罗马教皇看成是“若望宗徒”（即罗马教皇最器重的一人）。^③

1941年10月，青岛教区宗座代牧出缺。1942年11月，罗马教皇调任田耕莘为青岛主教，领导德籍教士管辖的青岛教区，因而“惊动了当时的中外人士”。^④田耕莘到任后，除大力传教外，并抢购大量德国颜料，进行投机倒把，“获利甚多”，^⑤使青岛教区从负债累累一变而为有基金“若干万”美金，田耕莘因而获得善于理财之名。^⑥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海军侵占青岛，帮助蒋介石输送军队物资，准备发动内战。田耕莘急忙投向美国，对美侵略军关怀备至，美国海军中一个天主教信徒写了一本田耕莘“小史”，为他树碑立传，夸奖他说：“美国海军驻扎青岛，多蒙田公殷情款待，慈父之怀，令人难忘。”^⑦

1945年12月，罗马教廷任命田耕莘为中国第一个枢机主教。1946年1月，田耕莘由美国枢机主教斯培尔曼陪同，乘坐美军用飞机赴罗马举行就职“祝圣礼”，行前，曾受蒋介石接见。4月，罗马教廷宣布中国“成立正式教统，划全国为十二教省”，^⑧5月，任命田耕莘为北平总主教，主持全国教务。6月初，田耕莘返国，立即跑到南京去“晋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他“优礼有加”。^⑨田耕莘就任北平总主教后，即派青年神父入大学深造，把本教区的小修院改为耕莘中学；在北平成立上智编译馆和圣多玛哲学院；同时指示凡修会能维持一堂区者，即划分堂区，千方百计扩大教会的势力和影响。

1948年6月北平解放前夕，田耕莘跑到上海。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又跑到香港，随后逃到美国。1957年9月，他曾

窜到台湾活动。1958年8月他在西德因车祸受伤,10月去美国施行移骨手术。接着又带伤赴罗马参加新教皇的选举投票。1959年6月再去美国。同年12月4日,罗马教皇若望廿三世任命田耕莘为台北总主教,次年3月到台湾任职。他一上台,即成立若瑟修院、托玛斯神哲学院及耕莘医院等,并任辅仁大学董事长。1962年他到罗马参加天主教大公会议。1963年他参加新教皇保罗六世的选举。1964年他又跑到美国为台湾教会“募捐”,这时,他的反动宗教活动已日暮途穷。1965年3月,田获罗马教廷批准辞职,退居台湾嘉义圣言会。1967年7月24日病死。

注:

① 方豪:《田耕莘》。

② 《田枢机主教传略》,见天津《益世报》1946年6月30日。

③⑥ 同②。

④⑤⑦ 同①。

⑧ 见吴智德辑:《公教信友手册》第33页。

余日章

雷镇阁

余日章，原籍湖北蒲圻县，1882年11月25日（清光绪八年十月十五日）生于武昌。父余文卿，早年加入基督教，为中华圣公会牧师。

余日章从小入教，并在教堂附设小学读书。1895年入武昌文华书院。190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由于教会学校多年的熏陶，“这时他对于宗教运动已感有热烈的兴趣”。^①

1905年春，余日章返武昌任文华书院附中教员。1908年秋，靠美国传教士帮助，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教育科，1910年毕业，同年12月下旬返国。次年春，任武昌文华大学附中校长。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组织红十字会，自任总干事，并充黎元洪的幕僚。不久，在黎元洪任都督的军政府外交部任交涉局局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英文秘书。

1912年，余日章加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次年任该协会演讲部主任干事，曾到江苏、广东、云南等地宣扬基督教义，并鼓吹什么“教育为立国的基础”。^②从此开始了他以基督教活动为主的生涯。

1916年，余日章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代理总干事，1917年9月正式任总干事，以后连任达十七年之久，其间1923年到1928年还兼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成为

中国基督教界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

余日章一生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极力兜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人格救国论”，反对社会革命，认为中国所以衰弱，是因为所谓道德的“退化”，只有皈依基督，才能修养人格，富强国家。这种荒谬的“人格救国论”，实际上是“基督教国论”。

余日章成为中国基督教界头面人物后，又以“民间”姿态频繁地参加政界活动。他曾多次为当时反动政府派出访美，主要的有：1915年5月至9月，参加当时袁世凯政府农商部的“实业考察团”赴美考察，任该团名誉书记。这次访美的目的是所谓“联络邦交，促进实业”。^③余作为该团发言人，在遍访美国大部分重要城市时，作了九十次讲演，他很会迎合美国某些人士的心理，使他们感到“没有一个从外国来的人曾使我们这样兴奋过”。^④1921年11月，余又以“国民代表”身分随北京政府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抵美后，他奔走于美朝野人士之间，到处介绍“中国实况”，并“征询”美方对会议的“意见”，幻想美帝国主义会“赞助中国”。结果，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烟幕下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合法”根据。1927年7月，余又率代表团赴檀香山参加太平洋国民会议，在会议发言中，他竟引中国古时有兄弟因闹分家打官司，经人劝导后复和的故事，妄图去“劝导”侵略中国的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发“善心”，与中国讲和睦相处。^⑤1932年8月，余日章去美国治病，他曾面见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梦想要美国对日侵华有所遏制。^⑥次年9月回国。

1934年，余日章病重，辞去青年会总干事一职而任名誉

总干事。1936年11月22日死于上海。

注:

- ① 袁访贵:《余日章传》第3-4页,青年协会书局出版1948年6月版。
- ② 同上书,第25页。
- ③ 同上书,第42页。
- ④ 同上书,第42-43页。
- ⑤ 同上书,第100页。
- ⑥ 同上书,第126页。

附录:

《中华民国人物志》中的 《民国人物传》选录草案

《中华民国人物志》分三部分：其一为《民国人物传》；其二为《人名辞典》；其三为《人物表》。这个草案是《民国人物传》暂订的选录标准。

一、传记选录人物限于：自1905年同盟会创立起，至1949年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灭亡止，这四十五年间的著名人物。

二、传记选录的人物，暂定范围如下：

- (一) 清末（1905年后）反动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
- (二) 1905年后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同盟会革命活动中牺牲的著名烈士。
- (三) 1905年后人民自发反帝反清斗争中著名的领袖和烈士。
- (四) 1905年后改良派的重要人物。
- (五)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主要党派、政治团体的首领和主要活动分子。
- (六) 历届“国会”和相当于“国会”的各种代表会议（如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蒋介石的国民代表大会等）

的议长、副议长(或主席、副主席)和重要议员(或代表)。

- (七) 北洋军阀政府首脑及总理全部列入。各部总长、次长最重要者列入，各省、区、地方的都督(或将军、督军、督理、督办)、都统和省长亦择其重要者列入。
- (八) 护国、护法和国民政府时期，南方各届政府中的首脑，以及重要的部长、军长、师长。
- (九)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间自发斗争中的著名人物。
- (十) 国民党政府首脑全部列入。院长、部长、各省市的省长、市长之重要者。军人限于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的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等。特务机关中的主要头目。
- (十一) 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对派政府(如两广政府、福建政府)中的重要人物。
- (十二) 伪“满洲国”等六个傀儡政权中臭名昭著的汉奸。
- (十三) 在中国直接从事侵略活动的重要帝国主义分子。主要的“外国顾问”。
- (十四) 金融界、工商界著名的资本家及其主要代理人。
- (十五) 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卫生等各界的知名人士。
- (十六) 少数民族重要人物、华侨知名人士、宗教界著名人士等。

(十七) 帮会首领、土匪头目、黄色工会头目等。

三、著名人物中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党内有相当影响者,以党史记载为宜,此处不列入。

四、凡是在世的,一律不写传,只积累材料。

五、目前先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分类列名,全部写成后,拟一律按笔划顺序排列。

一九七八年九月